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

Chinese Anarchism Archives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

Chinese Anarchism Archives

安那祺主义文库 C-1



 中日美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19209-0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ville,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Editor 编辑: Jing Zhao 赵京, jzhao@mail.h-net.msu.edu

China Distributor 中国发行: Ping Wang 王平, wang@dt02.com

Edition 版本: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Version 印次: 1st Printing 第1次

Date 日期: November 11, 2009 2009年11月11日

目录

1.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收集自安那其研究

<http://raforum.info/spip.php?rubrique727&lang=fr>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之《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删去与安那祺主义无关的中国社会党的资料。
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杨奎松、黄士伟著《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评论。
4. “怎样建设真正平等社会”至“无政府主义原理”等文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18卷。
5.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
6. “信仰与活动”、“小小的经验”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12卷。
7. “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收集自《巴金代表作选》上海全球书店印行，1940年4月再版。
8.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我们的宣言”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17卷。



（刘师复，1884-1915）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

申叔（刘师培）

1907年7月25日、8月10日、9月15日《天义报》第四、五、七卷

现今倡无政府主义说者，一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一为共产无政府主义，一为社会无政府主义。而吾等则以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试述其理论如下：

一、总论

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平等者，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独立者，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自由者，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与人之谓也。此三权者，吾人均认为天赋。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也。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或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限制个人之自由权。此吾人立说之本旨也。

二、人类平等之确证

人类平等之说，试证之历史，验之物理，其所得之证，厥有三端：

甲、人类同源说 ……人类既出于同源，则今日世界之民，虽有智愚强弱之殊，然在原人之初，则固同出于一族，乃确然处于平等之地位者也。

乙、原人平等说 原人之初，人人肆意为生，无所谓邦国，无所谓法律，人人均独立，人人均不为人所制，故人人俱平等，此即原人平等之说也。当西历一千五六百年，欧西学者，有哥路志哈比布番，多谓人生之法，全溯源于天性，人之权利，全出于造化之赋与。卢梭天赋人权之说，即由是而生。卢氏作民约论，谓人之初生，皆趣舍由己，不仰人处分，是之谓自由之民；又谓古无阶级，亦无压制，故民无失德。近世持进化学者，虽痛排卢氏之说，然于原人无邦国，无法律，则固无一语相排。如最近社会学，多因进化学发明，然考西哲

社会家诸书，于原人之初，均确定其无组织，则卢氏以原人为平等，独立之民者，固为学术上不易之公理矣。盖人类不平等之制，由于后起，非人类之天性然也。

丙、同类相似说 昔罗马乌尔比安谓：“世界有自然之法，此法律不独属于人类，凡一切动植物，皆受此法律之支配”。近世哲学家以此法为天则，谓天下事物，均以自然定规之活动力，即变形变化之际，亦各有一定不易之定规。……人类亦然，自佛经言人之身中，各具四大，是人身虽殊，其所含原质则同。又据近世生理学所发明，亦谓人身之中，合诸种之原质而成，无论若何之人类，其所含原质均同。所含之原质即同，则所发之能力，亦宜相同。若今日世界之人类，因进化有迟速之殊，遂有强弱智愚之分别，其故何哉？则以所居之地，有气候地势及生产物之不同。其有进化较速者，则以外界所感之物，足以促其进化；若进化较迟，则又以外界所感之物，足以阻其进化，不得援此为人类不平等之证也。……人类之进化，有迟速之不同，大抵与此例相符。故人种有优劣之分，谓其受外界所感不同则可，若据此以证古初人类之不同，夫岂然哉！故古代哲学家，多倡人类平等之说，中国孟轲之言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释迦兴于印度，亦倡众生平等之说。岂非同类相似之说，不独可证之于科学，即前人所明之哲理，亦早有言之者也。

即此三证观之，则人类平等之说，非无稽之词。故人类平等者，出于天性者也，起于原人之初者也；人类不平等者，出于人为者也，且出于后起者也。则试将人类不同等之原因胪列于下。

三、人类不平等之原因

自希腊阿理斯多得谓人类不平等，或为人上，或为奴隶，皆天之所命。而荷兰亘鲁士，莫人遏必，均援其说，以为人民应属于帝王。然卢梭民约论，已痛斥其非。……况证之历史，则原人平等之说，历历可证，其由平等易为不平等者厥有数因：

甲、阶级不同之原因 人类之初生，固众人平等者也，无尊卑上下之分。且既为人类，必不甘服从于人类之下。然信教为上古人类之一端，上古人民，莫不信教，虽犷顽至愚之俗，亦鲜无教之民。……西哲所著社会学书，均确定信教为原人之本性。夫原人之信教，均以人世之外，别有神只，其识迥超乎人类，而操人世统治之权，其

所以降心服从者，则以神非人类，可以降福而弭灾。故人民之最黠者，亦假神术以愚民，人民见其假神术以愚民，遂并疑其亦非人类。观英人甄克斯有言：图腾社会，有巫无酋。巫者也，即以神术惑民之人也。民因信神之故，遂于以神术惑民之人，亦信其非民所可及，而尊奉之心生。既为人民所尊奉，则必为天神之化身，或确认为天神之代表，不复视为人类，故确定其居己身之上，与以统治之权，而己身甘于服从，此即酋长之始也。故上古之历史，均为神话史。如希腊之女神，中国之盘古是也。而各邦之酋长，又均以教主自居。始也有巫无酋，继也以巫为酋，君主之制，出于酋长，而酋长即上古之巫，此又社会进化之公例也。由是言之，则世界之民，所以承认君主者，以其身为教主也；所以承认君权者，以其兼握神权也。罗马帝加利互拉之言曰：人主神也，人民禽兽也。中国说文亦曰：圣人感天而生，天祐而子之，故曰天子。足证君主即天神之说，为欧亚所同。故君主亦利此名，称天为治，操握一国之政权，以肆行专制。必然以方士辅政，如中国皇帝相风后鬼容区，以及日本之天外，印度之婆罗门，犹太之体金牛是也。以僧正治民，如中国遣义和四子于四方，巴比伦于各地设大僧正是也。而一切道德法律，均由宗教而生。至于今日，人民于各国君主，犹默认其为天所立，如中国称君主曰天子，日本称君主曰天皇，俄，土二国以君主为宗教长，即西欧各国宪法均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一条，此其证也。岂非确认君主非人类之证乎。惟其信君主非人类，故守其法律，从其命令，畏其权力，而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又依附君主之权力，以居于齐民之上。此自古及今之社会，所由成为阶级社会也。今西哲斯宾塞耳诸人，既倡无神之论，并神且无，则昔日君主之缘饰神权者，均为诬民之说，而君主即天神之说破矣。君主既非天神，则君主亦人类之一，君主既为人类之一，则君主不可居民上。非惟君主不可居民上也，凡一切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其依附君主而起者，均当削夺其特权，而使人类复归于平等。

乙、职业不同之原因 上古之初，人人自食其力，未尝仰给于人，以未尝受役于人，虽所治之业，至为简单，然分业而治，则固上古所未有也。至生口日滋，地方养人者日蹙，天然之生物不足以给其所求，不得不出于相争，而相争必分胜负。其有胜负之由，或由多数攻少数，或兵器有利钝，或地势有利有不利，原因甚多，不得援此谓

人类强弱不平等也。战胜之民，对于战败之民族，始也逞屠戮之威，继也虏获其人，夺其自由，使之躬操贱役，以从事于生财。亘鲁氏之言曰：“战胜虏敌得杀而无宥，于是就虏者弃其自权而求活。”卢骚驳之，谓：“彼对于所虏之人，必曰徒杀之无益，不如夺其自由权之为愈，非有爱于虏也，直自利耳。”近世社会学诸书亦曰：“蛮夷以食少而出于战，战而人相食者有之，及生事稍疏，无所取于相食，而斯时力役为最亟，以为奴隶。”此均责俘囚以服役之证也。由是战胜之族，舍工作而服务，以服农服工之役，责之昔日之俘囚。如中国昔日之为农者，均系苗民；印度昔日之为农工操苦役者，均为首陀罗；而希腊、罗马均以平民服农工之业。胜者居于督制统系，而败者居于供给统系，此即以职业役人之始也。然多数之俘囚，属于一族之下，与牛马同。人人治共同之业，则不可专精，惟人各一业，则其业易专，而生财之数，亦必倍蓰。由是俘囚之中，亦分业而治，此即人类异业之始也。厥后昔日之俘囚，稍得自由，遂各出其技，以为谋食之资。然无论何国，农工之级，均不与贵族及官吏相齐，岂非贵族及官吏，于农工之民，犹确认其为受治之人乎。习俗相沿，则此为治人之人，彼为养人之人；此为乐佚之民，彼为勤苦之民；此为倚于他人之人，彼为役于他人之人。此则人类苦乐不能适均之由也。谬者不察，妄谓人类不齐，当有劳力劳心之别，不知所谓劳心者，外托狂傲之名，而阴以遂其懈惰之性。役使众民，仰其供给，世界安能容此惰民耶？惟明于人类之异业由于役使俘囚，则凡人生日用之物，可以不劳而获者，均为役人而自养，则苦乐不均之制非矣。

丙、男女不平等之原因 上古之初，行共夫共妻之制，未尝有女下于男之说也，亦未尝以女子为私有也。厥后两部相争，战胜之民，对于战败之族，系累女子，定为己身之私有。观希腊、犹太、波斯、罗马古史，于战胜他部，必言掠妇女若干人。又中国蒋济万论引皇帝言，谓：“主失其国，其臣再嫁。”又蒙古之初兴，其攻克一国，必尽俘其女子，以分给己部之民，此即沿蛮族战胜他族之遗制者也。惟其掠女子他部，故遇之如奴隶，使之受制于男，又虑其乘间私佚也，故防范之法，日益加严，而视女子为至贱。于女则禁其多夫，于男则许其多妻，习俗相沿，遂以为天然之天则，如东洋之学术礼法是也。故女子属于男，出于劫迫。若亚洲波斯诸国，以及欧洲北境诸民，当中古以前，卖买妇女之权，均操于男子，盖其视女子也，以为卤获品

之一端，故卖买妇女，均可自由。今耶教诸国，虽行一夫一妻之制，然服官之权，议政之权，近日女子间有获此权者，服兵之权，均为女子所无，与以平等之空名，而不复与以实权。又既嫁之后，均改以夫性自标，岂非确认女子为附属物耶，岂非夺其实权而使之永为男子所制耶。又西人初婚之后，必夫妇旅行，社会学家，以为古代劫女必谋遁避，今日旅行，即沿此俗。此亦女子为男子所劫之一证也。故今日之世界，仍为男子之世界，今日之社会，仍为男子之社会，安得谓之男女平等乎？惟明于男女不平等，由于古代以女子为俘囚，则知男女不平等由于强迫使然，不得谓之合公理矣。

以上三事，均足证人类不平等，由于后起，并足证人类不平等，均沿古昔陋恶之风，安能不矫之使平乎。

四、人类有恢复平等之天性

今科学诸家，所发明之公例有三：一曰两性失调和，则冲突以生；二曰气体之物，偶受压力，改其体积或形状，仍具欲复原形之性；……三曰液体之物，压力偶加，即生激力。足证物不得其平及外受压力者，虽在无机之物，犹有抵力之发生。又观物类之中，有转避障碍之天性。譬如树木甲坼之初，其根为瓦石所障，不克茁生，则必转向瓦石之间隙，以遂其茁生之性。人类亦然。如蛮民逐水草迁徙，向此方而行，若遇大川大山之障蔽，则必改向他方。足证人物有避障碍之天性。既以避障碍为天性，则凡阶级制度，足以障遏人民者，均背于民生之天性。若夫人民嫉阶级社会，与之分离，则又遂其本性之自然，不得谓之拂于人性也。况即世人之心理观之，人类之心，约分三种：一为自利心，二为嫉忌心，三为良善心。嫉忌之心，由对待而起，一由欲奋己身，冀与人齐；一由欲抑他人，使与己平。欲奋己身与人齐，如贱者欲贵贫者欲富愚者欲智是也。欲抑他人与己平，如孺子于他童所有之物必潜行破坏；又乡野之民，得一宝物，互相竞执，甘碎其器是也。其意以为我所不能有之物，亦不令彼有。由前之说，则由羞心而生自利心；由后之说，则由愤心而生破坏心。蔽以一言，则嫉忌心者，所以愤己之不能与人平等也。自利心者，又由嫉忌心引起者也。自利之心，虽非一端，然皆因他人获此利，然后己身步其后尘，自利之心由不足而生。不足者，因他人能足，己身不能足，比较而生者也。纯乎由比较及争竞而生者也。若夫良善心则不然，如不义之人，思遂害人之念，欲行顿止；又如一人向隅，满堂为

之不乐，孺子入井，乍见者皆思援救。是则良善之心，由自然而生。中国儒家谓之仁，欧人康德谓之博爱，克鲁泡特金则谓之互相扶助之感情，其名虽殊，均执此良善之心言。人类所以发此心者，所以悯人之不与己平等也。由是言之，则己身不等与人平等，久为人类所共愤，他人不能与己平等，又为人类所共悯，在己则欲其与人平，在人则欲其与己平，岂人民之天性，均以人类平等为心乎。使人人充其嫉忌之心，扩其良善之心，则凡不平之社会，必扫除廓清。及人人苦乐适均，归于完全之平等，则嫉忌之心不生，嫉忌之心不生，则无由引起其自利之心，而互相扶助之感情，愈以发达，其道德之进步，必非今日能跻，此则按人之性而莫之或爽者也。不然，恶声相加，何以必反唇相诟，两仇相厄，何以不反兵而争，则人类维持平等权之故耳。又观于欧美平民之革命，或排异族、或诛王室、或抗富民，此非尽出于自利之心也，大抵由不平之心而生，岂非人类之中，有恢复平等之天性乎？岂非今日之人类，有趋于平等之现象乎？盖人类希望平等，乃人民共具之心也。

五、世界人民不平等之现象

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以致受凌受役之人，日受无穷之压抑。试将世界不平等之现象，分列如下：

甲、政府之于人民 野蛮之国人民之自由权尚克维持，文明之国人民决无自由权。试观之中国，由两汉以迄于今，虽为专制政体，然去国都稍远者，均为政府干涉力所弗及。欧洲中世纪，国家之权利亦未克扩张，故人民自由联合之团体，有村落同盟、有都市同盟、有商业结社。至于十六世纪，则强暴之帝王，以强迫之命令，剥夺自由结社之权，而中央权力日张。至于今日，虽人民与政府抗争，获组织社会之权利，然解散之权，悉操于政府。加以交通机关，日益发达，而杀人之器，日益发明，偶有反抗，则草荆禽莠。又巡警侦探，分布于都市，名曰保全社会之安宁，然关于公众之利害，漠不关情，惟注意于捍卫政府，故巴黎、伦敦、纽约诸都市，杀人窃盗之事，日有所闻，而在下者之举动，则增无形之束缚，并失自由之权于无形，则所谓保全社会安宁者，实则仅保全在上者数人之安宁耳。况复贱民以逞，凶暴横加，克鲁泡特金曰：昔之神今之国家也。又曰：监狱者犯罪之大学也；裁判所者凶恶之小学校也。裁判官者，施残忍之法者

也，侦探者，作法庭之猎犬者也，狱吏者，罗刹之化身也。如俄国近岁以来，残杀志士，几至万人，复捕缚国事犯，流谪荒野，幽闭牢狱，其横死于狱吏之手者，又不可胜记，今且捕获代议士，以立政府之威。日本亦然，一罢工而捕者千百人，一倡社会主义，则遏其言论，禁之监狱。虽以法美民主之制，犹且以暴力削平民党，以焚如之刑，加及刺杀统领之人，近则北美政府，且禁言论之自由，此非所谓强凌弱之制耶。又立宪诸国，一国之政权，或操于政党，然彼所谓政党者，以虚伪之演说，蛊惑众听，一党得志，则扩张党员之权力，以遏抑他党，安得谓之为国民全体谋幸福耶。即改君主为民主，然既有政府，即有统治机关，权关者，权力之所集也。既有机关，必有掌握机关之人，而掌握机关之人，必有特权，彼握特权，而人民听其指挥，是不啻以千百万之民，而为数人之奴隶也。即使统治之人，出于普通选举，然选举之时，均以投票之多数决胜负，譬如一国之中，有千万人，及投票选举之期，其被选之人，共得九百万票，不可谓之非多数矣，然失意者仍有几万人。又如议院之议政，亦凭多数决从违，譬如议院之中，有议员千人，及议政之时，有九百人同操一议，不可谓之非多数矣，然失意者仍有百人。故议院之制，民主之政，蔽以一言，即众者暴寡之制也。以众暴寡，安得谓之平。况所谓议员者，均营求入选，所费之金，无虑巨万，即美法二国，亦复政以贿成，近美国桑港市长且以所贿著闻。此虽议员官吏之咎，然政府实总其纲维。是知今日之政府，均残民之政府，亦即舞弊之政府也。故吾等谓既设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财之机，安得谓政府非万恶之源也。

乙、资本家之于佣工 世界自古及今，舍阶级社会而外，无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之人，而只享权利不尽义务者，厥惟资本家；亦无只尽义务不享权利之人，而只尽义务不享权利者，厥惟佣工。是则资本家者，兼有昔日贵族、官吏、教士之特权者也，佣工者兼有昔日平民、奴隶之苦况者也。夫今日之资本家，为其中最富之人，然彼等之富，岂果有勤勉及节俭而得乎？试溯地主之起源。彼拥富饶之土地非一己之力所开拓也，亦非以巨金购之他人也。其在欧洲各国，则由昔日战服他族，各占其土地为私有，或因有功于君，赐以多数之土田。其在美澳各洲，又由殖民之初，斥逐蛮民，各占其土田为私产。则今日所谓土地私有者，均强者对弱者之掠夺耳。试更溯富商之起源。大

抵无赖黠徒，观时变以射利，利用时机乘贱贩贵，而所获之利，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故今日之经商致富者，均用欺诳之政策者也。积此二因，而资本家之势成。欧洲社会党有恒言：彼等之富，均不法掠夺之结果也。浦鲁东亦曰：彼等所为，直盗贼耳，足证欧人贱视资本家之心亦。资本家既拥有土地资财，地多则以生财，财多则以购地。然财非己力所能生也，必役使他人以为己用，此佣工所由日多也。然彼所谓佣工者，其始均独立之民也。及富者挟其资产以竞利，均较贫民占优胜，故垄断市利，无往弗宜致，小民之营业者，鲜克支持，不得不为资本家所兼并。加以机械盛行，非贫民所能备，资本家利用其机，遂独占生产之机关。而土地家屋机械，悉入于少数资本家之手，人民之失业者，不得不为资本家司工作，而最大多数之平民，悉为彼等所役使。名曰佣工之制胜于奴隶，然今日所为佣工，实劳力卖买之奴隶制度耳。及所役之人日多，则所生之利愈广，所生之利愈广，则兴利之术日繁，而所役之人亦愈众，故彼等之富，均工人血汗之所易也。佣工忍非常之苦痛，以劳动与工场，迫于衣食，卖其劳力，而所制物品，其利益悉为富民所吸收。于己身所制之物，转欲购之于市场，而所得赁金，或不足以购所制之物品。加以工场所制之物，或非民生日用所必需，故欧美各国，于物之关于众民生活者，若谷、若布，恒苦缺乏，而贵重之货，无益之物，充满市场，以致民生日用之物，价值日昂，使佣工日迫于贫。佣工既贫，所得不足以糊口，不得不争赁金，欲争赁金，不得不出于同盟罢工。资本家对于此举，或将所役佣工，尽行解雇，使数万失业之民，迫于死亡之残；或借用国家之威力，镇以重兵，肆行虐杀。试即近数岁之事言之，如法都巴黎，枉杀劳动者三万人；而美国资本家，则对于同盟罢工，私役军队。以彼民主之国，其虐遇佣工犹若此，则他国富民之不法，更可类推。呜呼！富民之财悉出于佣工之所赐，使无佣工之劳力，则富民无由殖其财，今乃忘彼大德，妄肆暴威，既夺其财，兼役其身，非为夺其财产权也，并且夺其生命之权，此非不道德之极端耶。故资本家之道德，最为腐败，进网市利，退拥良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以奢淫相尚，以纵乐为生。加以财产既盈，国家欲从事争战，不得不索之富民，致国会议院，均以有财产者充其选。而财产愈丰者，其行贿之金亦最巨，故一国贵显之职，咸属于少数之富民。名曰普通选举，实则多数之贫民，屈于地主一人之下，贫民衣食，系于土田，而土田与夺之权，操于地主，及选举届期，贫民预保其土田，势必曲意逢

迎，咸以地主应其举。故富豪不啻世袭之职员，而多数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岂非天地间一大隐痛耶！故贫富不平等，至今日而达于极端。蔽以一言，则今日之世界均富民之世界也。役使贫民，等于异族，贱民以逞，甚于暴君，非惟为社会之大蠹，亦且为贫民之大敌。盖此乃世界未有之奇变也。中国数十年后，使非实行无政府主义，亦必陷于此境。

丙、强族之于弱族 近世以来，欧美各国侈言帝国主义，挟其兵财，雄视世界，推其原因，一由国权利之扩张，欲逞国威于境外，一由资本家欲扩充商业，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积此二因，遂成戕杀之世界。故强族对于弱族，立于绝对之不平等。始也施之于南洋群岛，继也施之于美洲，继也施之于非洲，近且施之于东亚。对于未开化之民族，则横肆强暴，锄戮其民，占其土地为己有，其遗民仅存者，则役之若牛马，或蹙之山谷之中，使彼族归于消灭。对于稍开化之国，则始假通好之名，吸其利源，贿其政府，以扩张己国之实权，及权力日张，则又代之施政，驻以重兵，以灭人国于无形。致昔日之邻封，易为属土，既为属土，则施其贫民弱民愚民之策，征重税已绝其富，禁藏甲以绝其强，废实学以塞其智，禁其团结，遏其交通，或刳割如牲畜，不复待以人道，或施行伪道德，为托宽大之名，然其不平等则一也。夫昔日罗马待遇藩属，均与以自治之权，即蒙古、回民，征服他国，惨酷无人理，然未尝尽遏其生机，未有如白人之失德者。试观加拿大、澳洲，名为自治，实则其权全属于白人，与土人无与。杜兰斯哇以力战而获自治，菲律宾群岛以抵抗而得选举权，印度虽有助英之功，犹不得自治，若马来群岛及非洲更无论矣。是则欧美各国，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肆彼凶残之毒，虐使无告之民，视白人为至尊，而赤黑诸族不以等夷相视。据印度人所自言，则英人虐遇印人较往日蒙古为尤甚，学者不得讲政治法律，仕者不得居尊官。又据安南人所言，则法人之于安南，设税目数十种，人民鬻妻卖子，犹不足尝，数人以上，不得相聚，而人民私往他国者，治以重刑，联及家族。又据西人书报记载，则俄于波兰，虐杀义士，禁止集会，并废灭波兰文字；其遇犹太人民，尤为惨虐，其无罪而见杀者，不知凡几，甚至鬪村遭屠。美人号称平等，然于赤种之民，无复权利之可言，及黑奴解放，名曰有参政之权，然而：“美人于黑种，虽以平等叫号于市朝，名曰预选举参政权，其事乃绝相反。徒以容貌之

黑，遂沦落于社会之下层，其间有财质贤明财产众多者，犹不得与白人同伍。所定区划，黑人逾之，则放逐于规外，斩杀惟命，而白人逾之则无罪，虽乞儿无赖愚不知学者，一切视之同等。凡关于政治之事，则曰此吾白人所为也，有于白人之主配权而不赞成者，不曰卖国奴，则曰国事犯罪者矣。”观于以上数事，则白人之恶，不减于禽兽，舍白种而外，则权利尽失，并奴隶而弗如，可谓良心尽泯者矣。此不独欧美政府持此谬说也，其国民亦然。即有一二言社会主义者，犹曰其利只当及于白人。。。即杜尔伯特诸人，亦深嫉白人无道德，可谓探源之说矣。乃行此主义者，犹假二说以自饰，一曰强权，二曰爱国心。于至恶之事而以善自居，是何异佛经所称之罗刹女耶。试观白种之人，非惟虐遇属地之民也，即他国之民居彼土者，亦待之如奴虏，如南非之待开矿华工，美人之待华民均肆行非礼，近且以虐待华人之法，施之于日人。惟其原因，则由人人自私其国，于己国人民以外，不复以人类相视，故横行强权，不复视为非理，致近日之世界，易为强凌弱之世界，可不惧哉。

要而论之，以上凌下，政府之弊也。以富制贫，资本私有之弊也。以强凌弱，国家之弊也。惟其有政府，故仅利政府，不惶利及人民；惟其资本私有，故仅利一人，而不惶利及公众；惟其有国家，故仅利一国，而不惶利及世界。虽然，保护资本家者政府也，代表国家者亦政府也，故政府尤为万恶所归。人类生于今日，安能筹及改造世界之策哉。

六、改造世界之理想

今之欲改造世界者约有二派：一为社会主义，一为无政府主义。试溯社会主义之起源，自希腊柏拉图倡共产之说，厥后基督教会，亦冀实行此制。及欧洲中古之际，则村落之组织，都市之同盟，亦或与社会主义相合。至于近世，学者嫉富民之压制，竟倡社会主义，或依宗教，或依哲理，或依科学，然推其立说之大旨，大抵谓生产机关，均宜易私有为公有，依共同之劳动，蓄积共同之资本，即以此资本为社会共同之产业，以分配全部之民。近数十年，欧洲之地，有共产党宣言，有万国社会党大会，而各国社会党，或抗争选举权，或运动同盟罢工，夫依此策而行固足以颠覆资本家。然观近日社会党之所为，其欲离现今之国家而别图组织者，虽有其人，然其余硬软二派，或欲运动政府，或欲扩张本党权力于国家，宗旨虽殊，其承认权力集于中

心则一也。认国家之组织，以归此支配力于中心，而公众之民，悉服从其支配之下，虽政体悉改为民主，然掌握分配机关之人，必有特权，岂非多数劳动之民，昔日为个人奴隶者今且易为国家奴隶乎。向使强暴之国家，利用此策，托集产之名吸收一国之利源，又托支配之名，以妄施干涉，如中国汉武、王莽之所为，夫汉武、王莽之所为，喝尝非国家社会主义，乃既行以后，转以病民。虽曰今日之社会主义，主动之力，在于平民，与中国主动之力发于君主者不同，然支配之权，仍操于上，则人人失其平等之权，一切之资财，悉受国家之支配，则人人又失其自由权。盖仅能颠覆资本家之权，而不能消灭国家之权，非惟不能消灭国家之权也，且将扩张国家之权。蔽以一言，则承认权力集于中心之故耳。故不废支配之机关，此社会主义所由劣于无政府主义也。无政府主义虽为吾等所确认，然于个人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共产、社会二主义，均有所采。惟彼等所言无政府，在于恢复人类完全之自由；而吾之言无政府，则兼重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盖人人均平等，则人人均自由。固于社会主义之仅重财产平等者不同，亦与纵乐学派之主张个人自由者不同也。

七、实行无政府之方法

吾人观于今日之世界，凡赤十字社平和会社会党以及电报邮政之属均万国联合，确信人类有破除国界之一日。又观于近今欧美国民，虽处共和政体之下，犹复暗杀大统领，狙击职官，而人民暴动之事，亦日以增加，确信人类有废灭政府一日。故吾人所持之说，在于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颠覆一切统治机关，破除一切阶级社会及分业社会，合全世界之民为一大群，以谋人类完全之幸福。今试将其最要之纲领列于下：

甲、废灭国家，不设政府；乙、破除国界、种界；丙、不论男女，及若何之年，即服若和之工役，递次而迁，实行人类均力之说，以齐人类之苦乐；丁、实行男女上绝对之平等。

以上四端，均吾人之目的也。然欲达此目的，必有实行之方法，试述之如下：刊行书报，开通人民，宣播无政府主义；演说疾苦，运动人民；组合劳动团体（罢工、抗税、诛民贼、暗杀）；颠覆政府。依斯而行，庶平等之目的可达，无政府之主义亦可达。所谓人类完全之幸福者，其在斯乎！

八、结论

无政府主义非无稽之说也，蔽以一言，则无中心、无畛域已耳。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故可无国家。欲说明其理，非片言所能罄，故此篇仅主平等立论，以证特权制度之非。

女子解放问题

震 述，1907年9月1日，10月30日《天义报》第七卷、第八、九、十卷合册

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

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又因古代之时，男子私女子为己有，防其旁淫，故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以为男女有别，乃天地之大经，使之深居闺闼，足不逾阃。礼曰：姑姊妹女之子已嫁而反，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又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授币，不交不亲。宋伯姬曰：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汉儒郑玄曰：妇人无外事。此皆所谓男女有别也。故中国之言盛世也，必曰男女异路。盖男女异路，乃男女有别之极端。夫古人所以隔别内外者，不过防禁淫泆耳。至其结果，则女子毕身之责任，不外育子及治家二端。夫以育子治家为女子之职者，盖中国之教，以后嗣代灵魂，故人皆以传种为不死之药。中国之政，以子孙为产业，故人皆以繁衍为致富之方。由是挟其政教，以为纵欲之奥援，男子之于女子，特特为人种养成之物耳。加以中国之男子，鲜克躬亲小物，乃以纤末之家政，责之女子，使之服劳奉养。此育子治家二事，所由为女子毕身之职也。然推其远因，一由男子私女子为己有，一由近世以前物价低廉，人民易于谋食，仰事俯蓄，仅赖男子之力，以克有馀，故中人以上之家，女子舍育子治家而外，鲜事工作。（古代虽名门贵族，女子尤有从事纺织者，今则女子习于懒惰，鲜有从事工作者。）由是奴隶惰民之恶，悉集于女子之一身。然为男子者，亦安之如素。观中国人民之称其妻也，不曰内人，则曰内子。内也者，别乎外之词也。因自若其妻之故，而幽背其妻，与解放妇人之旨，大相背驰。至于近日，不独女子失其自由也，即男子亦以家室之累，而失其自由。凡奉母蓄妻嫁女之费，必集于男子之身。（中国女子无所事事，酿成虚荣之性，其妆饰之费，远出男子之上。又中国之礼俗，于婚嫁诸礼，亦尚虚荣，有废千百金者，虽贫民亦必如此。故福建及皖省旌德县人民，因嫁女致贫者，不知凡几。故为夫者嫉视

其妻，为父者嫉视其女，皆由于此。此男子所受之累也。）然男子虽躬罹其苦，仍以囿于礼法之故，以解放妇人为大戒。惟中人以下之家鲜克支持，为女子者，多自食其力，或从事农作，或出为雇婢，其下者则为娼妓，虽幽闭之苦稍泯，然谓之肉体解放则可，谓之精神上的解放则不可。况所谓肉体解放者，均女子之劳者也，均女子之至辱者也，又均女子之至贱者也，可不叹哉！（日本女子其受幽闭之苦也，逊于中国，而其受压制之苦也，则甚于中国。盖以至劳至贱至辱之事，责之女子者也。）

虽然，中国之所谓幽闭女子者，岂果能实行幽闭哉？中人以上之家，女子之身恒佚。佚则思淫，为男女自然之天性。若男子远游日久，或钟情妾御，为其妻者，恒敢怒而不敢言。及情欲日炽，势必非礼法所能拘。加以其夫既歿，严禁再嫁，青年之女，蜚居闺闼，舍眠食而外，别无职业攫其心，及情炽于中，亦必不安于室。由前之说观之，所谓无多夫之名，而有多夫之实者也；由后之说观之，所谓无再嫁之名，而有再嫁之实者也。往事吾弗论，试即近事言之。吴引孙之妻，年逾五十，及引孙官宁波时，尤与俊僕私通。梁鼎芬之妻，粗知文墨，继为文廷式所诱，与文同居者数年。推之盛宣怀之女，费念兹之妻，或于既寡以后，施行丑行，或于同族之内，广施邪淫。此非所谓巨家世族乎？加以在室之女，嫁夫之权，操于父母，即情有所钟，亦必不能达其志，或为文君之私奔，或效崔莺之密约。试观中国各县，每岁之中，女姦淫之案，恒至数十，其有隐匿不扬者，仍不知凡几。即杀夫杀子诸巨案，亦咸因是而生。足证幽闭女子之制，决不足以禁女子之淫。夫幽闭女子之目的，既在于防止淫佚，而其结果势必无解放女子之名，而女子之心，转人人报一淫佚之念，名曰禁淫，实则诲淫而已。盖既以解放妇人为大戒，又虑解放以后，妇人即从事淫，防之愈严，则妇女逾防之念日切，稍有解放之隙，则淫佚之念生。是犹禁人以盗物，为盗者知物之可贵，而盗物之心益切也。故女子之犯姦淫，由于幽闭，而非由于解放。安得谓解放女子，即系导女子以淫佚哉？乃中国人民不察其由，愈益解放妇女为戒，此女德所由日墮，而女性所由不发展也。（中国女子亦有迷信解放之非，甘于不解放者。然此系迷信礼法之故，非女子之天性也。）

中国之婚姻，礼法之婚姻也。若欧美诸国，则昔日之婚姻为宗教婚姻之制，近世之婚姻为法律婚姻之制。其制之胜于中国者，一则结

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则行一夫一妻之制；三则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就表面观之，不可谓非解放女子也。然吾谓此等之制，仍属肉体上之解放，非複精神上之解放。何则？解放者不受束缚之谓也。今观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力，再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名曰结婚自由，然欧美男女之结婚，岂尽由两性之爱恋哉？或男子以多财相耀而诱女子，或女子挟家资之富而引男子慕婚之心，或富民恃其财力而强娶贫女，此为利所缚者也。或女子身为巨族，男子欲假其势力，百计求婚，资为奥援，以为进身之地；或贵男贫女，两情相悦，卒以门第不同，惧招物议，虽欲结婚而不能。此为权所缚者也，安得谓之结婚自由乎？至于一夫一妻之制，不过为宗教所缚束，複为法律及伪道德所牵制耳，实则欧美女子，有终身不嫁者，然名为无夫，实则多夫，欧美男子，亦有终身不娶者，然名为无妻，实则多妻。加以女子限于一夫，然既嫁以后，女有外遇，不知凡几；男子限于一妻，然既娶之后，男有外遇，亦不知凡几。推之都会之地，不乏女闾，跳舞之场，不啻桑濮，则所谓一夫一妻者，特阴为法律所缚，而外托伪道德之名耳，安得谓之实行一夫一妻之制乎！（如英女王维多利亚，既嫁德国爵族，然仍与马夫私通，而德英俄诸贵族，于既娶之后複恋他女者，更不知凡几。）至于男女平等，则亦弗然。夫男女虽同受教育，然处人治盛昌之世，政治法律，女子攻者甚鲜，而陆军员警之学，不复令女子与闻。男女虽同入交际场，然处政府擅权之世，官吏之职，不加于女子之身。则所谓男女平等者，有其名而无其实者也。夫解放女子必使为女子者，共用平等自由之乐，若如今日欧美之制，势必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其所谓自由者，非纯正自由也，伪自由耳！其所谓平等者，亦非纯正平等也，伪平等耳！无自由之实，故女性未克发展，无平等之实，故人权未均平。亚洲妇女，震于欧美之文明，以为欧美女子，实行解放，实享平等自由之乐，一若克步欧美女子之后尘，为愿已足。呜呼！处今日女子革命之时代，吾决不望女子仅获伪自由、伪平等也，吾尤望女子取获真自由、真平等也！

近岁以来，中国之社会，亦渐谋女子之解放。然女子之解放，有真出于主动者，亦有出于被动者。何谓出于主动？即女子之力争解放是也。何谓出于被动？即男子与女子以解放是也。今观中国女子之解放，出于主动者少而出于被动者多。其主动之力，出于男子而不出于

女子，故其结果，女子所得之利益，不若男子所得之巨。夫昔之男子，以幽闭女子为志者也，以压制女子为天职者也，何近岁以来，为男子者，转提倡女子解放之说，主张男女平等之制？推其原因约有三故。一由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以为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均稍与女子以自由，若仿行其制，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非惟一己有文明之誉也，即家庭亦有文明之誉，而家庭之文明，又由己身开其先。若夫集会之场，稠人广众之地，複率其妻女，参列其间，使与会之人咸瞩目于其旁曰，此非某君之妻之女欤！其开化之程度，竟出中国女子之上。此岂为女子计哉？不过利用女子以成一己之名。而推其私心，则纯然私女子为己有。使非视女子为己有，则女子之成名与否，与己身无複丝毫关系，必无解放女子之心。惟其私有女子，故处礼法盛行之世，以防范女子得名；处欧化盛行之世，转以解放女子得名。此男子因求名而解放女子者也。一由近岁以来，中国之民生日趋于穷迫，中人之家庭限于得食，其力不足以贍其妻女。男子生值此时，悟室家之累己，觉幽闭女子之制，非惟无大利己也，抑且蒙其大害，乃提倡女子独立，以女子依赖于男为大戒。使之肄业于女校，其最下者，则粗习手工，或习制花、刺绣、编物、缝纫、割烹诸术，少进则专习师范科，进而益上，则于普通科目外，兼习专科（如医学理科学）。其于女子于学者，岂专为女子计哉，其目的，盖欲使女子学成之后，可以出为教师，或执一技以谋食，以抒一己之困耳。其食指繁盛之家，则仰事俯蓄之费，迫女子以分担。否则，辞家远游无内顾之虞，以昔日贍给室家之费，易为蓄妾宿娼之用，使己身享纵淫之乐，女子受独居之苦，名曰使女子独立，实则为一己之自利计耳。此男子因求利而解放女子者也。一由中国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而治家教子之劳，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家教子之事，责之女子。观中国各女校，首崇家政一门，而中国新党有恒言，为家庭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彼等之意，盖以野蛮女子之治家，不及文明女子之治家；野蛮女子之教子，不及文明女子之教子。实则家为男子之家，治家即系为男子服劳，子为男子之子，如姓父姓而遗母性是也，特男子欲秘用女子，而使己身处逸乐耳。此男子因求自逸而解放女子者也。综斯三者观之，则知今日之解放妇人出于男子之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昔日女子受幽闭之苦，然其身甚佚，今虽见趋于解放，然必迫以担任责务，故其身

愈劳，而女子之境愈苦。）盖昔日之制，男尊女卑，实则男苦女乐；今则女子分男子之苦，男子分女子之乐，而究之女子之名仍未尝有丝毫之尊。为女子者，又何乐而为男子所利用哉？愚者不察，妄谓女子之解放，出于男子之意，以颂男子之恩德。岂知此等思想，与近人称颂满洲立宪者相同。满洲之立宪，欲利用立宪，非真欲授权于民；则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满洲之立宪，一由对外欲博文明国之名，一由使人民信赖政府，助以财力，与男子解放女子冀求名利者，正复相同。）吾非谓世界一切之职务，当专属于男，不当为女子所分担，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特以女子之职务，当由女子之自担，不当出于男子之强迫；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若所担责务，由男子强迫，是为失己身之自由；所得之权，由男子付与，是为仰男子之鼻息。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已。故吾谓女子欲获解放之幸福，必由女子之自求，决不以解放望之男子。若如今日中国之妇女，日以解放望其男，而己身甘居被动之地位，是为无自觉之心。既无自觉之心，故既为男子所利用，而犹欲称颂男子，岂非无耻之尤甚者乎？近日之男子亦有著书报提倡女权者，然由于好奇心及好名心，非有爱于女子也。

女子之解放，出于被动，其弊既述之于前。然中国近日之女子，亦有醉心自由平等，不受礼法约束者。就表面观之，其解放似由于主动。不知彼等之女子，外托自由平等之名，阴为纵欲肆情之计，盖仅知解放之狭意，妄谓能实行纵淫，即系实行解放。不知女子欲真求解放之幸福，正宜发展其女性，以握改造社会之权。若徒知寄情淫欲，则救世之心，或为纵淫之心所夺，所抱之志必不克成。况彼等所为，果出于自由恋爱，尤可言也。乃吾观中国自由之女子，其钟情男子，出于自由恋爱者，实占少数。有情不自禁，不择人而淫者；有为男子所诱而堕其术中者。其尤甚者，则因求财之故，而自失其身，或以卖淫而攫财，或向殷富之民献媚。夫天下最贱之事，莫大于辱身而求利。（夫娼妓之贱，非以其多夫也，以其辱身以求利耳。故辱身求利之女子，其贱与娼妓相同。）今也辱身以求利，安得谓之自由？况所谓解放者，对乎奴隶制而言也。岂有不甘为奴隶而甘为娼妓者乎？盖彼误以解放为纵淫，故舍纵淫之外无他务，虽陷身娼妓，不复自知。

此中国女子之弊也。(中国女子所以若此者，一由幽闭既久，一经解放，思淫之心日切；一由男子莫不好淫，故所生之女，秉其遗传。)

今日白种之妇人，渐知男女不平等之弊，又以男握政权，女子则否，为男女不平等之原，由是联合团体，力争选举之权。远事吾弗论，试即最近之事言之。芬兰女子，以勇烈著闻，当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即建立协会，以谋政界上之运动。及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全境之民，忘男女之差别，惟反抗俄庭，演为武力之斗争。至于今岁，女子为议员者，计达十九名，为世界所仅见。其次则为那威。那威女子，近岁以来，亦争普通选举权。惟那威国会，于女子选举权，加以裁制，非年逾二十五、纳税及额者，不克有投票权，然女子获得此权者，人数亦三十万。其次则为英吉利、义大利。英国女子，既频与国会警官冲突，今意国妇人，亦结合群力，以争普通选举。此均西国妇人能力发达之徵也。然自吾观之，则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原，女子而欲谋幸福，在于求根本之改革，而根本之改革，不在争获选举权。试言其故。如那威诸国，既裁制妇女选举权，限以年岁及税额。限以年岁，尤可言也，若夫限以税额，则纳税及额者，必其丰于财产者也。凡丰于财产之人，不为贵族即为富室，否则亦中人以上之家，岂非选举之权，均操于少数贵妇人之手乎？夫吾等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斯为人人平等。若谓以少数女子握政权，与少数握政权之男子，势均力敌，即为男女平等，则试即男界观，今之世界，被治者为男子，统治者亦为男子，何以多数被治之男子，犹欲进谋革命？若昌男女分权之说，谓男界既有握权之男，即女界应有握权之女，则英帝维多利亚，中国之吕稚、武则天，均为女主，曾有丝毫利益及于女子者乎？以是知少数女子握权，决不足以救多数女子。若如那威之制，以少数贵女参政，非为无益于民已也，且使绅士阀阅之中，为女子者挟议政之权，以助上级男子之恶。至立法一端，亦仅上流妇女受其益，若下级女子，则必罹害益深。此非独那威惟然，即澳洲妇女，亦多参政，曾有为工女谋幸福者乎？而工女阶级之中，亦鲜克入场投票，此其所以不平等也。若夫由少数选举，扩为普通选举，立法似属差公，不知近日欧美各国，多数男子，喝尝无普通选举之权，何以选举之人，均属资本家？则以贫富阶级不除，贫民衣食系于富民之手，不得不媚富民也。然此岂独男界为然哉，女界之中，以贫民占多数，或为工女，

或为雇婢，其衣食亦仰给富民，及选举届期，安得不以贵妇人应其选乎？观于普通选举之国，议员既属富民，则知女子行普通选举，其议员亦仍属贵女。以彼例此，明证昭然，此国会政策所由为万恶之原也。或谓芬兰妇女，运动之力，半属于平民，且据布利拜尔克(芬兰女子，为议员之第一人)所言，谓凡女子入政界者，均不得助男子施恶，则利益所被，或竟加于多数女子，亦事理所或然。然此实不然之说也。夫法美革命之初，易君政为民政，有志之士，喝尝不以国会既立，议士由于民选，必无虐政之罹。即当时受民选举者，亦复实力济民，抵抗专制，百竭不回，以为众民谋幸福，其抵抗之力，非竟芬兰女子之下。以迄于今，曾几何时，而议员压制之弊，深切著名，社会党人所宣言，劳动团体所反抗，书报具在，可复审也。况法美近日之官吏，其压民最甚者，或出于昔日之民党。昔以抗上为能，既参国政，则与所抗之人无异。盖人治一日不废，权力所在之地，即压制所生之地也。今芬兰女子，其勇猛虽属可钦，然徒恃国会政策，恐数十年以降，被选之妇人，既系压制多数女子之妇人，此可援法美之制为鉴者也。或谓近日欧美妇女，其有投身社会党者，亦以女子普通选举之说为世界倡，倘女子普通选举之权获于社会党人之手，彼多数之女子或有解放之可图。此又不然之说也。夫欧美社会党人，其有持国会政策、投身政治运动者，亦恒为平民所钦悦，握左右劳动社会之权，及资格既隆，或选为代议士，或占国会议员之多数(如今岁澳国是)。彼未入国会之先，岂不以既入国会，即可改革经济界，抵制富民，以谋多数平民之解放？及身伺国会之列，或被选不仅一人，众咸幸平民之机将至，乃反观劳动之民，仍屈身赁金制度，以作富民之奴隶，虐待之苦，与昔不殊。若谓党势既充，选举之人日益，使政权悉操其手，则改革莫难，此又河清难俟，不知待至何日者也。故观于方今之现象，凡社会党人入议院，既不足以济多数平民，即知社会党员之女子，伺身议院，亦不足以济多数之工女，不过使少数女子，获参政之空名而已。昧者不察，犹谓女子全体解放，必待女子参政以后，仰思社会党参政之国，劳动者之全体其果解放也否耶？此又可援以为证者也。况社会党人，一投身政界运动，即改其昔日之所为，下媚平民，上媚政府，利用平民投票之多数，以攫一己之利权，鲜有不出于卑劣政策者，何独于女子而弗然。故为多数女子计，苟非行根本改革，使人人平等，宁舍选举权而勿争，慎勿助少数女子，俾之争获参政权。盖昔日压制多数妇女者，一为政府，一为男子，今则政府及男子而

外，另受制于上级之妇人，则是于己身之上，别增一重之压抑也。即使压抑不增，亦仅供少数妇人所利用，夫何幸福之有哉！夫何解放之有哉！况吾观于芬兰妇女，于运动政权之日，始也以言论鼓吹，继募集运动之资，发行书报，或奔走村邑，俟陈暴政，信其说者，均以献身社会自表，躬犯危险，以争自由。有实行秘密运动者，有公然排击政府者，即暗杀暴动之事，亦靡岁蔑有，虽窜身西伯利亚，处禁锢之刑，曾不稍恐。其勇敢之气，战斗之方，均为欧美妇女之冠。以若斯之能力，稍佚扩张，即可谋根本改革，覆人治以弭男权。顾乃见弗及此，笃信国会政策，其目的所及，仅注意于与男子均权，故于政府贵族之暴，虽知抵抗，至于政府羁绊，则莫之能脱。政策谬误，一至此及，不得不谓之至愚。吾深愿世界妇女，不仅以芬兰妇女为标准也。要而论之，妇人解放问题，当使为妇人者，人人同享解放之乐。今之持解解说者，一曰女子职业之独立，二曰男女参政之平等。不知所谓职业独立者，属于个人，抑属于全体？如曰属于个人，则仅己身不受制，非多数妇人均可免厄也。如曰属于全体，则以今日经济界之组织，少数富民垄断生产之机关，平民失业，其数益增，而谓妇女职业均能独立，则谓职业独立者，即以职业供役于人之异名耳。自由解放，岂可得哉？故谓职业独立，则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解放也。至于与男子均权，无论男子握权历时已久，男女参政之柄，非仓卒所能均，即使能均，决不能人人而参政。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彼多数妇女，不甘受制男子者，岂转甘受制女子乎？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奚必恃国会政策，以争获选举权为止境哉？倘有志之妇女，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则幸甚亦。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师复，《民声》十六号，1914年6月27日

我亲爱的同志乎，吾党在欧洲之现状，诸同志知之稔矣，若其在东亚之实况如何，则知之者必居极少数，且即知之亦决不能详，吾于是知君等之亟亟欲闻吾东方同志之报告与意见也。此次大会，吾人未能躬与其盛，殊为抱歉，然窃喜得乘此机会，陈述中国无政府党之短期历史及吾人之主张与夫对于大会之意见于我最亲爱而尚未能握手之诸君之前，诸君幸少留意。

当中国未革命之前，人民言论行动绝对不能自由，故凡革命党多避居于东西各国。以是之故，得吸收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想，而转贩于国人。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吾党之在巴黎者，始发刊华文无政府七日报，名曰《新世纪》，主笔政者为李石曾君，是为吾党第一之言论机关。同时在留日本之张继、刘光汉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东京，与日本党人幸德秋水辈游，是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实研究无政府主义者也。至次年，刘师复密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是时东京之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张刘以著名之革命党提倡斯道，以故留学生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诸名词，颇耳熟而能详。其时惜学生之思想，大抵亟亟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而对于社会革命之义理，不免冷淡。未几刘氏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氏亦去东京而走巴黎，于是东京社会主义之声响阒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纪》遂为独一无二之机关矣。《新世纪》继续出版者三年，编辑李君不但热心，且精研学理，多与法比党人游，凡克鲁泡特金及其他诸大家之著述，时时译为华文，复别刊传播小册子多种。虽当时满洲政府文纲綦密，邮禁殊严，《新世纪》绝不能输入内地，然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至一九一零年四五月間，竟以他故停版，至今言之，尤爲惋惜。李君现仍居巴黎，潜心译著，欲以科学教育灌输无政府主义，欧洲之中国留学生感受其思想者殊众。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革命军兴，南方各省次第独立，江亢虎乃在上海发起“中国社会党”。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

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徵地稅，罢免一切稅，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产以爲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视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爲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採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

一九一二年五月，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刊佈多数之印刷品，介绍其学说与内地，一时风气頗爲披靡，凡一般研究社会主义者，皆知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完善，且知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用矣。

无政府之思想既渐渐发生，故是年（一九一二）十月“中国社会党”大会时，遂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两派提议分离。惟江亢虎则骑墙中立，提议在“中国社会党”之内分组两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无治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民主党”，两党皆冠以“中国社会党”之名，皆须奉其所定之八条党纲（前所舉），其说頗堪发噱。开会后无人赞成，两派分离之议亦无结果。卒有愤愤乐无等宣佈脱党，别组一“社会党”，主张：一实行共产，二尊重个人，三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其思想及其组织，虽与吾人见解微有出入，然不能谓非昙花一现之无政府的社会党也。惜发起仅一月，即为袁世凯所禁止，不能自由运动矣。

一九一三年夏間，袁世凯复借内乱之名，解散“中国社会党”。袁氏之骄横暴戾，固不待论，而“中国社会党”亦以分子複杂实力缺乏之故，一经风潮，立即瓦解。当是之时，全国之中硕果仅存者，惟一广州之晦鸣学舍耳。风雨飘摇，传播事业仍孜孜不已，至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其机关报《民声》乃乘南北战争风潮最烈之时而出世，直接鼓吹无政府主义。仅出二期，遂为龙济光所禁止，并封晦鸣学舍，袁世凯及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诸同志出走澳门，期继续吾人事业，而彼等复纵惠葡人干涉，《民声》不能公佈，虽曾在澳秘印两期，然侦缉过严，举动悉不自由，不得已复去而他适，《民声》得续刊至今。

最近一二月間，上海同志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社之设，一方面传播主义，一方面联络世界同志，期为一致之进行，又一方面则鼓励内地之同志，各就其所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以爲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之预备，此则本社之目的也。

此外，如常熟则有无政府传播社，南京则有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广州不日亦将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团体成立，凡此皆足为传播机关者。至言论机关，除《民声》外，尚有《正声》出版于南洋，在中国工人中传佈颇广。

以上即中国无政府党十年来之历史及现在之实况也。无政府主义之在中国，所谓襁褓时代之婴儿耳，吾人述之亦殊滋愧，然而无足怪也。当满清时，国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败之教育（大多数人且并此亦无之），人格全失，新思想何由发生？及其季年，欧美日本之新思想虽渐渐输入，而其间有志者又皆岌岌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未暇留意于社会之革命。迨乎清室既倒，宣佈共和，吾人以爲可以乘此机会自由传播矣，不料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且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淨尽。以吾党之幼稚，而处此艰难之恶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国之运动，有较欧美爲易者，亦有较欧美爲难者。何以言之？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户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遂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于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然既有二易，亦有二难。中国工人智识极低，全无普通教育，识字者稀，即或略识之，亦鲜能读书报者，各行业虽間有工会，然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难一。中国政府既嫉视吾党，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吾党之书报均被禁止，官吏之对待平民，稍不如意即加杀戮，故皆相戒不敢阅读及收藏无政府书报以期免祸，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难二。虽然，吾人固绝不畏其难，抱致死不饶之精神，竭尽能力，以与境遇战斗，非至达吾目的不止。

今度大会，吾人虽未能赴会，然窃有无限之欢祝，无限之热诚邮贡于我大会之诸同志，并欲有所提议于大会者如下：

(一) 组织万国机关——吾党万国机关之议，发起者已非一日，今则时机已至矣。吾党散在各国，非联合则声气不通，势力不厚，其要固不待言，然图精神之联合，不可无联合之机关，此万国机关之所由不容缓也。顾此种机关，其性质只为吾党交通声气之枢纽，而决非权力集中之主体，其职务只在联络各分会及各小团体，倡导吾党事业，而无统辖各分会及各小团体之权。

(二) 注意东亚之传播——此事固吾东亚党人惟一之责任，惟吾等势力幼稚，外围之迫压复酷，苟非得欧洲诸国吾党之先进本其所经验竭力相助，以匡吾等之不逮，则进步倍觉其难。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略广者，仅欧洲一小部分耳，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

(三) 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近来工团党与吾党之联络，似尚未达圆满之域，吾党不可不留意。

(四) 万国总罢工——总罢工之议，吾党历年运动，均未得圆满之效果，是皆吾党未能联合之故。目下奥塞战争，全欧之和平势将破坏，窃谓宜即乘此机会与工团党及反对军备党携手运动，实行万国总罢工，则吾党之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五) 採用世界语——吾党散在各国，言语不一，此实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採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之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结团体，传播世界语于吾党，如《自由星》之类，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于万国传播。此举不独足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者颇多故也。

以上俾无高论之意见，想诸君早已见及，为诸君有以教之。并引领以祝大会之成功。

无政府万岁！大会万岁！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啓

自由的真谛研究（节录）

老梅（景定成），《自由》二期，1922年2月

说起自由来，仿佛很容易明白。但自由的真谛——真正意义，究竟如何，恐怕不是随便可以答出来的。我现在也不管别人怎样解释，仅由自己意思，自由地解释一番，不敢说就是自由真谛，不过向真谛方面研究罢了。

“英文‘自由’有两个字，前者是脱离不自由的状况，成为自由，后者是本来自由无碍的状况，叫做自由；前者是从动词变来的名词，后者是固有的抽象名词。”这种解释，是不错的。或分自由概念为两种：（一）消极的，无外面一切拘束；（二）积极的，所谓自由的本物，随自身法则而活动的力，本来具足的状况。这两种概念，大概也不错。

据中国“自由”字意解，也和英文一样，并从字面上得一种妙义，可以包含以上两种概念，表出自由的真精神来。“自”是自己，“由”是随从，“由”是动词，“自”是名词，依普通文例，把动词放在前面，组合起来，自由成了由自——随从自己，不是随从自己以外的东西（或人或物）。譬如儒者说女子三从：“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终身从傍人，不是从自己，便是由人，不是由己，便是人由，不是自由。再拿“自”字和别的动词组成的名词说，如自利，是利自己，自杀，是杀自己，自讚，是讚自己，由此类推。“自由”是由自，无疑义了。再讲一句，即是创造这个名词的人，意思或者不如此，我想如此解释也无碍，且可以得自由真谛。

何以叫自由，不叫由自？因为注意“自”字。依我个人的意思讲这“自”字，差不多是佛说的自性——禅宗六祖惠能所谓：“一切方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是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拿这几句彻悟话看起来，自性是何等自由，何等广大——真是从横自在，无滞无碍，较之本身自足活动力的积极的自由概念，更圆满些。

“自”——自性是超离善恶以外的，是包括无遗的。人的自性，便是宇宙的自性，只有一般，并无两样。可怜世上的人，多把自性忘

失且消灭了。没有“自”何以“由”，所以我希望人们，速速恢复了自性，认识了“本来面目”再讲自由。

我并不是说法传教，因怕人误认了“自”，一听说自由是由自，差不多要由自己胡言乱语，胡行乱走起来。“杀人放火，一切由我”，岂不是这一说要流毒社会么？所以我提出这“自”字真意来，表明那乱来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譬如疯狂的人，一切言动任意乱来，外面好像无拘束的状态，岂不是自由？其实并不是由他自己，纯由病毒。人一定说他是迷失本性，怎么能叫自由呢？醉汉也一样，完全受了一种酒毒，不由的自己癫狂起来，也仿佛是毫无拘束，其实是由酒毒，不是自由。试问醒来的醉人说：“你怎样酒后那样胡闹呢？”他一定答道：“那时由不得我了。”这是很明白的事体。中了催眠魔术的人，其行动纯由施术者的暗示，毫不由己，更是显然不自由的现象。

尝考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及什么名士美人，都中了环境的一种夸诈虚荣的毒，沉醉在金钱势力的酒杯中，颠倒梦想，不由自己，骄傲淫逸起来，对于社会又成了一种恶劣的暗示。流毒贻害，辗转无穷，非施一种断然禁酒绝毒去魔的手段，世界永远要被这些迷失自性的“贵魔”、“富魔”、“强魔”、“色魔”、“名魔”佔领去，任意造出一种“修筭道场”来，毒害众生。所有各国政府，都是魔毒製造所，所有名处都市，都是魔鬼贩卖场，因是弄得举世之人，如饮“狂泉”，都成了狂人，反以不狂者为狂，一定拉他“同入浑水”才行。即如最近俄人，少少觉悟富魔——资本主义——的毒害，努力要打破他，各国资本家的政府，都视俄人是疯狂，定要拉他到资本圈里，教他再迷失自性，不能进行他的真正自由主张。或曰：“列宁等原来不识自由真意，所以易被富魔诱惑”，也有几分道理。

人们啊！你们渴望身心的自由么？先把毒害自性的魔鬼全除灭了才成功，不然，你们但能由着金钱去玩弄，由着势力去压制，由着所谓法律宗教道德礼俗去束缚完了，一点也由不了自己，还能得甚么自由？

这样研究起来，世上显然受束缚压制玩弄。不自由的人们，莫过于狱囚、奴隶、兵丁。

先说狱囚。这“囚”字像人束缚在圈儿里，本来天地像一个大笼，惟有“自性”不受他的范围，常想衝破乾坤，使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人们却在这大笼里面，又编织许多小笼，去囚人，真是违反自性到万分了。狱囚幽闭铁笼里，由着狱卒看管，一切言动，不能由己，其不自由，更不待说。却说世上还有两种特别囚犯。一是“帝王”。中国从前住的地方，叫做宫禁，有人说这宫禁的“禁”字，“一方面禁人入，一方面也禁自己出”，所以帝王出入宫禁，也不能由己。听说前清宫中，设下许多什么“祖宗之法”，束缚那些帝王行动，干涉到床第，比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古法，还要严些。那么，宫禁不过是一座改良监狱，帝王只是体面囚犯，怎么人还要争着作皇帝呢？因为中了一种权力威福的魔毒，所谓生杀予夺，可以由己，除过许由、巢父那样的伶俐汉，都想由人把黄袍加到自己身上，去入宫禁了。二是“妇女”，特别是中国妇女。前边已经讲过“三从”，终身从人——由人不由己，又有甚么“严守闺范”及“女正位乎内”的话，把妇女一齐关在家庭监狱里，做死囚。富贵家的妇女，好像笼中的鸚鵡，贫贱家的妇女，竟似圈中犬豕，由人玩弄，由人鞭笞，由人管束。或受了虚荣心的魔毒，或受了习惯法的魔毒，不由的自己，涂朱抹粉，穿耳缠足，问他们果然愿意么？也不过应答一句：“人家通是这样，不然便要惹人笑！”可怜的妇女啊！你们受环境的魔毒，几时才了！还不赶紧由自己恢复自由人权，摆脱了一切束缚身心的玩艺，打破家庭的监狱出来么？

再说奴隶。如美洲黑奴、俄国从前的农奴以及富贵家的奴隶，都是由主人指使，刑罚买卖，行动言语，一点也由不了自己，比“童约”还要厉害。此外有几种体面奴才，如所谓朝廷上的大臣（满清大员自称奴才），中国古来宰相用奴以及小官僚——《水浒传》小说中石秀骂的那些“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由人提拔，由人罢免，“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他们还要学那晏子执鞭的御者，意气洋洋，甚自得也，直忘了自己是甚么了。那些奉上接下的官僚们，每日要接见不愿见的人，说些不愿说的话，也是由不了自己呀！还有被人利用的大伟人，明明白白作一般政奴的傀儡，由人拨弄，像耍猴子一般，它还自觉的怪不错哩！其次，资本家作金钱的奴隶，大似中国喜剧《化子拾金》中那一个乞丐，出门拾了一锭金子，便听那金子吩咐，叫它唱什么，它就唱什么，弄得它丑态百出，也不自觉。再次，

崇拜古圣先贤的学奴，一生照着书本行事，非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言，尝悬一个偶像，在心里作主人翁，由他支配，自己还要说由己由道，真是要命！最下是一般自命风流的文奴、欲奴，入了那些才子佳人的模型中，铸出一种轻薄狂态，成天哼哼些蚊子腔，作几篇言情小说，打油诗，腐文烂调，艳词绮语，魔乱人心，一生颠倒甚么情场里，在妇人裙带下作情奴，甚至以嫖妓弔膀为自由恋爱。这些奴才，更不值得一笑了。

次说兵丁。那宫禁、家庭两座特别的监狱外，加上一座兵丁住的营垒，便鼎足而三了。所谓“壁垒森严”更过于宫禁、家庭，是不用多说的了，一旦出征打战，五官四肢都由不了自己。有个怪名词叫“绝对服从”——服从长官一切命令。长官命向前，不敢退后，命向右，不敢向左，只要由官长一下命令，河也得跳，山也得爬，荆棘丛中，也得卧倒。命开枪便开枪，叫扯炮便扯炮，甚至命他向父母兄弟开枪，也不得违反。（其实战争总是人杀人，全是杀自己父老子弟的，没有甚么分别。）说起来不过为的每月几两银子，便把身子卖给兵营，作一种不自由的奴隶。究竟人的自性，断不是这样的。募兵还可以说自己愿意去受罪，徵兵便不然了。由国家定一种法律，强迫人去当兵，叫做“当兵义务”，更不能由自己，所以便有折臂薰目，装聋卖哑，希图脱免兵役的惨剧。人说那些折臂人是毁身全生，因为一入兵营，便要受种种违反人性的魔咒式的训令，但使人知道杀人立功，久之性情自变，成了雄赳赳气昂昂、虎豹食人的派头。所以将军自命有虎威，还由国家弄些什么“文虎章”表彰那猛烈的兽性。说起日本的兵丁，更不得了。每天要对那天皇肖像——圣容背诵些忠君爱国的魔语，弄得平时脸上现出一种痴气，然后战时才能演出一种狂态，犬奔狂吠，哪里像个样子！近来中国兵丁却中了忠于官长的魔毒，也染了虚谈爱国的狂疾，更服了些升官发财的麻醉剂，一发不由自性，任意到处闹起来了。

从以上情形看起来，满世界没有几个自由人，因为清淨具足的自性，已被魔毒的环境污染且破损了，历史改革家并未行一次根本的消毒法，那里会自由？最近俄国革命，曾标“土地归农，工场归工，自由归全体”的旗帜，实际不过利用他，号召一时人民而已。仅仅消除帝王的毒，最深的资本毒仍未去淨，所以要退一步，保持原有的环境，藉口四面强邻的压迫，不但不能去钱，并且不能去兵。试问俄人

的自由在那里？原来列宁奉行马克思主义，所以采取平民专政和工券制度，久之平民专政转为官僚化，工券制度转为资本化，是当然的结果；何况连工券制还没办到，怎么能退步呢？惟有在乌克兰的马克诺运动，是行无政府主义的，所以把法律、宗教、金钱全废了，人们非常自由，然而人人还愿意当兵以篡外侮，他们宣言说：“世界尚未完全自由，我们不能废兵。”他们原来爱真自由的人。只因世界环境的关系，仍有一部分违反自性的不自由状况，可欢已极！所以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恢复了自性；然后自由真谛可见。

有人说“食色性也”的话，说自性是恶的，恢复自性，不过恢复人类原始野蛮状态，使人单知贪食好色，肆情纵欲而已，和禽兽有何分别。我说以食色为性，已落第二义。因饮食男女，说是人之大欲也可，说是人之本能也好，不得指为自性本体。便是人生说，也是为生而有食色，不是为食色而有生，况且色只是求美，不是好淫，食只是养生，不是贪味，也没有善恶可说，因善恶是后起名词。自性是无记的，如人初生，即知食乳，不过是保生的本能。既长，男女相悦，只是求偶本能，不算什么善，也不算什么恶。只要人能保持天真自性，自然好色而不淫，适食不求饱，自己已支配食色，不由食色支配自己，有甚么野蛮放肆的过虑呢？只怕人忘了自性，由一切食色欲魔支配了去，那才是真正不自由。

再说自性本体，是怎么样个情形。

中国中古哲学家，也有好些省识自由真谛的，惟庄子最显著。看《逍遥游》的大旨，便是表明人物大小虽殊，各有任性自得的愉快；《齐物论》一篇精神，只在“吹万不同，使其自己也”两句话。“自”者由也，“己”者自也，自己即由自。由自则物类各得自由，所谓“任其不齐，齐之至也”。（是从自由真谛，然后可以得平等的真谛。）外篇如《胠篋》、《马蹄》、《在宥》诸篇，更发挥得透彻。其精言曰“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性。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以物易性，便是由物不由自性了，于是殉利者由利，殉名者由名，殉家者由家，殉天下者由天下，通把自性换掉了。所以说：“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又曰：“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见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自闻自见，皆有自不由人。注谓绝离弃旷，自任闻见是也。不然则“不自见而见

彼，不自得而得彼者，使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盖惟自适其适，而不适人之适，始为真自由。孔子曰“无入而不自得”是也。又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者“由”也，心所欲“自”也。以及“从吾所好”，皆是自由真谛。《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有任由之意，如后人所谓“尽情”“尽性”的尽字。尽其性，则自己自由，尽人性，则任人自由，尽物性则任物自由。到这步田地，便是庄子所说的“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为天放矣”，恰合天地生物之性。故曰“讚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说到极处，天地性便是人性，人性便是天地性，还是上篇说过的话，只于一般，并无两样。然而人物不能尽性自由者，是何缘故？则《马蹄》篇言之详矣，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连之以羈縻，编之以早棧，——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为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注：自足于内无所貌）……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蹙蹙为仁。踉跄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其咎全在治者。伯乐治马，马不自由；圣人治天下，人不自由。庄子所谓善治天下，故罗素仍引以为无政府主义之最古哲理。意为得自由真谛也。再看《庄子·在宥篇》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是自在，宥是宽纵，故注言宥使自在则治，治之则乱也。就是任天下自由。或恐任天下自由，必至于乱。不知天下之乱，正由于“治天下”，不由于“在宥天下”。所以《胠篋》篇云：“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乱乎上矣；钩饵、罔罟、罾筴

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治天下挟其法律政教之知，为民毕弋钩网，而天下始，“每每大乱”。假设也无法网政坑，则人任性自由，定有“鸞飞于天，鱼跃于渊”的快活，自然相安相得，决不相惊相扰。古人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庸人就是一般自命知识界的法家，政治家、宗教家等等，成天在那里製造束缚人身的绳索锁链，一面作茧自缚、作法自毙也不自知。因爲他们中了富贵利达以及威权名声的魔毒，仰视天、俯画地，兴妖作怪，颠倒是非，淆乱视听，纯然用诈伪手段，博取世界名利恭敬，巧立尊卑、贵贱、贫富、上下、主僕、君臣、父子、夫妇种种名目，还要说是人类纪纲。我说纪纲就是罗网的别名罢了，于是纔有命竟掠夺的事体。老子曰：“礼者忠言之薄，而乱之首也。”一点也不错。礼就是所谓不成文法，先由所谓圣人製作出来，大家随看瞎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便以爲礼，其实比法还厉害。所以爱自由者，有“礼岂为我辈设”之言，只好荡他们的检，越他们的藩，任意自如，不畏俗议了。其实所谓“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他们也是怕礼束缚，一由礼，便不自由了。法家亦然。他们但拿法律束缚旁人，自己常是逍遥法外，不受甚么制裁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历来如此。请看中国官吏，哪一个不天天在那里犯他们自造的法呢？禁烟公所，大闹烟灯；禁毒公所，自设赌局。算甚么玩意？总之，世界有什么治者和被治者存在的期间，决无自由可说。某社会学家云：“将来只有人治物，没有人治人。”其实人治物，也要顺物之性。顺物之性，乃可以说是无治。譬如盆鱼笼鸟，是设盆笼以治物，便违反物性；放鱼出盆入于渊，放鸟出笼翔于空，悠然远游，各得其所，盆笼完全无用了，有甚么物可治呢？不但鸟鱼，就是花木亦然。尝见治花木者矫揉造作，製成种种人兽亭台的形状，便觉得不自然，不如自生自长的花木饶有天趣。诗人云：“庭草无人随意绿”，便是省得物也不须治的道理。所以人治物的话，都讲不通了，何况人治人呢？噯！甚么治物治人，简直全是捣乱。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人们！若不能把这些自命治人的妖魔政府一时扑灭了，要想身心自由，何异做梦！尚有许多无聊的人，头顶香案，四头八拜，向妖魔门口要求自由。唉！自由是你们自身自有的，不假外求的。常言讲得好：“求人不如求己。”自由由己，而由人乎哉？甚么政府——魔

府，只有些禁制自由的魔术——政治，魔咒——法律，向那里瞎喊瞎闯，有甚用处？至于某君所谓“自由之奴，与其由下要来，何如由上赐予”，乃是替专制魔王解围的话。其实，自由不是什么“上”可以赐予什么“下”的，也不是什么“下”可以要求什么“上”的，因为上下，便无自由，这是显然的道理。要得自由，须凭着本源自性，打破种种魔障，降伏种种魔心。起头不妨像那《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上毁天宫，下扫地域，一番热闹，冲开什么天罗地网——天经地义，可算个大破坏家。到后来却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离如来手指——自性。孙行者——心，能充其破坏之量，是不错的，然有个上下天地，惟我独尊，魔念未除，所以自称是齐天大圣。及由自在观音——自性，降伏其我念，然后得见“天真佛”，从此才能降魔破妖，纵横无碍，有绝对自由的现象。“绝对自由”有许多人评论，说是没有这一种东西，不过一句空话罢了。不错，拿人的身体说，即会脱去种种束缚，有时不能不感受自然的压迫和抑制，如气候的寒冷，风雨的阻碍，云雾的蒙蔽，虽有防御和抵抗的方法，总觉得有些不自由。轻舟渡水，飞艇凌空，是自由的状态；潮起风生，舟覆艇坠，那能由己？所以说到底，只有比较的自由而已。话虽如此，但就自性说，仍有个“绝对自由”。因自性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大可于无外，小可至于无内，有绝对不可思议的霏霏想，老子鱼龙的譬喻，得其道似。再由实地上进一步讲，无政府实现后，解决了人身周围的束缚，精神方面，定有一种现在想不到的发展。如列子理想之华婿国然。其言曰：“华婿之国……不知斯（离也）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欲嗜，自然而已。（破法障、欲障）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破知障、情障、神障）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拮无伤痛，指摘无痒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扰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蹶其步，神行而已。（便是极端自由，无政府以上的状况。）”举凡所谓耶稣奇迹，释迦神通，如画水，移山，分身，变相，踏破凌空，未尝不可以达到。极言之，转四时，不被四时转，转宇宙，不被宇宙转，才算是绝对自由，即是自由——自由的真谛。有人说，这是万万做不到的呀！我也说一句活话：魔障层层包围宇宙，打破一层，再打一层，将

来的事情，让将来的人去想去做好了！我们但说现在想到的和能做到的事情，自由合力去做一番罢！

现在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方面在不自由的环境中，极力保持自性，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一方面努力去打破不自由的环境，使人人各复其自性。譬如富贵没有了，还淫个什么？贫贱没有了，还移个什么？威武没有了，还屈个什么？自然都成了大丈夫，也就没有这大丈夫名词了。某禅师奉淨土宗语曰：“所以欲人往生西方极乐者，因善根至彼成就善，恶根至彼，无所施其恶。譬如蛇曲行，经过直管，自然要逼直的去也。”和蓬的生长中，不扶自直的说法相同。予因悟无政府时代，即是地上极乐的淨土。

无政府共产党上海部宣言

《自由人》三期，1924年5月

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这二十年中，虽不敢说有多大效果，但同志数目天天增加，宣传刊物到处都有，和平的、暴烈的革命行动，也时有所闻。世界的潮流，早已将资本主义判决死刑；俄国革命的失败，很足以证明共产主义的破产；科学的进步，更时时给无政府主义确定的根据。光明的日子快到了！同志们！努力前进吧！

我们的努力决不是盲目的，是抱着下列两个目的的：

（一）打倒政府。世界的趋势，总是向着增加个人的自由，以至完全自治，减少政府的职权，以至于无。近些说，试问中国四万万人民中，有几分之几与政府法律发生过关系的？乡下的农民一辈子不知官是什么样子，除严迫他们纳税以外，政府能给他们什么好处？现在看起来，无论是专制政府、民主政府以及理想中的一党专政政府，都不足以满足一般平民的需求。有政府必有法律，有了法律，便无自由。有政府便有治者被治者之分，由此阶级便无平等可言。政府实在是自由平等的大敌，渴求自由平等的人们呵！快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吧！

在未来的社会，处理人们一切事务的，决不是政府，一定是许多自由组织并且自由联合的团体。譬如教育者自由组织教育协会，来处理关于学校和图书馆等事务，决不要那失意的政客插足其间，以做升官发财的阶梯。铁路工人自己管理关于铁路一切事物，决不要那因未阅某站长密电，以致发生临城劫案的北京官僚来过问。工会由工人自己组合，不再被政客利用了。农会由种田的自来问，那穿长衫的绅士，想进去当会长，怕要被他们打出去了。总之，无论那一种事，都有内行的自己去管的，绝对不受政府及任何权力的干涉。这绝不是空想，便在现在的社会制度底下，这种依“自由同意”成立的“私人创业”已很不少了。如红十字会、英国的救生艇会等，尤其是思想团体、工人组织，都已表示人们除去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处理事务的良法。政府到现在，已到了末日了。最要紧的，是以革命的手段，将政府推倒，让富有创造能力的民众，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呵！

至于法律，那时也无用了。对于罪犯——那时一定很少——我们将在医学上设法，不请教那制造罪犯的法律了。

(二) 废除私产。世界上那一件东西不是成千成万人合力造成的？我们吃的一碗饭，是农人种的，而农人用的器具，非靠铁匠不行。由田里运到我们家中，不知要经过多少工人的转运。衣服、住宅以及其他用具也都如此，谁敢说“这件衣服是我的，这所住宅是我的，不是你的”？试问：以你一个人的力量，你能做出些什么？也许有人说，这是金钱买来的。但试问金钱又从哪里来的？钱都是工人们开矿冶金铸造出来的，不过你——至少也是你的祖先——用强暴或欺诈的手段掠夺去的罢了。万物既为万人所造，即当为万人所同有。将来管理田地工厂等的，一定是农工自身，决不是不劳而食无功受禄的地主资本家。那时将以科学的方法，本“各尽所能”以生产，“各取所需”以消费。现在的生产工具，机器、土地、铁路、工厂等，都充了公，每人每天三四小时的工作，已足够供给万人的安乐了！

但我们应实行彻底的共产。象现在的共产党（其实是集产党），一面主张将工厂土地充公，一面却仍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分配法，用劳动券来代金钱。这种共产私产的调和方法，万不会有好结果的。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资本家，我们也一样的反对未来的所谓劳农政府及集产制度。我们所要求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组织自由联合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我们的目的如此。我们的手段呢，共产党常讥我们无方法以实现这好的理想。在我们看来，那想依赖旧有势力，以实现社会革命的，才真是梦想呢。社会革命非得民众同情不可，不得民众扶助，其势不得不一党专政。试问与时代相违的专制政体，还会有价值的吗？以社会主义的眼光看去。俄国早失败了，请别再蹈眼前的复辙！

我们万分相信，自由是可以夺取而不可赐与的。社会革命既然求第四阶级的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该以和平及暴烈的宣传，使他们自己觉悟，自己起来反对政府及资本家，建设无政府无私产的社会。

现在的中国无政府党，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外，为使主义早些实现起见，还该参加下列两种运动：

(1) 工团主义。未来的社会，非但官僚资本家及其附属物完全绝迹了，即士农工商之分也没有了。大家都是为社会工作的工人，劳心而且同时劳力的工人。这些人为生产各种必需的和奢侈的物品，或满足普通的和特殊的欲求起见，将组织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将与别的团体自由联合，以代替现在一切政治及经济的机关的职务。但这种自由组织的团体，要完全美满的实现，自然非将现在制度推翻不可。但这些团体，决不能立刻成立，不在现在立些基础，革命以后，旧制度已推到，新方法还不能代替，那是一定很纷乱。最好能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或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一方面可以用总同盟罢工及其他种种方法与资本家政府宣战，一方面可以为将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许多无政府党，同时信仰工团主义。

(2) 合作运动。中国同志对于合作运动，从来未十分注意过。许多人总以为这是太和平了，太带建设性了。我们以为对于这种黑暗的制度，大破坏自是必要的，但没有建设的具体方面来替代现在一切机关的职务，这种破坏将为盲目的，用以泄愤则可，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的。未来的社会，在政治方面，可以用民众自己组织的团体，替代现在政府；在经济方面，生产及消费的方法，与现在合作的方法，大抵相差不远。中国农民比工人来得多，农民间的运动，实在很重要。合作运动，在农民间是最适宜的，我们相信中国倘能有很发达的合作团体，只要经短时间的破坏，新社会便不难成立。

同志们！我们一面尽力宣传，一面参加工团主义及合作运动，民众的同情与帮助，比武力重要到万倍呵！

有了正大光明的目的，方法是不必限定的。除了这两种以外，自然还有许多，一切革命应有的手段，我们也不必详说了。我们所敢相信的，只要我们努力向着认定了的目的干去，主义的实现，一定是快到了。

我们同志，除了认定以上的方法，切实去实行以外，我们觉得应继续不断的以下三事，互相勉励。

(一) 砥砺人格。“论目的不问手段”在现在制度下，有时好象不得不如此。但总当尽可能的力量去避免。社会革命是要得民众的同情的，而同志们的高尚的人格，最足以与民众以莫大的暗示。在革

命时如此，在宣传时也如此。同志们！请注意这个！倘若不然，非但予反对党以口实，并且失却民众以同情，却是永无成功希望的。

（二）切实研究。我们同志，现在多数是知识阶级中人，多有研究主义的时间与余力。无政府主义已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了，我们对于主义，自然不必人人去做精深研究的工夫，以求有所阐发，有所修正，但了解是必要的。

（三）随时宣传。无论什么革命，总以宣传为第一步。宣传的用力越大，宣传的时期越久，将来革命的成功越容易，革命的牺牲也越少。宣传的方法，或以文字演说等和平的方法，或以暗杀暴动等激烈的方法，都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又要告诉中国知识阶级几句话：中国现在是新旧思想相冲突的时候，你们的心中一定常常这样想：资本主义已到破产地步了，社会革命的必要，已不成问题的了。我还是为维持自己的物质上的安乐起见，帮助强者压迫弱者呢？还是提起精神扶助被损害者反抗强权，以张正义呢？我们极诚恳的告诉你们：历史告诉我们，真理终会胜利的。你们去帮现在的强者的忙，我们自然无权干涉；但你们将永远与正义相违背，总有些时，要大受良心上的责罚的。倘若你是一个“人”，倘若你还有良心，你终有一天会说：“他们工人们农人们，自己吃了许多苦，供给我们的一切衣、食、住、学校书籍等，我们难为他们太多了，现在还该帮助强者压迫他们吗？中国现在太黑暗了，我们知识阶级倘不出来替平民干些事，——像以前俄国的知识阶级——平民将永无自由的日子了！”那时，你也许要找解决你的一切问题的方法，那时你也许觉得只有无政府主义足以满你的意，你将与我们一起干，努力为社会革命牺牲了。那时你的精神上一定会得着未曾有的安慰与快乐，你会大叫起来：“这种奋斗的生活，才是真有趣味真有价值的咧！”

我们至少希望你们两件事：

（一）了解主义。现在一提及无政府主义，大家总立刻联想到一群目无法纪的暴徒。其实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学说，少数的暗杀及暴动，不过是无政府党所用的许多手段之一。即以杀人流血论，资本家和政府以巧妙的方法，每天所杀的人，何止千百（战争、死刑、牢狱、不卫生的工厂、劳动过度、贫病等），无政府党所杀的，还不及

此万分之一，而竟被称为暴徒，这是什么论理！况且对于牺牲自己以求全人类幸福的无政府党，即对于他们主张上大不满意，对于这种行为，也该予以深厚的同情。还有一般人，一听到无政府，便说是空想。社会上大多数都只承认当时当地的真，对于理想，多数总是不敢承认的，但你们至少该要看看现代世界的趋势与科学的结论。中国的知识阶级呵！别再盲目的反对了，请先去研究一番，再来提出几条特别难题，公开讨论，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二）赞助革命。你们也许会说：“对于你们的主张，我是绝对赞成的，但是革命、流血，我终是觉得可怕的。”可怜的弱者呵！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比你们更可怜的了。可是世界并不因为你们怕血，血会不流；反因怕流少数的血的人太多了，血会流得更多些。因为资本主义不推倒，战争、刑罚、贫病等便天天增加，而赞助革命的人越少，革命的流血一定越多。譬如说，倘中国四万万人从今天起，人人都成了社会革命者，自然可以一滴血也不流，革命立即成功。这可惜是太空想的了。但赞助革命的人越多，将来流的血必越少，这的确是事实。一指生病，将害及全身时，你就知道将那手指割去。劝你们对于人事也这样看待，象以前俄国知识阶级一样，报异常慈悲的爱与同情，实行革命。中国的知识阶级们呵！你们也忍些痛来赞助革命吧！现在的农工太无知识了，不得知识阶级的赞助，革命恐一时无望的。

无政府共产党同人更以最诚挚的友谊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敬致忠告如下：

中国以前无所谓共产主义，有之，自俄国革命以后始。世界也太黑暗了，一听俄国革命消息，非但你们，即是我们——无政府党——当时也予以极浓厚的同情，并尽力予以帮助。只要是真的社会革命，我们决不固执成见的。但这是一件多末伤心的事呵！大有希望的俄国，只在口头上说些好听的名词，实际上还是一样地压迫工人、压迫革命党，现在竟已实行什么新经济政策，并与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了。亲爱的共产党呵！你们倘真以社会革命为目的，那末，你们对于俄国政府的失望，一定与我们一样的。因为事实的确如此呵！

中国历史的习惯，世界现在的潮流，都和中央集权大相对，这一层，你们也许见得到。我们知道，你们不过因为俄国的革命，想以

俄国的方法用之于中国。这种苦心，我们是很谅解的。不过现在的俄国，已经与我们一个大大的教训，便是无论哪种集产的政府，无论政府中人如何可靠，结果终是要到横暴一途的。亲爱的中国共产党呵！你们因为俄国的教训，也许会知道主张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是不错的了，你们也许因此知道号称有手段的共产党的手段，是靠不住了。韩国以前的共产党很多，现在知道了俄国现实以后，很多都改入无政府党的。中国的共产党呵！你们竟因为服从首领，便反对真理么？无上帝！无主人！你们快去反对那受俄国津贴的野心家吧！这是真忠心于社会革命者所该做的呵！

民主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互相关联的。三民主义中的民主，至多不过是一种社会政策，用以缓和社会革命的。你们全体奉首领命令加入国民党，此之谓“妥协”——你们以前所时常反对的妥协。

最后我们还要附带说两件事：

（一）日本同志大杉荣及伊藤野枝被杀事发生后，中国同志除以文字或口头表示哀悼以外，简直没有一件有价值的表示。大杉荣前年到上海时，曾劝我们努力革命，严密组织，国内及国际间都该有相当联络。同志们！我们该继续他向前进呀！对于他的死，倘只以哀悼的事，大杉荣真死不瞑目了！

（二）苏俄政府虐待革命党事。许多俄国的革命党（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民主党等，反抗政府的工人、农民、水手等（他们决不是反革命党或白党）被杀的实在不少，现在还有许多被禁在莫斯科及各省狱中的，被流放至北部的。他们除受虐打及一切沙皇时代的刑法以外，每人每天只得一磅的有稻草的黑面包。德国救护俄国被囚革命党联合委员会曾有通报发出，请求各地同情者予以经济上精神上的帮助，款可以寄交德国。由 Berkman 转交。

无政府共产党上海部敬祝全世界同志继续为社会革命努力！敬祝一切表同情于社会革命者的健康！敬祝无政府共产主义万岁！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节录）

三木，《春雷》三期，1924年5月

（上略）非难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说：“无政府主义者专注重个人的自由，实际上便是个人主义者。”又有人说：“无政府主义者自负太甚，想推翻一切，自做超人。”也有人说：“无政府主义者丢开现世，注重未来，与那些祈求天国的基督徒相等。”其他非难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调，尚不知多少。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实受了许多枉屈，并且在他的进行上也受了许多阻力，因为许多浅近无知的人们，常常因此而反抗无政府主义者，又有许多表同情于无政府主义的人们，因此也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枉屈和阻力久已铲除了。

个人主义，在表面上看，好似与无政府主义相似。因为它也是反对国家与政府，主张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高尚的。其实它是一种极不合逻辑法的东西。法国 Basch 教授说：“个人主义，他的目的，不是使社会全体‘完全发展’，惟有发展那少数有天才的人，是亦不过现在少数人垄断教育的变相罢了。他的意义不啻说给有少数人的一个‘完全发展’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与政府，他方面又要借重国家与政府的权威，以维持他们少数天才人垄断教育的权利，这不是一种极不合逻辑法的东西吗？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永远灭绝国家与政府的威权，而实现普遍的互相扶助而不相侵的自由，与那些 Stirner(施蒂纳)及杨朱等个人主义者，可说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

超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是两不相容的，因为超人的威权，更甚千万倍于现在的国家和政府，主张超人主义的尼采(Nietzsche)说：“一切为权利意志而存在”，又说：“人类是系着禽兽和超人中间的一条绳子。”他的这种说法，不啻宣传威权主义以增长少数聪明才智之士的野心，又好似宣传基督教，把人类做羊，以超人为牧师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威权和主人奴隶的存在，这样的超人，也自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敌人了。

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是丢开现世注重未来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常识。因为他们常常不顾事实，专凭一人的偏见来批评的。他们说：

“无政府主义者只求将来极乐地的实现，不顾现社会的实情。”殊不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现社会的实情实景，已应用科学方法将他分析又分析，由分析的结果，知道无政府主义为促进社会进化的唯一道路。故从而宣传之，实现之，以增加其进行速度。在一月前，友人某君合我讨论无政府主义，谈到最后的结果，他便提出一个好笑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何时可以实现？”我的回答便是：“无政府主义天天在实现中，正如进化的行程，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行，毫无停止。不过此时所实现的，不是一个整体，是一部分的加多，就是由平民中产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组织，正随着时代进化而扩大，好似硫酸铜在水中，初则浸漫于水之一部分，继则至水之全部。”如果用科学眼光来观察无政府主义，正如观察硫酸铜在水中的现象，时刻向那广大的空间扩散，许多人常肯定说，无政府主义的实现须在几千万年以后，因此目无政府主义者为抛弃现世，注重未来，这实在由于缺乏科学头脑所致，用不着多多讨论了。

由此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不是什么超人，也不是抛弃现世只顾将来的焦土，他是为着自己生命之力，不断地向前奋斗的革命者。他那伟大的人格，充满着真实、和悦、勇敢、坚韧和热忱，好似那巍峨高山，兀突宇宙间，这是如何坚乃尔伟大呵！又好似那好党的海水，是如何奋勇而热烈呵！他不知道什么悲观和乐观，他指将他那生命之流，向着进化的前程开拔；如果世界上失去了他那慈祥诚挚的爱，世界将向后退化，以至于不能存在。无政府主义者所要求的，是自由，因为要有自由，才有和平，才有欢乐，才有进化。要是没有自由，便是将生命的前程斩断，世界便会朝着死的方向走，那里还有和平欢乐与进化呢？无政府主义为着自由的要求，常常用他那真实、和悦、勇敢、坚韧、热忱的精神，与那自由的障碍奋斗，虽受尽极残酷的待遇，亦所不惜。这便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精神，也就是那最高无上的伟大人格。这种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是无政府主义者生命的全部。

无政府主义者，在过去的时代，原来是充满着全世界的。但是到了现在，有一部分失去了他的本性，被许多诱惑物所蒙蔽，一念之差，致堕落于进化途程之后。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为之灰心，仍用他的赤诚和热血，迫促他们醒悟，以便同登进化之路，虽至流血杀身，亦所不惜。必至将全世界都化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同生于一

个自由美满的乐土中，一切的虚伪消灭了，一切的压制破坏了，各自本着真实的生命，为宇宙进化而努力，这部伟大的工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所负担的，一刻也不会放松。

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呵！我只看见你是真、是善、是美，是光明，是伟大，是勇猛，我愿借你这样的真、善、美、光明、伟大和勇猛的精神，激刺我的麻木神筋，使我一样地和你前进，我们携手合作！

[注]：本文作者三木，即李少陵，又名嘉本特，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李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时，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参加大同合作社、青年同乐会及湖南老工会的活动，并任劳工会的教育部长；1922年就读广州的广东大学，后与王祺淮共同创办《春雷》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李少陵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四十六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70年在台湾病世。著作有《骈卢杂忆》、《曾、左、胡故事》等。

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节录）

苦力，《民钟》第十三期，1925年9月

（一）国际状况（略）

（二）中国现势 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资本主义已进入萌芽时期。一般卖国与剥地皮的官僚，渐变为财政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的大部分，直接间接均为帝国主义的奴仆，工业大半在外人手里，故完全抱着侵略的目的。无产阶级在这种状况，不但受军阀与财阀的剥削，并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无阶级的责任，不但要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并应推倒土著资产阶级。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决不能违反全世界的共同潮流。现在先进各国的无产阶级，正努力反对资产阶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决不能与土著资产阶级妥协，实行单纯的国民革命。因为土著资产阶级虽反对帝国主义，但他们间总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土著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事实上常采取妥协政策，一块儿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中国无产阶级，联络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努力去干社会革命！

（三）政治主张

扰乱中国社会的根本原因，固由于军阀的互争地盘，但欧洲的“民主主义”政府，也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物。我们考察政府的任务与历史，知道他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民主政府或劳农政府，实际总剥削劳动者的汗水，拥护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所以政府的唯一的任务，即干涉人民的自由联合，使一切人类社会的关系，均假手于命令与官僚。无政府党的政治主张，无非反对集权的政治组织，提倡工农的自由联合，凡社会的生产与分配等问题，由职业团体派遣代表讨论后，再经各地方团体审定。

我们认现在的议会，是特权者的骗人机关。他们伪称代表民意，制定种种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我们应联络劳动群众，在议会外干革命运动。但我们对于民众的请愿运动，如根本上不违反无政府主义，也得积极参加活动。不过我们须警告民众，说明请愿运动的无

效、政府与议会的性质，使民众于痛苦的经验中，倾向于纯粹的无政府运动。

（四）经济组织

现社会的一切生产品，均为劳动者合作的结果，所以无论寄生阶级或劳动者，全不得认生产的某部分是他个人的所有物。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使人人有劳动义务与消费的权利，但不得占据生产工具与生产品，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于社会革命时，应援助劳动阶级占领工厂，农民管理土地与耕具等，使野心的社会党无法组织政府，妨碍工农直接管理生产与分配。

工农管理生产与分配后，应使工厂与制造场的组织不致妨碍人类的健康，并用机器耕种土地，使农民不因经济关系发生小资产阶级心理。关于劳动方面的报酬，就是消费的权利，应平均分配。但病人得因培养的关系，享受特别的待遇，其他有损健康之工作，或特别劳苦之工作，亦得享受罕少物品之权利。但我们决不能因智识与技术的不同，而分别劳动者的消费权。

（五）劳动运动

无政府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思潮，而是劳动群众的革命理论。如我们考察各国的社会运动，也可发见无政府主义与劳动运动有密切之关系，故我们想在中国干革命运动，也应积极参加劳动运动。我们当使中国无产阶级脱离野心政党的影响。因为无产阶级的劳动团体，不但是社会革命的大本营，且得应用自由联合的原则，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于实际参加劳动时，对于加入已成立工会或另组无政府工团的问题，不必加以原则上的规定。欧美各国同志，亦有组织工会后，并不联合全体的产业工人，仅容纳一部份工人，但他们的行动却影响于全产业，并能于实行罢工时，指导工人反抗资产阶级。有的同志加入已成立的工会，但不久便能使该产业的工人脱离一切政党之操纵，而恢复自己的阶级意识。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劳动运动的方法，应以空间与时间而定。不过工会如要求会员承认政党的党纲，那末我们只有实行退出，另外组织该产业一部分工人。

（六）农民运动

农村经济的落后与无进步，全由于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农民在这种散漫的组织里，阶级觉悟与革命性颇为薄弱，故欧美各国的革命者，大都参加劳动运动，而不注意于农民运动。其实农民虽不能为革命的主力军，但一般贫农因受地主压迫，对于无政府的社会革命，不但不致反对与嫉视，且是革命工人的援助者。

现在欧美资本国家，农民总较多于工人，故于实行社会革命时，如未得到农民的同情，则决不能达到共产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于未革命时，应积极组织农业无产阶级，反抗地主与政府的剥削。我们知道农民也与工人一样，决不为空洞的理论所激动，所以于接近农民群众时，当使他们感觉自由组织的利益，最好利用合作社的组织，把农业品去换工业品时，不受商人的从中的剥削。这种方法于社会革命后，就变为共产社会的基础。

（七）暗杀与暴行

一切群众的革命运动，决离不了暗杀与暴行。但我们知道单纯的暗杀行为，决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为暗杀与暴行是黑暗时代的反抗方法，各国同志每利用这种手段，去打破统治阶级的威权，而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以我们的暗杀条件，就是应使目标较为显著。假定于实行暗杀后，尚须加以书报的说明，那末这种行动已告失败，民众也认此类行为，是一种个人间的仇杀。

我们认为暗杀与暴行等手段，须由直接参加之个人与团体自行决定。凡一切集团的暗杀行为，纯为维护他人之利益，完全违反无政府主义。因我们不信可用政党的纪律，去强迫同志牺牲生命。所以我们主张暗杀行为，由同志们自行决定。

（八）民众革命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目的，直接的是解放无产阶级，间接的要求人类解放。故我们的革命运动，如不为劳动群众援助，则很艰难达到目的。一般热心于革命的同志，应参加工农的革命运动。我们于革命的预备期里，当助工农组织团体，设法改善劳动条件。如平时工农与资本家斗争时，虽其目的仅在经济方面，但我们亦须积极的参加，使工农于罢工抗税中，渐知打倒政府的必要。

同时我们知道，罢工抗税虽是一种革命行为，但我们决不能以这种行为，去逼迫资产阶级放弃他们的特别权利。所以我们于革命时期，应一方鼓动劳动阶级实行罢工与抗税的运动，他方面用反军国主义去破坏军队中的纪律，然后我们再去武装革命工农，实行武装暴动与武装示威运动。

（九）对政党的态度

无政府主义者对他党之态度，有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如我们的目的为社会主义，想消灭政府的威权，使土地与生产工具变为社会的公共产物；实行社会革命的手段，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直接反抗资本主义，并用民众的武装暴动推倒任何政府形式。至于其他政党，无论是民主党、社会党或列宁党，均想假政府的威权，施行种种改良政策。他们以为一切社会发展，纯是政府的力量。所以他们常谓维持社会秩序，须用常备军、警察与监察等。无政府主义者深知政府的威权是社会进化的障碍物，至于一切政府的组织，只能破坏人民的自动力。

其他政党因争权关系，每有妥协与合作的可能。我们的理想与手段，与他党根本上不同，故决不能统一战线。但对于他党的个人，应持敬爱的态度，因他党的个人中，亦有热心的革命分子，所以我们与他党讨论时，应免去谩骂与讥笑等恶习，而解脱本团的纲领，与其他政党的缺点。因民主派、社会党与列宁党员，每有抛弃从前的谬误思想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

主张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节录）

柳絮，《民钟》第十六期，1926年12月15日

同志大杉荣曾极力的提倡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然而他一逝去，这个重大的题议便同时也几在无形中消灭了。我觉得东亚同志们太散漫了，无政府主义流入至今近三十年来，连一个联合的通信机关也没有，这是何等羞耻的一件事！我以为若是东亚大会开不成功，先只组织一个联合的通信机关，以便各国同志联络，也总比没有强些。我以为在这东亚各地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热烈的时期，我们总有一个严重的表示，以作民众运动的指南针。

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穷命，最需要的是国外的市场与原料，因此帝国主义掠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侵略行为，较前更甚。依近来的情形看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暂且不论其意义与背景如何，但却能看得见民众的反抗精神。日本虽在欧战时期，得了不少渔翁之利，然而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需要贪夺不厌的掠夺政策，所以它对于朝鲜，近来并行武装政治及经济侵略，由此使经济破灭而毫无余地的朝鲜民众，抛弃缓和的运动，而着手急进的破坏运动。我以为无论何处同志，尤其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同志，使该地民众须先了解民众运动的意义与必要，不然民众的有力的反抗运动，竟给少数野心家所利用，结果，反会得到以暴易暴的结果。

欧战后，“民族自决”的声浪日高，各殖民地的民族运动，一时甚为猛烈，于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同时拼命的提倡反帝国主义运动。可惜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显然有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的倾向，就是想以本国的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意思。

还有殖民地的如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台湾等处的民众运动，大概都离不了狭小的民族革命运动。这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帝国主义暴政之下，最容易深刻的印象着爱祖国的思想。我以为殖民地的同志们，第一步可以先努力于解放本殖民地的运动，但是决不应该含着民族的区别，比如目下朝鲜民众，要干社会革命，在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前，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可是殖民地的同志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是设法消灭爱国狂潮，不然，我们的为正义的活动功劳，也反会被他淹没了。

日本方面，我们的运动，在震灾以后虽有暗杀军阀及破坏官厅计划与示威运动等，然而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地震对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给了致命伤，从此以后，日本同志的活动力在劳动运动里远不及布党。然而日本同志的炸弹声、被捕投狱的消息，实使布党与万恶资本家心飞魂乱！日本同志干破坏运动每遭失败，其原因是在缺乏破坏工具及组织。这里中国的同志可以供给他们的需要，朝鲜、台湾的同志可与他们合作，而着手破坏活动。

我以为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及召集东亚大会事，并不是空喊所能成功，所以凡赞成的，渐渐往前作这种工作才能有实现之日。我盼望中国方面的同志，在未召集东亚大会之前，应该开一次全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在《国风日报》上有许多同志提议过，但终未见实行。召集全国大会，我也知道其中有许多困难，然而我想在中国方面总比他国容易，因为在政治纠纷的中国，好乘机会容易找地点，所以我以为东亚大会也不能不在中国举行。至于代表方面，我想除中国同志以外，他国同志只能代表团体而出席，因为在他国，召集全国同志选出代表，这是非常困难并且是不可能的事。

或者节省中国同志的许多困难起见，中国大会也可以与东亚大会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开幕。

至于东亚同志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大会上应讨论的问题及筹备上大体计划，现分列如下：

一、开会地点 我主张在上海或在武昌，这些地方比较上自由，且是中心地点。

二、时期问题 我主张迟在二年以内，极力使他成立。

三、大会发起人 民钟社、民众社、朝鲜黑帜团。

四、出席人员 有一个团体以上证明认为信实同志者，依个人资格也可得出席。

五、议事的手续 由以上三团体发起而得各地同志的资助后，先组织一个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期成会，由期成会筹备一切关于联盟及大会的事。

六、讨论的问题

- A. 组织大联盟问题；
- B. 审查各国同志的革命方略；
- C. 如何纠正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论调（民锋社）；
- D. 如何纠正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爱国狂潮（朝鲜黑帜团）；
- E. 联络各国同志的问题（……民钟社、劳动运动社、黑帜团）；
- F. 宣传问题；
- G. 破坏运动问题（长沙星社、朝鲜黑帜团、日本同志……）；
- H. 劳动运动问题（日本劳动运动社、民钟社）；
- I. 农民运动问题；
- J. 对付布尔什维克党问题；
- K. 世界语问题（北京安社）；
- L. 军队宣传问题；
- M. 大会的宣言（日本同志——劳动运动社、民钟社）。

上列的问题和团体名，都是由我个人记得的团体之中假定而且假设的，我盼望各同志们注意一下，并速起而谋这大计划早日实现。

注：本文作者柳絮（1905-1980），即柳树人，原名柳基石，笔名友竹，化名刘平、邓茹英、刘雨亭、李启东，朝鲜黄海道金川郡人。1912年来中国，1916年加入中国籍，1926年毕业于朝阳大学经济系。柳树人曾先后担任天津商报、河南民报、中韩文化月刊编辑、主编及河南大学农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南通农学院副教授。1952年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5年获准恢复朝鲜国籍。柳树人早年积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曾与朝鲜黑帜团有联系，并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

南洋无政府主义运动之概况

欧西，《民钟》二卷一期，1927年1月25日

南洋这个地名，讲起来好像是很含混的。据一般地理学家说，南洋可有两种的讲法：一叫做“广义的南洋”，一叫做“狭义南洋”。但是，我并不是地理学家，而且在这里也用不着来讲什麼地理，所以关于这些问题，本可略而不提；可是，要使我们的亲爱的读者看了这个报告有着一些印象起见，那末，在这里倒又不得不先把这里所讲的南洋，简单的加以一些说明。

这里所谓的南洋，大概包含马来西亚、荷兰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暹罗、缅甸与安南等几处地方。像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怡保、金宝、亚鲁士打及高塔等地方，都是属于马来半岛的；像苏门答腊、爪哇、巴布亚等地方，都是属于荷兰东印度群岛的；像马尼拉，是属于菲律宾群岛的；再像曼谷与宋卡，是属于暹罗的；像仰光，是属于缅甸；而像西贡，则就属于法属之安南了。

在上面所述的几处地方，大概都发生过无政府主义者之运动，至少，也曾有着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之足迹。但是，我要在这里预先声明：那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最热烈的地方，却要算到马来半岛，而尤其是马来半岛上之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三处地方。这三处地方，在从前曾经产出过不少政治革命的牺牲者；到如今，那末简直可以称之为南洋无政府主义者之“大本营”了。

南洋的社会，在物质方面讲起来，是一个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社会，在精神方面讲起来，是一个文明者和野蛮人的社会。所以，若是要研究起南洋的社会问题来，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那所为资本家和劳动者，所谓文明者和野蛮人，大部分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谓的“华侨”。他们不论是已经成了资本家或者还是劳动者，不论是已经成为文明者或者还是野蛮人，大概都有一点共通的性质，就是“冒险”。他们因为肯冒险，所以他们的进取心很发达；他们因为进取心很发达，所以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就比较的很丰富；当然，而尤其是一般为资本家、绅士们所瞧不起的劳动者。

在前清末年，孙中山到了南洋宣传之后，他们便踊跃跃的投身同盟会，有的牺牲生命，有的捐输金钱，尽力那所谓“民族”，“民权”的政治革命，这是他们的革命精神第一次的表现。直到所谓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加入了限制无产阶级入党之条文；那末，一般无产的劳动阶级才觉悟，那“民族”、“民权”的政治革命是中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平民革命！于是，那马来半岛和荷兰东印度群岛上的一般劳动者就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另行组织含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工党于槟榔屿，专门从事于劳工的运动。并且办了一个周报，作为他们的宣传的机关。同志冰弦与显纯二君，都是当时的最热心的运动者。自此以后，南洋的各种职业的工团，便相继创立于各岛之各埠，而槟榔屿之工党，要算是南洋劳工运动的先锋，而且也可说它是南洋无政府主义者运动之胚胎了。

一九一三年师复先生创刊之《民声》，是中国国内宣传的第一种无政府主义定期的刊物。在一九零五年时，虽然有过一位陆先生印行的《小热昏》，但这是一种韵文的小册子，并不是期刊，而在南洋群岛上的第一粒无政府主义种子，也不能不挨着《民声》哩。其时，在吉隆坡有客公君，在怡保有捐生君，在槟榔屿有显纯君，在仰光有冰弦君，就是在荷兰东印度群岛也有着很多的同志，他们都极力的把《民声》宣传到南洋的各岛各埠去。因此，南洋群岛上的正在努力从事劳工运动的劳动者，才得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和一种劳工运动的方案。直到一九一四年冰弦君创刊了《正声》，一九一七年华林君在马尼拉创刊了《平民》，发起了工党之后，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在南洋就此更形活动了。

南洋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叫做真社。它是于一九一九年产生的。真社出版的宣传品很多，而为新加坡政府所痛恨最深的宣传品，要算是同志笃初君所编的马来文的小册子；所以，那时的笃初君被英国政府——新加坡——驱逐出境，而石心君则被荷兰政府——苏门答腊——驱逐出境。新加坡的《国民日报》为了此事封闭起来；而荷兰政府方面，并且添加了一条监禁无政府党人十五年之法律。这可以想见那时的运动的热烈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从同志被逐、报馆被封之后，一般未被驱逐之同志，当时只好采取稳健的方法进行了。那知到了一九二零

年又有运动电气厂罢工和格杀荷兰官僚之鼓吹，发现于荷兰东印度群岛之苏门答腊。此次运动之主谋者为张狮眉君。结果，张君被荷兰政府判了六年之监禁。后来，荷政府又因为张君好用马来语言在狱中演说，便把他充到了荷兰东印度之边境属于新几内亚之巴布亚荒岛。幸而一九二三年荷兰国王万寿，才把张君特赦了，驱逐到了新加坡。

南洋无政府主义者运动之热烈很可钦佩，但他们终究有着一个弱点，就是缺少一些联络的精神，虽然也有过真社的组织，到一九二二年虚舟同志到了南洋，他便极力的四处联络起来，并且在吉隆坡办了一份《太阳》，又在怡保出版了《人权》。南洋安那祺同志社便是虚舟君的最后的成绩。

一九二三年爱真代表东方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到南洋宣传主义，联络同志，组织机关。其时，同志一余也从广东到南洋来。因此二人便联络起来，分途进行。爱真本在槟榔屿锺灵中学担任教务，因为创设劳工夜学、组织东方无政府主义者同盟之槟榔屿部，事微闻于政府，政府便必欲令他离校；幸当时锺灵之当局者为之担保，才始仍旧安然无事，可以继续进行。虽然，政府方面的侦探已经常常跟在爱真之后了。一余君在新加坡也从事联络同志、组织劳工夜学。到了那年的十二月里，爱真的教员证书终被英国政府取消。于是在槟榔屿，爱真已有不能安居之势，便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六、七二日在皇后街机关部开了一个马来半岛无政府主义者大会。这个会中最重要议决案，便是在各个到会代表（十三人）的所在地——怡宝、金宝、吉隆坡、亚鲁士打、新加坡、槟榔屿、宋卡——至少要组织一个机关，成立一所劳工夜学，这总算是在南洋群岛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了。但是，为了这个大会，而皇后街的机关部里承蒙英政府的随带镣铐的侦探与差役光临了两大次。那被光顾的爱真，其时幸而已经到了一个和槟榔屿相隔一水之吉礁国的乡村高塔去了。避不过新加坡总督的通缉的电令，爱真终究不得不遁逃到暹罗之京城曼谷去了。

社会的黑暗，政府的野蛮，在南洋以法属之安南为第一，其次就要挨到暹罗了。在暹罗，竟可说什麼都讲不到。爱真到暹罗之后，无法可施，便以“世界语”之宣传为吾党运动入手。除每日在《暹京日报》特辟一栏鼓吹之外，又与二三同志开办了一个曼谷世界语夜学校，每晚教授“世界语”二小时，以为联络同志之机关。结果，居然也得到了十几个同志。可是，自从《暹京日报》被封，而曼谷世界语

夜学校也受了影响，一点正在发生之萌芽，从此遂被踏入了无何有之乡了。

那时，在缅甸之仰光却有一个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之《仰光日报》。这个报纸，文字优美，纸张洁白，印刷鲜明，主笔政者为同志傅无闷君，这实在是一件极可纪念之事也。

马来群岛上之无政府主义者自开“大会”之后，几乎无人不在英国政府注目之中。就是那一段很和平的所谓新思想者，也都被视为嫌疑者了。当时的政府之专制情形，除身受之外，简直是难以文字或言语形容得出的了。一般无政府主义者深恶痛绝之余，就决计用最后之手段，以炸弹轰击新加坡之总督，以为报複之举。预备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新加坡总督出巡七州时，即为实行此举之期。但任掷炸弹者为黄素英女同志，而逸民同志则担任放手枪。不料总督出巡时，行动很是秘密，他们二人到处追踪，终未遇见。他们于是遂改变方针，到吉隆坡作谋炸马来联邦华民政务司之举。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钟，吉隆坡华民护卫司署中之炸弹案事件发生了。

南洋的英属殖民地，每州都有一华民护卫司署，内设华民政务司正副各一人，它的名义是保护华侨，其实是监视华侨的。当黄素英女同志手携放置炸弹之皮包走进华民护卫司署之办公室里，而吉隆坡之华民政务司列嘉士刚巧在听电话。黄女士见之，便将炸弹掷出，那办公室中顿时身横血泊。当时华民政务副司某亦被炸伤手部。可惜被炸者都未致命，亦云幸矣。

炸弹案发现之后，马来半岛上之党人被捕去者很多很多；有的监禁，有的驱逐。即未被捕者，亦都逃往他处；有的暹罗，有的仰光，有的西贡。而黄女士则被判为十年之监禁也。

黄女士至今仍在监中，据说身体尚健。我与此文结束之时，我就在此遥祝黄女士万岁！南洋无政府主义者万岁！

中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宣言

《民锋》二卷四、五期合刊，1927年9月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

中国的革命已经陷于这样危殆的地位了：白色资本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奉鲁系军阀，红色恐怖的共产党与所谓左派的国民党之武装势力，土产的法西斯蒂——在蒋介石独裁之下的所谓真正国民党及其武装与一切改头换面的军阀，正宰制着中国，压迫、屠杀或强奸无产阶级。

一切无产阶级真正的组织被他们破坏了或操纵了，他们垄断了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破碎了无产阶级的战线，甚至于强奸无产阶级的意志。

无论是高唱（为了要阶级独裁而发的）阶级斗争和高唱阶级调合的，都是充满了十足的独裁欲望而利用无产阶级为其掠取权位的工具。一切革命的怒潮被压伏了下去，革命分子一律的被囚戮了。许久以前，民锋社联盟苏州区部被南京政府的走狗摧残，而湖南嘉禾县民锋社的同志刘沛为了在农民协会做我们的工作而被逮囚，杀伤请愿农民七八十人。无政府主义梦想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得到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原是一切政府的仇敌。

本联盟是由民锋社联盟改组的，从今后色彩更鲜明了。我们从过去以至永久都站在政府和政党及反动势力的敌对的方面。我们不因为怕残酷的迫害而拍卖我们的原理主张，而和他们妥协或合作。

我们很能够认清现在的形势，一切自命为革命的政党和他们的爪牙都是反无产阶级的利益，反革命的狐群狗党。他们的一切设施和行动，已给我们证明了。如果真正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一方面，他是不会被迷蒙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和反动的政党和政府妥协，为他的爪牙，替他争取权利，替他稳定政权的基础，他已经拍卖了自己的人格而早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了。虽然他们在口头，在笔上尚不丢弃这个名称，然而他们的行为已经把他们

的面具揭穿了。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的叛徒，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内奸，我们应该一致的反抗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团体中清洗出去，并且在理论上及各方面给他们以有力的打击！

本联盟今后---不顾任何方面的迫害与破坏---抱定的态度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

驱逐自己行伍中反无政府主义而投降于任何方政党的内奸！

反抗任何形式的政党和政府！

反抗赤白色的恐怖！

与东亚及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团结！

忠于社会革命的工作！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万岁！

无政府主义万岁！

中国少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目 录

一、中国无政府主义

郑汝成关于密查《晦鸣录》致金绍城函

(1913年12月26日) 1

附录：《晦鸣录》第一、二期文选

1. 编辑绪言 1

2. 无政府浅说 2

3. 师复启事 9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1914年7月) 10

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 (1914年8月) 12

京师警察厅关于通行各省查禁《人道》详

(1916年2月9日) 16

交通部关于查禁《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

等印刷品飭 (1916年5月1日) 18

交通部关于查禁《进化》、《工人宝鉴》等印刷

品训令 (1919年5月5日) 19

杨善德检送《兵士须知》致参陆办公处函件

(1919年5月26日) 19

汉口警察厅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及防范无政府

主义刊物传播函 (1919年6月11日) 28

第一次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告失败书 (1919年6月)	29
内务部等关于严密查禁《兵士须知》函电 (1919年6月)	30
国务院等为严密查禁《民声丛刻》及北京《实 社自由录》有关文件 (1919年6月)	31
卢永祥关于查获无政府党人在沪活动等情致京 师警察厅函 (1919年7月20日)	32
国务院等为从严查禁《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 义》等七种印刷品有关文件 (1919年8—9月)	33
杨增新关于防范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电 (1919年9月5日)	34
黄凌霜与朱谦之讨论无政府共产主义文 (1920年2月)	35
外交部等为严密查禁福建漳州过激主义宣传 品传播有关文件 (1920年4—5月)	65
内务部等关于严密查禁《光明》、《进化》等印 刷品有关文件 (1920年7月)	73
内务部关于严密防范过激党在京活动密函稿 (1920年12月29日)	74
国务院关于王怀庆请制定取缔“过激党人”专 条公函 (1920年12月29日)	74
国务院关于严禁无政府主义书刊传播公函 (1920年12月29日)	76
陆军部关于查禁无政府党劝兵工厂罢工广 告令函 (1920年前)	77
关谦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集会活动及筹资 赴俄调查等情致王怀庆呈 (1921年2月)	77

国务院为严密查缉费哲文等在沪密设三无学社 鼓吹平民革命有关文件 (1921年2—4月)	82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互助 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呈 (1921年3—4月)	84
国务院关于批转杨增新为查禁平民革命筹拟根 本办法公函 (1921年5月4日)	91
交通部等查禁《无政府主义讨论集》及《好世界》 印刷品有关文件 (1921年10月)	93
附录一：刘师复著《无政府主义讨论集》文选	
1. 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94
2. 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101
3. 论社会党	105
4. 答悟尘	112
5. 答李进雄	114
6. 驳江亢虎	121
7. 答飘飘	137
8. 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	139
9. 安那其	143
10. 答蔡雄飞	145
11. 答恨苍	148
12. 答悟尘	151
附录二：刘师复著《好世界》文选	
起！起！起！	155
交通部等查禁《救世音》印刷品有关文件 (1921年12月—1922年1月)	156
附录：《救世音》文选	
1. 人道学社约章	157
2. 人道学社启事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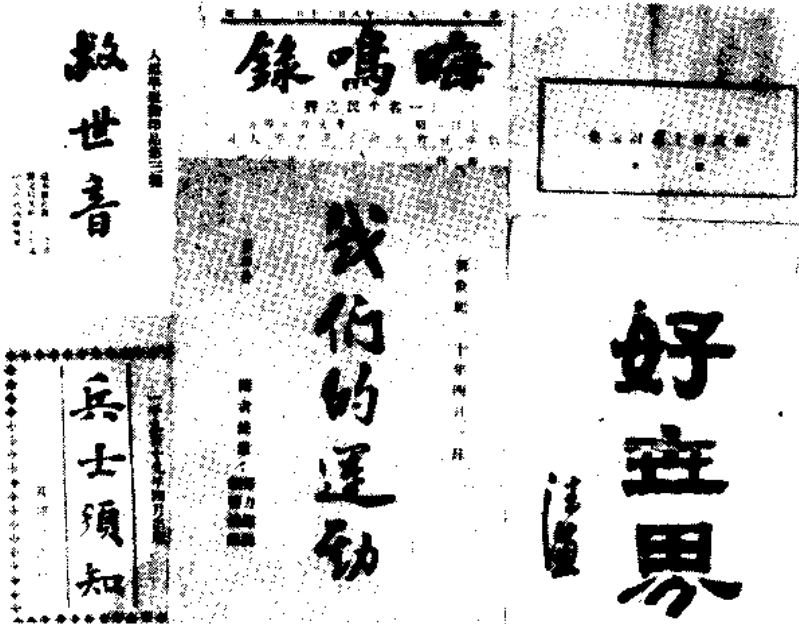
京师警察厅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人集会讨论为黄爱 庞人铨开追悼会等情呈 (1922年3月30日)	159
载德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人组织世界语学会及活 动情形致聂宪藩呈 (1922年6月5日)	160
国务院等关于王怀庆请制定取缔“过激党人” 专条的文件 (1922年11—12月)	161
国务院关于批转王怀庆呈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 团与无政府党人集会活动情形公函 (1922年11月14日)	165

二、中国社会党

(一)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及其被解散

张锡銮关于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请求立案咨 (1912年6月11日)	169
张锡銮检送中国社会党章程党纲咨 (1912年7月5日)	172
内务部关于中国社会党宣告规章与临时约法抵 触应不准立案咨稿 (1912年7月18日)	176
江亢虎关于直隶支部假冒名义立案致内务部呈 及内务部批 (1912年7—8月)	177
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等解释破除世袭遗产 制度不抵触临时约法有关文件 (1912年8月)	179
外城巡警总厅关于中国社会党北京部开成立大 会应否禁止呈 (1912年8月12日)	183

内务部关于中国社会党破坏现行制度通行各省 不准立案文稿 (1912年8月23日)	184
大总统府秘书厅等检送社会党缘起约章并通行 各省区严行诫禁文件 (1912年11月)	185
陈翼龙要求政府不得干涉中国社会党天津部开 成立大会呈及内务部批 (1913年1月)	187
冯国璋关于应否准许中国社会党设立天津部 事务所咨 (1913年1月29日)	189
附录一：中国社会党天津部成立大会传单	190
附录二：中国社会党北京部创办平民学校缘起 简章及世界语传习所招生广告等文件	191
内务部等关于取缔中国社会党张家口分部 电 (1913年2月)	196
陈翼龙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开会遭警厅强迫 解散提出质问函 (1913年4—5月)	196
内务部等取缔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有关文件 (1913年5—7月)	199
京师警察厅请通电各省解散中国社会党呈 (1913年8月5日)	202
内务部警政司关于杀害陈翼龙案与京师警察厅 往来函件 (1913年8月)	203
大总统解散中国社会党令 (1913年8月7日)	205
刘师复为政府解散社会党及枪杀陈翼龙发表 《政府与社会党》文 (1913年8月27日)	206



北洋政府查扣的几种无政府主义宣传品
 (见本书第1、19、93、156页)

郑汝成关于密查《晦鸣录》致金绍城函^①

(1913年12月26日)

巩伯先生大鉴：昨接惠函，嘱为注意晦鸣革报一节，已飭密查。现在尚在发行，因在租界无可制止，惟有随时留意可也。兹将该报寄上两份，乞察存为荷。专复。即颂大绥。

附晦鸣报两份^②

郑汝成启 十二月二十六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附录：《晦鸣录》第一、二期文选

1、编辑绪言 Deklaracio de la redakcio[redakcio]^③

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又取其所读论者借铅槩纸墨布之于外，从而名之曰《晦鸣录》。其在宇宙，直微尘耳，非所敢列于当世报章杂志之林也。虽然真理之在天地，本无所间于远近大小，惟潜心澄虑不为物蔽者乃得之。故二三人其势虽微，苟能以正确之真理为准则的，不郁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瞥见，独立不倚，以达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足以代表真理，而为人人心中所欲言，斯则所谓“平民之声”矣。

注：①金绍城字巩伯，众议院议员。

②晦鸣报两份，即《晦鸣录》1913年8月20日第一期，1913年8月27日第二期。

③此件选自《晦鸣录》1913年8月20日第一期。

《晦鸣录》既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晦鸣录》所论列，即悉本此旨，斯非嘹亮优美之平民之声乎？

今敢约举所纪载之纲要于下：

共产主义；

反对军国主义；

工团主义；

反对宗教主义；

反对家族主义；

素食主义；

语言统一；

万国大同。

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并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支那泱泱大国，固不乏深识远虑之士，其诸有以教我乎？

2、无政府浅说Klarigo pri anarkiismo师复^①

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果于吾人类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贍，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

注：①此件选自《晦鸣录》8月20日第一期。

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

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顾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

政客乃为之辩曰：政府之作用，将以为民御外侮平争端，而非以凌人也。则诘之曰：凡政府皆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谓外侮？必政府本为凌人之物，然后得藉御侮之说以自饰。且即以御侮言之，两国相争，必有胜败，果胜者为能御外侮为良政府乎？则其能胜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谓列强皆是也。至于人民之争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府所执之法律，不过集录社会固有之习惯而已（此为近世无政府大家克若泡特金之说）。使习惯可敬守也，则已无所可争，既有争矣，又岂其固有之习惯所能平之者乎？争之根源固别有在，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见政府之能也。

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

顾世人之闻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

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社会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为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

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孳孳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佚，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则弱者转沟壑，狡者习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娼妓），以为苟且之生活。其强悍不驯者则挺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

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通之论，即今日之心羨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强盗劫掠，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杀人者，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杀人之原因，十八九由于争财，否则争色。财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

有；而二者之所以存立，又无非根据于政府之法律（所谓民法）。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为也。惟将来无政府之世，无私产，无家族，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己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此时既无公私之可言，即私利亦无非公益，则不谋私利之公德，又自自然人人皆备矣。其他种种，凡今日所称为不道德云云，罪恶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于恶劣之社会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无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恶劣之社会，而铲灭今日所谓罪恶、所谓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谓无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遍晓，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但能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难。盖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其间必费多少时日、多少精神，以从事于主义之传达鼓吹。当传达鼓吹之时，即所以使人知无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盖此种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处，实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使之知固易，行之亦不难者也。倘或有一二梟悍之人，故意与众为敌，敢于破坏公理者，是谓拂乎人性，为社会之公敌，人人得而摈斥之。既能推翻强力之政府者，岂并此区区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实行无政府，惟有竭力传达，才者从事于鼓吹及实行之务，不才者亦请先自信之，此实为今日凡知有无政府之名词者所当留意，断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

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踞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

或又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共产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人之好逸乐者多，惟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将若之何？则应之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此语盖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游行，苦坐既疲，即思运动。此无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体，皆有运动之本能，无时或息，故断不能无所作为，不必人之强迫也。且人类由兽域而进于人境，其最显而易见之差别，即在于两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故“好动为人之天性”，实可断言。至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厉也。私有财产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生活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者），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贫者独任之。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铄，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好动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效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馔，而自食乃馀。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无论如何勤劳，只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其失望而懒，固人情所应尔。盖与其偷惰片刻，尚得片刻无聊之安逸，犹愈于盲勤以供富者之淫乐也。呜呼！此岂人之罪，实贫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蠹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

此。故无政府必反对私产，同时以共产主义代之。私产既废，自无因贫而为人奴隶之人。凡人皆躬亲力役，不至习为骄奢淫逸，柔弱不能事事，且人人平等，无有富贵尊卑之别，自然无视工作为贱役之理。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此时尚有人好逸恶劳，吾不信也。且今人每日工作时间，八时至十二时不等，劳动过甚，致害生理，虽有可以省力之机器，而富者以佣值廉贱之故，不肯出资购器以代人工。若共产之世，已无金钱贸易之关系，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但司其机关，虽甚污秽及辛苦之役，皆无难变为安闲之事业，即克若泡特金所谓秽浊之矿坑，亦可使之精美与大学之试验所相等者。盖既无资本家之勒其金钱，自然事事皆可利用科学之结果。而所谓文明之幸福，不至为富贵者之专利品。劳力与时间同时并省，无所谓苦，盖惟有乐耳。试观今日之世，富贵者逸乐不事生产，以大多数官吏、商贾、海陆军人、律师、警察、奴隶、娼妓、盗贼、流氓、乞丐、棍徒，以及全人类半数之妇女（凡以上各种无益于社会生活之人，统而名之曰游民），所需之衣食住均责之于农工两类之人。工人之中，又耗其一部分于无益之物及杀人之具，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世界人类职业之统计，难得确数。然以上所指游民，必居农工两类之三四倍。平均计之，即以一人而供三四人所需，亦即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也。是今人大多数皆见养于农工者，而反视农工为贱役。农工所得之幸福，必不及各种游民。冤哉不平之社会！），焉得而不劳。若彼时人人工作，苦乐平均，加以各事利用机器，又无战舰、炮台、军械等等耗损，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其时物产之膨胀，必不可思议。据法国无政府家某氏统计布算之结果，谓将来每人每日工作二小时，已足供社会之所需，今姑假定为一倍之数，每人每日工作四小

时，时间短小，工事轻易，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今人逸乐无聊亦往往为游猎、旅行、游戏、体操等等消遣之事。然则每日作工数小时，亦不过消遣之类耳。又何不肯工作之足虑乎？

又有虑无政府时代，人类既无竞争，社会将无进化者。不思进化乃天演之原则，向上为人类之公性，断无退而不进之理。世界之进化，全赖科学，今人之发明科学，岂皆为竞争私利计者？盖大抵怀改良社会，图谋进化之心耳。顾今日发明科学之所以难能者，则以有私产之故。人非富者，不能得最高等之教育，既得之后，又以谋衣食之故，暇时无多。而器械试验之助力，亦非有资本者不能。欧美科学研究会及科学发明家，往往藉富人之资助，此科学为金钱所操纵之明证。若行共产，则教育平等，人人皆有科学之智识，所谓发明非复少数人所专有之事。每日工作之时既短，研究之时自多，复人人可得试验之器械，斯时凡思想之缜密者，必能潜心研究，科学之发明，比之今日，将有一日千里之势矣。且今人困于私产制度之下，日谋衣食，但求得多金而已足，其猥琐龌龊之态，不可向迩。若彼时生活丰赡，处于协爱之社会，思想必异常高尚，无有不思为社会谋幸福者，何不进化之足云。

此外，又有一最普通之疑虑：即恐一国无政府，他国遂从而侵割之是也。疑此者大抵习惯于有政府之下，迷信政府为万能，而不知政府亦人耳，非有万能。所谓御侮者，不外倚赖军队，军队习惯于服从命令，已无独立性质，一旦驱以御侮，其视听命令之心，必重于御侮之心，故不足恃。若人民自为防卫，纯由于保障人道，抵抗强权之公理，故必视政府之军队为有力。观于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国大革命时，以平民抗拒联军；千八百八年西班牙人战退拿破崙第一，此皆以人民抵御外侮之最著而有征者。是可见御侮不必久练之兵，而以军国主义为名，提倡扩充军备者，皆不过为政府之私利，而非专以御侮也。不宁惟是，平民既有推倒政府之能力，可以胜一国之军队，即可以胜他国之军队。且无政

府党无国界，既推倒一国之政府，且将分其余力，助他国之无政府党以推倒他国之政府。今日无政府党已遍布各国，一国之政府去，其他各国之无政府党必相继而起，各谋去其政府。此时凡所谓政府者，方自顾不暇，岂有余力以侵略无政府之国哉？试观今世所称司战大神之德皇维廉第二，对于无政府党尚为之恐怖，至有“无政府党能合万国为一团体，各国政府不能合万国为大同盟”之言。于此可见政府之力远出人民之下，显然无疑者也。

以上反复申论，皆所以证明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以实行。然则闻斯说者又何庸颯颯过虑乎？

3、师复启事①

(一) 本志言论，无论为自撰，为译述或为投稿，概由师复一人负完全责任，至其宗旨已备载于第一期编辑绪言。中外间或有以为心社机关者，虽非大谬，亦微有误会。盖心社社约只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与社会无涉。《晦鸣录》则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纯为研究社会问题，而不但拘拘于个人道德而止。故谓《晦鸣录》宗旨与心社无冲突则可，谓《晦鸣录》为心社机关则不可。

(二) 师复现在除发刊本杂志及致力传播吾人主义外，一切社团、报馆概与师复绝对无关系，外间传某社、某报与师复有关系者，皆讹言也。

(三) 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倘有假冒混充，或信道不笃，以致背约者，心社亦无从干涉。世人不察，凡从前曾列名或冒名心社者，其所作所为苟有不是，皆举而归咎于心社，甚而责备及师复个人。殊不知心社既为无章程、无规则之团体，于社友个人之行为从不过问。间无论为发起人，为社友，为赞成人，苟其人既甘心违背社约，或为无意识不道德之行为，不合心

注：①此件选自《晦鸣录》1913年8月27日第二期。

社宗旨者，即为自绝于心社之明证，即不必认为心社之人，于心社本体实无丝毫阻碍，心社不能为之代负责任，师复个人更不应代负责任。惟师复一己则敢自信，敢设誓白：日毁星球灭，师复终不敢犯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之十二神圣社约，及一切与心社宗旨冲突之事。然即使他日师复一旦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亦惟师复个人自绝于真理，为社会万众千秋百世所垂骂，而于心社本体仍丝毫无损。世有恒言，设使克若洵特金（最近无政府党之泰斗）一旦变为何才夫（俄罗斯革命党之汉奸），亦无损于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无政府主义，即此理也。再，心社所有只有十二社约之真理，此外，绝无设施，绝无举动。凡心社社友以个人名义举办他种事业者，皆由个人自负责任，与心社全体无涉。幸勿以个人之故，或误会以为某事某事由心社所举办也。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1914年7月）

一九一四年七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聚会既毕，乃公布宣言书于众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也，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寇，废除财产私有制。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

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及器械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由生产者公共使用之。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服食物房屋及一切生产物)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蠹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一切公共事业，自由组织种种公会、种种团体以经营之，而无复丝毫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军之谓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由之实力，以期摧陷强权者，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铲除之，无所容其犹豫。

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所以出汝等于地狱，使入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

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即同时改造个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性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二十世纪不可避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也。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连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务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以前，暂以本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人愿勉力担任之。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①

（1914年8月）

何谓无政府共产党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果何在乎？试以

注：①此件系1920年5月11日外交部致内务部公函附件。据《师复文存》其撰写时间为1914年8月。沿用原标点。

简明之语条述之：

(一) 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同时废去钱币。

(二) 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纳租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

(三) 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如耕织、建筑、交通、教育、医业、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类正当生活所应有之事业、皆为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 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 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 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 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 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与众人。(例如长于农事者、可联合同志、组织农会。长于矿业者、可组织矿会。)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组织某种公会者、即为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 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孕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解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

(十) 儿童满六岁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校受教育、无

论男女、皆当得同等之学问。

(十一) 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岁或五十岁、皆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理之。

(十二) 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 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 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以上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也。欲达此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人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 当传播时期中、各视此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甲)抵抗、如抗税抗捐、抗兵役、罢工、罢市等。(乙)扰动、如暗杀、暴动等。此两种手段、既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遍传遐迩、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 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 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不区区为一国说法。惟最要者则为传播时期、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急须从事于(一)(二)两种方法。盖世界革命、时机既熟、俄罗斯同志、今已大举推翻政府及私产主义矣。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均已传播成熟、引满待发、工党罢工于市、军队倒戈向朝、欧洲政府、将次第倒毙。吾

党之在南北美洲及亚洲者、亦已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今日中国、若不急起直追、一面致力传播、一面筹备大举。诚恐欧美各国、行告成功、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梗矣。

以上又即吾党用以达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时人对于吾党主义、往往多所疑虑、无非以为难行而已。或则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及规避劳动、任意夺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类众多、传播势难普及、各国政府之强权、终非小数之无政府党所能敌。此两种疑虑、大抵为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当有以解释之。

一、吾人已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须先传播吾人主义、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倘多数人晓然于此主义之美善、则少数人之未明晓者、感之固自易易、曾何患其纷扰。况无政府之人、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难行之道德。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宜、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达。且彼时之劳动、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恼者。科学发明、复无金钱之束缚、凡事皆可使用机器。无论何种工作、必求其轻捷省时、合于卫生。故于每日数小时之工作、无异于体操游艺、人何乐而避之。夫既有机噐之迅速、加以作工者之众多。生产之丰富、当不可思议。需要品唯有过多、无虞不足、又何所用其夺取。倘仍有冥顽强暴之人、必欲他人之为之服役、而已则饱食安坐者。吾人当本反抗强权之大义、摈之社会之外。彼少数人、岂能为之患哉？

二、凡事不合于天然公理者其传播难、合于天然公理者其传播自易。今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人人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传播又岂极难、但视吾人之毅力如何耳。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六七十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四十余年。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

无政府之团体、遍布各地、无政府之书报、汗牛充栋。在中国人之闻而咋舌者、在欧洲则已视为老生常谈、去年俄国社会大革命以后、红旗军之势力、已遍及于北欧中亚、更由西伯利亚而入于海参威。欧美各国皆莫不有革命之表示。世界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军队。而各国所行征兵制度、当兵者亦无非平时之工人。故在数年前、已常有政府调兵禁压罢工、而军人均不肯从命、甚或倒戈相向者。盖军人觉悟、不肯助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则将来一旦大革命起、军人亦将反抗政府、此实可断言。彼食肉之政府与资本家、何足惧哉、若就中国今日情形论之、此主义之传播、诚不若欧洲之广。然吾东亚同志、苟能群策群力、牺牲数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吾敢决吾主义行将遍布于东亚大陆。欧洲之进步、当更不可思议、实行之期、必为吾人所亲见、慎勿视为不可实行之理想也。

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此而完全揭露矣。方今战事完结、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时、无政府风潮、将从此日益汹涌、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京师警察厅关于通行各省查禁《人道》详

（1916年2月9日）

详为查明近人卢信所著一书，妨害治安，拟请通行各省一体查禁事。窃惟生心害政，名教所不容，莠说异言，王制所必禁。查有书肆发售《人道》一书，著者为顺德卢信。书分十四章，大旨剿袭西洋均富党之极端社会，谈借人道之名，鼓吹无政府主义，而学不足以见极，语不足以指实，其於宗教、政治盖无所不用其

诋诽，而尤以第五章、六章论法律、妇人为最悖谬。如云法律者，资本家之利而平民之害；及夫死再嫁，乃云失节，宋儒作俑之言，其罪上通於天诸语。荒谬之言，小之既足以败坏风俗，大之直足以妨害治安。查西洋各国国情本不同於中国，故其宗教风尚彼此互歧，而学说亦有不能相容之点。往往一说之出，在彼邦奉为至理名言，而行之吾国，则不免流弊滋甚。然如此书之学非专门，语无统系，逞其狂吠，直类风盲。盖其悖理之谈，不但与吾国学说大相刺谬，即律以西洋之名学亦不足，成为一种空谈学理之书。昔者东周学散，诸子并兴，老庄之徒愤世嫉俗，发为一种偏激之论。如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又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浸寻至於杨墨之徒出，各树其帜以为招，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孟子推其流，极诋为无父无君，比其祸於洪水猛兽。盖青年学子，血气未定，骤睹〔睹〕异论，诧为新奇，而及其浸淫久之，未有不为所移动者，此自由平等之流毒所以至今未已也。查此书印刷於日本，应按照出版法第十一、十二、十三各条分别禁止其出售及没收其印本，以绝莠言，而保治安。除申厅通飭各区分别查禁外，拟请宪部通行各省一律查禁。是否有当，理合检同原书详请宪部鉴核示遵。谨洋

内务总长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

附原书一册〔缺〕

洪宪元年二月九日

附：内务部警政司承办签条①

查阅详送原书，语多狂恣之论，显诋人道之常。目方正为迂

注：①此件承办人为内务部警政司科员景亮钧。内务部总长朱启钤批示：通行查禁。警政司长陈时利又批：此件因出书无多，且京城地面业经由厅查禁，无庸通行查禁。

拘，美邪僻为识达，且力言立宪为专制变相，军队为强权保护，法律为剥人自由，监狱为害人苦境，国家为空撰名词，政治为庸扰事业，连篇累纸，荒谬成文。其尤甚者，主张破坏资本，废去婚姻，偏至之言，极端之论，影响所及，实足贻祸无涯。盖一学说之留传，即有受其弊於奕禩者。法国卢梭倡民权之说，全国大乱者垂八十三年。前人老子主清静之旨，两晋清谈误国者至百余年。言论之为祸於人间颇烈，若不力事排除，听其滋蔓，实足为人心世道之隐忧。该厅所详各节颇有见地，拟据详通行各省一体切实查禁；并批示嗣后对于书肆类似此种书籍以及淫词小说，一律严查究办。景亮钩。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交通部关于查禁《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等印刷品飭

（1916年5月1日）

交通部飭 第一一六五号

为密飭事。准统率办事处函称：据淞沪杨护军使函称：检查邮信员检获《无政府浅说》及《平民之钟》小册二本，又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暨同志社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两纸，送请核禁前来。查无政府主义为世界各国所不容，上海既有此种秘密结社，势必暗中勾煽，日益蔓延。前项印刷品自应禁其传播，以免危害。除函内务部通行查禁外，函达飭局注意查验，勿为递寄。等因。合飭该总局迅电各邮局认真检查，遇有前项煽惑印刷品，即行扣留停寄为要。此飭。

民国五年五月一日

右飭邮政总局准此

〔北洋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交通部关于查禁《进化》、《工人宝鉴》等印刷品训令

(1919年5月5日)

交通部训令 第七六三号

令邮政总局

近来外间发现《进化》杂志、《民声丛刻》、《工人宝鉴》、《太平》等印刷品，以鼓吹社会革命及无政府共产同盟罢工等事为宗旨。现经内务部密电各省区长官转饬警察机关，对于该杂志等按照违反出版法切实办理。合亟密令该总局仰即密饬各邮局，遇有前项印刷品交邮递寄时，即予扣留，送交就近警察机关办理，毋稍疏忽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五日

〔北洋政府邮政总局档案〕

杨善德检送《兵士须知》致参陆办公处函件①

(1919年5月26日)

迺启者：濠电计已达览。兹将《兵士须知》一册寄请察阅。该书内容即无政府之共产主义，此等狂悖之说，向者早有闻知，幸未侵入军界，其说故不得逞。今是书竟从队伍驻扎地发现，其中显系有人主使，藉以扰乱秩序，破坏治安，若听其蔓延，不但国家无以存立，人类且随以灭亡，星火燎原，不能不预为防范也。且过激举动为世界所不容，敢请知会友邦，共同饬属严行查禁，务使狂悖之说及其发行之印刷物，一概从速扑灭，无使滋蔓，至为企祷。专肃。即颂公祺。

杨善德拜启

注：①此函时间系参陆办公处收文日期。

附《兵士须知》一册

兵 士 须 知 李得胜述

弟兄们：我是第三师第十二团一营一连六棚正兵，名字叫李得胜，直隶保定府的人，当了六七年兵，打过两回仗。去年在衡山被炮弹炸伤了一条腿，现在治的可以迈步了，但且比着从前，还是不自由的狠咧。前两个月销假回营，把我拨到执法处当护兵。问案打人的时候，弟兄们哭号的声音，虽说听着难过，不下操，没勤务，倒也清闲。每到了礼拜，访朋友的访朋友，上茶馆的上茶馆，独我一个人，因着腿脚不便，不愿意在人前过来过去，常是坐在号房里头，自言自语。旧交的朋友，多一半阵亡。新补的弟兄们哪，看我是个废人，待我都没甚么意思。世态炎凉，这也不必怪他。所最教人难受的，是家中老娘来信说我当初不应该当兵，叹他的命运不好，怨我们祖上没有德行，因此子孙们才落的当了兵，拿着身体不当身体。幸亏仅仅的伤了一条腿，若是死在湖南，连他这一条老命也活不长了。我是自幼没了父亲，长大成人都靠我母亲那两只手。所以一听见他老人家说出这样话来，不由心如刀割的一般。欲想销差回家罢，怎奈道路太远，欲想暂在外头胡混罢，又自觉着没一点儿好处。进退两难，真是自找，天天愁闷，日日烦恼。越是夜静更深的时候，越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后思前，只说今生今世，不但不能再讨我母亲的欢喜，连上了年纪有没有饭吃也不敢断定。思想到难过处，不由的发痛。一日早起，正在愁眉不展、极无聊赖的时候，忽然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书，上写“兵士须知”四字。我一看这个题目非比寻常，遂掀开书本，从头至尾看了几遍。觉着我从前所希望的，现在都不希望了，从前所缺少的，现在都不缺少了，从前所忧虑的，现在也都不忧虑了。这一本书啊，恐怕比孔夫子他们的四书五经还强的多咧，真是无价之宝。不能不对弟兄们说说，教

弟兄们知道咱们所杀的，都是咱们的好弟兄，所服从的，都是害咱们的仇敌，所吃穿的都是好百姓拿血汗换来的，不是那大元帅、督军、师长他们亲自种地、织布养活着我们的。弟兄们，千万由根本上想一想，别把仇人当做恩人，再瞎给他们使唤愚弄着咧！如若不信，等我把《兵士须知》一句一句的背给你们听：

弟兄们：咱们入营当兵，爱的是国，还是为的吃穿呢？我想人人都为的是吃穿，没有一个肯爱国的。这是甚么说法呢？弟兄们你想，家是咱们人人都有的，若说到国，那一点儿地方是我们的，那一个地方是我们认识的。象那当官长的，他们可以就他们管辖的地方，向他们管辖的人民征收租税，克扣粮饷，还可以拿一园一省的名义，把大家靠着生活的各样产业，押卖给外国人，得些个金钱，同着少爷们、姨太太们胡花乱糟。把国当做他们的摇钱树、护身符，把国内的人当做他们的家人奴婢、鸡犬牛马。非藉着这个国字，他们就不能卖大家的业产，夺大家的吃穿。所以他们张口也是爱国，闭口也是爱国。象我们当弟兄的，除非在自己家里吃饭不用花钱，此外任你到了甚么地方，见了甚么人，都是吃饭花饭钱，穿衣裳花衣裳钱，那里是我们的国家呢？我们不当兵，还可以有我们的家，若是一当兵，连家也没有了。我们当兵不打仗，还可以有我们的身，若是当兵一打仗，连身子也没有了。回想祖宗望我们的心思，父母养我们的盼望，朋友交我们的情意，妻子恋我们的慈爱，岂是打算教我们把一把骨尸送的远而且远，使那死了的人没有祭祀，活着的人没人扶养么。我想无论甚么的祖宗，没有不望他的后代子孙，常在他坟前烧香化纸；无论甚么样的父母，没有不望他的儿女，常围绕他的左右养老送终；无论甚么样的朋友，没有不望他的相好的、结拜的平平安安常在一块儿谈心共事；无论甚么样的妻子，没有不望他的丈夫，他的父亲在强壮的时候，爱惜他们，照养他们，到老年的时候，受他们的报答，受他们的恭敬。人活一世不过百年，在我们

当弟兄的更不知道甚么时候死。弟兄们，你看那火线上的人，那一个敢说保得住性命。年前我到过前线，在火线上看见好多挂彩的号哭，没有人向后方抬送；在路上看见好多横就竖卧的尸首，没人就地埋葬，浑身是血，臭气难闻，看看他们的肩章，都是我们当弟兄的。我起初尚说我们当军人的，若死在战场是狠荣耀的、狠光彩的。到看见他们有缺胳膊的，有缺腿的，有脑浆迸裂的，有肠子肚子都炸出来的，把官长平素种在我肚子里头的贪心勇气全都消灭了。不但消灭了，还觉着营里头的教训，没一样儿不是欺压我们的，巧使我们的。我们这身体是父母生下来养大的，受家中的恩惠很多，爱他是应当的。国是个甚么东西，于我们有甚么好处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着，叫也叫不应。（弟兄们，不见那要饭的沿街叫唤么，那一个做官的把他请到衙门里去，给他一顿饭吃，那一个当财主的把他请到家里去，给他一件衣裳穿。）无非几个奸雄想着欺压我们，巧使我们，又怕我们看他也是个人，也只有一个家，不信服他，遂凭空的造出一个国字来，把他抬的高高重重，说他有生杀人的权力，人有服从他的义务，非如此天下就不能够太平，人民就没人保护。甚么“法律”咧，“命令”咧，“忠顺”咧，“奖励”咧，“抵抗”咧，“违背”咧，“棍责”咧，“枪毙”咧，这些名目，全是他们私自造出来，教我们当弟兄的帮着他装在国字里头的。有了这个名目，他们可以管辖我们，杀我们，还可以教我们杀反对他们的。若没了这个名目，他们就不能发号发令，做官诈财。因此有说他们不对的人和说他们不对的书本出来，他们就怕的了不得，恨的了不得，硬说这是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不是抄书，便是拿人。把反对他们的书叫做禁书，把反对他们的人叫做乱党、革命党、过激党，传知各路军警一体抄拿。我们当弟兄的不晓得反对他们的人和书本，都是替百姓打抱不平的，于我们大有益处，反听他们的吩咐，抄书拿人，把天下的善人善书，一网打尽，教一些坏东西横行霸道。请问问

我们的良心，说得下去，说不下去。弟兄们，你想咱们一没有财产，二没有功名，三不大识字，那乱党也罢，禁书也罢，关我们甚么事。大元帅一年几百万元，督军几十万元，师长每月饷银八百两，办公费在外。旅四团三营二连半百，排长二十四两，司务长二十两，象你我当弟兄的，副兵顶多的四两八钱，正兵顶多的五两二。这四五两银子，扣去伙食，还不够零用，那能养家。革命党诸位，纵然闹得天翻地覆，难道说没了你我弟兄的饭吃吗？况且革命是革国字的命，革法律的命，革官宦的命，革尊贵人的命，革财主家的命，不是对着当百姓的革命，当弟兄的革命，也不是杀我们的父母，夺我们的妻子，抢我们的东西，我们何苦与他们为仇呢？倘若革命党成了功，我们不但从此以后，永不愁吃愁穿，还能够太太平平、团团圆圆的过日子。凡世上的人，不管他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和我们平等，比现在大不相同，你说好不好呢？前几天我有个乡亲新从哈尔滨来。他说俄国的过激党（在俄国叫广义党，日本人恨这个广义党，把它叫做过激党），是庄稼人、工人和兵伴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官的命，当财主的命，是平民的革命，人把他叫做俄国式的革命。我们中国这几年的革命党，是当军官的、读书的和政客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皇上的命，做总理的命，是伟人的革命，人把他叫做法国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是讲究爱国。俄国式的革命，是讲究爱人。法国式的革命，是为这个国字，可以死多少人。俄国式的革命，是为这个人字，不要那一切的网。法国式的革命，是把国王的权力移到国会。俄国式的革命，是不承认国会代表人民。法国式的革命，是把国会与人民当做一事。俄国式的革命，是把国会与人民看成两事。法国式的革命，说国会是人民，人民是国会。俄国式的革命，说国会是国会，人民是人民。法国式的革命，是国会制造法律，拿这个管辖人民。俄国式的革命，是人民各自耕织，拿这个养活老幼。法国式的革命，是人在

人上，人管人。俄国式的革命，是人与人等，自管自。法国式的革命，是承认地、房子和一切财宝，为各人的东西，不准许大众使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承认地、房子和一切财宝，为众人的东西，准许各人使用。法国式的革命，是分人民为读书的，做官的，做买卖的，当议员的，当律师的，当医生的，做庄稼的，做工的。俄国式的革命，是分人民为做庄稼的，做工的。法国式的革命，是把读书的、做官的、做买卖的、当议员的、当律师的、当医生的当主人，把做庄稼的，做工的当奴才，当下等人，教他们种地织布作工，养活着主人，养活着上等人。俄国式的革命，是除了做庄稼的，做工的人，一概不要。凡中年的人，每人每天都要做三四点钟的工，养活着老幼和一切不能做工的人。法国式的革命，是教人学聪明，学伶俐，能够做官发财，才受人恭维。俄国式的革命，是教人别离了朴实，别离了厚道，能够耕地织布，才受人欢迎。法国式的革命，是把天下的人分出多少等来，一种人享一种人的福。俄国式的革命，是把天下弄成一家，人人都享一样的福。法国式的革命，是有使唤人的，有被人使唤的。俄国式的革命，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法国式的革命，重的是法律。俄国式的革命，重的是耕织。法国式的革命，重的是金钱势力。俄国式的革命，重的是土地工作。法国式的革命，是有了金钱势力，无论甚么东西都可以拿金钱买来，势力夺来。俄国式的革命，是有了土地工作，无论甚么东西都可以拿人工由土地上取来。法国式的革命，是人没了金钱势力，就不能够生活。俄国式的革命，是人没了土地工作，就不能够生活。法国式的革命，是人人拿着金钱势力当性命，非用智谋去求他，不能得着，因此才生出许多的是非。俄国式的革命，是人人拿着土地工作当性命，不用智谋去求，自然就有，因此天下常得太平。法国式的革命，教人爱的是金钱，乐的是势力。俄国式的革命，教人爱的是土地，乐的是工作。法国式的革命，是教人靠着知识吃穿，立学

堂，考功名，就是这个缘故。俄国式的革命，是教人靠着劳动吃穿，讲种地，讲织布，就是这个道理。靠着知识吃穿的用脑筋，靠着劳动吃穿的用两手。用脑筋吃穿的，是拿着金钱来骗人，人若不要金钱，他就没有吃穿。用两手吃穿的，是拿着作工作来养人，人若都不要金钱，他的吃穿更多。弟兄们，你想金钱是一种极硬的东西，饿了吃不得，冷了穿不得，除了拿他当骨董摆摆，当耍物玩玩，没有甚么用处。那做官的、做买卖的人，一天到晚尽是摆架子，装体面，不但不耕地不织布，连耕织的事情都不晓得，凭着甚么吃穿呢？所以他们又造出一种骗人的东西来，把他叫做金钱。买卖人是拿着金钱换那吃穿的东西，贱买贵卖，从中取利。做官的觉得收租收税，要金钱比要粮米方便的多。因此才欢迎那商人所散布的金钱。年深日久，这金钱遂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东西。万事万物都可以拿他买来。请看那有金钱的，不是买总统（徐世昌的总统，是交了新国会五百万元，议员们才举的他），买议员（当一个议员得买三十多票，每票平均要五百元），买着我们当弟兄的该死么。卖总统票，卖议员票的人，每人至多的得几十万块，至少的也几百块。你我当弟兄们的，活着的时候，一个月四五两银子，死了的时候，不过十四元二角（十块钱的棺材，四块钱的装裹，二毛钱的纸），这还是因病死了的。若是阵亡，连尸首都没了，那里有棺材装裹呢？向好里说，说我们是死在火线上咧，向坏里说，说我们是临阵脱逃了，你说冤不冤哪！做官的人，他们的生活，不是靠着收租税，便是靠借外债，若是不养兵，就没人肯出租出税，更没人肯教他借外债。所以他们把从百姓手中夺来的孽钱，把拿着大众的财产卖给外国人的价钱，分给我们当弟兄的比九牛一毛还少的一点点。教军官辖管着我们，替他压制那些好百姓，连我们的父母、亲戚、朋友都在其内。平常待我们极苛薄，抬手就打，开口就骂，若是少微的一分辩，硬说我们是抵抗官长，重则枪毙，轻则军棍。总要训练的

们，教杀他的骨肉，拿身体和枪子碰一碰，也得遵令而行。一到用着我们打仗咧，米也不扣钱，饼干也给吃，仿佛象那坐监狱的人，到提出来枪毙的时候，才给他一顿饱饭吃的样子。许多的弟兄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没一点儿好心眼，还喜欢打仗，望着升官发财。其实各师旅团里头，军官候补的人很多，漫说部订的章程，兵总是兵，官总是官，不容易破格用人的，就是准许从兵士一跃而为官长，也是千百个人里头没有一个得到的。至于发财更算是白想。弟兄们在前敌上关饷，教你可以领双的。那随着营盘走的吃食店，东西狠贵，不知道那一会儿碰上枪子的人，都好吃喝，手里有几个钱，不是吃了去，就是喝了去，能够存下的实在狠少。若是靠着光复（在我们当弟兄的，把抢夺叫光复）发财，在打胜仗的时候，纪律严明，光复是不易的，不能不望着打败仗，还可以抢夺抢夺。但是可以光复的地方，往往离家乡狠远，纵然光复点儿东西，也难以携带。这发财的一个念头，也只可丢在脑后。不信，弟兄们你看看当兵的人，那一个发了财了。古人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这话实在不错。我劝弟兄们，你们若为着做官发财当兵，我敢说你们都是妄想。若是为着吃饭穿衣当兵，我敢说你们都有的是吃穿，不但弟兄们有的是吃穿，连弟兄们的妻儿老小也都有的是吃穿。请看世上所有的东西，那一样不是我们穷人拿人造出来的。既是我们穷人造出来的，也应该我们消受消受咧。这叫做俄国式的革命，平民的革命。是我们当弟兄的、当工人的、当庄稼人的，革那做官的、当财主的、当买卖人的命。教他们把夺去骗去的东西都还我们，不要再自尊自贵，自己饱死，人家饿死；自己暖死，人家冻死；自己甜死，人家苦死；自己乐死，人家愁死；自己闲死，人家忙死。谁也是人，都生在一块土上咧。大家和和气气、公公道道的活着好不好，何必争名夺利，损人肥己呢？近来德国、奥国因着天下太不公道，太不平均，平民也革起命来了，闹的地覆天翻，比俄国还要利〔房〕害。

我们的同胞华工狠和他们通气，真是天意。弟兄们，你们若为四五两银子给那当财主的、做官的当看家犬，当刽子手，我除了望着你们掉泪，听你们把我杀了以外，没有话说。万一弟兄们觉着他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个人，不甘心给他们做看家犬，当刽子手，大伙定规定规，各人把各人的官长都赶跑了，随后知会做庄稼的，做工的，分头把世上存多少东西留着后来自己用的和拿这些东西卖钱的，都叫他们拿出来。可以吃的，可以穿的，可以住的，可以用的东西全留着，大伙吃，大伙穿，大伙住，大伙用。不要紧的东西都把他烧了，省得后人因此学奢华，添嗜好。总而言之，我们留一宗东西，务必教他于生活上是有用的，若是没用，要他做甚么呢？所以必得把他烧了。当这个时候，天下必大乱一阵，但是乱完了以后，天下就好了。比方一个大屋子，住了多少人，满屋子里头的家具摆饰，要想重新装修装修，非把一切的人撵出去，一切的家具摆饰拿出来，怎么能够呢，当向外头撵人，拿家具摆饰的时候，屋子里不乱一阵么。又比方我们下操，由横队变纵队，由两行变四行变八行，也是先乱一阵，然后才成了新队形。这乱一乱就好了的事，本不算异样，弟兄们大着胆子做去就是了。这平民的革命，若是先由我们当弟兄的发起，把正大的理由告诉大家，我想天下没有反对得了我们的，因为天下人的性命和兵器，都在我们当弟兄的手里咧。别看他当官的，当财主的，除了巧使人，一点儿力量也没有，怕甚么呢？我们现在应当告诉他们的理由有四样：

第一样是，土地是产生五谷棉花和各种财宝的东西，应该归大伙公有，谁也可以使用。

第二样是，吃的穿的住的全是拿人工换来的，能够作工的都要作工。

第三样是，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古来的人和现在的人合起力量来造成的，应该大伙消受。

第四样是，无论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男对女，都要平等的待遇，谁也不欺谁。不出租，不要官，一切的事情由大伙商议办理。

这本书，是专为劝告我们当弟兄的作的，未免过于简单了。详细情形请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前第二路兵士某记。

我将这《兵士须知》已经说完了。我同病相怜的弟兄们呀！你们想想，他这话说的，岂不是真情实据吗？

〔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

汉口警察厅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及防范 无政府主义刊物传播函

（1919年6月11日）

啸翁①司长钧鉴：京华于役，幸侍德辉。忝邀知遇之私，复荷关垂之雅。寸心铭感，蔑有加焉。近维起居曼福，至为慰颂。敬密肃者，顷接敝友胡小吾君自沪寄来一函，据称沪上各情：自和会停顿，外交紧迫，人心恐惶。侦查孙中山一派，会议数次，秘密筹划。借外力以破坏长江，派党徒潜赴京津一带，暗设机关，其捣乱主旨，拟从北方发动。韩恢亦受军政府密令，为京津一带指挥官，以亡国之惨语，为运动军警之法门，并乘排日风潮激烈之时，破坏京师治安。又闻俄国社会党懋兴、美国女社会党高曼等一百余名来沪，与聂豫等共同鼓吹共产主义，其宗旨无政府、无家族。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其运动者。此间激烈派谭人凤、李烈钧部下与之连络者亦复不少，现以美国邮局为交通机关。值此游民偏野之时，为生计所迫受彼方运动者，日形鼓涨。内地各县镇亦设有交通机关，阳则研究学识，阴则图谋不轨，使官厅不易窥破其逆谋共产主义及无政府等项主义。并在四码头泰东书

注：①啸翁即内务部警政司长王扬滨，别号啸侯。

局，印刷各种大逆不道书类出售，毫无顾忌，名曰《进化》、《太平》两志，内地书店亦有秘密代售。此种违禁书报、杂志，最易狂悖惑人。各等语。查奸人等利用时机，意图不逞，实为惯技。所有敝友侦察各节，未非无因。汉口方面，自应仰体先生关心桑梓之至意，从严防范，以遏乱萌。惟是津、沪地方更属重要，倘邀鉴核，俯赐伤知各该处一体查禁。即长江一带，使奸人无所施其技。则是地方幸甚。国家幸甚。……仍望随时训示，俾得遵循，庶免获咎于将来，则感荷为无暨矣。肃此。恭叩崇安。伏惟垂鉴。

陈芸谨肃 六月十一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第一次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告失败书

(1919年6月)①

附抄支那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告失败书

吾等与会第一次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之诸团体、诸同人，敢告最诚挚、最亲爱之热忱同志，及现在运动失败，前敌失利，险阻艰难之男女诸同志：诸同志乎！吾等组织联合会，为欲创造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期吾神圣事业早告成功，已由各地同志开第一次大会，研究吾等在支那进行之种种问题矣。惟未事之先有足令吾人怀莫大之感想者，即从前及现在尽忠竭力于吾正义，造公共幸福、自由、平等、博爱主义之失败诸同志、诸同事共奋勇，其勿馁。吾人将战胜一切快活之寄生虫（指不工作之人民）、暴虐之强

注：①此件系参陆办公处抄件，后接录江苏督军公署参谋处致某机关书，内有“张继、戴天仇现为社会党首领，旧国会议员多受运动。激烈派之谭人凤、李烈钧部下之人，在沪者亦多与之联络”等语。按前选汉口警察厅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及防范无政府主义刊物传播函中，亦有同样内容字句。此件形成时间当在1919年6月前。

权家及掠夺者。奏凯之时虽未至，然为期已不远矣。吾人主义已深入平民脑中，愈播而愈横，一旦受压制者至于无可忍耐，平民革命之中乃钟能鸣矣时期也。自创一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管辖及寄生虫之社会，不必祈祷、不恃欺人之国会代表，惟恃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赴最后之战。对于主义之决义决心之希望即进行进步^①。无政府党万岁！

〔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

内务部等关于严密查禁《兵士须知》函电

（1919年6月）

（1）陈树藩密电（6月18日）

北京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内务部鉴：统密。前奉艳电，业经通令各军队遵办在案。陕省近日邮件中忽发见一种印刷品，署名《兵士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共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式革命之区分，与艳电所闻各节大致相同。似此措词背谬，煽惑军心，若任其到处流传，为害伊于胡底。除严令各军队长官一体严密查禁，随时销毁，以绝根株外，拟请查核转电各省区一体查禁为荷。并乞转呈。陈树藩。巧。印。

（2）内务部函稿（6月23日）

迳密启者：准陕西督军电称：陕省近日邮件中忽发见一种印刷品，署名《兵士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共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式革命之区分。似此措词背谬，煽惑军心，若任其到处流传，为害伊于胡底。除严令各军队长官一体严密查禁，随时销毁，以绝根株外，拟请查核转电各省区一体查禁。等因到部。除通电各省区外，相应函请查照。此致

^①此句原文如此。

陆军总长
海军总长
京畿警备司令部
步军统领
参战督办处
西北筹边使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国务院等为严密查禁《民声丛刻》及
北京《实社自由录》有关文件

（1919年6月）

（1）曹锟密电（6月25日）

北京国务院钧鉴：统密。比因外交内政险象环生，学商各界风潮虽已渐就平息，而群情浮动，事杂言庞。激党外溯浸淫输入，奸人复乘机煽惑簧鼓其间，遂有种种印刷品之散布，旬日以来，各处发现甚多。查有《民声丛刻》一书，译著学说鼓吹无政府主义，其内容口口为纲常革命经济平等，而归宿于实行共产，为人道自由之进化。其尤堪注意者，则为鼓吹劳动界自由团体之结合，实为破坏扰乱之导线也。方今商民凋敝，生计维艰，人心惶惑。此等莠言若任其广为传播，青年理想固已易入歧趋，而无赖不逞之徒或且藉端号召，扰害治安，星火燎原，大乱戛至。复查有北京《实社自由录》出版预告，亦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虽属言论之自由，恐贻大局之隐患。锟为消弭乱源起见，已饬所部各旅团营严密检查，遇有此项邮寄单册，立即销毁，俾免淆惑。拟请钧院通令各省区一体查禁，以遏乱萌，而靖人心。是否有当，即希裁察。曹锟。有。印。

(2) 国务院密电稿 (6月27日)

各省督军省长、各区都统、龙华护军使鉴：统密。准直隶曹督军电称：近日发现有《民声丛刻》及北京《实社自由录》，其内容均属无政府主义，已飭所部各旅团营严密检查，拟请通电各省一律查禁，消弭乱源等语。近日国事纠纷，群情浮动，此种邪说传播，易滋煽惑。希飭所属切实查察，遇有此项印刷品立即检集销毁，以遏乱萌为要。院。沁。印。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卢永祥关于查获无政府党人在沪活动
等情致京师警察厅函

(1919年7月20日)

迳启者：案查无政府共产党前在沪上租界设立机关，发行各种印刷品，业经本署飭令邮局检查员注意检扣；一面商由英捕房查获发行人郑亦〔佩〕刚一名，搜获印刷品多件，解送公共公廨按律惩办，并将邮局检查员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函送内务部核办在案。兹闻沪上各报先后登载北京警厅拿获陈独秀一名，系因共产党案牵涉等语。究竟贵厅关于此案获犯几名及讯供情形如何，应请查明。如获犯供有沪上机关、人名、地点，即祈录案示复，以凭设法查缉，俾销隐患，而绝根株。专肃。顺颂勋绥。

卢永祥启 七月二十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国务院等为从严查禁《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等七种印刷品有关文件**

(1919年8—9月)

(1) 陈树藩密电 (8月28日)

北京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内务部、交通部鉴：统密。查《兵士须知》一书措词背谬，前经树藩通令严禁，并将办理情形电达钧院大部查照各在案。近日邮政仍又检出《民声丛刻》、《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寸[工]人宝鉴》、《愚人伊万国史》、《告下士》、《衣食与国家》、《新生命》等七种印刷品甚多，大半传播无政府主义，意图煽惑人心，较之《兵士须知》措词尤为激烈，若任其到处流传，为害伊于胡底。除分行各军队从严查禁外，伏希鉴核转电各省区一律查禁，以弭隐患，而绝根株，不胜翹企，并乞转呈。陈树藩。俭。印。

(2) 国务院等复电稿 (8月30日)

西安陈督军鉴：统密。俭电悉。业由交通部转行各邮务局一律查禁矣。奉谕特复。院、参、陆部。卅。印。

(3) 国务院密电稿 (9月5日)

除两广、云贵、四川各省督军、省长，承德、归化、张家口都统、上海、宁夏护军使鉴：统密。陕督俭电以近日邮件中检出《民声丛刻》、《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工人宝鉴》、《养[愚]人伊万国史》、《告下士》、《衣食与国家》、《新生命》等七种印刷品，大都传播无政府主义，意图煽惑，较之前次发现之《兵士须知》尤为悖谬，请飭查禁等语，当经函知交通部办理。顷准复称：前项印刷品足以扰害治安，自应扣留，以弭隐

患。惟扣留各件宜由经手邮局就近交地方官所派检查员处理；如无检查员，局所则寄与该管邮务管理局，转呈本省长官处理。等因。此项办理尚属周妥。除函复该部令行邮政总局先通令各邮局，遇有上列印刷品即行扣留外，应希贵省区通飭各地官遴派妥员，与各该地邮局随时接洽办理。院、参、陆军部。歌。印。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杨增新关于防范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电

（1919年9月5日）

国务院、内务部、参谋部、陆军部、财政部、农商部鉴：承准内务部冬电，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之各种印刷品，以维公安等因。当即转飭各属切实遵办。惟增新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无政府主义之传播，足见人心思乱，未有已时。第人心思乱，非人性之好乱也。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是故国家之危，莫危于民不聊生。民国成立，竭人民之脂膏，以为养兵之费，兵愈多，而民愈穷。至于民无以为生活，则怨气弥漫，乱机四伏，土崩瓦解，在在堪虞矣。今日之势，对于传播无政府主义之印刷品，及其他意图破坏治安之行为，固当并行取缔，力为制止，以治作乱之标；尤当节省军费，加意民生，以治思乱之本。苟能全国一心，痛裁军队，振兴实业，使人民轻其负担，减其痛苦，有家给人足之乐，无啼饥号创之忧，必不肯附和暴烈分子以相与叛归于乱。有乱者起且相率驱之、迫之、出死力扑灭之，又何煽惑之足虑哉。若徒扩张军备，借债养兵，以搜括为政策，以兵多为可恃，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诚恐民心离散，乱亡无日，其可畏者不特传播无政府主义已也。增新备位边疆，忧深栋折，管见所及，敬祈采择。杨增新。歌。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为对敌，但因主义接近的原故，我相信汝是我亲爱不过的朋友。

朱谦之 新世纪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外交部等为严密查禁福建漳州过激主义
宣传品传播有关文件**

（1920年4—5月）

（1）外交部公函（4月14日）

外交部公函 九年爱字第八九二号

逄启者：准英馆函称：本馆现由各方面接得报告，福建漳州府现有印行鼓吹过激主义之书报多种，希留意等语。相应抄录来函函达贵部，希即查照核办为荷。此致

内务总长

附抄件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四日

照译英馆哈参赞致刁秘书函 四月十二日

敬启者：本馆现由多方面接到左列之报告，蓝代使飭录送执事查阅。现有鼓吹过激主义之小书多种，由福建漳州府印行，陈炯明司令实从中协助一切。闻陈炯明司令现在闽省境内统有军队三万人。据其同党声称：该司令对于过激主义竭力赞助。现印有该司令乔装劳动与劳佃共同操作之照片秘密散布。该司令又编辑一种丛报名为《民声》，每半周期刊发一册，专载过激主义论说，引起一般青年之华人、韩人，均信该司令将来必在中国树立红军旗帜以号召宇内。现闻该司令已与海参威过激主义派互通声气矣。云云。以上消息尚希留意为盼。

（2）内务部密咨稿（4月22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准外交部函称：准英馆函称：本馆现由各方面接得报告，福建漳州府现有印行鼓吹过激主义之书报多种，希留意等语。抄录来函，希查照核办。等因并抄件到部。相应照抄英馆原函，咨请贵省长转饬所属，遇有前项书报务即依法切实取缔，以免传播为要。此咨

福建省长

附抄件

内务总长

(3) 外交部公函 (5月3日)

外交部公函 九年爱字第九八三号

迳密启者：关于鼓吹过激主义书报一事，前准英馆来函，业于本月十四日函达在案。兹复准英馆函称：陈炯明在漳州刊发之日报内有广告一段，凡抱过激主义欲入党者，开列姓名邮寄上海邮局第一百零五号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等语。此事既迭准英馆来函言之确凿，相应再将来函抄送贵部查照，即希会商交通部严密检查，以遏乱萌为荷。此致

内务总长

附件

中华民国九年五月三日

收英馆哈参赞致刁秘书函 四月廿九日

迳启者：关于陈炯明鼓吹过激主义一事，经于本月十二日函达执事矣。本馆现由可靠之机关得有消息谓：陈炯明在漳州刊发之日报内有广告一段，劝勉凡抱过激主义而欲入党者，均须开列姓名邮寄上海中国邮政局第一百零五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云云。希查照为荷。

哈尔定谨启 一九二〇年四月廿八日

(4) 内务部密咨稿 (5月5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准外交部密函称：关于鼓吹过激主义书报一事，前准英馆来函，业于本月十四日函达在案。兹复准英馆函称：陈炯明在漳州刊发之日报内有广告一段，凡抱过激主义欲入党者，开列姓名邮寄上海邮局第一百零五号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等语。查此事既迭准英馆来函言之确凿，再将来函抄送查照，会商交通部严密检查，以遏乱萌。等因。并抄件到部。查此案前经外交部函知前来，当经密咨福建省长转饬所属，遇有前项书报务即依法切实取缔，以免传布在案。兹复准外交部函称前因，相应照抄原件咨请贵部查照，转饬各局遇有前项书报，务即严密检查，以免传播为要。并希见复。此咨

交通总长

附抄件

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九年五月 日

(5) 外交部公函 (5月11日)

外交部公函 九年爱字第一〇三三号

迳密启者：关于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刊发鼓吹过激主义书报一事，前准英馆来函业于上月十四日及本月五〔三〕日函达在案。兹复准英馆将该项印刷品函送前来，相应函送贵部，即希查照核办为荷。此致

内务总长

附件

中华民国九年五月十一日

，

附件一：〔略，见第12页〕

附件二：救命呀！

现在是甚么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强的吃弱的，富的吃贫的，凶狡的吃忠厚的，没良心的吃有良心的，血肉模糊，禽兽界断没有这样悲凄惨淡的景象。

为甚么闹到这样呢？有国家，有政府，有官，有绅，有兵，一辈都是强者、那弱的就要任他吃了。有私产，有金钱，有三几万家当的叫做小资本家，有三几十万的叫中资本家，千数百万的叫大资本家，土地任他要，机器由他霸，衣食住的东西听他独占、那贫的，就一样任他吃了。因为有政府的资本家的强力来保底，所以凶狡的没良心的，可以青天白日张口吃人，忠厚的有良心的清白平民就无瞧类了。

救命呀！政府吃人，资本家吃人。我们平民的穷命贱命，一天不知送掉多少！努力去耕田做工做商，月月年年，辛辛苦苦，来捱那毫无趣味的残生，如何得了。救命呀！只有革命是救命的唯一方法！

甚么叫做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又叫经济革命，和从前的政治革命不同。经济革命固然先要把吃人政府推倒，更要把吃人的资本家都铲清光。以后不许某人得有私产、不做工的不许吃饭，其余间接吃人的伪道德伪名教，一律肃清；那么，我们清白的平民，只有做工吃饭，吃饭做工，绝对自由，极端平等。

做教师学生的呵！你们读书讲学，要预备做工吃饭的资格，不要求得一点学问去做政府资本家的走狗。

当兵的呵！你们要将好身手，预备铲除政府资本家，为平民作前驱，为大群幸福去牺牲，不要帮助政府资本家来吃人。

做农的呵！你们结合团体，自耕自享，田地是天然的，劳力是自己的，纳税与政府，纳租与田主，就是把你的膏血供他喝、把你的骨肉供他吃了。

做工的呵！你能建屋，你就应该住好的；你能织布，你就应该穿好的；你能做种种物品，你就应该享受至大的福。为什么你

们如今苦至这样呢？你能联合起来，把原料机器抢回自己手里，谁还敢刻薄尔呢？

失业的游民呵！你能够不懒惰，能够合大群去征服资本家，那时土地田园工厂物料机器都是公共的，你一定有工做，再不会失业了。

一切的人听呵！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是我们救命的方法，世界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来啊！来啊！早一天动手，早一天救命。

附件三：令子令孙断断有饭吃

我从前看见一本曲本里头，说有一个很吝啬的富翁，碰着人劝他做好事的时候，不特不答应去做，并且说照你这个样子连子孙都要没有饭吃了。劝的人问他，你相信你的儿孙能彀有饭吃么？他说不敢〔原文如此〕舍子舍孙断断有饭吃。这一段话看了的都笑，但是不理睬子孙吃饭的问题的人有几多呢？现在听见废止财产承继制度就要怕起来的不是狠多么。我们且不向少数的青年讲，且问一问他们多数的人，假使给你十万万的家财，你们令子令孙实在能彀断断有饭吃么？试想一想承你的宗祧，拜你的坟墓的固然是子孙，女婿也是半子，女儿的儿女也是外孙。比方一对夫妇生出儿女三个，到孙辈便有九个了，到曾孙辈就有八十一个了。这许多孙，你无论遗留什么财产，总有一天是干净的、是会接续不来的，那个时候令子令孙就没有饭吃了。况且这个只算你的子孙都是狠安分的来讲。如果他不安分起来，你还没有死就 在外头借债，明写着严亲绝气，本利清还。你死了不到三五年，早一个大钱都花干净了。那个时候恐怕你老人家还是断断无他技。就算你的儿孙不坏，世界还有坏人哪！偷的、骗的、有意的、无意的、直接的、间接的、官司、寇盗、水火那一件不是可以把你吃饭的钱财剥去的，你能彀都止住他不来侵犯你么！还是你这个富

厚的人，首先要这些军官匪骗的敲诈去了钱，还要赔命，他不杀你，你还要饿死，那个时候令子令孙也没有饭吃了。又不讲这些天灾人祸，就拿平常的营生来说，随你拣一百有钱的人，问他祖上有几个是一直都有钱的呢？并拿一百个没有钱的人来讲，他的内外长亲没有一个曾经有过钱的几个呢？把他平时的情态来说，放债就会收不起，买田就会碰着没有收成，做买卖又会因货价涨落亏本，放在最坚牢的银行也会倒帐，简直叫做世界没有可以放钱放得安安全全的道理。这样想来，令子令孙还是不能断断有饭吃。照这样讲，是不是凡有人的子孙都不能断断有饭吃的呢？能彀的，不过不要把钱来传给儿孙。本来人是应该替子孙想吃饭的方法的。他这一生一世都只管顾着子孙吃饭是一种好处，不是坏处。常人往往说，莫替儿孙作马牛，这是错的。我们没有祖先的做马牛，自己能彀到这个地步么！要人类向上，不是一天可以办得到的。人类向上的结果，不是在那里用力的人可以见得到的。所以，凡有能彀使人类向上的努力，都是替儿孙作牛马。我们有了无数做马牛的祖先，才能彀有今日。我们也要对将来无数的儿孙负一个做他们马牛的义务。（但是做马牛和做强盗不同，应该分别）如果大家只做乘马服牛的聪明圣人，不做牛做马，那一代两代前人的贻留用完了，差不多人类便要吾世而斩了。所以我想变换了这个成语说，应替儿孙作马牛。作马牛的内容不止一种，穿衣、住屋、读书、走路都要替他做工夫的，却是吃饭又比这几种事情要紧。所以不特你们要求子孙有饭吃，我们也希望令子令孙有饭吃。但是，你们积财产的子子孙孙断不能个个有饭吃是已经明白的了。请你试想想，这个不能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因为只有少数人有钱，多数人没有钱么。如果人人有钱，用不着做骗子、做强盗了，用不着做兵，做匪了，也没有赌钱、放债，也没有娼寮、诱奸了。还有不能的就是个个人只管自己，不管人家。所以，做生意的亏本也没有人肯赔他，遇着天灾人祸也没有人肯

救他。甚至于抢他人的、骗他人的钱都是想积起给子孙的。那晓得世界钱财是很少的，人类享用是很多的，打个坐食的算盘一定是不能彀。所以，要积起钱财来叫子孙有得吃就顾不得别人，不特顾不得别人，连自己的儿孙也是顾得了一个吃饭，就损那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儿孙弄得他们没有饭吃了。本来同是你的儿孙，你断不会分出这一个该食，那一个不该食，却是弄到后来真是其豆相煎，这是何苦来呢？所以，这些只管自己儿孙食饭的，一定不能彀保的儿孙食饭。多数人没有钱，自然也不许少数人永远有钱食饭，这便是现在打算子孙食饭的所以艰难的原故了。然而古人也有说不叫子孙有钱的，为什么行不去呢？因为子孙没有钱便要做工来食饭。你们第一是，怕子孙没有会做工以前和已经不能做工以后，没有饭食。第二是，怕子孙只管会做工，仍然没有饭吃。这些都是现在社会里头必然的事实。我们只管出去一看街上三岁小孩、八十岁老婆有讨饭的，他们能做工么？现在不是许多壮年的工人也是空闲着找工做找不到么？因为，他熟这一门不熟那一门，人家偏偏找那一门工，不找这一门。他的食饭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们想要子孙靠做工食饭，也不能断断有饭食是不错的。然而，你们也没有方法，只希望多积一点钱财，多养他们几年。这个方法不中用，是上头已经说明的不用再说。现在，所问的只是还有别的方法保证他们有饭食一没有层〔没有一层〕。既然晓得多数人没有钱的时候，少数人有钱也不能食饭，不晓得有不能做工、无工可做的时候，虽想做工食饭也不能彀，那就当然可以想得到，假如我们的子孙把钱财当做公共的，能做工的人养不能的〔做〕的人，有工做的人养没有工做的人，岂不是子孙食饭稳固得多么。从前喜欢说九世同居不分财产的话，不就这样么。这个团体越大，子孙有食一层越发靠得住。所以，我们的子孙，如果肯和别个人的子孙合起来，做这个九世同居不分财产也是愿意。不讲九世，就是九百、九千世也愿意的。不止两个家

族，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乃至世界全人类，如果办到九世同居不分财产，在者安之，老者怀之，死有葬，疾有养，那些话你以为是好呵还是不好呢？老实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底下我们的子孙，只要人家有饭食，有衣穿，他决不怕冻饿。只要世界永远进步，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子孙都能享受的。他们的生活比我们现在强多了，你们不希望儿孙是这个样子么。共产主义就是能保得将来人类永远有饭食的主义。将来的人类，就是我们的子孙也是你们的子孙。我们你们的区别，到那个时候，或者已经去掉了。子孙的分别，到那个时候，也只是历史上名词了。但是，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我们仍旧在你们面前保证一句：

听我们的话，令子令孙断断有饭食。

请看了的人，送给别一个人看。

请晓了的人，读给不晓的人听。

请批评我的人，另外做一篇更好的。

(6) 内务部致各省区密咨稿 (5月29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承准国务院密函开：兹准外交部函准英使馆函称：福建漳州印行过激主义书报，有陈炯明从中协助，希转行检查等因。当经函达贵部暨交通部严行查禁在案。兹复准外交部将英馆送到该项印刷品转送到院。除分行外，抄录原件函送查照，飭属随时防禁，并将办理情形见复。等因。并抄件到部。复准外交部函同前因。除函复国务院并分行外，相应刷印原件咨请查照，飭属严密查禁，以免传播，并希见复。此咨

各省省长

各都统

淞沪护军使

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九年五月 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内务部等关于严密查禁《光明》、《进化》
等印刷品有关文件**

(1920年7月)

(1) 内务部训令稿 (7月10日)

内务部训令第 号

令 京 师 警 察 厅 吴 总 监
京 兆 尹 王 达

承准国务院交致各省督军、省长电。统密。顷接卢护军使次电称：沪上近日发现《光明》杂志、《进化》丛书等印刷品，均系鼓吹无政府主义。又有工党首领陈家鼐组织《白话日报》已于前日出版。其目的专在煽动工人，实行社会革命。飭查此种书报均在租界出版，其散布内地各省，系假外国邮箱接递。除密商英、法各捕房严行取缔外，应请中央通飭各省一体查禁。并转知外交部，商请公使团，分飭各外国邮局，对于此种印刷品注意检查扣留，以免传播，是所至禱。等因。除函外交部商请公使团严行取缔外，合行电达，希即通飭所属，一体严密查禁，务绝谬说，毋使流传，是为至要。院。真。印。等因到部。合亟令行厅尹遵照办理，飭属严密查禁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 日

(2) 京师警察厅呈 (7月13日)

呈为遵令查禁《光明》杂志等三种印刷物具复鉴核事。窃奉训令开：〔令文见前件〕等因。查《光明》杂志前据报厅核准发行，并呈报宪部有案。奉令前因，除布告该杂志停止出版，并将

原领执照吊销外，当经通令区队，对于该《光明》杂志、《进化》丛书、《白话日报》等三种印刷物，一体遵照严密查禁，以免传播。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呈复鉴核。谨呈

内务总长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三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内务部关于严密防范过激党在京活动密函稿

（1920年12月29日）

迳密启者：准国务院抄交参谋部呈谍报员报告一件，内称：前闻有过激党由沪派员来京，拟乘学潮与劳动界一同罢学、罢工。嗣以学潮业经底定，难事鼓吹，该党等旋即出京，近复探有二批党人来京，仍以无政府主义鼓动学、工界，且有散布该项传单之说。等语。奉批交院处等因。转交到部。除分行外，相应函达贵衙门查照，转饬认真侦查，严密防范为要。此致
步军统领衙门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 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国务院关于王怀庆请制定取缔 “过激党人”专条公函

（1920年12月29日）

国务院公函 第三千三百十号

迳启者：奉大总统发下步军统领王怀庆呈过激党人，煽惑劳

工，恐酿事变，拟请飭订专条，从严取缔，以保治安文一件，附印刷品六件，相应抄录原呈，并检同附件〔略〕，函达贵部查核办理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廿九日

呈为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恐酿事变，拟请飭订专条，从严取缔，以资遵守，而保治安，恭呈具陈，仰祈钧鉴事。窃维言论自由，原属法律所赋与，而主张越轨，亦为法律所不容，拔本塞源，事贵慎始，燎原星火，忽则必张。窃以国家成立之要素有三，曰土地，人民，统治权。所谓统治权者，命令强制人民，即治者统治被治者之权力也。破坏统治权，即破坏国家；破坏国家，即为人民之公敌。乃自俄国扰乱以来，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中土，过激潮流，方兴未艾，而首都重地，竟有散布刷印传单书册等件，任意煽惑劳工，主张共产，反抗政府，邪说横行，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外省地方亦多有此项文字鼓吹。查社会无政府主义，原系欧洲一种不良学说，各国政府以其有碍国家政治进行，均严加防范，以遏乱萌，俄之纷扰，足为殷鉴。我国边境与俄毗连，于是此种谬说乘机流传，当此时局蜩螗，中原多故，南则干戈扰攘，祸乱迭乘，北则五省旱荒，饥民遍野，深恐党人利用机会，扰乱治安，蒿目时艰，杞忧曷极。此等越轨言论，本属内乱罪范围，自可援用刑律条文，惟事关国家安危，又未可与普通犯罪同日而语，非议订专条，从严惩办，恐不足以资制止。查民国初元，各省土匪蜂起，刑律惩罚未足示儆，袁前大总统特颁惩治匪法，治乱世用重典，故不数月而萑苻敛迹，过激党人之言行，虽不能以盗匪相衡，而宗旨悖逆，危害国家，则有甚于盗匪之行为。拟请飭下院部议订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并将为该党印刷运送之人一并拟定惩治附条，提交国务会议，一俟通过，请以教

令颁布，俾便各省一体遵守，而保公安。所有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拟请飭订专条，从严取缔缘由，是否有当，伏乞鉴核训示施行。谨呈

大总统

兼署京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王怀庆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国务院关于严禁无政府主义书刊传播公函

（1920年12月29日）

国务院公函 第三千三百十八号

适启者：准京畿卫戍总司令咨呈内称：京师地面屢次发现无政府印刷书件。兹又据警察厅搜获共产原理十九本，系从上海寄递来京。可知此等过激党徒潜伏京沪一带，必有谋乱机关为之根据，希图煽惑乘机起事，若不亟早查禁，深恐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本总司令有维持地方之责，不得不先事筹防。爰于本月二十四日招集京师军警官长公同会议，京师地方责成军警严密查禁，遇有散布此项印刷书件之党人，应即拘拿法办，以遏乱萌。此等过激党徒散处各省，所在多有，意在煽惑军警、工人、学生为入手方法。拟请贵院分咨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农商、教育各部，并分电各省督军、省长一体设法严禁。凡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书册、印刷品等件，应即禁止印造，禁止寄送，禁止阅看，倘敢故违，一律从严惩办，以保治安，而弭隐患。等语。相应函达贵部查照，希即分飭查禁，以期弭患未萌为要。此致

农商部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廿九日

〔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

陆军部关于查禁无政府党劝兵工厂罢工广告令函

(1920年前)①

(1) 陆军部训令稿

陆军部训令 第 号

上海兵工厂总办谢邦清

令汉阳兵工厂总办刘庆恩

德县兵工厂署总办宋振纲

为密令事。准国务院密函开：据探报云云，词极谬妄，钞送转饬，严密查拿，以杜乱萌，见复等因；并钞件到部。除分令饬遵外，合即钞行令仰遵照办理，并严密防范，以免不虞。切切此令。

(2) 陆军部复函

密启者：准奉贵院密函钞送无政府党油印劝兵工厂罢工广告，请饬严密查拿，以杜乱萌，见复等因。并钞件到部。除已分行钞令各兵工厂饬遵办理外，相应函复贵院查照。此致
国务院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关谦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集会活动及筹资赴俄调查等情致王怀庆呈

(1921年2月)

(1) 2月12日呈

注：①原件无年月日，件内有“司长翁阅”字样，按翁之麟自1912年4月任军械司长至1920年9月止。此件形成时间当在1920年前。

为报告事。窃于本年二月九日下午二时，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假高等师范二楼通用教室内举行欢聚大会。查是日到会者，除由上海来之同志肖焕〔俊〕章及其眷属一妻一小女外，共有二十二人。侦知姓名者七人，为黄庆、徐名鸣〔鸿〕、刘果航、陈廷璠、王伯时、陈德荣、朱谦之等，皆北大、高师之学生也。首由林君发言谓：今日开会并无一定议案，不过借此假期与诸同志自由闲谈于一堂耳。并希望由南来之肖君，新出狱之朱君讲述可乐之经过，以资笑谈。遂由朱谦之云：阅报载我之在狱期内，有忧郁悔过之论调完全是假的。我之心理不知荣辱，更无所谓痛苦，本良心上之动作而乐为之事，即愉快之境遇也。我是主张虚无者，而最不赞成俄式之共产专政，亦非希望仅到无政府地步。不过今日世界革命至低须要由无政府运动起手。天地即吾，吾之所不满意者，无论何事皆实行破坏之。吾之能力，著书与执炸弹是也。次由肖焕〔俊〕章云：自十月十日在上海散放传单，天演君被捕，同人等皆在恶政府通缉之例，遂潜行至汉口，该处虽有同志，皆无结合。如彼校同志即不认识此校同志，情形与消息皆甚隔寞，故无一事可陈。是以同人等集议，设法联络各省同志，组织统一机关以谋进行之便利，而达互助之精神。今已有同志三人分途到各地征求同意，并定开会之地点、时间，余来北京就为此事。由汉口过南京、河南各处皆主张在暑假举行，地址则因地理上之关系各有异议，将来俟接洽后，以多数为定论。今同志宜急进缓进分工进行。一弹胜千章诚妙诀也；而感化各人之心理运动，亦大同主义必经之手续。余迟日回汉口时，预备开一医院，施诊劳动人，以传布为宗旨。至于此项经费，已由到粤同志向陈炯明领款矣。诸君有志望共进行。最后畅论无政府之激烈言论，众皆赞成鼓掌。再由伊等请谦发表志趣，谦即扬言在政治革命经过情形及现在受不自由平等之痛苦，而迫应潮流与诸同志共同牺牲，以造新世界，并历述伊等所乐闻之话语。最后由黄庆论同志应免除一

切利禄、好奇、嫉妒之恶魔心，宜存死而后已之决心，并论死之方法，研究牺牲之程序，庶可无憾矣。如陈廷璠、徐名鸣〔鸿〕等六七人皆有过激不伦之快谈。至于应行决定之事，统俟例会讨论，今日自由畅谈之欢聚会也。至下午七时始散。再查其聚会非常严密，谦入门时经三次盘查。在未开会时，有素识之一二人倍〔陪〕谈，行止皆暗为监视。其未开会以前，所来之人皆分散他处，临时齐集，所有招待亦不用茶役。至于开会时无形式上之秩序，无主席、记录等事。茶点自由取用。谦为外界新加入之第一团员，须俟大会审查通过后再正式入团。今谦甚为伊等所不疑，故易于联络而渐可窥悉其底蕴也。至于团费自由捐助，任务各人公举。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阶级专政，已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谦当另行设法运动，亦为加入。以后进步如何，再拟报告。今将是日实在经过情形，合亟陈述。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二月十二日

(2) 2月19日呈

为报告事。窃查得近日无政府党出一种《克鲁泡特金纪念号》印刷品贰千张，由《国报》出版部承印，并纸张、工资皆《国报》尽义务而成此事。本拟出一万张，《国报》承印五千张，后因机工无暇，故得贰千张之数，分交北大、高师号房零售，其余由各同志分寄他处及赠友人。该印刷品内载名无负者即《国报》编辑李亚先也，空三女士即无政府党陈廷璠，凌霜即黄兼生，伯时即王伯时也。本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四时，该党三五人在北大小聚会，是请北大教授俄人百禄威（译音）介绍一俄农党员，随同同志到赤塔、莫斯科调查俄地状况，并劳农政府之利弊，拟入莫斯科大学，以便查视实形，而为该党之报告。是日谦适逢其

会，探悉百禄威乃劳农政府人员，在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份子，亦北大教员也。住天津，每逢星期五六来京上课，临时住灯市口十二号，或即来即去，行踪秘密。当时允为推荐于莫斯科也。此次去俄调查之人，为四川同志华清、刘仲容及北京同志刘稀、孟某四人。并闻上海方面亦有同志拟入大学于莫斯科，定四月间由海程抵海琛威而转俄境。又日昨互助团通知在北大小会，谦列席。查得是因前次由俄寄款来京，在赤塔被日本军扣留，故经费支绌，因之青年团月余未有举动及会议，而互助团亦甚不振。现在四同志出发赴俄，其四川同志二人已由该省筹得路费，其本京同志二人因俄款未到，无法启程，故请各同志量力维持以利进行。预约由京到赤塔每人路费一百五十元，由赤塔至莫斯科则经济上完全由俄政府可担任也。当即各人愿分筹助。又查交通部新设之职工讲习所，亦有互助团员数人加入，以便毕业后派赴各站教授，得乘机宣布主义。惟该数人入校均是假名，故颇难特为侦〔侦〕知。近日屡次接洽，只知由南来之无政府党肖焕〔俊〕章入校，改名为高子扬。据伊之陈述，迩来该校教职员甚不满意伊之行动，因其每出风头，主张不考试。因该校新生共九十六名，拟定他日考毕业额九十名，故举伊为代表反对，并伊屡次当众宣传主义，惟内有教员为之奥援也。以上均连日联络侦知真情，合亟报告。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二月十九日

（3）2月28日呈

为报告事。窃于二月二十日下午五时为筹集赴俄同志川资，会议于沙滩二十二号陈德荣处。首由赴俄人刘仲容陈述此次到莫斯科之意旨，应负调查全俄经过及现状，以为吾人兴利除弊之良标

本，并联络劳农政府而为本党国际上之助力。今得俄人百禄威介绍友人同行，更为旅行之机会。我与华清、刘稀、孟知眠四人暂约为党务牺牲，不敢畏难，以冀有所贡献而利进行。俟后定当随时报告，尚希诸君指导。云云。次由黄兼生报告接上海萍水君函称：此间同志三人已首途赴俄，第二批四人拟四月间出发等语。再由陈德荣发言，谓据俄人方面表明劳农政府首创新机，极之欢迎同志赴俄，并有莫斯科大学招待新生，供给甚优。兹有同志四人趁此机会从事考查，惟因旅费尚差二人用度，约计由京至赤塔共需三百元之数，特约同志量为资助，以成厥功。遂有高师方面由徐名鸿（前写徐名鸣误）代表共交五十五元，俄人百禄威由陈廷璠代交八十元，陈友琴十元，黄庆、陈德荣、章铁民各十元，廷璠、刘果航各五元，李建朝二十元，黄兼生七元，杜某五元，林某六元，王伯时八元，谦亦捐三十元，不敷之数由四川同志二人随伴补助。最后各有勉励及过激之辞，七时始散。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在北大第二院大客室欢会，由日本来京之早稻田学生傅敏中、明治大学生嘉康杰，皆山西人，暂住松公府夹道十一号公寓。据伊等所述，此次自东京请假回籍，顺道来京，由友琴君介绍与诸同志晤谈，幸甚。我等留学东京常与日社会党人接洽，见伊等百折不回之精神，实在可佩。每逢大会辄与军警相斗，至被缚时，仍口唱党歌，神色严定，以军警为传播主义之好招牌。如前次在东京集会时，有党员八十余人，在未开会之前，即被解散，因不服解散，随被逮捕。每一警或二警执一党员，满街招摇，震动城市，后因无确证，只押为首三二人，内有一人在狱绝食，而政府恐慌，遂交保释放矣。迨来再接再厉，日渐扩充。该党首名大杉永者不日又须来华一游。至于留学方面，因环境所困，无甚组织，不过有少数人留心研究此主义而已。次由黄兼生略叙中国该党各地情形，及陈德荣、邴光典、朱谦之、黄庆等皆发言，盼二人到山西为统一会议之联络，将来回日时进行组织，

并代表接洽日人作国际上运动云云。茶点毕，六时始散。二十四日因陈德荣迁居北河沿四十五号公寓暂住，尚欲租房与百禄威同居。又陈廷璠亦迁往裤缎前街六号。谦假其便特约职工讲习所肖焕[俊]章、张俊杰及陈德荣、廷璠、王伯时晚餐于景山东街便宜居内。探悉该所有同志五人，为章铁民充教员，于朝杰、张俊杰、肖焕[俊]章、蔡某皆学生也。惟肖焕[俊]章屡次出头违抗校令，公然宣传，故深为教职员所感恶，实有不安于位之势。其余数人仅于校外会议，不敢在校内有所举动。又德荣告焕[俊]章所云，因其代借邮电学校高子扬文凭，兹为本人查觉，该冒名之肖焕[俊]章行为不轨，亟欲速回文凭，今只得考试时故意不中，以便交还文凭。随肖焕[俊]章亦言，在内志在播吾党种子，毕业何为？今职责已尽，应办第二步回南组织统一会议之事实。云云。……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摘要报告。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国务院为严密查缉费哲文等在沪密设三无学社鼓吹平民革命有关文件

(1921年2—4月)

(1)何丰林电(2月18日)

国务院钧鉴：专密。据报中国无政府共产党刘师复遣〔遣〕党费哲文近受俄共产党果尔克夫指使在沪密设三无学社，鼓吹平民革命，工界中赞成者颇多。现亟欲运动兵士入党，特用白话文体编纂《目兵须知》及《告少年》两书，印成小册四处散发，其散布方法异常诡秘，不易查获。近日华界中已发现此种印刷品，正设

法根查。等情。并附呈上项印刷品两件前来。查阅《目兵须知》一书纯系鼓动兵士反抗官长之语，《告少年》一书系鼓吹社会革命，均应严行查禁，以杜煽惑。除仍飭注意侦查该三无学社机关以凭拿办，并通飭查禁上项印刷品勿任散布外，谨此电陈，伏乞密飭各省一体查禁。又前据邮局检查员检呈《新安 徽 杂 志》一册，谓系向邮局请求挂号之件，应否照准，祈核示等情。查阅该杂志内容系传播共产谬说，主张社会革命，其编辑社在法界宝康里。当经函知邮局此种杂志应予扣禁，一面密嘱法捕房将该社严行取缔，现已由法捕房勒令该社即日停办矣。知注并闻。何丰林。巧。印。

(2) 国务院复电(2月20日)

龙华何护军使鉴：专密。巧电悉。三无学社意在运动兵士入党，鼓吹平民革命，宗旨谬戾，踪迹诡秘。经尊处查获印刷各件，具见匡持大局，悉力侦察，至深嘉佩。该社究竟设在何处，仍望设法查明，缉拿究办。此间亦已据电密行各省于此项印刷品一体查禁，勿任传播。《新安徽杂志》主张谬说亦经扣禁停办，至慰。此种学说流行，为害社会甚于洪水猛兽。我公毅力防维砥柱之功，正不仅一时大局蒙其福利也。院。号。印。

(3) 内务部快邮密电稿(3月14日)

江苏督军省长、淞沪护军使鉴：统密。准公府秘书厅抄交谍报一件，内称侦得倡无政府主义共产党首领华人刘师复，由海参威派来党徒费哲文等来沪，与工党首领陈家鼎秘密组织三无学社，鼓吹平民革命，并编印书报密散各省及沪上各工厂、学校、军队等处，其秘密机关设于工党协会内，内容诡密异常等语。特电请转飭严密查缉为要。内务部。寒。印。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4)京师宪兵司令部致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密报(4月3日)

据密探探悉：前无政府共产党首领刘师复联络各界鼓吹过激，迄未成功。其遣〔遗〕党费哲文仍继续进行，在沪密设平民革命机关，亦惟以倡言过激为宗旨。近人受俄国共产党领袖果尔克夫金钱运动，在沪租界内组织三无学社，聚集党徒秘开会议，专以勾串军人，鼓吹各界实行社会革命为目的。工界中人对于该党入其彀者甚夥，独军界尚无人响应。该费哲文以工界势力薄弱，非有军界协助，不敢相机而动。因是编纂《苦军人》及《一个兵的说话》两书，刷印成本，在租界内秘密散布。其散布方法极为诡密，现已查获二本。该两书内容大致均系鼓动士兵反抗官长，措词立意实属谬戾已极。复查该三无学社机关屡易地址，并无一定处所等情。

.....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 互助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呈

(1921年3—4月)

(1) 3月13日呈

为报告事。窃三月十一日互助团临时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裨緞前街六号会议。查是日出席者有：北大学生陈廷璠、王伯时、黄凌霜、陈友琴、黄庆、陈德荣、邵光典、朱谦之，高师学生刘果航、徐名鸿、林某及肖俊章、李亚先及新由南京高师来转学于法文专修馆之曹文曜等。首由黄凌霜报告：据广东同志区声白、赵司农等函称：本各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

度。乃吾人在粤曾为一度之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兹粤中同志惟有努力以真理驳斥其妄举，以科学证明其邪说，尚望同志奋起图之。等语。吾人既抱大同主义，自与利己者终难契合。独秀之野性更难相与。查独秀之敢如此纵横者，一由五四运动假群众之功，而得浪声于海外，故今受俄劳农之利用，以与资助之便。二藉民党势利以号召利禄之辈，而欺瞞外界之事实。如此观之，吾人当速谋吾党之大集合，订定方针合力并进，将来派代表于国际间，以揭破其黑幕，宣传正理，以规正其邪说，则何患人不与我取一同举动乎。次由友琴云：默察世界之趋势非达到无政府之境不止，且曾与俄劳农中人谈论，亦非仅至国家社会主义为满足，不过履行手续之第一步耳。故吾人之理想总可于最近时期发现。今宜由鼓吹而入于实行地步，联络群众实行，又非组织吾党之统一议会，无有以互通声气也。又由肖俊章宣言，现因受环境之逼迫及各地之意见，有即日回南招集会议之必要，故决定明日启行，以便于暑假内举行。今暂与诸君告别，希望各同志精神毅力共襄此成，随时畅发鸿论，俾得参详。云云。随后朱谦之、陈廷璠皆绝端反对与青年团接洽，谓多一事运动，多无量之牺牲，设使成功亦徒供少数投机者之利用，是不如直行无政府为快也。各人多有发言，并赞成招集会议，公推黄凌霜拟通知书，自由签名为发起人，以后付印寄交俊章分发各处。议毕，四时五十分始散。随由肖俊章特约凌霜、德荣、友琴、文曜及谦等到公寓商议资助南下之事，并议定在武汉间立一医院为通信机关，先由友琴由存款项拨出二十元，文曜助十元，德荣助五元，谦亦因其屡次商借，将款十二元资助。凌霜则谓阴历三月有款可来，当酌助其每月支用。至于肖俊章退出

职工讲习所之原因，实由于高子扬去函揭破肖俊章之假文凭，并不负其责任，以至伊不能毕业得差也。再谦近日侦查互助团及青年团因经济困难均无特别举动。仅将经过情形合亟报告。十二早，肖俊章已携眷赴汉。将来俟其通知，再定防预之方针也。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三日

(2) 3月17日呈

为报告事。窃三月十六日早由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谦此为第一次到青年团入会，须有二团员介绍，故谦于一时到陈德荣处，约王伯时同往。适值无政府党陈廷璠、黄兼生、陈友琴、邰光典等在坐，讨论将来统一会议之通知书，订期八月十号至二十号在汉口或广东招集，以便合力进行，谦亦签名“伊知”。发起人又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之方法，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然独秀又来函至京，甚为和蔼，联络凌霜、廷璠等人，议决由北京方面去书独秀，劝勿自相伤斗，总以协力推倒现政府为要，如其再事反对，则进为排斥也。因阅广东报论说，遂延至二时四十分，谦方与廷璠、德荣、伯时同到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四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儿、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由书记报告：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 Green（英文）Гринь（俄文）现年不过二十岁，住天津，时来北京，住灯市口十二号，已来京两星期之久，因来与同人报告俄国现状，并为国际上之联络。今来函陈述赴津有事，不克莅会，惟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四月二十

五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伊代垫。云云。查期限已近，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吾人必须参加，愿望今日同人以投票式慎重公推一人为华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随即建议临时设一审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专收此次各同志对于赴会之意见书，并审查将来赴会提议各案事。谦于选举时，并未投票，因未知各人之名。遂于事毕，由德荣起立介绍，谓谦热心改造之好同志，请众赞成入会后，谦谓：连日病魔，今日不克多发言论，甚歉。唯声明愿牺牲一切，以追随诸君之骥尾，建设新社会之义务。云云。后各人稍有议论，当即散会。预定收齐意见书再作钱行之大会。云云。……兹将经过情形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 呈

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七日

(3) 4月2日呈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涛、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郭〔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涛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计会员四十七人，现又加入八人，共计五十五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七人。这几日极力设法筹经费，今由会员所缴来之款及特别捐等，共得现洋九十六元五角，并陈述料理何孟雄出发种种手续。次由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亦得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

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措。惟会计刘仁静发言，谓设立事务所必添设什物，经济上应请各同志设法特别捐助云云。再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会，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并说明改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连之弊；（二）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会制，则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负责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语。即付讨论，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涛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并议决，每星期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议，谓昨接同志李芟来函，谓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试思此语极是，欲救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议赞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传，请同志发表意见书，由大会决择。并公议办理同志赴俄调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经费及造预算，事务所问题，因组织改变须修改章程等事，统归执行委员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议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谦连日到无政府党人处，探悉该党近日并无特别议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无政府同志张秀书、邹进二人来京，谓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调查，随后一星期内，尚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该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发。并由陈德荣转来汉口肖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行及请助资事（原函抄呈）。谦又觅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原函译呈）^①。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见紧急，至于如何联络资助等情，以便窥其全豹，而易进行之

注：①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略。

处，恭请核夺施行。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日

肖俊章来函

德荣、益之：我自初二午后九时抵汉，连日来与各同志设计一切，惟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汉上特别机关一时尚难成立。现在我与各同志磋商，表决三个办法，（1）谈话机关，暂设汉口后城马路人道医院家兄俊生处；（2）通信机关，汉口花楼小董家巷桂芳里岭南学校转菊化女士；（3）办事机关，这个机关本应即刻成立，奈汉上同志经济担负力很薄弱，所以一时难成。依我意见，此项经济每月总计约五十元，由汉上与京同志量力分担，不知兄等以为如何？如赞成。请即将二兄愿担之数，写个信给我，以便筹画。至我们的大会筹备宣言书，我已另函凌霜付印了。但他一人恐有不足或过劳的地方，最好是二兄分工合作，即免劳逸不均，并且快些，以免错过光阴。转眼暑假便到了，再谈，祝努力奋斗。请二兄烦步将这信及办法同诸同志商量谈谈，并代致意。

俊章上白 中历二月十九日

（4）4月25日呈

为报告事。窃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十六人：李大钊、王伯时、堪小岭、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涛、高尚德、祁大鹏、宋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三人及谦等。首由书记张国涛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之事：（一）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二）“五一”运动已付印一种小册子，定名“五一

日”，二千本；又一种明信片式之纪念品乙千张，皆于三十日前分散工厂；又一种简明宣传传单，注重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星期停工，仍支薪金，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于五月一日散放各处。（三）会址因无适宜之处，暂设于平民讲演所内，以便办公。（四）陈述前次张国涛与李实赴津，联合该津会，亦拟于五一日发布传单；及到唐山，此处本无青年团，经伊等联络工业学生数名，从事组织，并于五一日由京派代表及印刷品助辅进行，谓该处工人俱粤民，较易传播也。（五）宣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志来函，拟于五月一日开工团成立大会，是日招集工人演讲游行，请京派多数同志莅会帮助云云。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数目尚余十七元二角。随即讨论何孟雄来函，谓在满洲里京、津赴俄同志十三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日，饱受痛苦，因伊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查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当由书记发言：幸未被搜出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因该件缝在棉衣内，大半由格林带去”，尚易营救，此次是同人公推他去，现在被捕，理应尽量，请公决办法。即由李大钊云：接各处来函，皆说上海代表自认过激，以致招祸，而学务局及本校事前未发证书、护照，此种彩色断然不允援救，且时隔多日，恐更有不便。兹有黑省友人熟识督署，托为设法，料有八九成功。惟昨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三百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四百元应用，请公决如何募捐。当议由到会人先行认捐特别捐，有李大钊签十元，张国涛、刘仁静各五元，高尚德及谦各四元，其余各捐一、二、三元不等，共计筹得四十九元。则所差尚多，拟再以分担法，每团员二元，除出京十数人，预得一百元。其不敷之数，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负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三人被捕”，附带代为设法。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认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伊垫办，

以促救出。又议设“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法即：举出七人，如王永禄、罗章龙、王复生、高某等，先期设法联络北大印刷厂工人及各校役，财政部印刷工人，同文、新社会、国京各报工人，在北大“五一”以前集合，帮助其游行运动劝诱及派传单，预备印刷品或国旗，担认散布；并选出三人赴长辛店，及二人赴唐山，协助进行。所有各费，由会计发通知，征收四、五、六月份各团员常费及请特别捐。并请各团员于三日内拟运动法之意见书，七日内交常费及特别捐等事。……合亟报告。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国务院关于批转杨增新为查禁平民革命筹拟根本办法公函

（1921年5月4日）

国务院公函 第八百二十七号

适启者：公府交奉大总统发下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呈查禁平民革命主义应筹根本救济办法文一件。奉批交院。等因到院。查阅原呈扶陈利弊，苦口危言，洵有关根本至计。凡有地方之责者，自应共筹救济，弭患未萌。除分行外，相应钞录原件函达贵部查照。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四日

呈为呈明查禁平民革命主义应筹根本救济办法恭请钧鉴事。中华民国十年三月三日准国务院电开：中国无政府共产党邢〔费〕哲文等在沪密设三无学社，鼓吹平民革命，工界中赞成颇多，希

密饬所属切实查禁等语。查自欧战发生，中国武人主张加入欧战，其实参而不战。虽有参战军之组织，不过欲扩张私人之权利，以酿成内乱之行为而已。至于参战之影响于中国者，厥惟协约国招募华工之一事。华工之应募而至欧洲者不下数十万人，回国者实居少数。其侨居俄、法诸国者，无不结党开会，发行报纸，演说平民革命、社会均产、无政府诸主义。查各国革命其动机多发于下，中国革命其动机多发于上。自辛亥迄今共和成立已十稔矣。前清以兵而亡，民国以兵而乱，纷纷扰扰，统一无期。一言以蔽之，曰武人专制而已。中国扰乱实由武人。问商界有倡乱者乎？曰无有也。问农界有倡乱者乎？曰无有也。问工界有倡乱者乎？曰无有也。是中国之敢于为乱使全国无宁日者，不过有势力之二三伟人。而农、工、商各界方望治之不暇，绝无附乱者，故曰中国之革命其动机发于上也。虽少数之伟人倡乱于上，使全国之人水深火热，而无人不被其害，则各界之人又安能束手待毙，而不思革少数伟人之命，以求保全多数平民之命乎？于是农、工、商各界之革命亦必因之而渐起。所谓各国革命其动机多发于下者，此等风潮必渐渐传入中国，一发而不可遏。其传播革命之种子必以欧战期间内所招之华工为萌芽。该华工之在欧洲者，于平民革命、社会均产、无政府诸主义，既习闻其说，习见其事，及其回国，未有不互相传播，以期推倒京外政府中不良之分子者。幸而中国无大工场也，假使工场遍全国，则革命之事必不崇朝而遍全国。然中国虽无大工场，而华工由欧洲回国者，始而煽惑工界，继而煽惑商界，煽惑农界。我知昔日革命动机之发于上者，今日革命之动机未必不发于下矣。至是而把持军权、政权之少数伟人，乃无立足之地，而中国亦将变为第二之俄罗斯，四崩五裂，虽数拾百年而无以善其后，中国前途岂不危哉！今日补救之法仍望有势力之二三伟人，激发天良，解除害民之兵，厉行利民之政，或可挽救于万一；否则平民革命之说，必将实行，非可以一纸空

文所能塞其源而绝其流也。增新久膺骥寄，与国实同休戚，其所以苦口危言者，非故为无病之呻吟也。实见祸机所伏，郁极必发，不能不直揭病根，以相警觉。我政府及各当道果能共筹根本救济之法，而有以防患于未萌，则中华之幸，亦即增新之幸也。兹准前因。除飭属严行查禁，并将根本救济办法分咨外，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大总统鉴核。谨呈

大总统

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交通部等查禁《无政府主义讨论集》及《好世界》

印刷品有关文件

（1921年10月）

（1）交通部密咨（10月15日）

第一四〇六号 咨

交通部为密咨事。关于查禁各项具有煽惑性质之印刷物品，其有在不服从中央命令之各地方查出者，前经本部令行邮政总局转飭各该处邮局体察情形，将该项刷印物件呈由总局转呈本部核办在案。兹据该总局将湖南邮务长所呈提倡共产主义由大同合作社散布之刷印物两件转呈到部，相应送请贵部查收核办，并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此咨

内务总长

附件二件〔见后面附录〕

交通总长 张志潭

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五日

（2）内务部密咨稿（10月28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准交通部密咨开：〔咨文略见前件〕等因。并《无政府主义讨论集》、《好世界》各一册前来。除咨复交通部并分行外。相应咨请查照，转飭所属，如查有前项印刷书件，及类似此种印刷品，务即依法切实办理，以弭隐患为要。此咨各省省长 除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各都统 步军统领 淞沪护军使

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十年十月 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附录一：刘师复著《无政府主义讨论集》文选^①

1、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是二人之有志提倡，记者未尝不感之；顾其所言究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吾人有不容不研究者。近世学子，耳食者，众震于总统党领之名义，不暇论列是非，辄盲信为社会主义之真相，其结果有反足为社会主义之大障者。记者于此，又曷能已于言耶！

顾记者欲论二氏之主张，当先以数语略述社会主义之定义及其派别。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

注：①刘师复著《无政府主义讨论集》收有论文二十四篇。该集由铁心编为《无政府主义讨论集》第一集，于1920年8月出版；1921年7月再版，平民书社发行。特选录其中十二篇，沿用原标点。

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其简单之理由：以人类生活赖乎衣食住，衣食住之所由来；则土地生之，器械作之，而尤必加以人工者也。土地为天然之物，非个人所能私有；器械亦由人造成，人工则为劳动者之所出。故以正理论之，凡劳动者当得衣食住，惟现在资本制度之社会则不然。土地为地主所占据，工厂器械为资本家所独有。大多数之平民，则服役于此二者；为之生产各物。其结果则大部分利益均为地主与资本家所掠夺，劳动者仅得微薄之工资。终岁勤动，曾不足以贍其生；而地主与资本家则深居大厦，坐享最高之幸福。其不平孰甚于斯！欲救其弊，惟有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其土地器械，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作之自用之。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夫然后可谓之平，此即社会主义之原理也。顾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公有。此为凡言社会主义者所公认，无有异辞；惟对于生产物之分配方法，则言人人殊。而社会主义中遂有种种之流派。然大别之可略分为二：一曰共产社会主义，一曰集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人人各尽所能以工作，各取所需以享用之。集产社会主义则主张生产机关属之公共，其所生产之物，则由社会或国家处理而分配之。其分配法亦有种种不同；然大致不外视其人工作之多寡，酬给因之而异。各人所得之酬给，即为个人私有物。二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苟欲其主义之实现，必须从根本推推〔翻〕现社会之组织，由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此则二派共同之点也。（至二者之优劣，当世已有定评。所谓社会者，乃对于个人而言；故既曰社会主义，则凡社会之物皆当属之公有。而不能复容个人之私有权。令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之产；根本〔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且同一房屋，牛马之圈厩则为公有；人居之房舍则为私有；同一用品，工厂之煤膏则为公有；人家之薪火则为

私有，于理论上岂复能通？且集产者主张按各人劳动之多寡而异其酬给。是则强有力者将享最高之幸福，能力微弱者将至不足以贍其生。夫能力之薄弱，或关乎生理，而非其人懒惰之罪。乃结果不平若是，尚何幸福均等之足云？此吾人所以谓集产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也）此外有所谓社会政策者。不欲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惟欲借政府之力，施行各种政策，以补救社会之不平。其政策亦有种种，如限制资本家，保护劳动家，行累进税及单一税；以及设置公共教养机关等皆是。此种政策，不过在恶浊政治中自标一帜，不能名之为社会主义也。以上社会主义，及社会政策之派别异同大略如此。今孙氏与江氏所倡导者，果为何派之社会主义乎？抑但为社会政策乎？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读者苟疑吾言，请得而论之：

孙氏本政治革命家，社会主义非其专治；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学说，（即单一税论）欲实施之于中国，故“同盟会”会纲有“平均地权”之语，即此物也。然亨利氏之单一税论，乃一种之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盖社会主义，无论为共产，为集产，必须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归之公共，使社会上无复留地主与资本家之迹。单一税制则仅限制大地主略减其势力，而不能使之消灭。盖大地主固不患地税之增长者；以彼将间接取偿于劳动家故也。以社会主义之根本理论言之：土地为天然之物，固不容有所谓地主，即亦不应更有所谓赋税矣。顾孙氏不但主张单一税而已，同时又自称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其在“中国社会党”之演说有曰：“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其下复盛称集产主义之元祖麦格斯之资本论。是孙氏俨然集产派矣。集产主义虽非圆满之社会主义，然固主张土地器械均归公有。绝对不容私产制度之存在者也；今既主张集产主义，已从根本上推翻一切地主及资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谓单一税

者以骈枝于其间乎？孙氏亦明知二说之相左，故辄变其名曰“单税社会主义。”复为调停之说曰：“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云云。不知单税论之所由来，即以惮于改革，惧社会主义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说之不易行，乃代以单税之法，期稍杀地主之势力，实则因陋就简，不敢实行社会革命者也。若集产主义，无论其合理与否，及手段若何，然终不免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取回今日地主所占之土地归之公共。如是即断断不必复有事于单税。犹之主张共和，即不必复有事于君主立宪；更无所谓并存者也。今孙氏乃同时主张集产主义与单一税制，吾诚不知其所可也。推原其故，实由孙氏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麦氏资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论。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比也。麦氏尝解释“资本”之意曰：“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藉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即生产机关操之直接生产者之手之谓；使资本之势力无可表见者也。国有营业，则仍藉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而资本势力反益澎涨者也。二者在学理上之背驰若此，孙氏乃谓铁道及生利事业收为国有，即为解决资本问题，即为无异公有，是直不知“资本”之意义者耳。孙氏所谓主张集产主义者不外如是；然则满清与现在之政府，均尝嗥叫铁道国有矣，亦可谓为社会主义否乎？至亨氏之单税论，纯为支支节节之社会政策，孙氏乃以之与麦氏资本论并举，尤为不伦。麦氏虽但言资本公有，然土地实可包括于其中。土地亦生产机关之一，凡集产家无有不主张土地公有者也。且其所谓公有，实以土地归之直接生

产者之手。单一税则但由地主之手分润其税金，不但不能名为土地公有，并且不能名为国有；只可名为政府与地主分有耳。而孙氏乃以为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又不知所谓公有之意义者矣。由此言之，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

若夫江氏俨然“中国社会党”之党领。自当有明确之主张，惟记者尝搜索其言论，则又未尝不病其芜杂也。江氏曾为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其言曰：“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观此则江氏明明主张共产主义矣。乃其下文则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然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前后两说，乃极端反对之文字；而江氏竟于一文中同时出之，此真足以令人骇怪者矣！以彼所称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之共产主义，竟不免阻滞进化。然则江氏所言之社会主义果为何等物耶？吾有以见江氏固未尝深知共产主义之真谛者也。抑不独不知其真谛，且亦未知其定义与派别。故又曰：“共产主义：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者，即一种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也。此外更有均产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江氏于共产主义中，分出若许流派，不知本自何人。若以吾所闻，则生产机关与所生产之物，一切共有者为共产主义。（江氏所谓动产不动产一切共有）生产机关公有，而所生产之物则私有者，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不动产公有，动产私有，接不动产，动产

等字在此本不适用，今不暇深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共产主义。分劳异给，各取所值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今江氏乃统而纳之于共产主义者。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已属可骇；复谓此外更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吾诚不知江氏以何者为集产主义也。江氏与学派源流淆乱若是，故最近在美洲之演说又曰：“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同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例推翻之，是真可称怪剧者也！然而读者无庸骇怪，盖江氏实主张社会政策者。固无怪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律推翻也。江氏之言曰：“鄙人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凡人自初生至成人，同在公共社会中，受同等之教育。一届责任年令，即令自由营业。所得财产，仍为私有。惟各个独立，不相授受，死后即收入公有。”此即江氏最简明之主张矣。夫社会主义派别虽多，然其共同之点，必反对私产制度；故无论共产，集产，均主张以土地器械属之公有。今江氏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曰营业，曰财产，明明有私产无疑，曰自由，曰独立，更明明保护私产无疑。且中国社会党亦仅以专征地税为党纲，而未尝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与孙氏政策如出一辙，其稍异于今世之资本制度者，特遗产归公一事耳。然生前则明明各有私产，且私产之范围，不独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因欲营业之自由，财产之独立，非得土地器械之所有权不可也。充江氏之论，营业自由，野心家即随之而起，今日之托辣斯大王，不难复见于江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之世。虽遗产归公，终不足以绝其垄断之欲望。盖彼辈万恶之资本家，大抵好虚荣，弄手段，以抚有多金，奔走奴隶，操纵金融为乐事；其目的不但为长子孙计也。故自由竞争一日不绝，即资本家与贫民之阶级，永无消灭之日，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而北辙耳。欠口言社会主义，乃于社会主义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反谓“虽有私产，以有生为断，共产之真精神亦不外乎

是。”复自称为社会主义特殊之主张。吾以为江氏之主张称为特殊之社会政策，则诚无间言矣。若称为社会主义，则吾期期以为不可也。何也？盖社会主义之根本共同点：土地器械当归公有。必先承认此共同点，始可与言社会主义。今江氏尚未及此，复证以其党之党纲，所谓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遗产，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专征地税，限制军备八事。大抵皆社会政策之条件，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记者前谓其所主张近于圣西门之学说，实则仍不能企及。盖西门氏固主张土地器械公有者。今江氏则仅仅窃取其废除遗产一事而已耳；于其根本要义不敢附和也。然则江氏虽百计欲避社会政策之名，又乌可得耶？

由是言之：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然孙氏于社会主义之派别，尚厘然能辨；江氏则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瞽乱，尤难究诘。且孙氏常自称社会政策，未尝讳饰，其所领之“国民党”亦采用社会政策之党纲。故除混称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之一误点外，尚不失为宗旨一贯。江氏则明明主张社会政策，而必坚称社会主义。袁氏登位则电陈政见。国会开会则上书请愿。党章中且明著“党员得以本党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之条，而必自谓不主张政治运动，必自谓非政党；既非政党则中国社会党之八条社会政策的党纲，又将从何而实现之？乃同时又自称“本党之宗旨，不违反国家社会主义；而可达到无治共产主义，本党之性质，可以为政党，可以不为政党。”模棱两可，饰说欺人，至是而极！是则比孙氏抑尤下矣。至二氏共同之谬误，即恐人但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因之谓共产主义为不可行是也。此等见解，几为一般人所通有，记者曾为无政府浅说对于此节已有解释。读者苟一参观之，当能释然矣。

记者之为此论，纯为研究学理，非敢故为苛论，更绝非对于个人而非议。诚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始萌芽，正当之书说，廖若晨星。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税，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此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也。记者为发扬社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计，又乌能已于言！

一九一四、四、八

2、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名正然后言顺，此语为凡百事物凡百学术所不可忽。而吾人提倡一种主义欲以号召天下者，尤不可不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示根本之主张，而一学者之观听。

“无政府”云，“共产”云，此名在华文中为新产物；其主义之在东亚，则犹襁褓时代之婴儿耳。闻其名而却走者固多，道其说而不知甚解者尤多。而浅人又或恶其名之骇俗，强饰以种种离奇可笑之代名词，令闻者之疑惑反加甚；则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乃作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无政府主义原名Anarchisme其定义曰：“Anarchisme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据此定义，则华文译为“无政府主义”可谓确切而不易。而最近无政府主义之大师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先生则与以最简确之解释曰：“无政府者无强权也。”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藪。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之义亦自在其中。都克Tucker氏亦曰：“无政府字有多种解释，其要义则反对强权政府，故以为名。”此无政府主义之名所由不可易也。

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於社会最显而

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Capitalisme 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名Socialisme其定义曰：“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之机关（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属之社会之学说也。”惟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te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全属之公共。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集产主义Colectivisme〔Collectivisme〕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关土地之类），属之公有（或国家）二派之外，复有独产主义Individualisme〔Individualisme〕之支流（参观民声三四号所记法国无政府党大会事）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而集产主义则“社会民主党”Social-démocrate（即俗称国家社会党或简称社会党）所主张，独产主义则“独产党”Individualiste所主张。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也。是故无政府党常自标其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e-communiste。

由此言之：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

乃世人习惯於政权管辖之下，以为有主则治，无主则乱；或误会无政府即为扰乱之别名，视无政府党无异於放火杀人之强盗。虽有心好其说者，亦惧其惊世而骇俗，不敢坦然受无政府之名。於是种种可笑之代名词，乃纷然以起。而名遂从此不正，言亦从此不顺矣。今试列举而辩正之。

世有欲浑称无政府主义曰社会主义者。不知社会主义，对于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则对于政治的；不应混为一物。无政府党未有不主张社会主义者，故无政府主义可以兼赅社会主义。社会党则多数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故社会主义不能代表无政府主义。又况社会主义一语，近世已习用为集产社会主义之简称；尤与无

政府党所主张相抵触。“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党”二语，无政府党人常道之。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及社会党也，徒以社会主义社会党之名，已为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所习用，欲反对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亦不得不沿用其习惯之名而反对之。即如中国近日所称社会主义，已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发起）所习用。其主张视欧洲之社会民主党尚不能及。甚至孙逸仙所倡之专征地税政策，亦日之曰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之名因之而减色矣。是故混无政府主义於社会主义，足令闻者无所适从。

又有名之曰“极端社会主义”者。此名不知创自何人。而愤愤乐无等所发起之“社会党”实以此自标其宗旨。不知社会主义中，祇可分为共产，集产等派，而无所谓极端不极端。即使强而言之，亦祇可谓共产主义为极端，集产主义为不极端耳。与无政府主义固不相系属也。况其名於文义上尤为不辭耶？

又称为“纯粹社会主义”者？按“纯粹社会主义”即Socialisme pure〔pur〕在学术上原无一定之界说；然当世学者多称圣西门派之学说为纯粹社会主义。圣西门者，St. Simon 十八世纪末之社会主义家也。其学说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各人视其能力而工作，公家量其工作之多寡而给以报酬。所谓生产之机关（土地器械）属公有，生产之结果（日用需要物品）则属私有。质而言之，实即近世之集产主义耳。此种学说，在吾人主张共产者方讥其不纯粹，曾何“纯粹社会主义”之足云？（其理由请看“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然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揆其原因，实为江亢虎所惑。吾闻“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江氏於章程内以己意加入：“於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此语实异常狡狴，一方面以“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影射“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 intégrel 冀调停一部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

义之党人，而掩一般不明学派源流者之耳目；一方面隐示所主张实为圣西门派之学说，而以“不妨害国家存在”七字为抵拒无政府主义之具。其用意盖如此，不科学者竟为所欺，相率沿用，误会纯粹社会主义为完全社会主义；甚或以为无政府主义之代名，抑何不察之甚耶？

于是又有易其名曰“无政治主义”者。此名较之前两名为略正。然语不经习，义无定释，或且误以为“反对政治”之称。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故一举无政府主义之名，在习惯上已足包举社会主义之意；而“无治”则第以为破坏政治，如老氏之学说而已耳，于社会主义之意不相连属也。大抵用此名者，皆休于政府之干涉，欲借不痛不痒之名以掩饰之。不知无政府党之运动，有公布的，有秘密的，其公布者当明张旗鼓以与政府作战，无取乎掩饰。若其为秘密运动，则无论所用何名，皆不失其为秘密。倘徒欲苟且一时以避祸，则断非无政府党所应有。且“极端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一语，已出之蠢侦探吴天民之口矣。然则又何难点窜一二字曰“无政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混名。”如是则即欲苟且一时，又岂可得耶？

此外又有所谓“三无主义二各学说”者，尤为离奇而怪诞。此二语实为“中国社会党”所创用，尝有“三二学社”之组织。彼所谓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也；所谓二各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以堂堂正大之主义，而饰以诡诞滑稽之名词，是直射覆之东方歇后之郑五耳，吾党人安能出诸口耶？且所举尤无伦类。夫“无政府主义”者：赅括之名，而非偏举之名也。无政府之字面为反对政府，而含义则为反对强权，其义几无所不赅：凡对宗教等等皆为无政府党人所倡导；亦为反对强权中之一。以之统属于无政府主义中则可，以之与无政府主义并列则断断不可。无政府主义中，尚有所谓无祖国主义，Antipatriotisme无军备主义，Antimilitarisme无国会主义，Antiparlementarisme

（正名均为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主义等）及其他等等。若必胥举之，不将曰四无，五无，六无，乃至不可计量无耶？不又将以无政府中种种偏举之义，一一与无政府主义并列耶？至于“二各”之名，尤为不祥，无异舞台上丑脚之谐话。“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乃共产主义之格言耳。若标其学说之名，则祇可曰共产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若执一二精理名言，以名其学说，恐古今东西无此奇闻也。且既可名之曰“二各”亦可名之曰“二所”；又亦可名之曰“二其”。岂惟类于丑脚，抑更甚于眩人之幻戏矣！或者乃曰：名固无足轻重，不知凡一学说之名，必庄重而可敬，方足以起世人之景仰。否则徒增轻褻耳。况此了无意义之名，闻者不知何指，又安能持此以相号召耶？

吾今请为一简明之语以告吾党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吾人主义中，若偏举其一二义，则有反对宗教，反对家族，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惟不能与无政府主义之名并列。至若一切纯粹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以及三无二各等等支离可笑之名，皆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此后当相戒勿用，使之绝迹于吾党之口角与笔端。

一九一四、四、十一

3、论社会党

顷得“社会党”发起人乐无君来书曰：“足下既批评孙江二氏之社会主义。尚望一抉社会党二纲六目之瑕疵。既释众疑，亦为亚东社会主义中留一鸿爪。”云云。犹忆前年“社会党”发起时，愤愤乐无诸君，屡函招邀入党。惟记者对于“社会党约章”，及其组织法，不甚满意，未敢轻诺。方欲有所论列，又以其时“社会党”与江亢虎所领之“中国社会党”互相水火。凡所非难，颇秩出辩论主义范围之外，记者颇不以为然。对于两党是非，自守中立，

而不欲加以评论，致助其激争之焰，故卒未赞一辞。今虽时异境迁，然乐无君既拳拳下问，记者亦乐得此机会，一述从前所未发之意见。读者幸勿以明日黄花见消也。

记者对于“社会党”之意见，当分数问题如下：

(一) “社会党”之立名果当乎？读“社会党”约章，盖主张无政府共产者也。乃不名为无政府共产，而曰社会党。揆其原因，误认社会主义可以包括无政府主义之故。记者于“答乐无”中，已略言之。大抵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殊甚。能介绍其学说于中国人者，尚属寥寥。时人对于社会主义之定义及界说，均不注意。好古者则又执其保存国粹崇拜祖国之陋见，取中国经籍，牵合而附会之，以为社会主义，本吾国所固有。而社会主义之为物，乃愈觉迷离诞幻，不可究诘。甚至一切革新事业，近于自由平等之类者，皆以为社会主义所能包括。而社会主义之真谛，反因此而愈晦，此实社会主义在中国之不幸也！今“社会党”发起诸君，岂遂不知此？而仍未能免俗，则甚矣习之难移矣。记者以为无政府党不可名社会党，其故有二：一、学理上之不可，社会主义之定义，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属之社会公有”者，此普通之定义也。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衣食住），全属之社会公有”者，此严确之定义也。社会主义之学说，千流万派。要其大致，不离乎此。盖纯为社会的学说，而非政治的学说，与无政府主义不能相混者也。今社会党既宣言消灭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显然为无政府党，即非复社会党三字所能包举矣。二、事实上之不可，社会主义，本有共产，集产之殊。而近世之所谓社会党，则大抵为主张集产者之通称。如英美之政党的社会党，均但名“社会党”。而各国之社会民主党，通称亦曰“社会党”。今既主张无政府共产，而又取名曰“社会党”。将何以自别于各国之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乎？或者乃曰：此为欧美各国之习惯，吾辈不必奉为圭

臬。不知社会党非一国的，乃世界的。文字或有国界，而学术则无国界。社会党，社会主义之名，乃由翻译欧文而来，并非中国所自创。岂复能以国粹骄人？况即在中国，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人人皆称为社会党者也。今主张既不同，名称乃相混，致令举述者，不得不辨而别之曰：“愤愤乐无所发起之社会党”，曰：“江亢虎所发起之社会党”。其冗沓词费为何如耶？记者曾晤一英国社会党人。示以英文无政府主义之“自由”报。彼一见骇问曰：子非主张社会主义者乎？何故爱读此报也？予笑应之曰：何尝非社会主义，特共产的社会主义耳。彼复曰：然则子非社会党矣。不然，何与江亢虎所言各异耶？于此可见今日之习惯，以为“江亢虎之徒，始为社会党。必江亢虎之言，始为社会主义”者，固不独中国人为然矣。如是，吾人又何取此含糊影响之社会党三字乎？至“约章”第二条，以极端社会主义为宗旨。其名亦有不安〔妥〕，已于“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详论之，今不赘述。

(二) 无政府党有组织机关之必要乎？无政府党，极端反对管理代表等权，而主张绝对自由者也。故无政府党，不应如当世之政党，组织机关，自定党纲，招人入党。各国之无政府党大抵只有自由聚集之场所，而无全体固定之机关。其性质不过如俱乐部，其作用则传播聚谈而已。其集合亦完全自由，而无一切手续，盖凡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即为无政府党。非必写一志愿书，领一入党证，然后可谓之党员也。无政府党之行事，皆自由独立，不受指挥，不俟全体之议决，即或有联结多人，同时并举之事，亦只由同意者，合力为之，而非如当世之党会，由党中少数人，议一事，而党员遵行也。今“社会党”，乃悉取当世政党之形式，有章程(即约章)，有党纲(即二纲六目)，有入党限制(须党人介绍及有戒约)，有入党志愿书，有党员证书，有党旗，有分科干事。凡此皆与无政府党宗旨相抵触者也。据记者个人之见：以为吾党如必欲设聚会之地，惟有建设研究社，或俱乐部之法。无论

何人，凡愿为无政府事业者，即可为会友，借此以为传播主义及聚会研究联络交谊之地，固甚善也。若欲宣布吾党公共之意见，则当别开“无政府党大会”，当众讨论吾人进行之方针，及当为之事业，发表宣言书，布告于社会，以示吾人之所主张者如是如是，吾人进行之共同目的如是如是。庶几与吾党宗旨不背耳。

（三）无政府党有制定党纲之必要乎？世间政党皆由三二党魁，制定党纲，以号召徒众，故一切皆以党魁为主动，而党员为被动。实则利用多数党员之声势，制造党魁之名誉，以为他日禄位之阶梯耳。若无政府党，则各个独立，人人有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安能以少数人之意见，制定党纲，而强多数人之同意乎？故吾可断定之曰：无政府党，不应有所谓党纲。然则无政府党无一定之主张乎？则应之曰有。无政府主义之根本要义，即无政府党一定之主张，此为凡无政府党所同具，可以不言而喻者也。顾一般社会，未能共晓，无政府党乃随时发表意见于大众。有个人发表之意见，即书报演说等是也。有公共发表之意见，即本大会讨论之结果，用“无政府党大会”名义所发表之宣言书是也。二者皆自由言论，而绝无所谓党纲党目之名称。今“社会党”之二纲六目，其非个人意见，固不待言，若比之大会之宣言书，则又不可。盖社会党纲目，乃悬此以招集党徒，与宣言书之但发表公共意见者，固迥别也。“社会党约章”，明著入党者须信从纲目之条。曾亦思信即崇信，从即服从。崇信服从，固无政府党所极端排斥者乎？其与各政党之服从党魁，果何以异乎？

（四）二纲六目之分别，果合于学理乎？今姑舍去无政府党，不应有党纲之说。专论二纲六目之当否。“社会党”之纲目曰：“纲一，消灭阶级。目，（一）贫富，（实行共产）（二）贵贱，（尊重个人）（三）智愚，（教育平等）。纲二，破除界限。目，（一）国，（无远近）（二）家，（无亲疏）（三）教，（无迷信）”此二纲六目者，条分缕析，有如表格。两两对举，无异駢俪。所谓

文人积习，原不应施之发布公共主张者。然特小疵，可无深论。第论其落落大者，不当亦有数端。今世所谓智愚，特比较的形容词耳。非如贫富贵贱之显示区别者也。富贵者虽愚，亦俨然居于民上。贫贱者虽智，终不能不受制于人。是则智愚，又何阶级之可言？宗教之派别繁多，出主入奴，自不免各有界限。第吾党之排斥宗教，其目的不在泯教争，而在除迷信，重自由。是则又何界限之可言？此纲目分隶之未当一也。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一语。其以尊重人权为尊重个人耶？则尊重人权，乃法权家之所尚，而非无政府主义所有事。其以个人主义为尊重个人耶？则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在社会主义学派中又译独产主义）。与共产主义Komunismo学理上，各相背驰，恶能同时并举。及读“社会党纲目说明书，”则其意盖指消灭治人者与统治者之阶级而言。然则质而言之：实无政府耳。夫无政府党之废除统治机关，不受法律束缚，此乃恢复人类之完全自由，其意义不但尊重个人，其目的亦非徒平贵贱而已也。苟欲表示无政府之意，最简单者莫若曰：废除政府，否则曰：废除统治机关。又否则曰：废除治人者与统治者之阶级。然后意义可以明瞭。若徒曰尊重个人，则不知其主张云何矣。此第一纲第二目，措词之未当者二也。实行共产，废除政府。此诚为无政府党根本要义。若夫教育平等，则未可与之并语也。盖今日教育之不平等，乃由于贫富之不平等，未行义务教育之国，贫者固未由得丝毫之教育。即义务教育已行，贫者终未由得高等之学问，科学美术，徒为富人之专利品，此非有他种原因也。贫富阶级使之然耳。今既主张共产，贫富阶级既除，教育又安有不平等之患乎？吾党所有事者，惟在剿灭强权。强权之魁首（政府与资本家）既去，即百事皆了。其时如何工作，如何教育，自能由大众之公意，条理而布置之，势如破竹，而今日则不必特别提出者也。彼政党则不然，欲以政治之力，实施其政策于目前，故往往有所谓教育普及，教育平等之党纲。而江亢

虎亦主张社会政策者，故其党纲又有教育平等之条。若无政府党，性质既殊，即亦无庸相倣，此教育平等，与无政府共产并列之未当三也。国界者，政府之所造成者也，小则争权利，大则起战祸。皆由政府发生之，与平民无与。苟无政府，吾平民即能互相亲爱，又安有所谓国界乎？家族主义，虽为强权之一种，然其细已甚，苟无政府，苟无私产，家族即末由存立。盖法律既废，婚姻之制，自然消灭，公共教育之机关既备，即亦无人自私其家室，而谓此时尚有所谓家族，吾不信也。此破除国界破除家族，列入纲目之未当者四也。此外二纲六目之当存者，除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外，惟一破除宗教而已。宗教为保护强权之利器，导人安贫守分，服从强权。排除宗教，即使人思想自由，抵抗强权。故凡宗教，皆在无政府党所排除之列。然由其本原论之，则宗教不过政府与资本家之附属物耳。排除宗教，自是无政府之一手段，而不必与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并列而对举，如纲目所云云也。故吾人常谓政府为万恶之源，政府一去，百事皆了，惟对于产业之意见，不能不示明确之主张，（即以别于集产与独产）自有“无政府共产”一语，遂可以赅括无遗矣。

（五）无政府党有预定建设之事业乎？“社会党约章”有曰：“事业分鼓吹，进行，建设，三种。”鼓吹，进行，诚为无政府党所有事。若所谓建设者（原注指育婴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等）。其指推倒政府后之建设耶？则其时已为无政府之社会，人人皆为无政府之民，而不复有所谓无政府党。如何建设，自有大众无政府之民，各尽所能而为之，不必专属之无政府党。更不必今日之无政府党，预为之设想也。其指现在之建设耶？则无政府党方竭其心力以谋推翻强权之不暇，尚有何余力，有何余财，以作此补苴弥缝，举一漏万之建设乎？大抵今世俗人，每以“办事”二字为口头语。凡一党一会，必须有创办之事，始合时趋，无异贸易之公司焉。今“社会党”亦不能免此，于是有建

设之条，此实不明无政府党与政党性质之分别者也。政党以施行政策为职志，建设建设，固属时趋，若无政府党，则以推倒强权为职志，除传播主义，实行革命之外，皆非无政府党所有事。又何贵有所谓建设者云云耶？今世之无政府党，固有组织工会，建立学校，以图主义之普及者矣。然此乃传播事业之一种，乃党人运动之方法，而非所云于建设也。

（六）无政府党当有戒约乎？“社会党约章”，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教，不称族姓之戒约。必遵守戒约者，始能入党。窃以为过矣。所戒之事，皆无政府党反对之事。既以无政府为宗旨，自不必复立戒约，此无政府党不必设戒约之说也。无政府党以绝对自由为宗旨，不能预定戒约，使人遵守。虽戒约六条，大抵采自记者所发起之“心社社约”中。然“心社”与无政府党有不同之点。“心社”乃以道德问题为准的。除社约外无他事，故有与社约同意者，集为社友。其于自由之旨，固无背也。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乃于目的之外，加以种种限制，便与自由之旨冲突矣。此无政府党不可设戒约之说也。不独此也。无政府运动之方法，不能限以一格。故无论何种社会，皆当有人以运动之，鼓吹之，而尤以军人社会为最要。故常有坚忍之同志，投身军队，以行其活泼之运动者。今乃弃之如遗，相戒以不作军人，不亦自绝其运动之路耶？且军人既被拒于无政府党，则军人必为无政府党之敌。欲行革命，而反自树革命之敌，何其不思之甚耶？（至“心社”所以有不作海陆军人之说者。以“心社”乃道德之问题。社会运动则非“心社”范围内之事，故凡与道德相违反者，皆得列入社约。倘其别有怀抱，欲隐身军队，以行其革命之职志者，则可暂居赞成人之列。而吾“心社”亦不至失此良友也）。然则戒约之当毁。可不烦言而解矣。

以上为记者个人对于“社会党”之意见，而非攻击社会党，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九一四、五、九

4、答悟尘

来书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已有无政府之意义。又疑共产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此大不然。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明明为两种学说。（有主张共产而不主张无政府者，亦有主张无政府，而不主张共产者。）无政府主义本质，为对于政治之学说。虽含对于经济之意见，而不限定为共产。共产主义则纯为对于经济之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出自法之鲁意布郎。专为生产分配而言。）而对于政治之意见，则尚未表示。倘共产主义，而兼主张无政府者；是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Anarkiiste-Komunismo 此中区别，请细读民声各论，当能了然也。

来书又问。共产实行之始，吾人衣食住之配置，必须有详细组织方法，预示世人云云。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即最完善之方法乎？吾人须知，无政府共产主义，乃绝对自由之主义，无所谓繁密之组织。所贵乎繁密之组织者，特集产主义耳。资本制度之末日一至，吾人即各尽力工作，以供给吾人之衣食住。有屋者可居之如故，而不必给租。无者即居于无人之屋。又不足，则大众合力建筑以居之。大衣服店之衣服，均吾人之衣服也，可往取之。大粮食店之粮食，均吾人之粮食也，可纵食之。此等平平无奇之事，尚须吾人预定方法以教之乎？若恐物产不足，美恶不平，或从此而起争端。则吾人第一著当先知共产主义何以能实行？以社会革命之成功也。社会革命何以能成功？以平民多数已知共产主义之真理，乃同起而革命也。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有厘然不同之点：即政治革命为英雄革命，为少数人革命，而社会

革命则平民革命，大众革命也。政治革命，以二三英雄运用手段，便足以成功，而平民大多数均不知其所以然。故革命之后，组织机关，制定法律等事，即须随之而起。若平民革命，则大多数已明此真理，一旦成功，即以真理为天然之法律（非真法律）而已。又何至有种种争端，而须预谋组织防范之方法乎？若犹疑吾言，则请细读“无政府浅说”。及其他诸家之学说，自可涣然冰释矣。至于工作之分配，公共教养之设置，此更容易。亦无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已。此时平民既能推翻政府，推翻资本家，试思其聪明才力何若？岂有此等小事，而不能处置裕如者乎？至谓须有一至精密详细之图说云云。此在小议家，不妨各以其所见而为之，用以为茶前酒后之谈助，若学说则无需乎此也。盖此时社会之进化，人智之特出，固非吾人今日所能拟议。即强拟之，亦必不能密合彼时之情势。且其时人人自由，安能步步趋趋，死守吾人今日之计画乎？总之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完全自由之主义，无政府共产之社会，乃完全自由之社会。故吾人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亦当本完全自由之脑想以研究之，而不可杂有丝毫政党政策之见解，如政治革命党之预定革命方略，以为他日如何组织，如何施行之地也。

来书又问。纯粹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别，是否一为集产，一为共产云云。按纯粹与真正，均为有所对待之词。以华文字义释之，似无甚分别。惟日人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乃以释英文Pure socialism一语（亦作纯正社会主义）。据英人 Kaufmann 氏所著社会主义一书。其所下纯粹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认各人之才能不同，需要互异，因之生产之分配，当视工作之多寡以为报酬之比例。故土地资本，主归公有。而各人岁入则仍许私有。”此实集产主义之学说也。著者原为集产家，则其以集产为纯粹社会主义，固无足怪，惟吾人则不能承认也。至于近日中国学者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则又不同。如

三二学社之通告曰：“纯粹社会主义有三无二各之学说。”而“中国社会党”之章程，所谓“于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亦全为调停无政府派之党员而设。故世人遂即以“纯粹社会党”。名愤愤等所发起之“社会党”，是则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实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前所述，相去绝远。然则此一名也。或则以集产主义解释之，或又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混名。迷离扑朔，无从分辨。故记者敢断定此为不正之名，吾人屏之勿用可也。至于真正社会主义，乃对于集产社会主义而言。盖吾人常目集产主义为伪社会主义故也。克鲁泡特金尝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克氏之意，盖指无政府共产主义也。要之所谓真正者，对于不真正而言。若无对待，则真正之名亦无由立。故真正社会主义一语，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注释则可。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盖此语本非专名词，即亦无一定之界说也。

一九一四、五、十六

5、答李进雄

来书云：“读民声第五号‘中国社会党之现状’一则……云云。余持此以质诸江君，据云‘无政府共产主义虽未敢决其可行与否，然亦未尝有只字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也’。云云。据此则贵报所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抑有所误会也？”答曰：本报谓“江氏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已表示不赞成。”盖据江亢虎通讯片第三期江氏演说谓“共产主义恐未易遽见施行，”是表示不赞成共产。又谓“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是表示不赞成无政府。本报又谓“江氏从前尚未敢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于其发起“三二学社”自称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见之）今则论调一变。”三二学社之发起，虽有“能否实现”之疑词；然既结社研究，则自然是赞成一方面为多，故谓未敢明白宣言无政

府共产之非。今则曰未易遽见施行，曰未敢深信，是俨然研究有得，知其不易施行，知其不可深信矣。非论调一变而何？然则本报之言，安能谓之无据，又何尝有所误会耶？

顾以上所举江氏前后矛盾之论，不过随手举示一节耳。实则江氏一生言论，几乎处处矛盾。本报以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已甚，闻者不察，遽以江氏之言为的论，贻误后学，实非浅鲜，故特著论与之商榷，以期真理渐明，并非好为非难江氏也。足下试读本报第六号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论。当可略知本报之旨趣矣。顾是论所举，仍有未尽之意，今请再为足下言之。

江氏最近之论，谓共产未易施行，谓无机无契约之说未敢深信，显为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证。夫赞成，反对，均为江氏个人之自由，他人何由干涉。独可怪者，江氏往日持论，尝谓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中坚，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又尝著论倡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宗教无家族），又自称倡尊社会主义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又自称夙所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又自称愿为无政府党一学子（以上均见洪水集）。据此数节，江氏固俨然一宗旨极定之无政府共产党也。乃一方面又曰未易施行，曰未敢深信，且声明“非无政府党”（见通信片第一期）请江氏试平心思之，其能免矛盾否耶？然江氏又或自辩曰。余但谓恐未易遽见施行耳，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但谓未敢深信耳，亦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若然，吾亦有说以证明之：

按江氏谓共产未易遽见施行，并未说明理由，颇难测其命意，然以上下文参观之：江氏谓“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鄙人首倡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之说……”是明明谓均产集产共产均不如其所倡之善而易行矣。是非不赞成共产而何？又以江氏平日持论证之，则其反对共产，更有明据。江氏尝曰：“……共产主义……与记者平昔所主持者颇相迳庭。”

又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而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若制定规条，过于繁密；则措施之际，必多烦难，近于无事自扰，且甚妨害个人之绝对自由。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孟子所谓巨屨小屨同价，谁则为之？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又曰：“有主张共产论者，财归公业，力出私人，各取所需，各勤所职，然徒取所需而不勤所职者当奈何？……况人之性行，既有能有不能；其见之操行，又有力有无力。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若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而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原文作亦得一分权利，然以文义考之，一字当是十字之误）。就所得之权利言，看似平等；就所尽之义务言，实是不平等。且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意美而法殊未良也。”（以上亦见洪水集）凡所云云，皆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之论。江氏尚谓未尝有只字言其非耶？夫思想言论各有自由。反对共产斯反对共产耳，又何必模棱两可，忽而推崇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忽而自称倡导二各五非；又忽而结社研究三无二各耶？抑江氏既谓共产不易施行，复有种种反对共产之议论，吾辈即不能不辞而辟之，以解世人之惑。江氏之对于共产斤斤以为虑者，即“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当奈何？”一语也。吾共产党可简单直捷答之曰：倘有此者吾人可竭诚劝戒之，戒之不听，可以众意屏之社会之外。此非刑罚也，非法律也，天然之公理而已。吾党有一格言曰：“必已尽其力之所能者，方谓清偿宿债之人。”又曰：“无业者请他往！”而克鲁泡特金先生亦曰：“众人协合而为群，无须条约，无须罚律，无须裁判，惟以公众之热诚行之；有悖谬者可为众人所屏斥！”此种格言在共产之世，即为天然之法律。而无肯犯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夫良心之失，由于恶劣社会迫之使渐就渐灭耳（如诈伪者乃得衣食，正直者必日就穷蹙，饥寒所迫，则流为强劫杀人，此其最

显之证也。)若共产之世,无私利之可谋,无金钱之可争,吾人本来之良心,自然发达。相互扶助,各事其事,以工作为幸乐,以无业为耻辱,断无不尽所能而徒取所需之人。即万一有之,吾人惟惻然告以“无业者请他往!”一语而已。固无待繁密之规条,苛刻之刑罚者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未有不趋而救之者,在律书中固未尝有“不救孺子入井者处某刑”之条也。然而无肯不救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各尽所能之理亦然。不必设“不尽所能者处某刑”之条,而人自无肯不尽所能者,亦良心使之然也。共产之世,无物足以蔽其良心故也。况乎工作轻易,时间短少,每日劳动数小时,与游艺无异。人又何苦而不工作耶?至谓人有能有不能,有力有不力,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实为不平等云云。此尤不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意义者也。在江氏之意见以为人有智愚巧拙之不同,智者巧者所作多,愚者巧拙者所作少。而所得权利未尝有异,于是谓之不平。不知智愚拙,乃由遗传与感化而来;而非其人之功罪。同是人类,智者巧者非天然当驾乎愚者拙者之上者也。(今日之地狱社会智者才者辄欲居愚民之上此实最劣之心理)人乃有理性之动物,已有所长,当以助他人之所短。岂有自恃智巧而与愚拙计较权利之理?况天下事万汇千门,有宜于智巧者,亦有适于愚拙者。分工任事,相需以成,及其成功,则皆相等。如建一屋也,智巧者可任绘图测量之事,愚拙者岂不能胜运砖斫石之劳?及其落成,则绘图测量,与运砖斫石,皆为构成此屋之要素,而绝无轩轾于其间也。然则无论何人,苟既尽其所能,即为尽十分义务,纵有弱者拙者竭其能力所作终属无多,然亦不能不谓之已尽一分义务也。彼所谓尽一分义务,亦得十分权利之说,果何自来乎?至谓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此语尤谬。天演家谓“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攻击社会主义者几无不借此为口实。社会主义家则力辟其说,有以社会主义废衣食住之竞争,而仍存

道德名誉之竞争者。论据未免薄弱。易其说者，则谓人类进化与一切生物不同。生物之生存竞争，以个体为单位，人类则个体之外，兼有其公共心与社会性。以社会共同进化为目的，而非特个人之自由竞争。至克鲁泡特金先生更以生物学证明“互助为进化之母”之原则。谓生物之集而成群，必相互扶助乃能生存。所谓“适者生存”一语，即能互助者能生存之谓。而指出赫胥黎优胜劣败说之谬；且证明达尔文学说原意并无优胜劣败之论。自是天演学中乃辟一新纪元。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之说，论据全失。而反对社会主义者遂亦无所藉口。不料反对者用以攻社会主义而遭失败之论，江氏乃拾之以攻共产主义。得不令人失笑耶？以自命中国五十万社会党人之代表，而竟承认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又几何不轻支那而羞天下之党人耶！至其所主张财产独立，营业自由云云，其根本谬误，即由于误认个人竞争为进化之母，遂至倡为是说。而不知已大背乎社会主义之原则，视集产主义尚远不能及。记者于民声第六号断定其为社会政策，而不认为社会主义，非苛论也。夫社会主义何自起？起于经济之不平等也。富人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生享大利，工人则为之奴隶，仰给其工资以度活，不平莫甚于此！社会主义乃从根本上改革之，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掌之，自用之，此实社会主义共同不易之原则。无论其为何派之社会主义几皆同此主张。苟非然者，即不能谓之社会主义。今江氏号称社会主义，独于生产机关公有一问题不敢置一辞；而但曰财产独立，营业自由，虽有遗产归公之言，而私产之存在如故，地主资本家之存在如故，资本势力之跋扈亦必如故。无资本无土地者（即平民），仍须服役于资本家以谋糊口。与今日之资本制度何异，与社会主义之精神相去奚止千里。足下侨居美州当知美洲托辣斯之害。彼托辣斯之资本，岂必由遗产而来耶？其资本主之多慾无厌，又岂徒为长子孙之计者耶？若但为子孙遗产计，则煤油大王一分钟之收入，已足坐享

数十世而有余。又何必耽耽逐逐，甘与世界公理为敌耶？于此足见遗产归公，终不能绝资本制度之流毒明矣。江氏乃欲窃共产之美名，谓共产主义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是直不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者耳！

江氏之反对共产，前段既论之矣。今当再论其反对无政府之谬。江氏通信片谓“鄙人非绝对否认政治者。……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据此以为江氏反对无政府之证，江氏或尚有遁辞。吾今再举其洪水集之言以互证之。江氏曰：“无政治即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如此之世界，试以吾人设身处地思之，能安居乎？能进化乎？”痛诋无政治之流弊至于不能安居，不能进化，谓非反对无政府而何？江氏尚有辞可遁否？无政府何以不能安居，何以不能进化？江氏并不能道出只字。而惟借口讥议，既不研究无政府之学说，而一概字之曰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又不审所谓无契约，无机关之意义，而以为纷纭扰乱之谓。其武断为可恶，其鄙陋抑又可怜矣！无政府之学说，千条万绪，有主张无契约说者，高得文、托尔斯泰、司梯尔等是也。有主张有契约说者，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是也。重理想者主无契约说，而重实行者，则大抵主有契约说。今请举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以代表之。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众人结合而同活于社会中，不本于强权之管辖，而本于众人之协约。”又曰：“无政府之世，法权全灭，信权不灭，仍有契约为众人志愿所认可，保此信权者，共同工作，互相协助，虽有不肖，不敢犯众也。”又曰“众人协约组合而为群，无须强为协约之条款。无罚律，无裁判，惟以公共之工作，大众之热诚行之。有不践行者，可为众人所排斥。”于此可见无政府之真意。江氏乃以无契约三字抹杀无政府主义，吾党岂能承认乎？至无机关无组织云云（机关即组织可不必分二语）。尤非无政府主义之本旨。无政府所排斥者强权之机关，若自由之组织，则固无政府主义之所尚也。蒲鲁东之国民

银行，巴枯宁之公民会，固为有目共见之组织。而克鲁泡特金言无政府之组织尤精。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以自由组织为社会组织之新法。各业皆有公会，如食品衣物以及技艺皆然。无论何种出产，互取所需而无界限。道路，铁轨，学校，机器，物具，均由工作者自经营之，自组织之。将来之社会，即以代今日之政府。”于此足见无政府自由组织之大意。曾何无机关无组织之有乎？至于无系统云云，更不解其何谓，以意测之，其殆纷乱而不统一之谓乎？夫无政府固非纷乱，前已言之。若统一者，乃国家统治机关之所尚，政权统一即强权集中之谓。无政府党之极端排斥者即在于此。以此责无政府，吾党固顺而受之，然不统一即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其理由又何在乎？今世之所谓立宪国家，可谓达统一之极轨矣。其人民果皆安居否耶？果得真正之进化否耶？江氏又分政治为官治与自治。谓“自治如教育，实业等当取积极手段俾日进于完密。”其下即接以“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语意之间，一若无政府主义惟有破坏；对于教育，实业亦不措意也者。其不知无政府主义之本旨而误会以为如此耶，则是盲吠也；明知其不然而故为此语耶，则是诳语欺人。其心更可诛矣。夫无政府主义排斥政治法律，何尝排斥教育实业；排斥国家统治，何尝排斥人民自治。无政府之组织，以各尽所能，共同工作为社会之基础生活之本原。工作者即今世之所谓农也工也，即江氏之所谓实业也。教育更无政府之所重，主张人人皆受完全高等之教育，其时任教育者亦不啻工作之一种。安见其不日进于完密，更安见其不取积极手段耶？抑岂必有政府然后能完密能积极耶？吾党常曰：无政府者，人民自治而不用政府统治之谓也。江氏一孔之见乃以为无政治即不能自治又何其陋耶！

吾今更以简单数语总括江氏言论之大谬点条列于下：

一、江氏不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不主张废私产。违背社会主义之原则。故江氏所主张非社会主义。

二、江氏对于政治主张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对于产业，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皆属国家的社会政策，故决不能窃社会主义之名。

三、江氏既主张社会政策，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去太远。故不惜诋共产为阻滞进化，诋无政府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因是之故，吾人不能不认为反对党。

江氏如不承认，则请取民声第六号之论及此次答李君书一一解答。记者亦断不偏执己见，自以为是。倘江氏有圆满之理由，为记者之浅学所不识者，当即为之更正，或更当舍己见以相从。若不能以圆满之答辞。则请江氏自今以后，慎尔出话。勿再鼓其簧舌，以荧惑海外华侨之观听。盖江氏之言，在国内已无价值，而在海外则为患方长。哀我华侨！方失望于政治革命之无效，忽闻有所谓五十万社会党员之代表者不先不后，应时而至。遂举其信政治革命者而信之，而不悟其患视政治革命为尤甚。此吾所以不避好辩之名而亟亟与之商榷也。

一九一四、五、廿三

6、驳江亢虎

江亢虎新大陆通信片第十一期內载一文，题为“纪民声杂志论载事”，对于本报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均置而不答；而惟以诋毁，干涉，专制，横逆，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丑语加之本报；甚而攻击及记者个人。本报于第六号经已声明辩论范围：“纯为研究学理。绝非对于个人而非议。”复于第六号申说记者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江氏苟不以记者所论为然，自可根据学理，反覆辩论；虽千百回不为赘也，不料江氏绝口不谈学理，而惟以恶声向人。江氏诚工于趋避而善于骂人哉！今试撮举本报第八号以前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条举于后，而附注其有无答辩，俾读者略清眉目。

(一) 本报谓江氏不主张推翻资本家，收回土地资本归诸社会，是为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故江氏所主张，不得称为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二) 本报谓江氏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而惟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以及限制军备专征地税等，均属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以上二条为最扼要之论点。此外则

(三) 本报谓江氏忽而称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忽而谓共产主义阻滞人类进化，赞成反对，同时而出。是为自相矛盾。(江氏不能答。)

(四) 本报谓江氏并举共产集产之学说，统称为共产主义，是为不明学派。(江氏虽有答辩而其谬加甚于下文再驳之。)

(五) 本报谓江氏举社会主义之各派(均产集产共产)一律推翻，而自称为特殊之主张(不啻自居于社会主义之外)，益显见其所主张为社会政策。(江氏不能答。)

江氏既于以上各要点不能置答，则其他连篇累牍，刺刺不休之谈，其有无价值可想见矣。今请取其误会及强词夺理者顺次驳之：

江氏曰：粤人刘师复君，本“同盟会”会员，政治革命党人也。满清时谋炸李准试验炸药，自断其腕。革命后复谋刺袁世凯挟巨资北上，行及沪而和议成，乃转而刊布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并发起“心社”及“晦鸣学社”于广州比又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粤。

按此一段文章，全为师复个人作传记，写履历。江氏之笔墨如此休暇，诚可谓不惮烦。岂与人辩论必须为其人详叙过去之履历然后可讨论耶？则试有人与江氏辩论一事。而开宗明义即曰：“江亢虎即江绍铨满清之进士(或举人?)而兼小京官也。”此语为有意识否？抑又或以本为“同盟会”会员本为政治革命党即不可主

张无政府主义耶？则记者曾入“同盟会”为会员固未尝自讳。十年前之“同盟会”会员，与今日之无政府党，岂复可以相提并论者？（记者之入“同盟会”在东京同盟会最初创立之时。彼时可谓纯粹之政治革命党。越二年谋刺李准方出门而弹发，事觉入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然敢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且此后皆独立运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矣。是时团中同志各谋其单独行动，多注重广州方面，如炸李准炸凤山等，余与同志数人则担任入京刺载洋本在四川湖北革命军未起之前。某君实先行，并输运炸弹，不料中途败事，余等计划更动。故延及革命军兴，始得成行。此时强权之魁首已转为袁世凯，故余等之目的物亦因而移于袁世凯。抵沪时南北议和适开始，某君止余等勿急行。及议和既成，余等之意以为可以乘此机会散布社会革命之种子，而单纯破坏转非所亟；此即“晦鸣学舍”之所由发起，冀以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之机关者也。以上为余个人思想变迁之琐事，殊无载入本报之价值，以耗读者之目力。徒以江氏既赘述余之生平，而又不能尽实，不得已略述之以告江氏耳）至谓余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粤”一语，则尤非事实。余之去粤由于民贼之封禁本报及“晦鸣学舍”此固无人不知，且曾具述于本报第四号。江氏夫岂不闻而必故为此语，其有意耶？抑无意耶？明眼人可以判之矣（余之由广州走澳门时为去年九月。在澳复被葡萄牙干涉。则又去澳时为去年十二月。若陈某之毒杀李世桂则在本年一月。其后牵涉余名。则在本年三月，时日之相隔乃如此至此事嫌疑之由来，尤为可笑，余固不必辩，亦且不屑述之，请观本报第五号之启事可知矣。）

江氏曰：自社会党解散，入室操戈下井投石者，颇不乏人。惟绝不意世态炎凉，虽至高尚纯洁之无政府主义家，亦不免竟为

其所中。观师复近所发刊之民声杂志。对于社会党及鄙人，冷嘲热骂之作，刺刺不休，幸灾乐祸之心，跃跃如见……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

嗟夫江氏老羞成怒，乃欲以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语诋我耶？“中国社会党”虽解散，而江氏之言论与主张具在。批评江氏之言论及主张，与中国社会党之解散有何关涉？夫人苟对于现社会而思有所改革，无论其属于何派，必不免为政府所嫉视，此乃题中应有之义。区区一命令解散，安足当社会党之一哂，何灾害之足言？又何所谓下井？更何所谓凉？必江氏脑筋中先存有重视政府，崇拜政府之印象，故一遭大总统之命令解散，即大惊而小怪之，曰灾，曰祸，曰下井，曰凉，（又如在上海编登报纸。亲友荣饯然后出游美洲亦必饰其词曰出亡，曰九死一生，与灾祸等词，同一声口。）反而观之，无怪未被解散之前，时时宣言曰孙前大总统推许，唐前总理赞成；又曰袁大总统赞成，赵总理保护。一若无上之光荣无上之炎热矣！自己既怀此龌龊思想，更无怪一见有人批评其言论之不当，即指为幸灾乐祸……云云矣。且余既屡次声明“反对江氏言论而非反对个人”。至社会党则业已解散，其物已不存，更无所用其攻击。有时取其党纲而批评之，则以党纲为江氏之手笔。批评其党纲，仍批评江氏主张耳。非批评其党也。今江氏则指为“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余究有何语为攻击社会党，何语为诋毁江氏个人者，江氏能指出否乎？若谓芜杂矛盾……云云。即为诋毁，则当定先诋毁之界说。诋毁者：攻击个人身上之私德，及并非实情而造谣以非议之，若是者方可为之诋毁。倘为批评一人在社会上之行动及其主张，则言论自由，无论其批评合否，惟有辩论更正，而不得遽为诋毁。即使武断之曰：凡批评不合者即为诋毁，亦必须指出其批评不合之实证，方合辩论之道，今本报谓江氏平日所主张为芜杂矛盾……云云，无一不举出江氏原文，加以评论，然后下此断语。并非凭

空造谣以诬之也。江氏苟以为不然，当一一答辩之，证明其非芜杂非矛盾非……而后可。今江氏则未尝有只字剖辩，而惟悍然辟之曰周内，曰诋毁，然则江氏之言论及其主张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设或有人评论之，即加以诋毁之罪，吾恐俄罗斯皇帝之上谕，亦未必如是之尊严也。

江氏曰：其最奇者，既痛斥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名词之不经；而直接标揭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矣，而又申言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不知真正完全字样胜于纯粹极端者何在？且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

记者于本报第五号“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以为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等名均属不当。其理由已具述于该论。然并未申言无政府共产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也。江氏果何所指而为此言耶？该论虽有“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及“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之言。然非申言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苟稍通文义者当无不能辩之也。“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此语出自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先生，吾人固常常称述之。完全社会主义，则对于集产主义之不完全而言，亦为近世所习用。然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者，均有所对待之词，而非有一定之解说。亦非专有之名词，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注解之形容词则可，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本报第十号答悟尘书中已论及之，吾人所以谓极端社会主义及纯粹社会主义等名为不当者，亦以其用为无政府主义之别名耳。倘其但用为诠释。而非用为专名词，则既无关于正名之要旨。吾人又何必斤斤讨论乎？至谓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云云。余亦有说以证明之。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出自克鲁泡特金完全社会主义一语，尤为共产主义家所习用。如马龙氏B. Malon 曾著有“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 Intégral”一书。黑拿尔氏 G.—

Renard又有“完全社会主义与马格斯主义”“Socialisme Intégral et Marxisme”一书。此外尚不可枚举。用语既有来历，即不能为无凭据。若问何为真正何为完全，尤属易晓。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而归之社会公有之谓也。既以财产公有为社会主义，则必如共产之说，生产机关及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然后可称为真正可称为完全。若集产之说，则生产机关归公有，而所生产之物仍属私有，是仅得财产公有之半面，即不啻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不啻为失其真相之社会主义矣。是即偏全真假之确切标准也。总之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等语，已成为当世无政府家共产家之熟语，江氏自未之闻，故訝以为无标准无凭据耳。

江氏曰：以余所闻，社会主义发起于圣西门集成于马格斯，社会主义之马格斯譬之中国儒教之孔子……吾人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其所谓社会主义。犹之吾人可反对儒教，而断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

谬哉江氏。社会主义之理想，实渊源于希腊之古哲。逮十八世纪之下半期，社会主义家蔚然勃兴。如巴比夫 Baboeuf 加彼 Cabet（以上二人主共产）孚理亚 Foulrier [Fourier] 圣西门 St. Simon 等同时并出。以言发起，则不独圣西门一人也，特溯集产学说之渊源者乃称圣西门耳。社会主义乃一公共之名，其中派别自夥。即从其最简单者言之，亦必有共产 Communisme 集产 Collectivisme 两派，固不能以集产主义独占社会主义之名也。今江氏乃谓社会主义集成于马格斯（即麦格斯）譬之儒教之孔子，岂知马氏以前，共产主义之理论已极发达。鲁意布兰 Louis Blanc 出，更与圣西门派之说立于反对地位。马氏既主张集产，纵能集圣西门派之大成，然岂能集共产派之大成乎？若比之孔子尤为拟于不伦。儒教倘认为宗教，则孔子实为教主。以马格斯比孔子，然则马氏其殆社会主义之教主乎？然则一切之社会主义家，必皆马氏之徒乎？然则共产派之社会主义，江氏其殆屏之社会主义之外

乎？江氏之谬妄一至于此，可谓叹观止矣！至谓：“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所谓社会主义，犹之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尤为怪绝。马氏之集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派，此固记者所承认，且屡次称载于本报。谁谓彼非社会主义者。然马氏祇可谓为社会主义之一派，而不能以社会主义为马氏之专利品。马格斯派之外，固尚有理论圆满之共产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欲谓马氏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比之孔子之外别无所谓儒教。呜呼江氏其善忘耶？抑梦寐萦萦于教主。遂不觉加大成至圣之冕于马氏头上耶！马氏有知将唾之矣！

江氏曰：当巴枯宁马格斯未脱离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实兼赅于社会主义中。及其脱离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而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从此无政府党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而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吾恐不但全世界社会党人不公认，即全世界无政府共产党人亦不肯公认也。此真所谓怪剧。不啻夫子自道矣。

谬哉江氏。巴枯宁派与马格斯派分离之历史，乃无政府党与国家社会党分离之历史，而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脱出之历史也。世之耳食者流，往往误会以为巴马二派未分以前，无政府主义实统属于社会主义中，而别无所谓无政府主义，一若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亦由马格斯之社会主义所产出也者，此实不明历史之故，江氏亦其一人也。今请以简单数语约举二派未分离以前之历史以告读者可乎？一八六四年“万国劳动会”*International Arbeiter Assoziation,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开会于伦敦是为劳动者国际同盟成立之始。是会宗旨，在联合各国之劳动者，谋直接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用之。至于取若何之手段，及采用何种之分配制度，其初固未有规定。且屡次大

会，均不能得确定之决议。是万国劳动会乃劳动者反抗资本家之团体。其命名非社会党，其性质更与国家社会党悬殊。凡赞成劳动革命者，无论其属于何派，均不妨入会。故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之马格斯与焉，主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又与焉。会员中学派既各有不同，则关于进行之手段及目的，均必有所争论。以是之故，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派，与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派，乃互相角逐，互有胜败。及其最后（一八七二年），卒致意见决裂而不可合。是即国家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分离之历史。所谓分离，乃两派不合并为一党而分离，并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分出之谓。当未分离之前两派主张，固始终各执一说，各树一帜，并非巴枯宁之无政府主义原在马格斯之社会主义中至是始分离也。江氏乃谓未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原兼赅于社会主义中。其欺人耶？抑不明历史之由来耶？无政府主义始于蒲鲁东以一八四八年发表其意见，实在巴马二派分离二十余年之前。试问此时蒲鲁东之无政府主义是否兼赅于社会主义中耶？且即言巴枯宁无政府之运动，亦不限于万国劳动会，两派未分离之前，巴氏亦自有活泼之运动。当一八六七年“万国和平自由会”开会时，巴氏实首先提出无政府主义〔义〕于该会。主张废除政府以保全和平与正义，该会议决采用。巴氏遂被推为终身会员。翌年巴氏复提出议案，主张极端破坏。当此之时，巴氏尚未入万国劳动会。试问此时巴氏之无政府主义又是否兼赅于社会主义中者耶？又翌年（一八六九）巴氏始入“万国劳动会”为会员。当未入会之先，劳动会之瑞士分部已有“罗马联合会”之组织，与马格斯派意见不合；而赞成无政府主义。巴氏入会而势愈张，反对马格斯派最烈。次年（一八七〇）拿破仑第三帝政倾覆，巴氏遂乘势运动，欲实现其理想之无政府社会。以里昂为根据地，宣言废弃国家。不幸而遭失败，复之瑞士，次年（一八七一）万国劳动会第五次大会于伦敦，马格斯派势力日盛，巴氏乃与“罗马联合会”共组

织“犹拉会”“Jurassienne”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又次年（一八七二）乃与马格斯派完全分离。由此观之，巴氏之无政府运动，在未入劳动会以前，已明标无政府主义，固与马氏无关。即入会以后亦时时有独立之运动，亦明揭无政府主义之名，既与劳动会不一致，更与马氏绝对不一致。是巴氏之无政府主义，与马氏之社会主义，始终绝对不相合。所谓合者，不过同在劳动会之三年中互相角逐互相争辩而已。相合且不可，更何兼赅之可言耶？江氏又谓“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然则未分离之前，巴氏果未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耶？巴氏由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数年中之种种运动，其社会主义耶？抑无政府主义耶？请江氏稍展其眼光，一读巴氏之历史及著作，当可恍然悟矣。

江氏又谓“从此无政府党遂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岂知社会主义之中，有共产集产之两派。马氏特集产社会主义耳，若共产社会主义则固无政府党之所主张者。安能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乎？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而极端排斥集产主义者也。然其生平著述，乃往往称述社会主义，其辞辟集产主义时，必明著集产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之名。而不单称社会主义。且常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也。”又曰：“无政府主义者废去政府之社会主义也。”其他无政府大家之著作，论述社会主义者，尤触目皆是，不可以缕述。江氏乃谓无政府党以社会主义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果又何所见而云然耶？夫今日一般人之习惯，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社会民主党，固诚有之。吾无政府党人因社会上既有此习惯，乃于名义之间，辨别益严。自称或曰无政府党，或曰无政府社会党，或曰无政府共产党，而不欲单称社会党，以免与社会民主党相混，此亦诚有之。然此乃习惯问题，若夫论述学理则社会主义之名，吾人固不必讳言。安有绝不自称主张社会主义如江氏所云云者耶？江氏又谓“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

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且谓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必不公认，而指为怪剧。按本报第二号尝曰：“近日好谈半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府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盖吾人以为社会主义当向社会谋解决，不当向政治谋解决，以社会问题而乞灵于政治，是自失其社会主义之价值；故目之曰半面的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易其词曰以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便与原意不符。因圣西门固未尝主张政治运动也。然此或称引之偶误，亦姑可以不论。第就学理言之，则西马二氏之学说，谓为半面的社会主义，亦非苛也。何以言之？社会主义必废绝一切私产，方得称为圆满。今西马二氏之学说，对于生产物之分配，均许私有。是明明尚有私产，焉得逃半面之谓乎？至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及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相对待时，往往称为完全社会主义。吾既于上文历历证明之，江氏乃指为怪剧，谓世界党人不公认，抑何所闻之不广耶？江氏若必以为怪剧，则克鲁泡特金先生及当世之多数共产主义大家当先承其咎。如师复者又何足道耶？且江氏以三无二各为纯粹社会主义，又谓“纯粹社会主义乃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见洪水集）然则国家社会主义之不纯粹，不言可知。国家社会主义非他，即马格斯主义也。然则江氏明明谓马格斯为不纯粹之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彼之所谓三无二各）之主张为纯粹社会主义矣。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肯公认乎？抑不肯公认乎？怪剧乎？抑非怪剧乎？忽而奉马格斯为社会主义之教主，忽而谓其主义为不纯粹。怪剧之中，复有怪剧。吾于是又不得不叹观止矣！

江氏曰：师复又痛斥余不明社会主义之派别，而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以余所闻，则社会主义最通行最紧要之第一著作，即马格斯所手草。固明明曰共产主义宣言也。马格斯自己不明社会主义之派别，而自己纳之共产主义中，当尤

为师复所大骇特骇不一骇者已。

嘻，此即江氏欲藉以掩饰其不明学派之答辩词乎？一八四七年。马格斯发表共产宣言。自称共产主义（此宣言之纲领，即禁土地私有课累进税禁相续权等等；即今日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所奉为蓝本者也。）盖因当时共产Communism集产Collectivism两名词，尚无严确之定义，故马氏得混用之。而巴枯宁即以反对马氏主张之故，特称集产主义以自别。若在今日，两名词之定义，既已无人不知。便可纵而诠释之曰：马氏名为共产，实即今日之集产。巴氏名为集产，实即今日之共产。可见马格斯之所谓共产主义，不过历史上之名词（在今日论学派者则皆以马氏为集产派），稍读社会主义史者当无不知之。记者于本报十二号第九页答端任书亦尝下以诠释，曾何足骇之有？惟江氏之不明学派，其病不在以马格斯为共产主义（江氏向未尝有此语。记者亦未尝谓江氏有此语）。而在臚列共产与集产之学说统而名之曰共产主义。

（参见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今江氏欲护其短，乃易之曰：“师复斥余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愚藉马氏之共产宣言以自掩。此其狡狴欺人为何如耶？马格斯之共产宣言谈历史者不妨仍其共产之名。若诸家之集产学说，则无论如何，决不能谓之共产。今江氏则统而纳之共产主义中，其言曰：“共产主义一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者，即一种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也。此外更有均产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江氏此论，其不可解之点不可枚举。请申说之：田地房屋为不动产，金钱器物为动产。此法律上用以分别产业之种类者也，若社会主义之分别产业，则以土地机器等为生产物（即生产机关），衣食房屋等为需要物（即所生产之物）。而动产与不动产之名词，则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之意义者也。今江氏之动产不动产云云，不知何指，亦不知为谁氏之学说，然以意度之，则必误以生产物为不动产需要物为动产无疑（民声第六号如此假定江氏亦无异辞）。社会主义中最浅而易知之用语，江氏尚不能辨别，不可解者一。若不动产与动产果作生产物与需要物之解释，则主张生产物公有而需要物私有者，明明为集产主义之学说。今江氏乃列之为共产主义之一派，不可解者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鲁意布郎之学说，当世学者皆通称曰共产主义而已。江氏则又从而名之曰废产主义，其本之谁氏，不得而知。然以余所闻，则共产主义乃尚产派Dominist之学说，与废产派Indominist乃适相反，不可解者三。江氏之所谓进化的银行汇划法，语不明瞭，不知何指。然集产学说中，有主张按各人工作之多寡而给以相当之工券可以互易物品无异银行之金券者。江氏或即指此种亦未可知。若然，则明明为集产学说，江氏又列为共产主义之一派。不可解者四。江氏此论，分共产主义为四派（一动产不动产均公有。二不动产公有动产私有。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四进化的银行汇划法。）若由今世学者普通之分派言之，则第一第三两派均共产主义之学说；第二第四两派均集产主义之学说，江氏乃统列共产主义中，既以集产主义列入共产主义混共产集产为一物矣，复从而申言之曰：“此外更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此种集产主义，究为何物？不可解者五。有此五不可解，江氏之不明学派，又岂余深文周内之词耶？吾久欲闻江氏如何分别共产与集产而不可得，近偶检天声第一集忽见其在杭州之演说曰：“共产社会主义，欲保持财产之平均，主张将私人所有之财产，作为共产。国家存在之日，则归之国家。集产社会主义，主张集私人之财产于一处，以营事业，年终均分红利，以免自由竞争之弊害。”呜呼？此即中国社会党五十万党员代表之江亢虎先生所下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之定义乎？苟以稍有社会主义之常识者观之，其不为之喷饭者几希矣！夫所

谓将私人财产作为共产者，其但指生产物（土地器械等）耶？抑兼指生产物与需要物（衣食房屋等）耶？于此二者既不明言，则共产之义尚未明瞭也。且共产主义必主张以一切财产归之社会，无论是否无政府，均无有主张归之国家者（若德意志派之专制共产主义，与近世之所谓共产主义，全异其旨趣，不能借以为口实。）主张以财产归国家，则惟社会民主党之集产主义耳。乌足言共产？至其解释集产主义，以为“集财产于一处以营事业年终均分红利。”尤足令人捧腹。以此为集产主义，则所谓集产者，乃一大贸易之公司。以有财产者为股东，而相与经营商务，是真古今东西未有之奇闻。江氏之分辩学派如是如是，吾于是又不得不叹观止矣！

江氏曰：师复又谓余初则宣言赞成无政府主义，今则宣言反对无政府主义，两者皆不知其何指；惟余十年前所倡道之三无主义，固明明为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师复乃代改国家二字为政府二字，而谓家庭宗教不能与政府并列，至以种种丑语形容之。如此强题就文殊令观者叫绝。

江氏之忽而赞成无政府，忽而反对无政府，记者于民声十二号答李进雄书中已历历指出其证据。请江氏一读，自知其所指，不可诬也。至江氏之所谓三无主义，其“三无主义悬论”文中，虽指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然除此之外，凡言三无主义，皆举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为言。如在杭州之演说曰：“无治社会主义……余欲称之为三无主义，即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见天声杂志第一册题为江亢虎大讲演）“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又曰“大抵〔抵〕高尚卓越之士，多祈望本党为纯粹社会党。以达到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之理想世界为宗旨。”其答案又曰：“无治党可标举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为其究竟之宗旨。”其后江氏又发起三二学社。其社约又曰：“纯粹社会主义有三无二各之学说，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也。……”以上皆江氏之言论明证具在，岂可

虚造。是江氏除三无主义悬论之旧文外，其他最近之言论，皆以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三者并举。称为三无主义，且以代无政府主义又以为无政府党之究竟宗旨（江氏之三无主义悬论，乃数年前之旧文，自谓“事过境迁不复成章不过存为纪念而已。”然则吾人引述江氏言论，自当以最近者为正，此实征引人言之通例也。）言犹在耳，墨且未干，江氏乃狡赖不认，反谓余代改国家二字为政府，谓余强题就文。噫，既食言之不已，复反唇以诬人。江氏之无理，至于此极，能不为之齿冷哉！抑吾且姑让一步：假定江氏之所谓三无，确为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则又试问此三者果足以尽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之意义否耶？除国家家庭宗教之外如军国主义Militarism资本制度Capitalism等，无政府主义亦反对之乎？抑不反对之乎？以无国家（或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三者为无政府主义，（因江氏明言称无治社会主义曰三无主义。又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为无治党之究竟宗旨。故云。）此真未之前闻之解释，诚非吾人所能梦见者矣。

江氏曰：至于Anarchism一语，其内容诚可解为广义，然一译作无政府三字，则既曰政府，即非家庭，亦非宗教。而师复乃以为一切包括无遗。忽而取其多，则谓政府家庭宗教三者尚在未尽。忽而取其少，则谓无政府一字即已有余。日近长安近，只顾自己说得有理而已。余意则以为就文字言，无治主义较为适当。就习惯言，无政府主义较为通行。故吾人姑沿用其名词，而别须分疏其定义。若谓政府二字即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如余捧昧，良不足以知之。

江氏以为Anarchism一译作无政府即不足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然Anarchism之原字则谓可释作广义，是其原语足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江氏想亦知之。Anarchism既足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今译入华文称为“无政府主义”，仍不过藉以代表Anarchism而此主义之性质作用及定义，则固未尝有所出入。断无在Anarchism

则其义可广一易以无政府主义之代表名词其义忽变而为狭之理也。今江氏乃谓一译作无政府即不能包括，其理由果何在？岂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文则其义广，在中文则其义狭。如水银之忽缩忽涨者乎？在吾人之意：以为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反对一切强权，所包甚广。苟于其中特标政府（或国家？）家庭宗教三者反对之，尚不足以尽其义。惟取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之名，然后其义乃无所不赅。前后意义一贯，何所谓忽取其少忽取其多耶？且吾人但谓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可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耳，固未尝谓“政府”二字之字面足以包括宗教与家庭也。今江氏乃强易之曰：“若谓政府二字即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云云，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通，是无异吾人谓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Anti-familism（反对家族主义）Anti-religionism（反宗教主义）而江氏则易之曰Government（政府）一字可以包括Family（家族）Religion（宗教）岂不令人喷饭耶？夫无政府党无有不反对家族与宗教者，其反对家族反对宗教之学说，亦皆纳之无政府主义中，固未闻以反对家族Anti-familism反对宗教Anti-religionism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三者并举。江氏乃谓姑沿用其名词而别须分疏其定义，然则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苟非无江氏之分疏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即不足以知其定义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果可以尽无政府主义之意义耶？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宗教无家庭三者平列分疏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果出之何家之学说耶？今请正告江氏曰：所谓无政府主义即Anarchism文字虽不同，而此主义之定义与范围则未尝有异。惟江氏执著字面误为排斥政府反对政府。无怪其格格不入，以为不能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而特创所谓三无主义之名矣。江氏又谓以文字言无治主义较为适当，吾不知无治二字与江氏之所谓三无又能相合否？无治则无政治耳，又岂能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耶？然则所谓较为适

当者又果何在耶？

江氏曰：主张无政府主义恒攻击社会主义，此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也。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此则中国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也。

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非攻击一切之社会主义也。无政府党多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是无政府党不独不攻击之，抑且主张之矣。江氏挟其一孔之见，以为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甚至欲奉马格斯为教主，以社会主义为马格斯之专利品，于是以攻击社会主义为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陋哉！至余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遗弃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土地资本公有）而以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江氏所最尊崇者马格斯，而马氏最要之主张（土地资本公有）江氏即不敢附和。是江氏虽欲窃社会主义之名，而其实尚不足以望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项背。然则吾人之反对江氏特反对社会政策耳，尚未足以语各国无政府党之反对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江氏乃谓余攻击社会主义，江氏诚欲借社会主义以自重，其如实不足以举其名何？至谓“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为中国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今请即如其言以释之曰：吾人之所攻击者，江亢虎之社会主义（实即社会政策）也。吾人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乃主张共产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也。吾人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者（此语有语病，特姑仍江氏之语耳），乃以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而江氏之社会政策则更每下愈况尤不足以列于社会主义之林也。此种意见，不独中国之无政府党为然，即万国之无政府党亦无不皆然。

江氏原文此下尚有八九百言，欲求其意旨之所在，了不可得。无非对于师复个人，谩骂而狂吠（如谓余不欲中国更有倡导社会主义之人。谓余干涉彼之言论行动。谓余专制胜周厉王秦始皇

百倍。如此种种。颇类疯人之语。)江氏自己不重惜其人格,惟记者则决不愿效其尤,与为村妪之角口。故惟有一笑置之,而不欲赘述以污读者之耳目。自今而后,江氏如能循辩论学理之范围而有所答辩,记者当乐与讨论。若犹是一派漫骂之谈,记者亦只有自守言论上之道德,决不与之哓哓,江氏之骂人自由,尽可达至圆满之域也。

一九一四、六、十三

7、答飘飘

来书曰:“蒙所疑者。恐将来(指无政府之初期)之工作,分配不均。例如机器未十分发明之时,必有挑担之工。然同是挑担,草担轻而粪担臭,孰不担草而担粪乎?”答曰:无政府之世,工作之分配,纯以自由之意志及互相之热诚为根本。吾人苟认互助为人类之本能,则规避工作及苟且塞责之弊,在无政府之世可决其必无。虽有用力较劳之工作,其筋力较强,必争先担任之,而决无所畏避。至于一切有碍卫生及令人厌恶之事,则必竭力求其改良。如笨重之运输,秽浊而危险之矿坑,以至如来书所举之挑粪等等,均必改用机器。此等机器,现在欧美发明已久。其应用尚未广者,则以有资本制度之故。凡较人工略贵之机器,即不肯采用耳。若一旦无政府共产实行,便可自由使用。其未有此种机器之地方,立发一电曰:此间需用某种机器若干,朝接电而夕装运,不及数月,无论天涯地角,机器鳞鳞于道矣。若谓需用太多,一旦不能应其所求,此亦不必过虑。盖此时凡军事之大工厂及一切无益之消耗品制造厂,皆将改为制造日用必需品之工厂。且各处均可招请技师,多开机器制造所,依式仿造,则机器之出产,自无缺乏之患。至于运输未到及制造未成之最短期间,吾无政府党当力守多劳力而少享福之格言。凡一切艰苦之工作,吾无政府党当率先勉力任之,须知无政府何以能实行,必无政府主义

已得多数之赞成而后可。是即无政府党已占多数也。以多数之无政府党，独不能任此区区乎？

来书又曰：“初行共产之时，道德尚本〔未〕充分，又无法律之限制。共聚一方之人，固能尽其所能，取其所需。若志好游历者，今日之东，明日之西，东西之人，岂可不许其各取所需乎？苟其许之，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尤而效之，将若之何？欲摈之一群之外，则彼辈东西无定，摈之无所摈。若设法限制之，则彼辈任意掠夺，限之无可限。若武力对待，又恐寡不敌众，此则不能无疑耳。”答曰：讨论此问题者，当先承认两前提。一则无政府共产之所以能行，必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已广，赞此主义者已居多数。二则私产虽废，不道德之根苗已绝。（“道德”一语，本无界限。在无政府党之意见，则以为不道德之根苗，纯由社会组织之不善。宗教法律固足为道德衰落之原因，而私产尤为万恶之源泉。若一旦私产废除，复无宗教上法律上之伪道德以束缚人心，则人类本来之良德，必异常发展。此理由无政府浅说曾详论之。）此两前提既认定，则来书所疑“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一语，必无从见之事实。而所谓任意掠夺，寡不敌众云云，尤可决其必无者也。至对游历者之工作，亦甚易解决。盖聚处一方者既当工作，则游历异地者在理亦当工作，在势亦未尝不可工作。（如以半日游历半日作工于势极顺。）且聚处一地者既能各尽所能，则游历时亦必思有以尽其所能。是事实上亦断无于此则工作于彼则不工作之虑也。至谓专藉游历之名，以规避工作，此等卑劣不进化之种子，吾不敢谓天地间必无其人。然即有之，亦必最少最少。此则可断言。既属最少数，则屏斥之，或感化之。均属不难。断不至如来书大多数云云之所虑也。夫人而至于借名游历以规避工作，其苦更甚于今世之逃犯。游历之快事，反变而为无限之苦恼，人又何乐而为此哉？（逃犯为避惨酷之刑罚，且为抵抗强权之一端。故比较上又觉其乐。若仅避轻易之工作而受良心责

骂，社会摒弃之苦恼，谁肯为之?)

一九一四·六·廿七·

8、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

余与江氏辩难既详且数，雅不欲再读阅者之听，惟见江氏最近宣言书，其中对于无政府主义之意见，独具别解。足令闻者愈滋疑窦，故不避词费，再辩之以解第三者之惑，固不为江氏一人发也。

江氏之宣言曰：“鄙人……对于无政府党。不赞同其采用强权。否认机关。”江氏以采用强权否认机关二者为无政府党之咎。此吾人所不能不一为研究者也。

“强权”一语。在欧文为“奥陀利替” *Autorité*(法) *Authority* (英) 其译为“强权”实始于“新世纪”报。如克鲁泡特金所著之“*La Loi et l'Autorité*”译为“法律与强权”。此外凡遇“奥陀利替”字均以强权译之。而日本幸德秋水译克氏“面包略取”一书，亦沿用此译语。考之英法各大词典，“奥陀利替”者，法定之权力，如“法权”“亲权”“首领权”等是。申言之，凡法律或章程所规定或社会习惯所认定之一种权力，足以命令人或限制人者，谓之“奥陀利替”实自由之对待语也。此物在法律家视为正当之权力，惟无政府党则恶之如仇，无政府党之反对“奥陀利替”与社会党之反对资本制度无异。盖无政府主义主张无限制之自由，绝对不承认法定之权力。凡所谓法定之权力，必侵夺他人之自由以为权力者也，故命之曰“强权”。凡无政府党无不以反对强权为职志。今江氏反指无政府党采用强权，真不知其从何说起也？或乃告我曰：江氏之所谓强权，盖指无政府党之主张以武力对待政府耳。若然，则以武力为强权，不但误解字义，抑且重诬吾无政府主义矣。夫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共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

皆与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掠无异。人苟被强盗劫掠，而以武力抵抗之。取还其赃物，无论何人，均许为正当之防卫者也。今无政府党以武力对待政府与资本家，抵抗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强权，恢复本来之完全自由及正当生活，与抵抗强盗事同一例，亦为合理之防卫。而乃诬为采用强权，此何理由乎？然则吾人当任政府与资本家之压迫，束手帖耳而不与抗，始谓之非强权乎？或又告我曰：江氏之意亦未必如此，特欲用和平手段而不主张激烈耳。若然，则激烈手段更不得指为强权也。江氏不曰激烈手段，而曰强权，是已显存先入为主之见矣。且无政府党之手段，向分两派：一不主用强劲手段而欲以渐变者，是为改良派，Réformiste 如高得文蒲鲁东等是。一主用强劲手段而不主渐变者，是为革命派，Révolutionnaire 革命派之中，又分为两支派：一主张抗税抗兵役等者，是为抵抗派Reniente〔Résistant〕如都克托尔斯泰等是。一主张暗杀大革命等者，是为扰动派，Insurrectionnelle 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是。可是无政府党并非全数主张激烈。江氏如不主张激烈，尽可曰不赞同扰动派之无政府主义，而赞同抵抗派或改良派之无政府主义。固不必以激烈手段概尽一切之无政府党，更万不能诬激烈手段为强权也。

至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吾已于答李进雄书详辩之。盖无政府党祇排斥强权的机关，而主自由的机关，并无绝对否认机关之说。世人不察，往往怀此误会，故托尔斯泰L. Tolstoy尝曰：“世人常谓无国家即无公共事业（如教育等等）之机关，噫，此何说乎？吾人不用统治机关之后，何故不能组织生活必要之机关乎？吾人此时自治吾事，岂不较统治机关之为他人治事者为更善乎？”在今之世，吾亦见有种种独立的组织，并不藉国家之力，而反胜于国家统治机关百倍者矣。“劳动公会”“合作团”Coopérative “工团”Syndicat等是也。况在无国家之世，一切强权，消灭净尽，吾人岂反不能从事种种组织乎？”托氏此言，可以辟尽

一般之误会矣。

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者，其仅如一般人之误会乎？抑所谓机关，固别有他解乎？吾尝参之江氏平日之言论，始知江氏之所谓机关，固非如是云云者也。

江氏之洪水集有曰：“俄国无政府党人史特孟君……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若免关税，撤军备，专从事于教育与实业，则教育与实业之机关组织，必更繁密完美。而政府者，不啻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无强权即无罪恶矣，意与余全同，窃自信为无政府之正解也。”（记者按史氏现在上海为律师：自称非无政府党，且非社会党，惟其人学问尚佳，当不至为此无意识之论，余尝以所述之言质之。询以有无讹误？史氏谓当直接致函江氏囑其更正，但不欲宣布意见于报上云。然江氏即自谓“意与彼全同。”则上述之言，是否出自史氏及其中语意有无出入，均可不论，直假定为江氏之意见可也。）所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此语极是。惟所谓“强权”与“机关”当先为界说。强权者：“奥陀利替” *Autorité* 也（其定义已述于上文），凡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无政府主义必主张废绝之。何为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即政府是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之种种机关是也。（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一换言之：即由法律或章程规定有权管理公务之机关是也。此种机关，既含有“奥陀利替”之性质，即为强权的机关，故无政府党必废绝之，而主张自由组织之机关。何为自由组织之机关？即关于生活必需之公共事业，如衣服，饮食，建筑，教育，交通及其他等等。当自由组织种种公会或团体以经营之。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绝无丝毫之特别权力，（奥陀利替）可以施号令定规则含有管理之意味。一切经营，惟按公共意思之结果而行之，若是者为自由之组织。今江氏之所谓“机关”者，其为自由组织的机关乎？抑为奥陀利替的机关乎？由前一说，则当与无政府党完全同其意见，何以宣言

书又自称“所异于无政府党者在有机关”乎？且既主张自由组织，则必排斥“奥陀利替”（强权），而凡属政府，在所必废，何故又谓若政府无军备关税即无强权乎？由后一说，则既主张奥陀利替的机关，即主张强权之存在，即为主张“强权主义”*Autoritarisme*强权论家”，即与无政府主义之宗旨根本反对，即当绝对否认无政府主义，又何必为无政府多作解释且自称为无政府之正解乎？两说无一可通。江氏之讨论学说，或表示主张向皆语焉不详（无非祇下断语而不说理由），故令人无可捉摸。然试细按上文所引之言，则江氏之所谓机关，实指政府而言，盖为后一说之解释无疑。何以言之？江氏谓免关税，撤军备，政府即无强权，是江氏明明主张有政府者，特反对关税，军备而已。盖江氏之意，以为政府惟有关税军备，乃有强权，若但从事教育与实业即无强权。对于“强权”之解释既误（世人往往以强暴行为*Violence*为强权。而不知强权乃“奥陀利替”江氏亦同此误），斯对于无政府之见解亦因之而俱误。殊不知无政府主义之反对强权，乃反对一切“奥陀利替”，以其侵害完全自由之故，而不但反对暴行而止。所谓政府者，乃由“奥陀利替”建筑而成，纵无军备关税，而既名政府，则必有政府之性质与作用。无论如何改良，如何缩小权限，然必认为法定的机关，必以法律或章程规定管理者之权限。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必有行使之职权，人民对于此机关必有应负之义务，且必受此机关之规则所制裁。有一于此，即所谓“奥陀利替”，即所谓强权，即为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论属于何派，无不绝对排斥之者也。江氏乃以为无强权，则其误解可知矣。江氏又以政府比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不知公司之经理，即为公司之首领，凡首领必有规定之首领权，且与其他职员各分阶级，尤为显而易见之强权。江氏引喻及此，足以证明其所谓机关，确为强权的机关（至学校为教授学业之地，而非处理事务之机关，以比政府，更为拟于

不伦。且即就学校言，其管理员教员皆有特定之权力，对于生徒，能施以种种命令制裁及罚规，是亦奥陀利替之一种。）江氏既是认强权的机关，则其根本思想既与无政府主义相乖舛，而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之否认机关”者，质言之实不赞同无政府党之否认政府耳。江氏祇否认有军备有关税之政府，而是认办理实业教育之政府，无政府党则否认一切政府，（即凡含有奥陀利替的机关）是无怪其格格不入不肯赞同矣。然则江氏心目中之所谓无政府，不过裁撤海军部陆军部及税务处，而留教育部与农工商部耳。所谓无政府之正解。如是如是，此其所以为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也。吾乃约为简明之语以告读者曰：

（一）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激烈手段（或武力）”。然不曰激烈手段（或武力），而必目之曰强权，则未免与当世之资本家及绅士常诋无政府党为暴徒者同一声口矣。

（二）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政府（即强权的机关）”。无政府党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今江氏不赞同，质言之即不赞同无政府主义。

一九一四·七·四·

9、安那其

安那其Anarchie（法）Anarchy（英）Anarko（世界语）一语，华文译曰“无政府”。此术语之定义及其内容，时人不甚研究，而种种谬解，遂缘之而生。今特略述数种定义，以为研究之一助。

（一）“安那其”Anarchie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主张个人自由发展，不用一切政府之统治（见法文新百科词典 Nouveau Dictionnaire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Encyclopédique]。

(二)“安那其主义” Anarchism 乃一种新社会制度之哲学。以绝对自由（不为人造之法律所限制）为根本。又断定无论何种政府，无不凭藉暴力，故皆为悖理害人之物，当废弃不用者也（见母地杂志 Mother Earth 引）。

(三)“安那其” Anarchy 乃社会的学说。主张人群联合，废绝一切以人治人之统治制度者也（见英文百年词典 Century Dictionary）。

(四)“安那其” Anarko 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主张个人独立生存，无一切首领或政府（见加比氏世界语词典 Vortaro Esperanto de Kabe）。

据上所举，则凡释“安那其”者，皆以无政府之义诂之。而克鲁泡特金亦谓“安那其” Anarchy 即无政府 No-government 之社会主义。又谓将来之社会，政府职权消灭净尽，是为无政府之社会。Society Without Government 是为“安那其”。Anarchy 又谓安那其共产主义 Communisme Anarchiste 即无政府之共产主义 Communisme Sans Gouvernement [Gouvernement] 是克氏之解释“安那其”。亦直以无政府为注脚，尤为简单直捷。然则华文译“安那其”为“无政府”于义甚切。（惟有当注意者“无政府”为一具体之名词。其分量与“安那其”相等。犹言无有政府之自由社会。非但排斥政府之意也）。不知者乃疑其名之不当，必欲易以种种支杂破碎之名词，不免庸人自扰矣。

其名既定，义亦随之。“安那其”之定义既如上述，撮要言之，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是也。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一切强权，惟藉自由之联合。满足生活上之需要。而无须乎强权之统治。若是者谓之“安那其”。谓之“无政府”。故无政府主义即反抗强权之主义。凡一切依附强权及为强权之保障者，无政府主义皆反对之。世有嫌“无政府”为不足而以无宗教，无家

庭，无政府（或国家）三者并举。名之为三无主义。又未知“安那其”之真相者也。

一九一四·七·四·

10、答蔡雄飞

（一）问：无政府之实行，各国间必有先后。其先行者难免受他国之干涉否？答：将来无政府之革命，其为一国先举，抑为数国合举，今日尚难预测。然其起事最先者必在欧洲，且必为现在之所谓强国，此则可断言者。以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最广而最速者，实不出乎所谓数强国也。欧洲壤地接近，党人之声气素通。一旦有事，或一国已革命，则欧洲诸国必同时接踵而起。各国政府方自顾不暇，安得有所谓干涉。即使有之，无政府党能抗本国之政府者，独不能抗外来之政府乎？欧洲既纷纷革命，列强次第倒毙，则美洲亚洲诸国亦必相继而起。此时情景，可不必征诸远，但观前年中国之革命，各省皆闻风宣布独立，即将来无政府革命之小影也。故今日最要者莫如竭力传播吾人之思想。待人民具此思想者日多，一旦时机既熟，有响斯应，沛然莫之能御矣。

（二）问：中国改革政治之人物，皆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将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实行，彼等难保其不阻碍否？答：中国今日所谓改革政治之人物，大抵迷信国家主义之政客，尚未足以语国家社会主义也。要之无论其为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均为无政府之障碍。吾人欲实现吾主义，一方面与政府战，又一方面与此种谬说战。必先战胜此种谬说，然后吾主义能得平民多数之赞同；然后人民能推翻政府，然后吾主义能实现。故无政府共产主义实行时，已无所谓阻碍矣。

（三）问：中国人民程度尚浅，共和尚不知为何物，何有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若遽以军队革命，实行此主义，社会上能免种

种纷扰否？答：无政府之革命，乃平民革命，而非英雄革命也。英雄革命，可以三数英雄，驱遣党徒，运动军队而为之，于大多数平民无与也（从前一切政治革命，多属如此。）若平民革命则必由于平民之自觉，以平民自己之实力行之。断非但使用手段，运动军人仓卒起事所能成功者。故吾党第一级最重要之工夫，即为“平民传播”，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所谓平民者，除政府资本家外皆是也。言平民则军队亦自在其中（近世各国皆行征兵制度。中国不久亦必效颦。凡平民皆不免经过数年兵役之苦难。而入伍之前，退伍之后，终平民也。）故将来传播成熟，平民大革命起，军队亦必倒戈而向政府。此时惟有平民革命之大义，不复有所谓军队革命之特别名称矣。然平民革命，须俟传播成熟，闻者必疑其难，不知天下事无所谓难，惟自畏其难，斯易者亦难矣。欧洲二三十年前，无政府主义传播之艰难，与今日之中国等。然党人不畏其难，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至今日则妇人孺子皆知有所谓无政府党，有所谓无政府主义。虽尚未至“多数赞成”之境，然而相去不远矣。今中国之传播，既得欧洲诸先进之成法以为前事之师，已觉事半功倍。况近日世界风潮，汹涌澎湃，为历史以来所未有，其力足以震撼一切进化之障碍。中国虽僻处远东，然直接间接终不能不被其影响。故传播之成效，比之欧洲二三十年前，自当迅速数倍。吾人倘能群策群力，坚忍前进，各相时势之所宜，利用种种手段（或文字鼓吹，或教育补助，或激烈行动。）以为传播。吾敢谓难之一字，当消灭于吾党之传播史中也。

（四）问：中国第三次革命之机熟时，即别竖一帜，实行此主义，各国同志能响应否？答：中国第三次革命，充其量不过军队革命。然非所云平民革命也。凡平民之机会未熟，而欲遽达至无政府，必无由成功。观法兰西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之役，其往事矣（参见民声十四号巴黎之自由市府）。然则传播未熟之时，必不可起激烈之风潮乎？曰：不然，激烈行动，亦为一种最

良之传播方法，如罢工，罢市，暴动，暗杀等。苟有合宜之机遇，随在可以行之。三数日之风潮，能胜于千万册书报之散市。特仍须恃吾人自己之实力以为活动，万不可使用不正当之手段（金钱权位），运动少数军队或无赖仓卒起事，徒足貽吾党之笑柄也。至问各国响应云云。在吾人之意，以为将来世界革命之起点，必在欧洲。以彼中数国传播极广，革命之时机已渐渐成熟故也。然则吾党在中国之工夫，即预备为欧洲响应之实力是矣。若不从事实力之准备，而欲于政治革命中以少数人虚揭无政府之名，侥幸欧洲党人之响应，此则所谓贫子说金耳。

（五）问：各国政府，乘中国之危，屡行其蚕食手段。而各国同志，竟任各国之政府横行，不加阻止。其故可得闻欤？答：各国同志对于各国政府之蚕食中国，无不发指眦裂。吾党各国之机关报，时时攻揭其非，不遗余力。又有反对军国主义之运动，以杀其势。此皆口舌上手腕上之阻止也。至言根本救治，则当言灭除，而不但阻止。如何方可灭除，即运动无政府革命是也。此种革命，固无时不在运动之中。特时机未熟，未如之何耳。须知所谓蚕食手段者。在政府之口中，则有种种美名，曰帝国主义，曰殖民政策，曰……。当其蚕食中国时，中国人深恶痛绝之。然各国之政府，则以为最正当之手段，最光荣之主义也。即中国若一旦达至所谓强国之地位，其蚕食他国。亦必与今日各国之政府无异。此时中国之爱国主义家，或将锡以嘉名，而忘其为蚕食手段矣。然则蚕食手段，实可谓为政府最大之事业，亦为政府唯一之义务。必能行蚕食手段者，方谓之“强有力之政府”，方谓之“国利民福”，方谓之“国家光荣”。是蚕食手段与政府，实为须臾不可离之物。苟一旦有政府，即一日不能免蚕食手段之横行。空言阻止，胡能有济？是故根本之救治，舍无政府革命外别无他道也。吾人不忍中国之被蚕食，则勇猛前进，与各国同志携手而促

无政府革命之成功可矣。

一九一四、七、十一

11、答恨苍

来书曰：予每与友人讨论吾人进行之方法。多数皆主张渐进，而否认急进。非反对急进派之学说，不过以为渐进（即改良派）则手段和平，而措施不尚急迫。及成功时，人人皆能深悉无政府之旨趣，而于无政府社会中之种种布置，必较易为力。若急进派（即革命派）则手段激烈，措施尚急迫。大有以最短期限，达到无政府目的之心理。深恐一般人民，于此短期内，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其个人道德。至成功时不免有布置艰难，甚至大有室〔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故不若舍彼就此之为愈。以予愚昧，对于上述，亦不能定取舍之途，愿有以教之。又民声文字太深，倘能演为白话或浅文，以期普通人之能晓则尤善也。

按时人往往误会“急进”二字之意义，以为“欲于最短期间达到无政府。”此却不然，吾人之所谓急进者，质言之即激烈行动之代名词耳。激烈行动之作用，一方面为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一方面为鼓动风潮，迅速传播；其用意则无非使多数人明白无政府之真理，赞成无政府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中国革命之迅速，人人皆归功于黄花岗之一役，及迭次之暗杀案。此即所谓激烈行动。自此之后，从前之反对革命者，亦不期而附和革命矣。可见激烈行动之效果，真有胜于十万书册之散布者，无政府之革命亦然。若徒藉口舌笔墨之鼓吹，而欲达吾目的，真不知至于何年何月，且敢决其无由达到。故吾人于口舌笔墨之外，不能不更以激烈行动助之。如罢工暴动，暗杀等等。（暴动在欧文为Insurrection〔Insurrection〕并非不美之名。其意犹云突然而起之激烈举动耳。黄花岗之役亦是也。皆可视为传播一种方法者也。然吾人主

张激烈行动，并非遂舍口舌笔墨而不用也。或印刷物，或演说，或教育，或戏剧，以及其他种种。皆为由今日以达至无政府之传播期中不可一日或息之事业。激烈行动则行之于一时，遇有可用之机会，乃始为之耳。且中国目前之情势，此等机会，似尚未至。故吾人于现在最短之时期，当先致力于口舌笔墨之传播。俟吾人之思想渐渐发达，然后再谋激烈举动，以助其进步，似尚未晚也。

更有当注意者：无论如何急进，凡欲无政府之成功，必须无政府之思想普及于大多数，此为不易之事理。特用急进方法，则思想之普及较速耳。来书所谓“急进恐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个人道德。”此实不然，所谓无政府智识，不过如吾所谓无政府思想。而急进则传播思想之最良方法也。至个人道德，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根本论据，以为必社会改良，然后个人道德可以改良。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即都克氏所倡导）适成极端之反对（个人主义，以为必先改良个人，然后可改良社会。）个人主义之哲理，与共产主义比较，孰长孰短，今不暇详论。然试以最浅而易见者言之：如欲人之不争夺，必须衣食富裕。衣食既富裕，自然无所用其争夺。欲人之亲爱互助，必须生活共同，利害共同。否则各怀个人主义，人人各为其私，爱他之念，又从何而生？又如人之偷惰，乃于雇佣制度，职业不自由所致。终日为他人服役，焉得而不惰？若人皆劳动，劳动之结果，即为自己之利益，自无虑其偷惰，而反足以生奋勉之心（今人无论何种职业，无非为强权者服役，而与己无闻。又择业但求多得薪金，而未必己心之所欲。与性之所近。又服役时间太长，为卫生上直接之苦脑。皆所谓职业不自由。皆为令人懒惰之原因。余尝为某学校教师，无权参与全校之改良，徒为上堂领薪之教员，形同雇役，因之教授亦苟且塞责。及自办学校，虽无一文之修金，而教授异常热心。又尝为报馆记者，每日勉强草成若干字，付之手民，

即出而闲游，且觉其苦。今编民声，每日执笔十小时以上，反不以为苦，而以为乐。于此足见职业之自由不自由，与个人勤惰之关系。）凡此皆须共产实行，然后可望实现者也。个人主义之根本论据，远不及共产主义之精确，即在于此。吾人亦研究已熟，乃决主张共产主义，然则吾人之预备工夫，惟在使多数平民，知无政府组织之美善，知无政府道德之自由（劳动与互助）足矣。若欲人人于有政府之世，先具无政府之道德，此可决其不能，且亦不必也。

来书又谓“急进则……至成功时不免布置艰难，甚至大生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此亦无足虑，无政府之成功，必由于平民革命，即大多数平民赞成无政府乃起而革命之谓也。而所以能得多数人之赞成，则由吾人用口舌笔墨之传播。复从中助以急进之方法，乃能得此。急进方法，其用意亦无非在要求多数之赞成。并非用急进方法，即不愿平民之赞成与否，而以少数无政府党仓卒起事，便以命令颁布无政府之谓也。然则所谓成功，必由于平民自己之革命。以平民自己之革命，布置又何至艰难？窒碍更无庸论矣。至所虑不肯工作，避重就轻云云，吾前已屡屡辩之。如无政府浅说，答李进雄，答飘飘以及散见其他各论者，均已解释颇详，请参观之。

来书又指渐进为改良派，急进为革命派，亦微有误会。渐进急进，本无一定之界说。第吾人所论之急进，实指激烈之举动，若改良革命，则别有解释。改良者：即变法之谓。不彻底推翻现社会之组织，而以变法之手段从渐改良之。革命则主张以实力推翻现社会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保皇党之变法立宪，谓之改良。革命党之颠覆帝政改建共和，谓之革命。又社会民主党，欲借议会之力，实行社会主义，是为改良派。社会革命党（法国此党甚盛。其目的则仍不外集产。）不藉力于议会，而欲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是为革命派。今吾人之无政府主义，实即革

命主义，断无改良变法可以达到之理。故近世之无政府党，主张革命者盖十之九也。但主张革命之中，仍有和平与激烈之两种方法。文字教育之鼓吹，所谓和平。暴动暗杀，所谓激烈。和平方法用之于常日。激烈方法用之于一时。各视乎一己能力之所及，与乎地方时势之所宜，取其适者用之可矣。

来书又谓民声文字太深，宜兼用白话或浅文，以期一般人之了解。此说极是，但本报之用意，原为通晓文字者而设。冀于阅者之中，得多数研究有得之人，以助吾人之传播。今日同志寥寥，以极少数之人。置之地积极广之中国，欲期思想普及，岂不大难？然则养成多数之传播家。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故吾人第一期望多数人游学欧洲，或研究西文，直接阅读无政府书报。然力能游学，及通西文者无多。而华文书籍，关于此主义者又绝无而仅有，虽或有志研究而无从。故本报所最注意者，为介绍名家学说，解释一般疑问，及报告世界之社会运动，其用意则无非欲供无政府传播家之研究品而已。其他普通鼓吹，尚须多刊白话通俗报或画报，惜为财力精神所限，一时未能急就耳。

一九一四、七、廿五

12、答悟尘

近来对于吾主义进行之意见如下：

（来书）一劳动者简易识字塾之组织。欧美各国强迫教育已行，人人皆得受初等之教育。读书阅报无甚困难。故主义之传布较易。中国则文字既繁难，贫者复绝不能得丝毫之教育。全国之中，不识字者占大多数。数千年来，举国人民，竟为一二腐儒操纵而左右之。发号施令，愚者盲从，真理公道，未由表见。故欲公理发挥，必使一般劳动者能自觉悟，由真理判断双方之利害而后。以是之故，平民教育，实为首要。吾党处此困苦颠连之境遇，建立学校，虽非易事。然有一最善而易举者，莫如劳动简易

识字塾。其用费甚简，于劳动工毕之暇，使其自由入塾。为之讲解单字，由简入繁，以期其能直接阅读近之书报为日的。

记者按：教育为社会进化之原动，亦为吾人传播之良法。故吾人于此，所当注意者有二：一为科学教育（所谓科学，乃真理的科学。而政治，法律，军事，等无用之学不与焉。）世界之进化，与人类之幸福，胥于科学是赖。顾中国今日学术之幼稚，欲使科学教育发达，非得多数人留学欧美不可。故鼓吹留学，养成多数他日改良社会之工匠。实为教育上之根本大计。李君石曾近日颇专意于留法俭学会之经营，其意即在此也。二为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对于国家教育而言，政府所经营之教育，无论如何，只能得皮相之教育，而决无精神之可言。甚或足为真理之障碍（即如提倡宗教，宗法，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是。）故私立之平民学校最为要务。即来书所谓简易识字塾，亦属此意。顾记者以为当名平民学校，或平民学塾。而不宜曰简易识字塾。盖此种学校，其目的不仅在识字而已也。欧洲平民学校之办法，除教授浅易实用之科学外，尤注重于演讲，戏剧，歌曲等。一方面与以应用之智识，一方面即以传播吾人主义，对于劳动者精神之教育，全在乎此也。中国同志，苟欲委身于此，亦当注意及之。尤当相地方情形之不同，而各异其教法。如在都市或商埠宜予以制造厂工人所应具之智识。在乡落则宜予以农业所应具之智识，其他类此。时间则或半日学，或星期日学，亦各视其地方情形而异。大抵中国劳动社会中，农人及手工家识字者最少。此两种工人，多在乡落而不在部〔都〕市，而乡落中经营此种学校，比都市为尤易，以所费更廉，而得校地亦不难故也。此种事业，吾同志随在皆可为之。其事易举，其功极大。慎勿以为无用而忽之，又南洋美洲华工所集之地，凡旅外之同志，亦宜留意于此也。

（来书）一劳动白话报之组织。资本制度之害，直接受其痛苦而占势最大者，莫如劳动家，吾党对于劳动家之传布方法，第

一劳动者之教育，第二白话报之组织。所以开通其知识而启其反抗强权之决心。彼劳动家终日劳动，兼具朴素诚厚之天性。一闻新社会之组织，未有不乐从而欢贺者也。故悟主张鼓吹之事应注全力于劳动界，若于一般人中传布之，用心虽苦，而终难得一二真同志殷殷以主义为己任也。以彼等正孜孜于吾党反对之事中而讨生活耳。是以有力能多刊白话报，输入一般劳动家，较发刊高深之学理报为要也。

记者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质言之实即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之主义。故吾人传播事业自然不能出乎劳动阶级之范围。断无向敌人方面（富贵阶级）而希望传播者也。所谓富贵阶级与劳动阶级之辨别虽若甚难，然有一最显而易见之点。即凡不劳动而亦能生活者，谓之富贵阶级。申言之则地主，商业家，工厂主，官吏，议员，政客，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必赖劳动而后能生活者，谓之劳动阶级。申言之则农人，手工家，工厂工人，苦力，雇役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家无恒产之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亦属此类。对于前者，吾人不但不希望传播，且当亟谋所以颠覆之。对于后者，则因其人之智识程度各有不同，吾人之传播方法亦当因之而异。就以报章论，对于通文字及稍有教育者，不妨用文言以达较高之学理。对于未通文字者，当用白话或浅文专论寻常社会亲见之事实与道理是也。然劳动社会中，不通文字者实占大多数。故论普通之传播，当以白话或浅文为最要。记者亦久有意于此，特以种种困难，一时未能成就，然固无日不有此事盘旋于脑中。且甚望各地同志之匡我不逮也。除此之外，尚有数法极利于传播者：（专就报章论）一为普通之日报，不必标明吾人宗旨。但每日载入一二段关于吾人主义之记事，或评论，或小说，使阅者于不知不觉之中，浸润真理。必有一旦领悟之日。其功实足与机关报相敌。因机关报固非一般人所爱阅也。二为画报。三为小说。此二者皆借美术文学之趣味，引人入胜。对于向未受吾

人感化之人，其收效视机关报尤胜。四为科学报。无政府主义实为科学之一种，近世最进步之科学，无一不与吾人主义互相发明。故借科学以灌输吾人思想于研究学问之人，及学校之教师与学生，亦比机关报为易入也。总之传播方法，千万门类，不可殚述。惜记者个人精神财力均已受不可伸展之限制。故卒未由实行其一二。是不得不望各地同志，各就力之所能与势之所宜，人人各任其一分，则传播之途，或能以渐开辟，而不至为最狭之范围所限矣。

（来书）一无政府试行地之组织。今之反对我主义者，多谓吾党乃空想而不易实行也。故在今之世，非有一试行之组织，不足以启世人之迷，是不得不以集资购地为入手之办法也。

记者按：试验地之举，倘能办到，固亦甚佳。然其中种种困难，不可殚述。况处现政府之下，吾人在内地者，一言一动，尚须秘密，遑论所谓试验地乎？

（来书）再，女子性质，似胜于男子。故传播吾主义，以女子为尤宜。在儿童之教育，亦有最大之效力也。记者按：男女性质，各有长短。女子性质胜于男子之说，今姑可以不论。但女子同为平等之人类，其地位与男女〔子〕相等。故吾人论事，无论对于何种社会，均统男女而言，不应置女子于例外。（即如上文所论之劳动家，亦统男女言之。）且儿童教育，于母教为尤接近。则今日为传播吾人主义计，自当同时注意于女子，更无疑义。因之女子教育，亦不可忽。惟吾人所当知者，今日之女学，其入学者大抵富贵社会之女子占大多数耳，于劳动阶级无与也。故苟经营女子教育，当以平民女学为急，即上文所论对于劳动家之平民学校之一种也。

一九一四、七、廿五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附录二：刘师复著《好世界》文选^①

起！起！起！

起——起——起——

起来收回你的东西！

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你的东西！

你不很穷吗！你作工不很苦吗！

你为什么很穷！为什么作很苦的工！不是你没有钱用吗！

钱是谁的！是财主家的么！是财政总长的么！是银行的么！是督军的么！是那万恶政府的么！不是。一定不是。他们都没劳苦一点、去开银矿、金矿、铜矿。他们也没有去种地、织布、建筑楼房、作种种的木器、铜器、瓷器。这些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一切东西、一切金银、都是我们工人造的、开出的。所以我敢大声的说。“一切东西都是我们工人的”！

我们有很多、狠多的东西。被什么财主督军、总裁总长、给硬抢去。他们享那很快乐和幸福、我们反来受穷！吃苦！真正冤死了！气死了！

来呀！来呀！我们不必怕他们。也不必打死他们。只要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就完了。但是他们未必肯善心的还给我们。所以要“一齐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也该我们享享幸福了”。

来呀！来呀！一齐起来收所丢的东西来呀。你不要羞、不要愧。这是应当的事。谁的东西、谁拿回去享幸福、这不应当吗？起。起。起。大家一齐起呀。

注：①此件载于1920年10月出版的《好世界》，作者为刘师复。

沿用原标点。

平等之真谛、无阶级而共产也。

自由之真谛、灭强权而无政府也。

博爱之真谛、废国家而大同世界也。

此三者完全实现、则是极乐之光明世界。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交通部等查禁《救世音》印刷品有关文件

（1921年12月—1922年1月）

（1）交通部咨（12月29日）

第一七〇八号 咨

交通部为咨行事。本年十月间，据邮政总局转据湖南邮务长报称：扣留具有煽乱性质之印刷物一百三十七件，已送警厅办理等语。呈明鉴核等情。即经本部以此项含有煽乱性质之印刷物件，嗣后如在不服从中央命令之各地方查出时，应由当地邮局体察情形，呈由该总局转呈本部核办等语。指令该总局转行遵照办理在案。兹据呈称：据广东邮务长呈到刷印物一种，题为《救世音》，系由人道学社出版，计五十本，自汉口寄广州东鬼基永曜坊瑞记洋货店陆松转陆英明收。九十九本包皮失落，均系提倡无政府主义。合将原件呈送鉴核等情。附印刷物一百四十九本到部，除留存一份备案外，相应将原呈附件一百四十八本，送请贵部查核。此咨

内务总长

附印刷物一百四十八本

交通总长叶恭绰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 内务部密咨稿 (1月14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准交通部咨开：〔咨文见前件〕等因。并附件到部。除咨复交通部并分行外，相应咨请查照转饬所属，如查有前项印刷书件，及类似此种印刷品，务即依法切实办理，以弭隐患，而维治安为要。并希见复。此咨

各省省长

各都统

除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淞沪护军使

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 日

附录：《救世音》文选

1、人道学社约章

名称 人道学社。

宗旨 安那其主义。

纲目 纲一：消灭阶级。目：（一）贫富（实行共产）；（二）贵贱（尊重个人）；（三）智愚（教育平等）。

纲二：破除界限。目：（一）国无远近；（二）家无亲疏；（三）教无迷信。

事业 分鼓吹、进行、建设三种。

一、鼓吹（杂志、书报、演讲等）。

二、进行（随时势用种种方法，铲除一切障碍）。

三、建设（产儿院、幼稚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等）。

入社 凡能了解宗旨，信从纲目，遵守戒约者，由社中人介绍宣誓后，得入本社。

戒约 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教，不

称族姓。

如遇有外界之压迫，得以暴力抵抗；用暴力时，得解除戒约，或为官、或为兵、或从事于各种事业，竭全力以谋本社事业之进行。事平仍遵纲目，守戒约。

干事 入社者自由担任。

机关 设交通机关于支那各地，由社中人分设之。

附则 本约章得于大会公决修改。

2、人道学社启事

本社承上海、广州、长沙各同志共捐助洋念四元，又天谷老人捐助印费洋叁拾元。谨此志谢。如有热心救世者愿予乐捐，不论多寡，无任欢迎。其通信地址，原无一定，请问同志便知。

介绍安那其主义的书报

适社意趣大纲	非卖品
告 少 年	三分
红 潮	三分
世界 军 人	三分
味爽轩一夕谈	二分
安那其粹言	五角
极 乐 地	四角
人 声	五分
新学社丛刊	八分
克氏思想	二角半
自由杂志	八分
夜 未 央	二角半
安那其讨论集	二角
民 声	非卖品
真理丛刊	四分

社 会 运 动 一 分

如欲购以上各书，请通信重庆适社收转柴和甫，或迳向人道学社初明君便得了。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京师警察厅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人集会 讨论为黄爱庞人铨开追悼会等情呈

（1922年3月30日）

敬呈者：前奉交报告一件内称：三月十八日有无政府党人在西城翊教寺街平民学校内开会，讨论为长沙工人黄爱、庞人铨开追悼会，并同时为改组社会之讨论，设立北京安社，编辑《社会运动》半月刊，暨安社宣言等各种印刷品等语。查经由厅通行各区队严密侦查，并行知检查邮件各员，对于此种印刷品一体查扣，以遏乱萌在案。兹据内右四区呈称：翊教寺街二号旁门平民补习学校，曾于三月十八日有该校教员张纯、易介一及北大学生刘果航等开会，讨论为黄、庞二人开追悼会。除天津已于十二日开会外，北京定于四月二日开会追悼等情。具报前来。除指令该区飭警注意，并令行中一区署对于北大第一院学生行动特别注意，密探有无开追悼会情事，会场设在何处，迅即查复核办外，理合呈请察核。谨呈

京畿卫戍总司令

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谨呈

三月三十日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

戴德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人组织世界语学会及活动情形致夏宪藩呈

(1922年6月5日)

为报告事。窃查无政府党人月前层〔曾〕在西城兵马司南搭连胡同设立世界语学会乙所，已有学生六十余人，均为专门学校学生投入补习者。所有经费乃发起人每月捐助乙元，学生收费五角。今有无政府党李〔陈〕声树、陈空三、冯懋及俄国人二名主持校务。盖名为造就世界语人才，实则传布贯输党义也。奈近因经济困难，日见零落耳。兹有该党陈廷璠（北大学生）新由莫斯科回京，据其报告经过情形略谓：俄国劳农政府行政不辘〔彻〕底改造，揽权者多为武断利己之人。故现象非常纷乱，平民流离失所。今更擅变最初之共产制而行共和法。前在华境招集胡匪约二万人，本拟驱之与日本作战。今因改变政策，竟与日本相和，故所招来之胡匪一律否定。而该胡匪等尚留住于俄境，计有枪枝弹子万余，马匹数千，机关枪、大炮亦有少数也。伊等困守俄境，饷食无倚，若与该首领联络，率之回华，乘奉直战事未终，黑吉无备之机，大可占据地盘，从事提倡共产，风行中国；再约陕西邓〔景〕梅九，四川萧汉章，山东张民权等，率匪同时响应，或可成功。云云。后有吕傅周、陈德荣、郭憎恺等计议，若率之作战，宜用自治军名义，以便联合高仕侯及直军等夹攻三省，较为势大，幸得事再施行主义。云云。最后多人俱恐胡匪脑筋毫无共产主义之智识，将来成功亦不过造成匪首为督军，徒害人民而无益党政。且据内地同志报告，联络军匪之事不甚得手，是恐徒劳无功。今宜派同志数人到俄劝之恢复向来事业，而同志亦加入与之共同行动，实行感化主义以待时机也。多数赞成，近预备筹款前往耳。又日前因欢迎

日本来华之共产党人近藤光及高丽人李丁奎、李丙奎等，层〔曾〕在世界语学会内开茶话会，计到会者有俄人一名，及无政府党朱谦之、陈友琴、刘果航、吕傅周、陈声树、关益之、陈德荣、冯省三、陈空三、郭僧恺等十余人。首由华人致欢迎辞，并陈述中国无政府党各地情形，继则日韩两国人致谢，并历述日本之与各国恶感俱为贵族军阀一种特殊权利造成，而乡民不与也。是以希望青年互助。又报告日本自大杉荣、片三荣等提倡共产主义已二十余年，今各地均有同志猛进以求改造，恐不久日本就放光明实行亲爱也。至李丁奎略谓：高丽全国民俱存恢复国土主权之心，故不惜牺牲以谋解放，最望中日韩之青年大同盟携手进行。又述韩地经过之历史毕。互相闲谈共拟适中地点开一大会，先向本国同志磋商，以谋实现。议毕各散。……近查各方面并未出何等印刷品，惟有无政府党扩张安社社约（附呈）及所得消息^①，谨此报告。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载 德 谨呈

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五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国务院等关于王怀庆请制定取缔“过激党人”

专 条 的 文 件

（1922年11—12月）

（1）国务院公函 （11月1日）

国务院公函 第二千二百八十一号

迳启者：奉大总统发下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呈防止过激党

注：①安社社约缺。

人煽惑酿乱，请飭速订取缔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及代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各条文一件。查所请飭订取缔过激党人各条，自系为防遏乱萌，用意至密。但过激主义只能为无形之消弭。如原呈中所称根本解决，端赖自身政治之清明，洵属探原之论，倘特订专条，著为法令，反足激起暗潮，无裨实际。应由贵部暨教育部会商根本办法，无形取缔。除一面仍函知王总司令飭令所属随时防范外，相应抄录原呈函达贵部查照核办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呈为防止过激党人煽惑酿乱，拟请飭订取缔惩治各专条，以资遵守，而保治安，恭呈具陈，仰祈钧鉴事。窃维国家之统治权必属政府，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人民无保障，偃偃假扰，亦遂无良好之社会。此无政府过激主义，欧美各国皆以有碍国家社会之公安，严为防遏也。自俄邦内讧，过激潮流澎湃中土，首都重地竟有散布刷印传单、书册等件，煽惑劳工，主张共产，反抗政府者。彼其意以为政府为资本家之保障，必废政府而后资本家失厥凭依，彼党始可横行而无忌。此种论调青年学子喜其新奇提倡之，暴烈分子因而利用鼓吹之，劳动与穷蹙困极思奋附和之，兹漫浸淫，浸及各省。昔者社会主义流派滋多，至于今日则已变本加厉。然克鲁泡特金所谓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之论，即马克思派亦反对之，胥其为哲学之空谈。故乌托邦虽类大同，而法兰球徒存理想。况列宁试验殷鉴非遥，可知邪说波行过洪水猛兽万万也。彼党之指摘，无非谓不良之官僚造成不良之政府，故当废政府以求人民之幸福。虽然不良，改良可耳，甚或改造焉可耳。今乃欲举政府而无之，譬之于人恃衣食住三者为生活，悬鹑垢敝之衣，糝糠腐败之食，漂摇罅漏之居，诚足以斫身而殒命，然求完褐、求精凿，求安宅斯已矣。而曰是当废衣食住而后可有

是理哉！无政府主义何以异是。怀庆武人不知学说，顾以事理推测，彼党之揭橥者，曰平等，曰自由，曰求人民幸福，而其结果适得其反。夫大小多寡、长短轻重之殊，高卑强弱、贵贱智愚之判，天然之阶级由来定矣。而贫富之问尤甚，有时贫者且赖富者之互助焉。故有政府以保障之，而富者乃能为贫者之后盾。果如彼党之指，强夺富者以与贫者，富者不甘必争，贫者骤富恃而羨者又争，争必掠卤屠僂，彼此展转，仇杀无已。是富者既贫，贫者愈贫，而其最大权利则尽归彼党之掌握，人人仰彼党之鼻息，事事为彼党所劫持。平民土苴，彼党神圣，平民为狗，彼党刀砧，暴徒专利之淫威，良懦流血之惨剧，适成其最不平之现象而已。盖其所谓自由者，彼党之自由，非人民之自由也。所谓幸福者，彼党之幸福，非人民之幸福也。迨至此则堕于盗贼世界、禽兽世界，无丝毫秩序之可育，不特无政府，并亦无社会。而外人以保护其侨民之故，或藉口放债务之关系，必将以外力乘间侵入，或占领代治，而吾国乃真万劫不复矣。夫官僚不良，政府不良，祸之暂者也，茹苦含辛，尚有来日挽救之希望。若道德沦丧，社会不良，其将何望乎？故怀庆之愚以为激党革政府之命罪小，革人民之命罪大，革法律之命罪轻，革道德之命罪重，此而不惩，惩而不严，将何以保障人民，保障道德乎。惩治之法虽可属于内乱罪范围，然不别订详细专条，严重取缔，恐不足以资制止。比来各省兵变与夫同盟罢工之举，日有所闻，难免非彼党之煽动。怀庆每与京师军警长官议及，皆以布尔萨维思姆主义之宣传近益加甚，无不怒然忧之。查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怀庆曾呈请政府飭拟此项取缔专条在案。今则星火之势渐将燎原，及兹不图，缓且弗逮。用特重申前请，拟请飭下院部速订取缔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及代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各条，提交国务会议及两院议案通过，即以教令颁布遵行，则国纪人道庶乎有豸矣。抑再有陈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民之意甚于防火，根本解决端赖政府

自身之清明，则民气帖然，蛊惑者即无由而起。否则，日日防激党，日日制激党，前途忧患，诚有不堪设想者。此又在政府彻底之觉悟，非怀庆之所敢论列也。京师系全国之观听，而万方辐辏，不逞之辈最易孽牙于其间。怀庆负京师治安之责，为京师计，不得不为全国计，故不憚其词之琐渎。所有拟请防止过激党人取缔取缔惩治各项专条缘由，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施行。谨呈
大总统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

(2) 教育部公函 (12月21日)

教育部公函 十一年函字第四六七号

迳启者：准函开：关于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呈请防止过激党人一节暂无庸议，本部自应赞同。除会画外，应将原稿并附件送还，即希查照办理。等因到部。此项呈文现经缮就，相应函请查照会印发还，以便呈递。此致

内务部

附呈文一件〔缺〕 呈稿一件 国务院函附件〔缺〕

教育部为咨呈事。案准公函内开：奉发下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呈防止过激党人煽惑酿乱，请飭速订取缔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及代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各条文一件。查所请飭订取缔过激党人各条，自系为防遏乱萌，用意至密。但过激主义只能为无形之消弭。如原呈中所称根本解决，端赖自身政治之清明，洵属探原之论，倘特订专条，著为法令，反足激起暗潮，无裨实际。应由部会商根本办法，无形取缔。抄录原呈函部核办等因。并附抄件到部。承准此。查过激党派之肇兴，原根于社会阶级不平之心理，最上消弭之法，自以澄清国家政治，调剂人民生计为先；其次则关于国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既有官厅依法查察，当可先事

预防一切，固无再行商订取缔方法之必要。否则，防遏过当，更启反动，恐于国计民生益多妨碍。睽孤已甚，革象斯成，清政未流，殷鉴不远。所有会商另订取缔过激党人各条一节，应即暂无庸议。再，此次会呈系教育部主稿，会同内务部办理，合并陈明，伏惟监察。为此咨呈

国务总理

署教育总长

署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 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国务院关于批转王怀庆呈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无政府党人集会活动情形公函**

（1922年11月14日）

国务院公函 第二千三百八十八号

逕启者：奉大总统发下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等呈称：前以党人宣传过激主义，曾经呈请飭订取缔专条在案。顷据报告：本年十一月七日，竟有青年学子开会，公然主张俄国式革命暨无产阶级革命，若再不加干涉，深恐祸在目前。拟请飭交院部核议办法，以遏乱萌。附报告一件等因。查该总司令前呈请订取缔过激党人及禁止运送物品发行文字各专条，业经分函贵部暨教育部会商根本办法取缔在案。兹准前因，除分函教育部外，相应抄录原呈并附件函达贵部查核并案办理可也。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敬密呈者：窃怀庆前以党人宣传过激主义，任意煽惑，恐酿

巨祸，曾经呈请飭订取缔专条，以资遵守在案。本年十一月一日承准国务院公函内开：迳启者：奉大总统发下贵总司令呈防止过激党人煽惑酿乱，请飭速订取缔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及代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各条文一件。查所请飭订取缔过激党人各条，自系为防遏乱萌，用意至密。但过激主义只能为无形之消弭。如原呈中所称根本解决，端赖自身政治之清明，洵属探原之论，倘特订原条，著为法令，反足激起暗潮，无裨实际。应由内务、教育两部会商根本办法，无形取缔，一面仍请飭令所属随时防范，除函内务、教育两部外，函达查照可也。等因。承准此。自应遵照办理。惟查近来京师地方过激党人之潜势力日见澎脹〔胀〕，鼓吹宣传愈演愈烈。顷据报告：本年十一月七日为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是日竟有青年学子麇集四五百人开会庆祝，散书册、传单，即以学校肄业之所为宣讲过激机关，且公然主张俄国式革命暨无产阶级革命，勉励同党努力奋斗，崇拜苏俄实行改造。似此情形若再沓泄放任，不加干涉，深恐党人将由演说手段进为实行时期，洪水猛兽之祸，即在目前。怀庆等负有地方治安责任，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拟请大总统飭交院部核议办法，以遏乱萌。除飭军警随时防范外，理合抄录报告密呈钧鉴，伏乞大总统训示施行。谨呈。

附报告呈一件

京畿卫戍总司令 王怀庆
步 军 统 领 聂宪藩
京 师 警 察 总 监 薛之珩

抄录报告

一、据报称：于十一月七日下午二时，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苏俄共和纪念日讲演大会，此会名为中俄协进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所发起，实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人李大钊、邓仲澥、

刘仁静、杨廉、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毛一鸣、阮永钊等所主办。闻是日发布之传单、小册子等印刷品，亦有苏俄来华代表团助洋二百元，藉以联络学生对俄同情，而鼓吹其共产主义也。查是日共有四五百人莅会，由青年团中人为招待员及散放纪念号之传单。场中悬一“全世界劳动者快联合起来啊”横联，届时由李守常（即李大钊）为主席，宣布开会并陈述苏俄纪念日即俄国劳农政府前五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历史，并论中国应仿行俄国革命，实行劳农专政，以打倒军阀、资本家及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而与苏俄携手进行之必要，故庆祝纪念日引起吾人之感化云云。继续演讲者有北大教授陈启修、谭仲达等，俱言中国不平等，不自由之现状，非联合起来努力奋斗实行改造，不足以解放而共享幸福等等论说。最后为奏乐、摄影及电影等事，六时散会。查北京现有组织之团体为革命运动，而足以扰乱社会，图谋破坏大局者有二：（一）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信仰克鲁泡特金学说，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然组织，自由契合，而为大同主义者之宗旨，欲推倒政府为无政治、无法律宗教一切束缚之理想。但北京方面，该党缺乏经济之辅助，势力非常薄弱，人数亦在二十余名。虽比较为最激烈之党，亦无所施其能，为〔唯〕仅有时发出少量之印刷品以资宣传耳。如景梅九之《国风报》，冯省三在《时言报》副刊及陈空三、陈德荣、王伯时、吕傅周、刘果航、陈声树等所发之《社会运动》半月刊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及组织世界语学会等消极行为也。（二）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过激派之集产党，信仰马克思学说，仿行劳农专政，预备创设劳农政府，集权、集产于一般劳工会，如苏俄现状然。专鼓动工人罢工及利用群众运动，以掀起大风潮为手段，其近来进行甚为速顺。其号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部，设于上海，以陈独秀为首领，由俄国政府汇款及陈炯明捐助为活动上之财源。现北京方面，各校中以北大居多数，共有党员三百余人之多，并于政治上极力活动，且在各团

体及工会积极扩张势力。近顺潮流，组织民权、女权运动大同盟、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俄协进会等团体，如请愿国会宪定劳动立法，更组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会，以引起劳工、平民之同情。对于各处罢工之事，必派人到场鼓吹，并代为拟文筹画一切。今累发文言攻击政府、军阀资本家，并力谋中俄携手，攻击外交界为亲美派，而不赞同不与越飞会议。默查该党潜势力日渐膨胀，将为大局之害。闻其中央执行部联络一般学界如胡适、李石曾辈，进行其所谓“好政府”之预备也。北京青年团其主要人为李大钊、张国涛、邓仲澥、罗章龙、邓飞、何孟雄、刘仁静、杨廉、郭春涛、宋天放、李敏襄、范鸿勛、阮永钊、朱务善等把持事务。以上该两党大略情形，合亟报告。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而保公安。此令。

大总统印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七日

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刘师复为政府解散社会党及枪杀陈翼龙发表

《政府与社会党》文

(1913年8月27日)

政府与社会党 师复

La registro kaj la socialisto

去年十二月间，新社会党发表未及一月，即被袁世凯下令解散。至本月四日，中国社会党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逮枪毙，袁氏复下令解散全国社会党。先后八越月间，以大总统命令解散社会党者二次，斯诚支那共和国惟一之特色，足以自豪于五洲万国而有余者也。

去年被禁之社会党，其宣言含有无政府的意味，以无政府之影，见恶于政府，所谓罪有应得，无足为怪。若中国社会党者，其党纲则赞同共和，其章程则规定不妨害国家存立。当去年新社会党被禁时，其首领曾遍布宣言，自称其党宗旨正大，手段稳健，袁总统所赞成，赵总理所保护。据此云云，已足见其党领对于政府之忠顺，当不至为政府所嫉忌。乃曾几何时，终不免大总统之震怒，而受解散之处分，斯岂其党领之忠顺尚有未至耶？抑社会党之名词固非有政府时代之字典所应有耶？

真正社会党决非政府所能解散，而中国社会党则固吾人所不能遽认为真正社会党者，即解散又何足惜。特以蚩蚩愚氓所醉心垂涎之集会自由，曾用寸许之大字端端楷楷写在所谓约法之上者，

其价值不外如是。吾人于此，当亦可以洞见政府之与人民，法律之与自由，固纯然两不相容之物，而勿复再作政治神圣之梦想矣。

袁氏之禁社会党也，根据于军警执法之宣布，曰陈翼龙拟以猛烈手段对待政府，计与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起事。曰拟，曰计，曰图，均非有事实发现，是否为共和法律所能干涉。又陈氏即有罪，应否牵连及于全国之社会党，在好谈法律者尚不难振振而有词，但吾人素不惯与政府研究法律，故对于此等问题，均不欲深论。惟读袁氏之命令，真有令人捧腹而不能自己者。袁氏之言曰：社会党……并非文明各国研究学理之社会党可比。袁氏自谓能悉外情，亦知所谓文明各国者，均有社会党之类时时大张旗鼓，亦明知禁社会党之恶名，将贻笑于万国，乃不惜设身处地，为所谓文明各国者下一转语。意谓各国之社会党，不过研究学理，非有异志，故各国政府能容之。若中国社会党则大逆不道，不可同日而语，故禁之亦不得为专制。于此足见袁氏尚时时存一所谓文明各国者在其心目中，凡事皆欲攀跻于文明各国之林，而不敢迥然独异，此诚吾人所钦佩不已者。独惜袁氏眼中所见文明各国之社会党，尚有未尽。袁氏以为各国社会党惟许研究学理，独不知今日运动罢工，明日提倡暴动之社会党遍于欧陆，亦得谓但研究学理否？所谓文明各国亦曾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不知各国社会党之外，尚有所谓无政府党，皆公然集会，宣言反抗政府，各国亦皆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听者苟疑吾言，则记者虽陋，斗室破麓中，尚有法文、英文之社会党、无政府党报纸数张可质证。满纸非运动罢工，即鼓吹暗杀，某处为无政府党之机关，某日为无政府党之大会，其大逆不道，不知视陈翼龙何如？而英、法之政府，固未闻以军法枪毙其党员，封禁其报馆，而解散其机关也。袁氏欲学文明各国而不能尽肖，此则吾人于钦佩之余，不能不继之以失笑者矣。军警执法处之宣布谓：大总统交查

社会党首领陈翼龙勾串外国党纲，妨害邦交一条云云。党纲而可以勾串，勾串党纲而至于妨害邦交，尤为千古未有之奇闻。袁氏幕府多才，措词之陆离光怪，令人如入山阴道上自不暇给，真不能不叹观止矣。

附注：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之别，时人往往混淆，今特附注明之。未革命之前，中国无所谓社会党也。去年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成立时，江亢虎始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上海。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制限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据此八者，实无异一普通政党，殊无取名社会党之价值。惟彼党宣言，不自认为政党，不运动选举，不谋握政权，且间或宣言赞成无政府主义。然既不入议院，不握政权，试问所谓改良法律、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党纲，将从何实施乎？既赞成无政府，又安得有所谓赞同共和、专征地税等等政客话头乎？党纲与宣言，自相矛盾，至于如此，则其内部实力决不能巩固，盖有必然者。及去年十月，该党开联合大会于上海，一部分主张政府社会主义（俗称国家社会主义）之党员，提议改为政党。一部分主张无政府主义之党员，又提议删改党纲，期合于真正社会主义，争论至烈。党领乃为调停之计，于章程中加入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及党员得以团体或个人从事政治之活动二语。其矛盾乃视前益甚。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其界说若何，虽不得而知，然吾闻各社会大家及各国大词典所下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而以生产之机关属之社会之谓也。今所谓纯粹社会主义，无论属何学派，想必不能出乎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社会之定义。社会二字，即为个人及国家之对待名词。然则国家存立范围内，安得有所谓纯粹社会主义乎？且其党纲之赞同共和，专征地

税，破除遗产，（而不主张共产）限制军备，（而不主张废除军备）等词，果得谓之纯粹社会主义否乎？至党员得以团体名义从事政治之活动一语，尤与不认政党、不运动政权之宣言相违戾。欲取调停，而自忘矛盾，其不满人意，固有由也。以是之故，大会既毕，两派终不能复合。愤愤（即沙淦）等乃出而别组一党，名曰社会党，而无中国之名。其党纲目有六：一、消灭贫富阶级（实行共产）；二、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三、消灭智愚阶级（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此等党纲及其组织，吾人亦多未能满意之处，然比较上视中国社会党为较善矣。此党发表未及一月，袁世凯即据侦探吴天民之报告，下令解散之。于是呱呱堕地之社会党，名义上遂不能公布于内地，惟于上海设一交通机关，（法界大马路卜邻里口四百七号）进行上尚未有何等之表见。最近始发刊一机关月报，名《良心》，始出第一期耳。若中国社会党，其本部亦在上海，（英界大马路福康里口），《人道周报》为其机关。据所报告，支部已有四百余处，党员达五十余万。然吾料所谓五十余万之党员，不独深明社会主义者绝无而仅有，即求能了解其党之党纲者，度亦不及万分之一也。最近被杀之北京支部干事陈翼龙，政府谓为图谋内乱，其是否不可知。惟谓北京为其本部，陈氏是其首领。又谓其党纲三条，此则尚未知该党之真相者也。今因论总统下令解散社会党事，遂附叙中国社会党与社会党之沿革历史及其现状如此。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太多的市场,而革命之说正方兴未艾。以至有人说,梁启超当时几乎不敢在东京露面。加上这时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孙中山一派革命者及大量留日学生深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热潮感染,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自然更为浓厚。但是,由此而影响到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竟然很快变得不那么合乎人们的胃口了。

3. 大风起兮云飞扬

任何一种思想潮流的生成和激荡,总是和特定的环境与条件分不开的。

1906年,据日本警视厅统计,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已经达到大约25000人,其中仅东京一地就达到14000人。同年,日本社会党正式成立,党员数达200人,数月间就增长了十倍。这一年3月发刊的《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即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考茨基的《恩格斯传》,以及介绍第一国际历史的文章。随后的几期更广泛译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倍倍尔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论》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哲学》等。该刊还同时开始介绍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两大对立派别的政治观点。同时,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开始公开鼓吹“直接行动”,坚决反对合法斗争和走议会道路,力主用总同盟罢工的方法来争取社会主义。至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气氛明显加强。至1907年,日本的同盟罢工比上一年骤增四倍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更进一步发生分化,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一派社会主义者日益表现激烈,以致于逐渐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50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这种激进情绪，强有力地影响了这时在日本的相当一批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这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已经达到近万人之多。孙中山和革命党一同盟会迅速扩展到上万名会员，其中在日本者占相当比例。由于中国革命者几年来已习惯于从日本接受进步的思想武器，因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倾向很快就和中国革命者及其激进青年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中国的革命者和青年学生经常地出席日本社会主义党派组织的各种会议，日本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参加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和团体。对进步和革命的共同向往使得中日两国激进青年相互支持，共勉共进。两国进步报刊上不断可以看到人们互相鼓励，并祝福对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鲜花怒放”的言论文章。

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耳濡目染，不能不导致中国一些社会主义崇拜者也逐渐随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而在观点上出现分歧。还在1906年，鉴于同盟会内部因厌恶专制、崇尚自由，及感兴趣于彻底的革命手段，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渐渐多起来，孙中山就公开表明过自己的态度。他宣称，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所谈之神仙世界。吾对神仙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①。《民报》也为此专门发表文章，主张大家认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文章说：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有三：“第一，无政府主义在废灭政府，而社会主义则在利用政府也。”“第二，无政府主义无论于何国家，皆轻蔑政治、破坏法律，对于政府企为阴谋；社会主义则服从法律，维持善良之政府，尊重生命，且为政治运动者也。”“第三，无政府主义之事业，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册，第209—210页。

蔑视法律之绝对的自己主义也；社会主义之事业，则平和而有秩序且博爱者也。”^①很显然，孙中山等人不打算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进一步推进到更为激进的程度上去。他们甚至立即开始考虑把他们的“民生主义”同那个太容易让人引起联想的“Socialism”之间的等号抹去^②，以免他们的会员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只接受由孙中山所作出的解释。不过，思想这个东西并不是靠一两个什么权威的解释就能让人接受的。不管孙中山怎样设法让他的同志们忘掉对于社会主义的责任，在1907年，强大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使孙中山的劝说相形见绌。

1907年6月，同盟会成员刘师培、张继等模仿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形式，在日本开始筹划建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同月，刘师培首先以其妻何震等人的名义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专门宣传社会主义的中文报纸《天义报》。两个月后，即在日本社会主义者两派组织的最后一次联合努力——社会主义夏期讲习会宣告失败之后，刘师培等90多个中国知识分子和部分日本社会主义者，于8月31日，在日本社会主义讲习会举办的地点，宣告成立中国社会主义讲习会。这个讲习会公开地站在日本社会主义所谓直接行动派幸德秋水等人的一边，并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它的首次会议就专门邀请了幸德秋水来演讲无政府主义。此后，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因日本政府镇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讲习会改名为齐民社，性质依旧）几乎每月都要举行一至两次公开的讲演，分别由刘师培、张继、景定成、章太炎和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及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联合宣

① 梦蝶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民报》第7号，1906年9月。

② 民意：《驳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1907年3月。

讲。这种公开宣讲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每次都有数十人甚至近百人参加。它不可避免地对当时在日本的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和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反，自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崇信者中间造成了信仰和观点方面的分歧。

刘师培等人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与孙中山等人有着鲜明的区别。他们开宗明义即主张“社会革命，不仅恃罢工也，必合世界劳动者为一大团体，取资本家所有之财，悉占为己有。”进而，他们更明确提出，他们的目的“不仅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①。断言：“今日欲为人民谋幸福，舍实行无政府制度外，别无改造世界之方”^②。为此，他们公开批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放弃一党一己之私利，其革命结果必然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实不过“以暴易暴”。在刘师培等人看来，人类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实行“共产主义”，这就是：“扫荡权力，不设政府，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刘师培还在这里为人们描绘了一幅颇有些田园诗般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图画。到那时，世界上不再有国界，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就划为一乡。每乡都设有养老院与幼儿园，凡新生儿与年满50岁之人，都将受到赡养。儿童6岁开始由老人教授一种世界语，10岁以后至20岁半工半读，20岁以后开始参加工作。从20至50岁之间，根据年龄增长和体力及智力的发展，将依次从事重体力劳动到专门性技术工作等不同职业。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均可用于学习和娱乐。他相信，这种“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

①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报》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②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第8—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均”的生活方式,就是“适于人性”,“合于人道”,“合于世界进化之公理”并“泯世界之争端”的“大道为公之世”^①。只是,在刘师培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不能有自己的生活,不仅吃的必须一样,穿的必须一律,住房的面积大小不能有任何差别,就是工作程序及其种类,也不能根据个人志趣和爱好而进行选择。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过用自由之权,必与他人之自由发生冲突,与人类平等的原则相违背,“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可限制个人之自由权”。不过,在那个社会里,“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那样就有那样,要多少就有多少”,“不独吃饭不要靠人,还天天都有好饭吃,还有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玩”^②。这对于当时物质生活水平十分落后,而头脑里充满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毕竟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与刘师培同时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张继,几乎立即就被这种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陶醉了。他在1908年前往法国,广泛了解法英等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向还在日本的同志们传送其经验。有一天偶然打听到在法国西北部森林中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地,他当即毅然决然地赶赴这个叫鹰山的共产主义村,参加了进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诚心诚意地在那里开始了以卖菜为业的共产主义生活^③,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者。

也许,法国本身就是一个更适宜激进思想生长的土地。象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激进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

① 中叔:《人类均力说》,《天义报》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② 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报》,第8—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③ 见《衡报》第8号所载张继自法国来信谈他加入鹰山共产村(应为6月底)并以卖菜为业的情况。

54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这时在法国都有着十分活跃的表现。特别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法国工团主义,这时更处于它的“英雄时代”,“直接行动”的口号几乎响彻法国的上空。象在日本一样,在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脱成为这种最时髦的社会思潮的崇尚者的命运。历史在法国和日本上演着几乎是同一幕文明戏。1905年,作为《警钟日报》主笔的刘师培还是一个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坚定反对论者,一年之后,到日本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被日本的激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俘虏了。无独有偶,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作为中国著名富商和大臣之子,以驻法使馆随员身份,竟也在法国无政府主义熏陶下投身于无政府主义宣传事业。就在刘师培等在日本创办《天义报》后不足两周时间,张静江、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不约而同地也开始发行具有同一性质的《新世纪》周刊,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随后,他们又创办世界社并发行《世界》画刊,介绍和宣传法国和世界的工人运动情况,其第一期就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各国工人纪念和罢工的情况。

由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混杂和主办者主观上的一些原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不象刘师培等人具有较为系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对自己思想中的转变的过程有过明白的交待。他们说:“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只是由于外界刺激引起良心之进化,才转而相信社会主义及其无政府主义。他们表示,他们之相信社会主义只是因为看出,“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①。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于进化

^① 民:《与友人书论新世纪》,《新世纪》第3期,1907年7月6日。

互助的思想尤为重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然而，要达到无国界、无政府等等，在李石曾和吴稚晖等看来似乎不象刘师培等人看来那么简单。刘师培等人的办法是直截了当的，那就是“运动农工”，组织劳工团体，罢工、抗税、诛民贼以“覆政府”。而李石曾等人几乎对所有方法都感兴趣，同时对所有方法都不那么具有信心。理论上，他们在进化互助思想的影响下，更看重通过教育启发群众的互助进化本性，使人人均知公理。他们认为，只要如此竭力鼓吹，“使信者日众，以渐达于大多数赞成之境，则强权不待排而扫地矣”^①。因此他们对无政府革命的概括是：“革命者，改良之谓也，进化之谓也，由不善而至于较为善，由不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面宣称主张无政府，一面却又相信实现无政府只能渐进而不能躐等；一面批评革命党只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一面却断言革命党所行之事“正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相合”，双方只是“行程之有远近而已”^②。这样，当在日本的刘师培等人逐渐与孙中山等分道扬镳之际，远在法国的他们反倒与孙中山等人接近起来，张静江等在了解孙中山之后，对他的革命活动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无私的援助。相反，远比他们更为彻底的刘师培等少数在日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头面人物，却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于1908年被明令取缔并遭受严厉打击之后，一蹶不振，直至被满清政府收买而去。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被取缔，反映了日本社会内部统治集

①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6期，1907年7月26日。

② 民：《与友人书论新世纪》，《新世纪》第3期，1907年7月6日。

第六章 平民革命万岁

1. 斯道不孤,信如也!

在1913年8月出版的这份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刊物名叫《晦鸣录》,它是由一个看上去完全是个文弱书生样子的广东青年创办的。他的名字叫刘师复,这一年刚好29岁。

29岁这个年龄在当时的中国严格地说可能已经说不上年轻了,而对于两年后就因为积劳成疾而夭折的刘师复来说,这个年龄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垂暮之年”。就是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刘师复最终成就了他的事业,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继往开来的一位十分重要的献身者。

刘师复最初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当他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时,他象同盟会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他也和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活动的影响,“深信无政府主义和暗杀方法,可以除暴惩恶,拯救中国的劳苦大众”。^①因此,他熟读了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学习了无政府主义者制造暗杀

^① 刘师复:《炯庵谏语》,《香山循报》第2期。

第六章 平民革命万岁 97

武器的技术与方法，并于1907年以必死的决心勇敢地承担了暗杀广东都督岑春煊与水师提督李准，以配合革命党起义的任务。在这次行动中，刘先是不幸于不慎中引起水银炸弹爆炸，炸伤面部，后又再度引起炸弹爆炸重伤左腕并被捕入狱。三年的监狱生活使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从而在根本上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10年他出狱后，更大力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身体力行地准备以武力反抗强权。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刘师复相信专制政府已经推翻，他才最终停止了个人恐怖活动，转而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理想道德的宣传与实践。

在中国，信仰无政府主义是与“道德自我完成说”联系在一起，并深受传统道家思想中的“忘怀于物”、“清淡寡欲”的观念影响，主张“寡嗜欲，薄荣利”。辛亥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哪一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世界会很快实现，但是，人们对通过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创造社会新道德却是深感兴趣的。1912年2月，一批社会名流首先倡议成立进德会，按照个人意愿划分为四级会员，普通会员只要“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即可；特别甲部会员则要加上“不作官吏”，特别乙部会员还要加上“不作议员，不吸烟”，而特别丙部会员更要加上“不饮酒，不肉食”。当年鼓吹无政府主义最力的原法国《新世纪》的编辑李石曾、吴稚晖等首先列名于进德会特别丙部，而张静江及其最早对“共产主义”身体力行的张继也公开列名于特别甲部。^①对此，刘师复极力赞成，并进一步创立“心社”，规定了十二条“信约”作为社员道德标准。这十二条是：“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号召天下有愿意遵行上述信约者都来加入他的心社。^①之后，刘全力以赴地开始宣传不饮酒、不

^① 见1912年2月27日《民立报》。

98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吸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废除婚姻、家庭对于实现人类平等自由理想的必要性,以及不坐人力车、不用仆役对于废除贫富贵贱阶级制度的重大意义。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究竟有多少人象刘师复这样真正看破一切民族、国家、法律、家庭、婚姻以及各种现存制度与伦理道德呢?

不难看出,刘师复在辛亥革命后最初并没有考虑立即公开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他对当时的共和政治和共和政府还多少抱着一种信任的态度,故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社会道德的改造上面。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和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鼓吹,使刘师复等人曾多少有些动心。但他显然不能满意江亢虎在“纯粹社会主义”幌子下面的那一套“不妨害国家存立”的畸形标准。因此,他虽然与中国社会党人不断书信来往,却对其主张表示怀疑。不过,刘师复此时仍旧希望这种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有所成就,是很显然的。因此当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公开分裂,该党领导人沙淦等来信希望刘师复加入社会党时,他虽婉言相拒,但却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方在幼稚时代,凡能信服社会主义者,无论属于何派,均可称一国之优秀,如春木之茁芽然,吾人当竭力护持之,万不宜互相攻击,自残其优秀之萌芽。”^②

可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刘师复对于政治毒化他所信赖的同志的作用却无论如何不能忍耐。1913年初,刘师复吃惊地发现,他曾经一度奉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张继,在公开宣布参加道德会作会员之后,竟公开进入议会充当议员,并且当了议会议长。而吴稚晖等也混迹于国民党人与中国社会党人当中大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这一消息使得一向视道德如生命

① 见《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

② 《师复文存》,第132页。

的刘师复“神经震眩，半月为之不宁”^①。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日益显露出专制独裁的本性，政治官场中的黑暗现象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都让这位理想主义者在道德思想上受到强烈的冲击。他迅速对当前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度的反感，进而开始走向极端。1913年讨袁事起，刘师复竟然也感到毫无意义了。他在致吴稚晖、张继的公开信中宣称：“今日政海恶潮，陷吾民于痛苦，国人醉心权位，讼言运动，不复知学问道德为何物，其祸殆有甚于传染。长此以往，光天化日之人类，不难立返于兽域。”各位志士仁人原本已经公开表示愿意成为世人道德表率，不料今日竞争先恐后挤入官场政海之中，“其如吾道何！其如为人之责任何！”^②

辛亥革命之后大批革命党人与社会主义者逐臭于政治场中的情况，使刘师复准备以道德身教实行社会改造的愿望彻底破灭了。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重新举起革命旗帜开始新的政治斗争，而江亢虎等社会主义者则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之际，刘师复挺身而出，决心反其道而行之，向那些被他视为伪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公开宣战，以肃清人们头脑中又日渐盛行的趋炎附势、争名夺利的丑恶心理，真正普及无政府主义的道德理想。刘师复的晦鸣学舍与《晦鸣录》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晦鸣录》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战斗性是不可避免的。

“斯道不孤，信如也！”对自己的主张充满了必胜信念的刘师复并不因为中国已经重新被置于一种新的专制统治之下，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已全无立足之地，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更是无法得到社会响应而稍感沮丧。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刘师复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埋头著述、编辑，倾其所有地致力于无政府主义书刊的秘密出版宣传，并且几乎是殚

^{①②} 《师复文存》，第140、137页。

精竭血地实践着自己的那些清规戒律，直至让肺癆夺去了生命。而完全由他所编辑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书刊，其种类有十余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行到数千册以上，要知道，这些书刊根据刘师复的道德原则完全都是些非卖品。由此可以想象，在这几年里，刘师复为支付如此之多的宣传品的出版发行，花费了多少资财和精力。这也就难怪他到最后病倒时，竟连看病的钱也拿不出来，待到朋友帮助送他去看病后，因无钱住院虽查出病因却无力医治，结果只有坐以待毙。^①

2. “真正社会主义”

1913年8月20日，刘师复在《晦鸣录》第一期上发表了《无政府浅说》一文，开宗明义地说明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试问读者：政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对人类又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他断言：我们饿了就吃，冷了就穿，能自己种田织布养活自己，能自己造房保护自己，能利用科学技术增进社会进步和幸福，根本用不着政府来指挥，更用不着政客们来教训。相反，自从有政府之日起，它就设立各种法律命令以束缚我们，以致我们人类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能不受它们的管束。而世界间人民本来都是兄弟，本来可以相亲相爱，但政府却以爱国为借口设立军队，让人类互相残杀，互为仇敌。说什么政府是为抵御外侮而设置，如果政府真的都是为了防备他人，还要政府何用？说什么无政府就无法律，无法律就会起破坏和扰乱，其实，哪一种扰乱不是起因于社会组织不良及社会制度不平等，这岂是法律所能改正？说什么人民教育程度不一，道德水平不齐，实行无政府不能保证正常秩序之稳定，但所谓道德不良难道不正是由于社

^① 文定：《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

第六章 平民革命万岁 101

会不良造成，而社会不良不正是由于政府所引起？强盗起因于贫穷，贫穷起因于社会分配不公，不公起因于富人垄断财产，而富人之所以能够实行垄断则是因为有政府法律给以保护。因此，“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即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①

既然政府如此可恶，任何主张或是容忍政府存在的观点自然都要成为刘师复攻击的对象。

刘师复的《晦鸣录》创办之际，正赶上孙中山国民党讨袁斗争揭开帷幕。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反复之后，刘自然不再对任何政治斗争或今后的任何一种政府寄以希望。他公开宣布说：讨袁之起，起于政治竞争而已，袁与非袁，皆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关系，“凡有政府，皆属万恶”，故不论袁是否罪恶，主张社会主义者均不应藉为口实而参加这种“隔靴搔痒”的讨袁斗争，而应以全力鼓吹准备世界革命。^②

但不首先推翻独裁专制政府，不仅鼓吹准备世界革命难以奏效，就是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想也难以想象，因此，仍有社会主义者对刘师复的主张公开表示怀疑。他们明确认为，社会主义者也有利用政治和运动政治的必要。刘师复对此大不以为然。很明显，孙中山、江亢虎等人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主张已经使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刘师复所想，相差不啻十万八千里，加上这时江亢虎又在美国大谈所谓“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只有他所提倡的“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之说”才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主张，这更使刘师复感到不能忍耐。显然，再不公开阐明真正社会主义的观点，容忍此“恶

① 《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

② 《师复文存》，第21—31页。

102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秀之乱苗，恶紫之夺朱”，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将不复存在。因此，刘师复终于按捺不住，开始改变他曾经明确表示过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不论何派，“万不宜相互攻击，自残其优秀之萌芽”的主张，对孙中山、江亢虎一派的社会主义观进行公开的批判了。

孙中山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刘师复公开斥问。“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孙中山、江亢虎是否如此主张呢？当然，同孙中山一样，刘师复也认为当今社会主义大致分为两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但他不象孙中山那样，认为二者的区别取决于人民道德程度的不同，他较准确地将它们区分为前者主张生产机关及其劳动成果全部属于社会所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者则主张生产机关属于公共，其劳动成果则由国家或社会按劳分配。同时，他指出了这两种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同之处，这就是：“社会主义无论为共产为集产，必须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归之公共，使社会上无复留有地主与资本家之迹。”孙中山、江亢虎是否有如此之决心呢？

孙中山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为集产社会主义或单税社会主义，但“今既主张集产主义，已从根本上推翻土地及资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谓单一税者以骈枝于其间乎？”“不知单税论之所由来，即以惮于改革，惧社会主义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说之不易行，乃代之以单税之法，期稍杀地主之势力。实则因陋就简，不敢实行社会革命者也。”刘师复断言，孙中山之所以同时主张集产社会主义与单一税制，“推其原故，实由孙氏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马氏资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论。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

第六章 平民革命万岁 103

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比也。”因此，“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①

至于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是以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为标志的。但即“曰营业，曰财产，明明有私产无疑；曰自由，曰独立，更明明保护私产无疑。且中国社会党亦仅以专征地税为党纲，而未尝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与孙氏政策如出一辙。其稍异于今世之资本制度者，特遗产归公一事耳。然生前明明各有私产，且私产之范围不独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故“地主资本家之存在如故，资本势力之跋扈亦必如故，无资本无土地者（即平民）仍须服役于资本家以谋糊口，与今日之资本制度何异？”“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北辙耳。”然而，尤其使刘师复感到恼怒的是，孙中山毕竟还经常自称主张社会政策，容易使人识别，江亢虎则明明主张社会政策，却到处宣称他所主张的是“纯粹社会主义”，并且忽而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中坚，忽而称共产主义未易遽行；忽而自称其主张的实质为无政府社会主义，忽而声明自己“非无政府党”；忽而胡乱解释社会主义有共产、集产、均产乃至废产、名废实不废或名实俱废主义者，忽而胡乱解释社会主义可分为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宗教无家族）、二各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主义（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致使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在一般人民心目中，已变得混乱不堪，难以一一加以澄清。^②

刘师复这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由于“幼稚殊甚，能介绍其学说于国人者，尚属寥寥，

①② 《师复文存》，第180—181、34页34。

104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时人对于社会主义之定义及界说，均不注意，好古者则又执其保存国粹崇拜祖国之陋见，取中国经籍牵合附会之，以为社会主义本吾国所固有，而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乃愈觉迷离诞幻不可究诘。甚至一切革新事业，近于自由平等之类者，皆以为社会主义所能包括，而社会主义之真谛反因此而愈晦，此实社会主义在中国之不幸也。”^①

为了便于一般人能够清楚地识别“非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刘师复明确主张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一派的公开旗帜。刘师复称：无政府主义的宗旨若用一言以概之，可以用最近无政府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来表示，这就是：“无政府者，无强权也。”“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Capitalisme）无政府主义首先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而后者“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并为当今各国社会民主党所主张，故无政府党常自标明其主张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今之中国社会党与孙中山将社会政策混同于社会主义，更使社会主义之名因之减色，“是故混无政府主义于社会主义，足令闻者无所适从。”鉴于此，刘师复明白宣告于天下：“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吾人主义中，若偏举一二义，则有反对宗教、反对家族、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惟不能与无政府主义之名并列。至若一切‘纯粹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以及‘三无二各’等等支离可笑之名，皆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此后当相戒勿用，使之绝迹于吾党之口角与笔端。”^②

①② 《师复文存》，第14—20、45—47页。

既然已经公开区别于前此中国所流行的孙中山与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刘师复等人的“真正社会主义”，或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又是如何主张的呢？

对此，刘师复明白宣称，无政府共产党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

(一) 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同时废去钱币。

(二) 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

(三) 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 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 无一切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 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 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 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于众人。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组织某种公会者，即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 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

(十) 儿童满六岁以至二十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

(十一) 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从事

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

(十二) 废去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 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戏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 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刘师复为人们勾画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刘师培以来中国人再次如此详尽地描绘他们所期望的大同理想，但是，根据想象和对于世界上各种共产主义理想学说的了解来描绘这种理想或许应当并不十分困难，困难的倒是坚信这种理想的必然实现和如何设计通向这种理想社会的具体道路。而在孙中山、江亢虎等社会主义鼓吹者都明白表示他们也都赞成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情况下，真正可以区别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关键，其实也就在于他们对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和时间的不同理解上。

刘师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设计的具体道路和革命手段自然是别有特色的，它确实充分反映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本质特点。

刘师复称，他确信实现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以下手段：

(一)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 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1. 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2. 骚动，如暗杀暴动等。此两种手段既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

遍传遐迹,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 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 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现在传播时代,各同志应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从事于(一)(二)两种说法,将来时机既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已传播极广,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诸国必皆闻风响应,工党罢工,军队倒戈,欧洲政府将次第倒毙,吾党之在南北美及亚洲者,亦当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①

十分明显,刘师复所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是自中国有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最为系统和最具革命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它并且带有十分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由下层工人平民来推翻上层地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政权,而这恰恰是孙中山、江亢虎等人在宣传社会主义过程中唯恐避之不及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刘师复的思想里,决没有如此前中国那些主张社会主义之人所深以为惧的对“程度”问题的担心,不论是人民的道德程度,还是社会进化和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刘师复都毫不在意。如果说他也有某种担心的话,那就是中国能否赶上世界革命的步伐。相信中国的社会革命必然是世界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革命当以资本制度最为完备和强大的欧洲为起点,这是刘师复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开始受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熏陶的一个重要的证明,

① 《师复立存》,第52—56页。

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无疑是自刘师复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明确认为：今日的中国，“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梗也”。他断言：“我东亚同志，如能群策群力，牺牲二十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工作，无政府共产主义必然会遍布于整个东亚大陆，而人类理想社会实现之日必将随之而来。”^①

3. “我同志向前进”

为了有效地实现自己的革命计划，推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刘师复在1914年7月于上海创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准备以此为基础发起组织“中国无政府党联合会”。当月，该会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明确宣布自己的主张是“天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根本目的在于“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它并要求全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它取得联系，以便“联合全体，一致进行”。^②与此同时，在该会给无政府党万国大会的公开信中，他们直接了当要求万国大会立即组织万国机关，以加强联络并帮助东方国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指出，由于中国工人知识水平极低，识字极少，工会组织不仅少而且还远未受到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影响，因此要启发并激励工人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而中国政府专事压迫杀戮，更使无政府主义传播事业“异常棘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格外希望欧洲无政府党人利用自己的成功经验来帮助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相信：“今日无政府主义

^{①②} 《师复文存》，第263—264、62页。

之传播略广者，仅欧洲一小部分耳，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①

显然，袁世凯政府的政治压迫这时已经使刘师复等人深切感到传播事业之困难了。《晦鸣录》刚发行不过两期，就遭到查禁并无以立足，不得不迁到澳门，并改名为《民声》。不料他们到澳门后尚未站稳脚跟就又被袁世凯政府探知，以致再度被澳门殖民当局查禁，于是只好重新秘密迁回上海躲入租界，并假称《民声》出版于日本，这样才暂时保住了这块宣传阵地。但是，政府的压迫并不能制止刘师复等人为主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刘师复显然与这时在美国以“出亡之人”自居倍感不幸的江亢虎等人不同，他对为了反抗强权可能付出的牺牲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为反对强权之运动，其受民贼之摧残，固在意中，何足缓吾人之气？自今而后，吾人之劳苦较前倍深，而责任则较前倍重，吾人当视民贼种种之残暴为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辈之残暴增一度，吾人之实力必然增一度，则平民厌恶政府之心理当必随之而增一度。夫如是，无政府之时期不远矣。”据此，他公开号召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其益决心！益猛进！无怠！无惧！以致于强权灭之域！”^②

“我同志向前进！”这是刘师复经常用以鼓励他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的一句名言。而在袁世凯专制政权极端黑暗的统治之中，南方各地一些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确实也在勇敢地坚持斗争。1914年7月前后，常熟的无政府传播社、南京的无政府主义讨论会，以及上海和广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先后成立，并秘密地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以致渐渐影响了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

^{①②} 《师复文存》，第290—291页。

110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兴起,促使工人群众的觉悟,刘师复等人在中国最先论证了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必要性和实际方法。

刘师复认为:“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质言之,实即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之主义。故吾人传播事业,自然不能出乎劳动阶级之范围,断无向敌人方面(富贵阶级)而希望传播者也。”刘师复这里所说的劳动阶级指的是一切以劳动为生且家无恒产之人,因此他认为在劳动阶级中虽有少数有文化者,更有大批不通文字者,对于前者“不妨用文言以达较高之学理”,对于后者则“当用白话或浅文专论寻常社会所亲见之事实与道理”,并结合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说、纪事和画报使之便于流传,“于不知不觉中浸润真理”,达到宣传效力。^①

对于劳动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重视,在中国自刘师复始。这尽管是欧洲工团主义思想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它毕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内容。也正是自刘师复起,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第一次真正开始站在工人斗争一边,为他们出谋划策。当1915年春上海出现工人罢工风潮之际,正是刘师复首先站在工人一边告诫工人,不应当继续使用旧式的反抗方法,而应当“结团体,求知识”。即首先分行业组织工团或工会,并绝对与资本家的组织相分离,由会员每月少量交纳一些会费,立即设立平民学校,于半夜或星期日教授文化知识,进而由各分业工团或工会,联成一工团联合会或曰总工团,以此作为工人全体之联络机关。以后与其他城市的工团互通声气,互相联络,逐渐增厚势力,最终必可制资本制度之死命。为此,刘师复明确要求无政府党及社会党全力为此鼓吹并积极予以赞助和指导,以养成其战斗之能力。^②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劝

^① 《师复文存》,第290—291页。

^② 《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

告中国工人组织自己的阶级组织,这在中国无疑也是第一次。

由于主观上以及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刘师复虽极力提倡立即开始对劳动者进行思想宣传和鼓吹,但并没有能够真正把他的种种设想付诸于实际。然而,他所提倡的这种思想在刘师复1915年9月病死之后,到底由他的那些同志们或多或少地开始实践了。1916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人道》、1917年出版的《世界工会》,特别是1918年出版的《劳动》月刊,清楚地显示出刘师复在这方面的影响和力量。这些宣传书刊都是力图以较浅显的文字和较生动的语言来直接对下层劳动群众进行有关工人组织和社会革命知识的宣传教育。如《劳动》月刊一开始就以十分通俗的漫画形式向工人宣传,在它发表的《劳动者言》中,它更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今‘劳动问题’日紫扰于欧美政治家之头脑,日暄于全世界人士之耳膜,问题者何?阶级战争也。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满者为一级,上焉者也,勤劳耕作而困厄颠连者为一级,下焉者也。不平斯争,问题起矣。”因此,为求解决之法,他们决定创办这个刊物直接向劳动者进行宣传,以提倡劳动主义、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普通学术,并记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这一切无疑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迎接更加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的冲击和即将到来的新的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运动,以及中国劳动运动之不可避免地提上议事日程,打下了相当的舆论基础。

改善“农民工民生活”。^①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所谈论的“面包问题”或“面包革命”吧？还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说得明白：“面包问题，岂仅俄国为然哉？”^②

“呜乎，革命起矣！”又岂仅俄国为然哉？

2. 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

主张用激烈手段来实行社会改造的，在中国首推刘师复。刘师复死了，他的主张并没有就此消失。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时还是公然主张“社会革命必不能仅凭口舌书报及个人之感化力可以达到”，“若欲达到吾人理想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社会，非经几次之扰攘不为功”。^③

既然都是主张“激烈手段”，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要成为中国最早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了。

1918年3月，由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劳动》杂志首先开始打破笼罩在中国舆论界上空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绪，公开发出了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声音。他们宣称：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问题，其根子就在于贫富不均和阶级压迫，而“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正大光明的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不管俄国这时如何动荡不安、四分五裂，也不管这列宁是失败是成功，是好是坏，他们毕竟真正“适合了物理人情”，也就是真正做到了“男女同一样，贫富一般齐”这两句话。“诸位可知道，这世界上的人，现在除了俄国人刚要享着了这两句话的福之外，

① 1918年1月1日《民国日报》。

② 1918年6月23日《民国日报》。

③ 凌霜答思明君，《实社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

其余各国的人，所行所为，没有不是违背了这物理人情的。”^①因此，《劳动》杂志的编辑们对于这时社会上所担心的俄国革命者的那些“过激”举动，不仅不感到惊奇，相反感到欣喜。比如，无论是对布尔什维克剥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解散议会，还是他们对德议和，退出战争，《劳动》的编辑们都明显地抱以一种公开赞许的态度。在其第2卷卷首曾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题为“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上面画着一个资本家在“俄罗斯社会革命军公告”前面痛哭，而那张公告上写着：“主张：面包自由、生命自由、土地自由、信仰自由、罢工自由。执行：休战，赦免罪犯，没收私产，革除宗教的社会阶级，立国民委员会，开放被征服国。”它清楚地反映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理解。

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这时俄国与中国之间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中国人对于俄国的了解多半只能借助于欧美各国通讯社发来的消息，因此人们很长时间不能真正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了解俄国革命者究竟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而更为重要的是，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通常只是象当年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样，即只是把社会主义主张在根本上区分为直接行动与议会政策两种形式，认为凡主张直接行动的，都是反对政治并主张激烈手段以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凡是主张议会政策的，则是坚持合法主张平和手段以求达到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因此，当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了解到俄国革命采取的手段和实行的政策都具有异常激烈的性质时，他们自然会把俄国的革命者很快地视为同类。相信“俄人做的，系世界的革命，社会的改革，国家

^① 《劳动》第1卷，第2号。

思想简直半点也没有”。^①即便他们随后逐渐看出：“李宁（作者注，即列宁）乃宝贵政权，决非无政府党”，他们也仍旧确信自己应当支持俄国革命。据他们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李宁不主张以国家权力推行社会政策”，因而也“决非社会民主党”。况且“李宁政策选举政权归诸劳动者之手，是近乎方今发展之‘直接行动’主义”的。他们的所谓政权，“非用以压制他人，掠夺大利之权，乃用以推行其主义之权力”，其保持国家资格，也不过因“旧党死争”而不得不如此。据此，他们甚至一反过去主张，断言：“社会革命之理论，原未决定实行时状态何如，即俄国现在时局，亦初非人人意中所料”，但“吾人只要知道主义，且不必问‘方法’”。^②言外之意，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即便不是无政府主义所赞赏的方法，如列宁所实行者，也未尝不可。

由《劳动》杂志所发出的这种非同凡响的声音，对于这时的社会舆论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影响显然产生于事实本身。到1918年春，被人们再三预言必将倒台的俄国劳农政府竟数月而不倒，相反，连美日等国的官员也开始公开承认它所具有的生命力了，这意味着世界上真的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存在下去了，这种情况对中国进步知识界不能不造成强有力的思想冲击：社会主义真的会成为现实吗？

1918年3—4月间，国内各报陆续报道了日本某官员对俄国的观察结果。他认为，俄国政府不仅比较巩固，而且颇受人民支持。俄国革命党已号召世界民众起而实行民族自决主义与社会主义，且不论世界战争结果如何，世界帝国主义今后必将一变殖民侵略政策转而承认各弱小民族自治与独立；世界资本主

① 《劳动》第1卷，第2号。

② 同上，第1卷，第3号。

122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义也必将一变压迫劳动阶级的政策转而限制资本家之跋扈，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①5月，中国各报更连续接获来自俄国外交代表的政策声明，这些声明更加清楚地说明：“俄国新政府所注意者，唯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而已，……务使人民悉登乐土。”其对中国及世界也“决无侵略主义参杂于其间”。为此，中华革命党人首先开始发出这样的感慨：“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②

时至于此，中华革命党人率先开始改变对俄国革命以及俄国新的革命政府的态度了。6月17日，其机关报首次称革命后的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22日，该报公开站出来反对北京政府跟随日本对俄国出兵干涉。23日，他们更以头版头条公开登出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华林所写的称颂俄国革命的重要文章。文章称：世间阶级制度与专制，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罪恶之源，而世间的地主资本家，恰恰是依靠这种阶级制度与专制生存和压迫他人的，“故俄国革命之声浪中，所唱最高者即倾覆地主及资本家耳，事实昭然，本无须讳避者也。”也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影响世界大局甚多，遭人忌恨也最多，这种情况毫不足怪，奇怪的是作为民主之邦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俄国革命的意义，完全不明瞭世界进化的趋势。其实，今天的世界已经是科学进步的时代，人类思想已经由空想进入实验时期，俄国的社会革命就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和先锋，就是“科学促进以成功”，今后人类社会的组织，“必有较良善较进步之势力”加以改造，此势力“即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无政府主义是也”。^③

① 1918年4月1日《民国日报》；4月14日《晨钟报》。

② 1918年5月27日《民国日报》。

③ 华林：《世界之未来》，《民国日报》1918年6月23日；华林：《社会问题》，《民国日报》1918年7月31日。

第七章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23

华林是这时中国唯一见过无政府共产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的人,以他的倾向,发表这样的文章自然顺理成章,但公开刊登具有如此激进倾向的文章并把它登在《民国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对于中华革命党人却是件破天荒的事情。这种情况说明,在一段时间的矛盾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世界历史进化的大趋势,因而开始急于要表明自己对于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赞同立场了。

果然,《民国日报》编者开始接连发表社论来标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其社论称,革命党多年来始终为争取真共和与真民主而不懈斗争,但五年之间,三度战争,结果“纪纲灭绝,道德坠地,国将被卖,人将为奴”,“血光烛宇宙,尸骨填原野”,“民权未复,民生已残”。如今终于醒悟:革命者注重政治,而一般民众则只注重经济,革命者以为争取民权才是改善民生的必要途径,但民众却极端反对一切损害其利益的革命和战争,而不论它是否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因此,双方之间不能达到相互间的默契。这样“以今日之民国,今日之吏治,今日之风俗习惯言,非特真正共和不可冀及,即反而求得一文景小康之局,亦势有所不能。此而不能,则急标之治,显然已无他望,而根本自存之道,当赖此民生主义矣”。且“欧洲大战更与中国人以锐敏之感觉,其渐进于绝对的民生主义之境,亦天地所造设而人类自爱之良机也”。“是故昔以民权为先驱民生为后劲者,今当翻然一变,以民生为正兵,民权为两翼矣。”据此,他们明确主张:“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①

^① 1918年6月25—26日、28—30日《民国日报》(社论)。

主义不就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①吗?社会主义不就是“一种理想的政策”^②吗?张东荪说得更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③

3. “帝力于我何有哉?”

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新的人类道德文化,并力图通过个人良心的发现和道德的改造一点一滴地去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这是在中国社会长期不能摆脱军事专制统治和腐败政治生活,因而与世界社会政治发展趋势越离越远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反映着人们绝望情绪的特殊现象。1919年至1920年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泛滥起来的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等,或多或少都是这种绝望情绪的反映。其中,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对于人们的吸引力极为广泛。

通过建立新村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生活,这是周作人于1919年3月首先从日本引入中国的。1918年11月,日本有一个叫武者小路实笃的人约集了一些有志者在日本日向的儿汤郡一个叫石河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盖了三间房子,创建了他的所谓“新村”,并准备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到全世界,以便将来人人都可以“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之本”,“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者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这种既主张协力,又赞美个性;既发展共同的生活,又提倡自由精神的“新村主义”,在那些渴望通过实行道德新生活以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自然是一种“切实可行

① 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

② 杨亦曾:《社会主义思想之源流及其发展》,《新群》第1卷,第4号。

③ 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①因此,当周作人自1919年3月起开始详尽地向中国人介绍这种新村主义并极力推行之后,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中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兴趣。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首记述于魏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的《击壤歌》,曾经引起过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往和陶醉呵!如今竟有机会去实现这样一种梦想,这岂不令人激动?许多人公开认为:“新村是一种新组织,是物心两面改造的,是皮肉一致、表里相应,是要打破现在知识阶级的则要加入劳动团体的,是以现在为基础的小组织,是以将来的世界为扩充小组织的大联合。”1919年8月,张东荪首先提出应该“到‘新村’里讨个新生活”。而同月,新成立不久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也接连发表文章主张:“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平等的团体,人人合力工作”,“造成一个组织完善的新社会”,并“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社会渐渐革新”。^②他们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莫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吧!”

随后,毛泽东、李大钊等人率先对此进行积极的响应。年轻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打算在长沙的岳麓山一带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新村,并迅速拟就了一个计划书准备付诸实施。其计划甚至雄心勃勃地打算通过创设新学校、新家庭直至合成一个新社会,其中将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

^① 见《新青年》第6卷,第3号。

^② 宗之槐:《我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号。

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公共设施。^①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则同样准备模仿新村“在乡村中建造极简单的生活”，“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至于李大钊，他则把这种新村的办法看成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理想途径，因此他明确倡言这种“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呼吁人们“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去向那些农民宣讲“博爱”、“互助”的道理，使他们都能够成为人道主义的信徒。即通过知识阶级加入劳动阶级的办法，来实现“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和“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②进而，他特意系统地翻译了关于社会主义新村运动的系列文章，以便使人们深入了解历史上新村运动的各种情况。

新村运动由于种种实际的原因，在中国始终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尽管周作人在北京一度甚至创立过一个新村支部，并举办过一个以《新村》为名义的新村主义的宣传刊物，但要让人们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去缺乏基本物质条件以至可能有土匪出没的偏僻山林，显然是太困难了。由于军阀混战，地方割据，政治黑暗，经济窘困，人们对于前往偏远地方去实验自己的理想充满各种各样的顾虑。因此，不论人们怎样充满幻想地在纸上谈论它，到底没有人身体力行。那么，人们是不是口是心非呢？当然不是。看起来他们对在城市中组织“新村”要比到偏远的山林中去显得更有信心。一时间，什么工读互助运动，以及与此相关连的工学运动、合作运动，因此而兴起。其中，工读互助运动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了。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② 李大钊：《“少年中国”与“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工读互助运动是基于“工读互助主义”而兴起的一种以和平改良为主旨的社会改造运动。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克鲁泡特金以崇尚互助、反对竞争为内容的“互助论”和托尔斯泰的提倡通过人人劳动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泛劳动主义”。因此，它在中国的最先提出者，实际上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早在1918年就曾经提出过“工读主义”的思想，认为将来社会就是工读结合的社会，即“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工读结合、人人互助的观念上，工读互助主义与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同出一辙。只是，新村主义主张在乡村中实行，而工读互助主义则因为难以前往乡村转而主张在城市中实行罢了。在这时，最先具体实践工读互助主义的王光祈，开始就是主张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娱乐的“新农村”运动的。到1919年12月，这位善于幻想的青年学生终于意识到实行乡村新生活的难度太大，故而开始提倡实行“城市中的新生活”，从而立即引起了工读互助运动的兴起。他说，前几个月，我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在讨论到乡村中组织新村的问题，随后我又想到了改造旧家庭组织“女子互助社”的方法，而今在与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教授商量之后，我自觉更应提倡组织城市中的“男女生活互助社”，可称之为“工读互助团”，以使男女青年从此脱离旧家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半工半读，实行互助”，一旦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将来理想社会不是自然能够顺利实现吗？^①

在城市中组织这样一种半工半读的“新村”式的“工读互助团”，又是在一些堪称青年导师的长辈支持下由充满幻想的青年学生来组成，这当然比较可行的。因此，说干就干。12月16日，

^① 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1919年12月16日。

146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一个名为《工读》的杂志首先创刊，青年学生赵世炎直截了当说明了他们提倡工读互助主义的目的。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坏极了，不设法解救是不行的，而“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在中国，以目前人民和社会的现状是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必须对各种旧道德旧习惯加以改造，改造之策最好就是通过工读互助的实践首先使青年学生“养成一种勤工俭学的学风”，进而使国民闻风而起，使民智日进，“供贵族政府奔走的人一天一天的少了，贵族的政府不会日益消亡吗？那平等的自由社会不会自然兴起吗？”^①这时影响力颇大的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编辑的《星期评论》也立即加以提倡，断言经济决定人的意识，因此，实行工读互助独立生活以创造新生活的经济基础，必然可以根本造成新社会的实行条件。从而实现他们曾经提倡过的“集合同志，组织理想的小社会，实行新生活”，“然后自由联合无数小社会，组织大社会”，完成社会改造的设想。^②进而，由原属改良派阵营的张东荪等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等也积极加以鼓吹，宣称“工读主义是人类生活史进化的一个新阶段，是20世纪新思潮孕育的一个良好结果，是将来新社会建设的一个大基础”，它无疑将是平等、自由和人类大同的基础。^③

1920年1月，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顾孟余、胡适、高一涵、周作人、陈溥贤等10多位著名学者领衔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诞生了。随后，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及漳州等地

① 见《工读》创刊号。

② 沈仲九：《我的人生观》；沈玄庐：《介绍“工读互助团”》，《星期评论》第29号。

③ 筑山醉翁：《评工读主义》，《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3号。

均有响应与组织产生。王光祈公开宣称：他们所实验者，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他们的工读互助运动，也就是“平和的经济革命”。陈独秀等人也认为：这种半工半读主义如果试验成功，“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可谓一举而多得。^①人们甚至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只有这种主义最有效力，因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叫顽固党听见，就好象洪水猛兽一般，所以这些主义在黑暗势力之下是绝对不相容的”，唯有我们的工读互助主义，他们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也无法阻止我们实行。

根据工读互助团所公布的简章，可知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平时每日每人必须做四小时的工，劳动所得归团体公有，生活、教育及其他各种所需，皆由团体供给^②。由于工读互助团的求学方法对于相当一批青年学生具有实际的帮助，因此它一度十分红火。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发展到了4个组，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其他一些地方还相继出现了以半工半读为宗旨的学校，并进而在工读的基础上又产生出了只为半工半读而不主张共同生活的所谓“工学主义”与主张互助协力而不强调体力劳动的“合作主义”等等社会改良主张。

但是，工学主义是否真的具有生命力呢？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人们改造社会的愿望呢？对此，那些在一旁助威的学者中间，有人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张东荪在1919年12月就曾经表示过这样的看法，即改造世界和社会固然可以避开现社会而另辟一新社会，但也应钻入现社会中去切实改造现社会。如果没有改造旧

^{①②}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148 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社会的能力，即使去到新社会里头也未必就有建设新社会的能力。何况人们并不能根本离开现社会呢？^①而后，当工读互助团的宣传尚在高潮之中的情况下，戴季陶公开表示：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受资本强力的支配的。现在的学校本来就是传播资本主义的机关，现在的政府更是保护资本阶级的机构，要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通过少数人半工半读的方法或脱离现社会建立共产新村的方法，来实现社会的改造，恐怕是不可能的。^②

但实际上，真正使工读互助团难以支持的还并不是以上所谈到的这些原因。工读互助团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经济问题。北京工读互助团前后4组共有团员几十人，其谋生之策分为放映电影、洗衣服、办食堂、印刷信封、制作食品和开办英文与算术专修馆等，结果除专修馆一项外，其余全都没有生意或亏本，其他的工作也因没有资本和顾客而无从着手，这自然不能不使工读互助团的共同经济生活很快便难以继续下去了。与此同时，更让人们头痛的是团员间在观点上的分歧。工读互助团开办不久，团员们就不能不讨论到共同生活的性质问题。多数团员确信现在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私有制度造成的，要避免这些罪恶就必须打破私有制度，实行共产，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实行共产制度，从而使得一些团员难以完全赞同而退团。随后，团员们又进一步讨论到脱离家庭经济关系与名份关系的问题，这立即造成团员们纷纷宣布脱离前此的婚姻或婚约，这就不能不再度造成有人退团。进而，极端者又进一步提出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员，以及资产阶级的子弟脱离关系的问题，力图以此来保持他们道

① 东荪：《忠告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时事新报》1919年12月29日。

② 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第42号。

德和思想的纯净,因而使工读互助团的宗旨迅速发生变化,所谓半工半读主义很快变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即主张实现“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至3月23日,工读主义竟被根本推翻。这种情况,自然使工读互助团无论是在城市生活中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迅速陷于孤立,其团体内部因强调极端自由更是精神涣散,无法统一,到1920年4—5月间,这一名为工读互助团的城市共产新村便不得不宣告解体。

什么“帝力于我何有哉”!看来城市中共产生活的失败要比山林中的失败更容易让人直接感受到现存社会制度的反动压迫和其威胁的无所不在。这自然要让那些年轻的失败者感到强烈的愤懑。

对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主要在于团员们没有真正了解到工读主义的意义,没有充分发挥工读互助团的“营业竞争性质”。但那些激进的青年学生宣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压迫,现在营业哪一样不要资本,试问我们哪里来的资本?宇宙虽大,失业却如此之多,试问我们如何去争平民的饭碗?他们因此而“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要真正实行新生活,惟有将现实社会的种种障碍打翻,而“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①

^①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5号;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

一九二一年

怎样建设 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近来“自由”、“平等”两个名词已成一般人的口头禅。但是问他们甚么是自由？他们回答说：“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书信秘密自由。”甚么是平等？他们说：“凡是一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个个都平等，没有什么尊卑的区别。”但这些绝对不是真正自由、真正平等。诸君不信，请看下文。

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我们想与世界的弟兄互相亲爱，但政府信要我们爱国，叫我们去当兵，杀世界的同胞。在中国更不成了，甚至本国人杀本国人，像湖南、陕西、四川这几年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惨不忍见。这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好处。

那些资本家，垄断世界公有的财产，使我们贫民不能生活，政府不但不去罚他，反设法律来保护他。人民没有吃的，只得抢些来吃；没有穿的，只得抢些来穿；没有用的，只得抢些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半月》第十七号。署名蒂甘。

来用；这都是那些资本家强迫我们人民做的。但是政府又说我们是强盗，要拿我们去枪毙。我们固然不该，但不过把我们失去的财产夺些回来罢了，却要拉去枪毙，像资本家抢世界公有的财产，反安然活着。既不要人民抢人，便不得不流为乞丐。有时政府、资本家看不过了，把他们抢来的钱赏几个与贫民，却美其名曰慈善；甚至有些还要骂我们，说不去做工，却来要饭。诸君！未必我们不想做工吗？不过他不要工与我们做罢了，却来骂我们。照这样看起来，前头所说的“自由”、“平等”，似乎与我们人民没有关系了！这样还算“自由”、“平等”吗？我绝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平等！但什么才是真自由、平等？我说：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要建设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就只有社会革命。

什么是安那其？安那其就是废弃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机关，主张把生产的机关及他所产的物品属于人民全体。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并依各人的能力去分配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医生就做医生，能做矿工就做矿工；事容易的就可多做几点钟，事难的、苦的就少做几点钟。你要吃，就有个机关拿饭给你；你要穿，就有衣服给你；你要住，就有房子给你。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愚的分别。法国某安那其党说“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全社会之需”；克鲁波特金也说“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即可支持全社会的生活而有余”。照这样看来，我想这样少的作工时间，绝没有人不愿的。

没有政府、法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资产阶级，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劳动界的朋友们！你们看无强权的社会何等自由啊！何等平等啊！你们想建设这种自由平等的社会吗？那么就请你们实行社会革命，推翻那万恶的政治。那时，这自由平等的社会就要实现了！望你们赶快起来联合你们的朋友们啊！若是再一味的隐忍，那么，你们就要成为资本家的鱼肉了！你们不信，请看嘛！

I. W. W. 与中国劳动者*

一

我们现在尽管一味的空谈“劳动运动”，究竟对于中国劳动者有什么益处？我们尽管大吹特吹“劳工神圣”，难道劳动者享受过这“神圣”的幸福吗？“五一劳动节”这名词传到中国人耳里，也有几年了。但虽有几家报纸大大的鼓吹，究竟有几个劳动者懂得！照这样做下去，将来能得到什么效果？我们鼓吹“劳工神圣”的人，还不觉悟吗？

我相信美国的 I. W. W. 是有益于中国劳动者的，故特把它介绍过来。

二

I. W. W. 是“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缩写，译成中文就是“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它是现在美国最占势力的一个劳动组合。美国这几年所发生的同盟罢工，差不多都与它有关系。它的势力几乎可支配美国全国。美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半月》第二十一号。署名带廿。

政府和资本家把它当作眼中钉，要消灭它，但大多数的人都是狠信服它的，所以把政府弄得没法。总之，我敢说：将来美国的社会革命必定由它起始。

它起源于一九〇五年。那年秋间在美国有六个狠热心的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当时美国工人的情形。并决定在第二年开一次大会。到第二年又约了三十多个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同年六月在芝加哥召集了一次劳动大会。那日赴会的有代表八十六名，所代表的劳动团体有三十四个（会员有几万人）。讨论了两星期，遂成立了一个团体，——就是最有名的 I. W. W.。

三

I. W. W. 的主义和法国的工团主义狠相似，故有人说它是“美国的工团主义”。

它起先便主张打破资产阶级，它以为不把资产阶级打破，劳动者便不能得真正幸福。因为“国家”、“政府”、“法律”都是保护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它又主张打破这些怪物。

它以为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和劳动阶级调和。必定要等劳动者把土地和生产机器取夺回来。并且必至消灭“工资制度”而后止（《I. W. W. 旨趣书》第二段）。

它以为打破资本主义，必须组织生产军；一而可同资产阶级战斗；一面为将来资产阶级推倒后处理生产品之用（同上末段）。

它又主张“联络一切产业的全体劳动者，协同一致，组织产业的劳动组合，一遇某产业有同盟罢工，或厂主闭门不纳等事情，各产业当共同一致援助，视一部的利害为全体的利害（同上第四段）。

它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就是“总同盟罢工”，这是他们最有效力的武器。若同盟罢工不能胜的时候就代之以“怠业”。

以上都是它的主义，也就是它的特点。照这样看来可见它是最好的劳动组合。不过我有点不满意它的地方：因它的组织是中央集权的，执行机关之理事会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命令某组合起同盟罢工。——这个缺点或者因为它的会员尽都是不熟练劳动者的缘故。

总之它是以激烈的手段，创造他们理想底真自由平等无强权的劳动者世界。

四

中国劳动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纯粹劳动者组织的团体。这缘因，只举一个例就可明白了。如某工厂工人因工资太少的缘故发起全体罢工。但他们回到家，屋里又没有米了，若再不做工，又怎么能吃饭。然而他们的厂主，又要另外去招一起工人，他们便不得不去恳求他们的厂主收留他们，这回就完全失败了。这样看来，就可知道要救中国的劳动者，必定要先使他们自己起来组织一个极大的革命劳动团体，同心协力，打破“国家”、“政府”、“法律”等制度，推翻劳动者的最大敌人

资产阶级，再把生产机关及其产物收归劳动者所有。

这是最好的方法。I. W. W. 的目的就是这样。可见它和中国劳动者的关系是再重大没有的了。

资产阶级的世界，快到末日了，劳动者的世界快来了。中国的劳动者，速速从好梦中醒来！联合你们的同胞，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庶几能生存于将来的世界，再不可做时代的落伍者了。

爱国主义与 中国人到幸福的路*

一

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它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命于天，即或有时实在受不了，也只有往自杀那条路走，从没人敢反抗的。因此一天一天的弄下去，竟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中国，哪还有幸福之可言？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份子，便不能昧着良心不去反对它，故不得不驳它一下，并且把我的“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的意见写下来。以下的话，都是本良心说的，我想这样大的中国，也许有几个不肯昧良心的人给我表同情——这并不算是苛求罢。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警群》第一号。署名蒂甘。

二

爱国主义究竟是甚么？托尔斯太说得好：“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与平民生活无与焉。”这句话初看起来觉得无甚道理，若是仔细看下去，“爱国主义”的精义都在这里了。我们人类除却一般没良心的军阀政客外，没有一个不反对战争、诅咒战争的，但我们考察战争之起源，却是由于“爱国”。假使人类互相亲爱，欢欢喜喜的一伙做事，哪里还有战争呢？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它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的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还有一事足以证明“爱国主义”是个杀人的怪物，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政府奖励人民的爱国热诚，并且实行征兵制度，全国的壮年男子，都应服务兵役，就是文人、教士也要做杀人的事，听军阀政客的指挥，去杀他人，一旦有工人罢工等事发生，亦在该杀之列，有时甚至于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唉！要是这样还不算暴虐、残忍，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暴虐残忍的事发生了。

三

上文把爱国主义驳了，我的意思以为爱国主义的发达，绝不能使中国人享幸福，只有使中国人越受痛苦。中国人要寻幸福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想走那条路，非先把下列的几种制度推倒不可。这些制度是什么呢？

一、政府。政府是一种强权机关，是保障法律的，它只有杀害我们，掠夺我们的衣食住，又能侮辱我们，帮助资本家杀害贫民的。我们人类本是自由的，它却造出许多法令来束缚我们；我们是酷爱和平的，但它却叫我们去战争；我们本应同各国同胞讲互助，但它却叫我们讲竞争。它种种举动都和我们多数人类的意思相反，从没有做过一件有益于我们的事情。而且它最大的坏处，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据地。我们要想寻幸福，第一步就要推翻它。

二、私产。私产是掠夺的结果。财产本来是人类公有的，乃有一二强有力的人，用他们的强力同知识，把公有的财产据为己有，遂使一般较弱的人流离失所，又用金钱收买别人劳力，替他们生产，所生产的物品，劳动者丝毫都不能用，他反享尽快乐。世界上不平等的事，这算是第一。且有私产，一般人遂起争夺的念头，欺骗盗贼的事常常出现，民众的道德扫地尽矣。我们又考察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久远，都是有私产的缘故；我们能把私产制度废去，那政府也就容易推翻了。

三、宗教。宗教是束缚人群思想、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

我们要求真理，它却教我们迷信，我们要进取，它却叫我们保守。一般教徒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真理、正道、善良、美好、势力、生机；人类是诈伪、不平、罪恶、丑陋、无能、死；上帝是主人，人类是奴隶。人类不能自己找公正、真理，永久的生机只可由神力暗示之。上帝创造世界，那些君主、官吏等都是上帝派下的，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人民应为吾主官吏的奴隶。”（英皇查理士第一说的“君权天赋”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耶教的精义。耶教为宗教中极有势力之教，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见了。巴枯宁说得好：“若然有上帝，我们也应把他来毁灭。”我们起来试试罢！

四

上面所列几种，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到幸福路的第一步，就要推倒这些。这些东西消灭后，再分配财产，自由组织，互相扶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图众人之利益，众图个人之安宁。这岂不是幸福吗？但我们要先出代价，然后能得到这幸福。这代价是什么？就是无量数的热血。巴枯宁曾说：“人生到世间，最痛快、最愉快的事，莫有过于革命的事业！你们都一想，与其蜷伏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幸生，何若磊磊落落、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这话说得何等痛快！何等壮烈！我愿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预备着满腔的热血，来干这最痛快、最愉快的革命事业，齐向这幸福的路上走！

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

谁都知道鸵鸟的方法(危险来时便将头藏起)是无补于困苦的。一切苦痛的然而却知道得很清楚真实性,较之自欺还是要值得赞美的。我们现在要来考察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在现代的重大意义,便不得不特别注意这些久已知道的事实。假若我们要夸大的宣传,说出各国的联盟、联合,大团体、小团体来(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我们自然可以使人惊异的。在北美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欧洲各处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联盟更以数百计。中国、日本、埃及、澳洲都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实在,哪一处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呢?现在世界中有一万或十万人自愿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虽有这许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实际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现象却不能满人意。我们因为怕敌人快意和讥笑的缘故,常常把这苦痛的事实隐藏起来,然而这举动反阻碍我们的认识力,并且表示出我们的无力,我们的错误,反而使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署名蒂甘。

那些我们所欲隐瞒的敌人快意。我们现在要来观察危机；我们的自述也许会被敌人利用，我们这一次却是他们对于别人失败而快乐的最后了。我们要防止我们这运动的退化，因此敲着警钟，要那些把我们运动的创伤视作个人自己的创伤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来静听！

固然在全世界中有千万个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们并没有联合成一个整体，并不曾走上同一的道路。他们所相同的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名称而已。除了那些终日与资本家企业主斗争的工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劳动团体的活动份子）而外，我们到处所见着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尼采的信徒、新虚无主义者，以及许多带有托尔太派或佛教或玄妙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根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加入工团活动。还有一些终日在咖啡店或茶馆中销磨时间的人以及一些小资本家，他们自己也浪费别人的劳力的结果，也雇用别人的劳动力，然而他们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人挂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招牌而不做实际运动的。到现在这许多人还以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名称，把这许多抱着相反的意见的人团结在一起。自然，无政府主义，那是劳动群众的革命理想，那是以暴力推翻现在“秩序”而建设无压迫的劳动社会的解释；这种现在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革命的观念居然被人误解了，这是无足怪的。

约在四十年前克鲁泡特金便讥笑过那些自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其实他们的全生活完全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而他们居然自谓“在理论上”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要

是资产阶级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了，那么，至今为什么平等、自由、博爱还不能实现呢？（《大家都是社会党！》《一个革命者之话》中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到了现在，各种不同的份子又“在理论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了。大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各个人以为无政府主义是他个人所喜欢的那样的，譬如在十个人中间，每个人的主张都是不同的。唯心论者要和唯物论者称同志了，甚至资产阶级也和无产阶级称同志了；重视个人享乐的人也和在工厂作苦工的工人称同志了。这样一来，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便失去了。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看成无上的“救世仙方”，说它可以消灭全世界各阶级所感受的痛苦，可以救济各阶级。所以他们便说无政府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建立在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于是他们自己也戴上博爱的面具，觉得自己是立在群众上面的超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忘却了无政府主义是从劳动阶级中生出来的，甚至把这种说法视作违背主义，所以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派的主张，其实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派所主张的大异。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是直接的，并非为着政治的目的，所以排斥一切专政，便是马克思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我们极端否认的。我们所注重的是经济的目的，即是用武力把现在社会的财富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回来，归还于社会，由生产者（工人）自己组织去接收。至于国家咧，政府咧，都是应该消灭的。

阶级斗争实在是无政府主义的特性，只有由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二

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史只能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时代算起。在十九世纪上期只有几个著作家有这种思想,然而这些人并不曾想到叫做“无政府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便是那个乡下人蒲鲁东,他是排字工人。他对于法国工人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曾予以绝大促进力。他也知道阶级斗争的重要。他曾说过:“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战争是世界史的全部。”然而蒲氏的主张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所以他竟想在资产阶级中找寻他的信徒,这是一个缺点。第一国际的拉丁诸邦的工人大都是信奉蒲氏的教义的,他们喜欢自称为“互依主义者”(Mutualist)。他们相信蒲氏所主张的国民银行,并且和平的由资本制度进化到无政府。

后来在七十年代初期,巴枯宁和意大利、法兰西以及其他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中完成了无强权的劳动社会的理想,这种社会只能由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战争达到的。第一国际承认工人与资产阶级间并无共同利害,所以宣言“工人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产阶级对于公社人员的一星期期间残酷的大复仇,便指示出来在现社会中两个对抗的阶级中间,永远横着一条大沟,永无合作之可能。特别在“巴黎公社”被压服后,无政府主义者便尽力从事于工人阶级之组织,预备来举起反叛之旗,实行革命,来报这一次的大仇。

三

还没有人明白的宣言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阶级斗争上面的。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创造者，第一国际的工人看来，无政府主义自然是工人阶级的理想，被掠夺阶级的理想，一直到芝加哥的殉道者柏尔孙司、司柏司、恩格尔、斐失儿诸人上了绞刑台时还是这样。这可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起源及发展都是从工人阶级中生出来的，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一样。事实是这样：工人阶级用武力对付资产阶级的战争不到全胜不止，只有由这剧烈的战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权力与资本的铁链中解放出来。当革命运动衰落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再造的国际便发达起来了，另一方面有一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倾向于都加 (Tucker)、墨几 (Mackay) 及司丁纳^①一方面的”，组成了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完全注重在“我” (司丁纳的《自我及其所有》的第二部的名称便是《我》)，忽略了群众，尤其忽略了劳动群众。不仅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并且还有许多自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信徒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在宣传满足各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说到工人，说到群众及其自身行动，说到革命。但他们并不是说现在的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和农民 (这些人事实上是为较好的将来奋斗

^① 司丁纳穷困以终，当时知道他的人甚少，后来德国诗人墨几穷毕生之力，著成《司丁纳之生涯及其著作》一书，司丁纳的主张才为世人所知。

的),那些反对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的到来好像是全人类互相宽恕的日子。他们虽说“革命”,但他们所想象的却是:当民众起来把现政府和平的推倒以后,那些掠夺者和压迫者便会自愿的加入胜利的革命党中,——工人与农民也会和他们的敌人和平的握手。人类互相亲爱的日子来了,狼与绵羊会和平的在一块游玩。这样便会走到无政府共产的路上。——果然吗?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被压服,芬兰、莱多维亚、匈牙利国资产阶级的复仇,波兰、保加利亚的白色恐怖,意大利法西斯特之横暴,智利政府屠杀工人,欧美各国反动势力的伸张以及苏俄“新资产阶级”(?)的赤色恐怖——这些足以证明出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鸿沟是永无法填塞的。狼与绵羊是不能在一块儿的。

巴枯宁在批评马克思派党纲时曾说过:“这党纲中的主张,最为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的人)所引为痛心疾首的,便是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工人作为阶级看待,而不认为是一般民众。”我们不要忘记巴枯宁在十九世纪中叶便说过这样的话。他要把劳动阶级看作“民众”和“人类”。他在《与法国人的信》内曾鼓动工人去拘囚一切扶助旧制度的人,他把工人的利益和工人的胜利看作最重要的事。

克鲁泡特金也不是立在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他一生都是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的。我们若读他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论文集《面包与自由》和他编辑的俄国无政府共产党人的议决案,便可知道他是赞成阶级斗争的,便在《现代科学与无政府

主义》一书内，我们也可看出这种主张。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友人都赞成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解放只有靠不宽恕的阶级斗争来完成。他们以为劳动阶级必需基础在日常生活的利益上面组织起来。武力的革命是不可免的；从旧的到新的中间是有一种过渡期的；那时对于那些拥护旧“秩序”的个人团体或阶级，不免要加以狂暴的攻击。至于有几个富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宣传的非武力的和平的革命，并且等着群众的自动，不去从事于革命前的组织，以为有一天资产阶级会痛悔前非，舍弃了以前的地位，来投身于民众的旗帜之下，无政府的社会便和平的实现了。那些终日坐在咖啡店或茶馆消磨时间的，以及过资产阶级生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大概如是。

四

我们应该起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理想和观念学，它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并非和平的，而是武力的。只有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然而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也不是不容许资产阶级中的“觉悟者”参加的。“无论何人，如生长教育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而真欲抛弃原有地位而为工人的友伴，则必须与原来的生活及一切资产阶级的习惯、感觉、思想完全脱离关系，并且还应认他们为仇敌，而与之宣战。”（巴枯宁语）假若他们仍然多少与

他们有点关系,则是工人的仇敌,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仇敌。

本来打算把 Hlebopjok 在《自由工人》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译出,但是译到中间,竟加了不少的话进去,简直不像原文了。近来我译短篇东西,常常爱就自己的意思加以删改,虽然有时曾声明过,但究竟算是不忠实,对不起原作者,所以这篇率性连“译”字也不要了。

一九二七年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实际问题，我虽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事实，不过我可以说仅有一小部分的同志是如此，并不能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有一些批评时事的文章，其内容只就一个原理演绎出一切，而不顾到事实。但陷于这种错误的，并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全体，而是少数的同志。我觉得对于那种意见我们仍有纠正之必要。

有一些同志往往只拿着一个原理，奉为天经地义，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于奉直的战争，以及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战争都以相同的话来批评；说我们是为着全人类谋幸福，于是反对阶级斗争，在谋全人类幸福的社会未能实现以前，对于其他的暴动以及没有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众运动，都不去参加；说要谋民众的解放，而自己不与民众接近，对于民众的疾苦和要求不能知道，也不想去知道，仅仅把几个很好的名词写在纸上，而不想法去把它们给与民众……这种态度对于主义的进行并无利益。然而一

* 本篇原为《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中之第二节，署名蒂甘。该书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由民钟社出版，署惠林、蒂甘、君毅著。

部分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并不如某一些人所想，是由少数聪明的个人在研究室创造出来的，它是平民的运动，最初发生于平民中间。起先只有微弱的趋势，后来逐渐明显，到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才把这种趋势弄成一种有系统的主义。所以有人说无政府主义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成为一种理想的和实际的组织，这是不错的。克鲁泡特金之所以能完成无政府主义的系统，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卓越到某种程度，⁸而是因为他是在资本主义的崩坏和无产阶级活动的时代。克氏自己从不曾说无政府主义的某部分是他创造的。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单把原理奉为神圣，而不顾实际问题了。

而且原理不是死板的，不是可以呆板地解释的，应该应用到实际上，由实际问题来证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释实际问题时，我们也不妨修正它，因为我们并不是迷信的宗教徒。

我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有错误的地方，不过是说明一个原理不是垂诸百世放诸四海而准的东西。而且无政府主义是实际的民众运动的产物，所以特别不是可以离开实际的。实在说来，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超时代的空想，所以有系统的无政府主义不会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前，而且无政府主义的发达也不会先于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很多说老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错误的。老庄的思想与近代无政府主义很少有相同的地方，而且在那样的时代决不会产生近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来。

再说到原理的本身，我觉得许多的人对于原理多少也有点误解。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战争吧，但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只是军阀政客为争利夺权而起的战争，假若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战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战争，我们是主张的。为自卫而战，为自由而战，马拉铁斯达且认为这“战争是必要而神圣的”。甚而至于殖民地脱离“母国”的战争，弱小民族反抗强国的战争，虽然其目的与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们也并不反对。说到为全人类谋幸福吧，有人便反对阶级斗争。《民声》第三十三期便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阶级斗争，而且还主张着。无政府主义乃是阶级斗争中被掠夺阶级（克鲁泡特金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里用“民众”这个名称）的理想和观念学。至于谋全人类的幸福的话，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已不是整个的，早分成为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治人阶级的理想”（克鲁泡特金语），“无政府主义真正的创造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阿利兹语）。

所以就原理来说，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不合原理的。而他们竟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在不知道的人甚至误会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真相，致发出许多无谓的非难，于此我们不得不辩明。

既说过了原理与实际，现在再来说实际问题，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国革命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朝夕所想念的，也就是怎样能使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唯物论者），我

们知道社会革命之到来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好意所能决定的，而是社会进化趋势所必至，只能由历史的需要来决定的。个人的劳力在物质条件的可能范围内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然而不是社会进化的唯一要素。我与惠林同志的意见不同，我是一个定命论者，而且定命论(Determinism)与宿命论(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认人类意志的表现，且承认人类不是被动的物质，不过他也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努力也要受环境的限制。惠林所说的并不是定命论。

革命与进化并不相冲突的，邵可倡说：“进化与革命是同一现象的连续的行动：进化先于革命，而后演进到革命。”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就可实现的，乃是由不断的革命与建设积累起来，然后可以成功的。阿利兹说得好：“无政府主义实现并不是突然而生的，我们最初不能把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完全实现，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实现它。”这样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之下，我们要立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理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并不错误，而且并不是空想，不过它的实现是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就是说它的实现不是像奇迹一样的突然降临，而是逐渐来的。我们每次的努力可以使它的到来快一点，但是也有限度。这纵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但事实确是如此。譬如中国一旦起了社会革命，我们要使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完全实现，在生产事业完全不发达、日用品都要靠外国供给，甚至粮食多少还仰给于外国这样的情形之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理能够施诸实行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便不得不退让一步，多

少迁就一点。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失败，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所以我们在革命未发生时即要先有预备，同时以合作主义的方法使工人自己来发展生产事业。革命发生后，也只能引社会向着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走去，不是一步便可走到的。

这是假定中国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后的情形，而实在我们也不能断定这在最短期间是可能的事。一则中国物质的条件尚未完成，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民众的隔离还远得很。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只拿几个原理向民众宣传，而不问他们的宣传能否达到民众中间，而且不问民众的要求。譬如从事于工人运动而不明白工人切身的需要，叫他们饿起肚子来革命，是做不到的。自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刻发生社会革命，便不去做预备的功夫，我们要使它的发生快一点才对。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已不是国民党的运动，而是民众的革命运动了。许多万的工人罢工了，许多的青年跑到战场去作战，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的革命者带有献身的精神去受死刑，去进监狱，要说他们完全是盲目的受着少数人的指挥，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要说他们是新的军阀的走狗，要说他们是纯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要说他们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国民军的北伐是一回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一回事。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

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现在能给一个更好的东西与民众自然更好，否则，袖手旁观的空言反对，在资产阶级的学者可以做到，但在一个革命家，这便是一个罪恶。“不完全，则宁无”，个人主义者可以这样想，然而一个为民众福利而奋斗的革命家至少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民众的要求不会如此。难道在你不能带来完全的(?)幸福与民众时，你便连民众从别方面得来一点些微的幸福也不要他们享受吗？何况这次革命运动不是一党派包办的，倘没有民众参加，没有民众的后盾，北洋军阀孙传芳等会得那样的失败么？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自己的错误。若因此就站在旁边痛骂这次运动，说只是政治的斗争，只是军阀的战争，说国民党和张作霖等是一丘之貉，那么，国家主义者和研究系等定在旁边大声称谢哩！

我们要知道，参加这次运动的并不是纯正的国民党人，譬如一个罢工的工人，你能说他的意见会与蒋介石一样么？他完全懂得三民主义么？他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么？参加战争的学生，你能说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总司令蒋介石一样么？假若你注意到实际问题，你将知道事实决不是如此的简单。十一年前的《民声》第二十八号上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习闻劳动家及小本营商者平日恒痛心切齿于袁政府者，谓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苟叩以政府之恶迹何在，则曰增多恶税也，剥夺平民生计也，军队骚扰闾阎也，而一般伟人政客所揭示之大题目如谋叛民国，解散国会，总统专制，混乱宪法等等皆不与焉。”假若你说那些“劳动家和小本营商者”是和“一般伟人政客”一

样想法，要夺取政权，要升官发财，要建立一个好的共和国，有谁肯相信呢？同样，你若向罢工的工人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丘之貉，他们也不懂的。他们的要求是与他们切身的利益有关的，他们并管不到政治，蒋介石究竟怎么样，国民党究竟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只晓得几个口号，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会”咧！他们知道北洋军阀封禁工会，压服工潮，帮助资本家，视工人如眼中钉，所以他们对之异常痛恨，他们要打倒它。他们这种举动，我们不能反对，因为这是关系于他们切身的利益的。总之，我们固然要记着原理，但同时不要忽略了实际问题。马拉铁斯达曾说过，无政府主义者从事工人运动时，有时为着工人的利益也要一点妥协，而一般从事于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曾鼓吹工人即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而且对于增加工资缩短时间的罢工运动也常赞助，并没有人因此种运动不彻底而加以攻击的。（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的罢工，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彻底，说工资虽增加而资本家同时提高物价，其结果与从前仍是差不多。其实问题不仅在这一点。每一次罢工胜利后，纵然实际上得不到多大的利益，而工人的组织便会更坚固一点，而他们对于革命的希望也更多一点。我们知道要有希望才容易起革命，因为每次罢工的胜利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不能抵抗资本家。这样的希望心一次一次的增加，到了一个时间他们便要起来革命了。那时工团的组织经过多次战斗后，也能成为极坚固严密的团体，足以适合革命的需要了。）

所以对于这次中国的革命的漩涡，我们应该投身进去，不

仅空言反对是不对的，便是袖手旁观也不该，假若我们自认是革命家的话。

号称“暴动的天才”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的一生参加了许多次的暴动，这些暴动并不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然而他总是热心去参加；他不因为它不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便加以攻击，他要跑到它（暴动）的里面去，想法使它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看一八七一年里昂的暴动便知道了。我们假若要做革命家，那么我们也应像巴枯宁那样投身入一切革命的漩涡里，把革命的潮流引向无政府主义之海里流去（不管流到多远）。如果你以为这潮流流不到多远，便想修造一座堤来防止潮流，那么结果这潮流一定会冲破了堤甚至淹没了你，而无政府主义之大海里仍不曾加上一点一滴。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我认为是极其公正的。

就拿俄国革命来说罢，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尽力于革命运动，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受着残酷的迫害。有许多人定会说无政府主义者上当了，其实，俄国革命之所以带得有社会革命的色彩，成为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民众革命，还是多少靠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工人管理工厂”、“农民管理土地”等口号，最初还是从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喊出来的，后来流行于工人与农民中间，最后布党也不得不承认这口号。假若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只袖手旁观，那么俄国革命也许要减色多了，然而对于他们，对于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处！

固然俄国的结果与当时革命者的希望大相悬殊，然而我

们不能说革命后的俄罗斯一定不及沙皇的俄罗斯，只有反革命党才可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假若曾研究过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一桩事，即每次革命的结果是和革命当时的希望相差得很远的。在革命时的思想总要进步一点，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向后走的时期。法国大革命时，热狂勇敢的民众拿起武器奋不顾身地向巴斯提堡垒进攻，无产阶级的妇女向着凡尔赛猛进，逮捕国王路易十六，各地的民众都拿着棍棒去破坏市政厅和监狱……结果怎样？你能说那些人的目的只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么？“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当时的口号，在拿破仑政府以至于在现在普恩开雷内阁政府之下，这三个字眼实现了多少？假若你看见监狱墙壁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大字，假若你知道现在法国还有不少的王党，你也许要骂法国革命不彻底，你甚至要骂它是多事。然而假若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不知还在怎样一个时代里呵！

再说到中国的革命上来。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对立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的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反对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反对它的一切建设罢了。（我从前在《民众》第一期的封面上印了一个口号：“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弱小民族自己努力”，一部分武昌同志及湖南同志都来函反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帝国主义不能消灭，打倒帝国主义是舍本逐末的事。又说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承认人类中有弱小民族的

存在。这和我意见完全不同。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同样，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便永不该独立吗？）一般民众同情国民党的地方，只有几个口号，在别的地方也许他们的意见是与国民党冲突的。在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是领导着群众（？），要是我们也跑到民众中间，投身于革命的漩涡里，引民众向较大的目标走去，那么，民众自然会离开国民党，跟着我们来，使这次革命运动多带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使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众的脑筋中留个很深的印象。如此逐渐的做去，虽然不能立刻实现无政府的社会，但至少民众得着向这方面走去（至少总比现在好）。然而，要是我们努力，或许种下一点好的种子，但若我们要筑堤防止这革命潮流，我们只有被淹没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已有多少比较国民党主张还要进步的地方，譬如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在上海时曾看见报上载武汉劳动阶级“横暴”的情形，通信者的意思是反对这现象，而我却觉得是很好的。我相信若我们参加革命的漩涡，我们也可造几个新口号如“农民自治”、“农民管理土地”、“废除工头制”等……在战争的混乱时期，我们也可以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以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的事，不要与政府发生多大关系。工人方面的运动，我们应该以工人的资格去参加，斟酌他们的要求创出新的口号，如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生活的

保障、工人教育的开办，在现在中国都很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鼓吹工人有直接监督工厂一切设施的权利，废除工头制，工人与厂主间的交涉由工会担任。至于工厂收归工人所有，在必要时可以鼓吹，但在中国现在是做不到的；在刊物上我们可以这样鼓吹，但做事时用的口号须与民众多少接近。

至于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可就原理上批评他们的主张，但决不应该用漫骂的口气。对于敌人，我们也应尊重他们的人格。自然，对于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野蛮军阀又在例外。有些同志主张在某一个事业上不妨与国民党取联络的手段，如打倒军阀等，俄国同志马哈诺（即大杉荣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将军的）甚至想到中国来参加国民军去打张作霖，对这种主张我尚没有一定的意见，这是要在做事的时候才能决定的。不过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这我并不赞成。

总之，我们若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漩涡里去，虽不能立刻使无政府的社会实现，但至少能使中国民众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接近一点，使这次运动多少带上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样比袖手旁观的在旁边攻击好得多了。

我因觉得对于主义缺乏深的研究，所以跑到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来，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这样我自己在中国革命的时期中像个逃兵一样的跑了出来，看着别人在战场里苦斗，哪里还有说话的权利！而且这篇文章的性质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但自己却置身事外，在良心上说是不应该的。不过我相信这些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虽不配来说话，希望同志们不以人废言好了。

中国无政府主义 与组织问题*

关于组织的问题，我的意见与全中国同志的意见一样，即是无政府党是需要组织的，而且需要严密的组织。在从前同志中也许有主张不要组织的人，但在现在差不多没有人会有这样的主张了，故在从前中国无政府党大多数是知识阶级，在中国的进步较迟缓的国家，他们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在秘密进行的活动中，他们完全不明白组织问题，甚至有人说无政府就是无组织。但后来，一方面由于原理上的研究知道无政府主义所需求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一方面由于过去的经验证明无组织便不能发展。所以在现在中国同志中最迫切的问题便是组织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先觉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赞成组织。巴枯宁常常说到组织团体的必需。而且从俄国革命以及中欧革命的经验中，我们更知道无产阶级如无组织能力，管理工业、农业、分配、生产等则决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故我们如要谋群众的解放，则必须发展群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壬平。

的组织力。我们要进行革命工作，也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力。

印一种小册子，出版一种刊物，这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然而实际的革命工作，有方案有策略的社会革命，便不是靠着个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这非由有组织的群众来完成不可，而为之先驱的，便是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从前有些同志深恐严密的团体组织只能妨碍个人的发展，这种思想实是错误的，团体组织非但不能妨碍个人的发展，反能帮助他发展的。团体组织所得的功效，除了各个人活动的效果外，还有一种群体活动的效果，这是分立的个人的活动所不能有的。

组织固然必要，但无政府党的组织是和其他政党不同的，这不是集权的组织，这一点，中国同志也是很明白的。中国同志所企求的组织是以自由联合的原则为基础的。关于此组织法，同志抱朴曾参考一九一八年乌克兰无政府党大会的议决案、同年全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两次议决案，以及一九一九年全俄无政府大会的议决案等并参照中国的情形，写了一本《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最初陆续在《民钟》等杂志上发表，后来又印成一本小册子。在大体上中国多数同志都赞成他的意见。其组织法的要点：团体的基本单位是以工厂、学校与其他机关内的同志组织的五人以上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与各村镇的小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区同盟，再由各区同盟进而成立全国联盟。在这里我举出一个极简略的组织法如下：

一、目的 无政府主义是有阶级性的，它不是Bourgeoise

的空想，它是无产阶级的 Ideology。所以无政府团的目的是在援助劳动阶级，进行革命的事业。

二、团员 凡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愿为劳动阶级尽力者均可加入本团，但须经团员一人以上的介绍，得大会通过登记后，才能为本团团员。

三、组织 凡工厂、学校内之同志有五人以上者得组织小团体，各小团体联合成立区同盟进而省同盟更进而为全国联盟。每小团体选举书记一人办理事务，任期是限定的。区同盟及省同盟组织书记部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选出。书记部须注意宣传事业组织劳动阶级。

如发生某项重要问题，各团体代表召集会议，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其议决案交书记部执行。

全国大同盟分书记、编辑、宣传、工农等部，其职务为经营出版、报纸宣传、召集大会、与各国同志联络。工农部专门应付工人农人运动。

四、规约 团员应执行一切团务，并向团体报告其所执行之职务。对于大会委派所做之事不得推诿。如破坏团体名义，不履行团员责任或无故不到会三次，即予以警告，如不听，得由大会通过开除之。

以上的大纲在大体上中国同志是同意的，不过各地所采用的组织纲领因各地的情形多少有点改变，有的更为严密了。

总上面的叙述，可略知中国同志对于组织的意见，全国同志意见既能大体一致，则组织问题已不复成问题，将由讨论时

期进到实行时期了。

这是预备致“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即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的筹备会的报告的一节,后因筹备会受法政府压迫,各国同志又多被驱逐出境,这篇报告便没有译出送去。现在录出一节在本刊发表。

给急弦的信*

急弦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我们异常高兴，同时我们还向你表示热烈的感谢。你的信想已由三藩市的平社同志回答了。因为这封信又转辗到了我的手里，并且很使我感动，所以我也与你写几句话，说得对不对，还望你指教。

其实我也没有多的话可说，因为你的见解已经很透彻了。像你这样明白而又虚心的人，是很容易了解真理的。我们要说的话，你大概早已知道了罢。

孙中山的人格自有他的相当价值，然而他说的话未见得就对。人是人，主张是主张。主张要是不对的话，无论是什么人说的，我们也要反对。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我们万不能因为信其人便推而信其主张！

你既然相信信爱先生的话是不错的，那么你便承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理由是不错的了，承认三民主义是不对的了。然而你却说出一个“但是”来。你说：“三民主义是对中国现状而发”，是“对中国的过渡手段”。但在你所认为“对的”，信爱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暴浪。

先生的小册中却明明说：“恭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怎样适合于中国国情，其实所谓三民主义的内容完全是西洋政治界中很普通的主张，孙先生并没有丝毫加以修正，就完全移用于中国……”可见三民主义还是洋货。那么所有的洋货都可以运到中国推销，何必定要三民主义牌的洋货来专利呢？其实只要一种主义是对的，便可行之于全世界，无所谓洋货土货之分。固然各国有不同的习惯风俗，但全世界的趋势则一。主义也就是世界进化的产物，他是就大体而立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由人民自己组织的自由联合的团体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业，这在各国都适合的。至于中国人应该吃米饭，西洋人应该吃面包，这些小事现在便管不到了。所以若拿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来反对从西洋传到中国的主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南方与北方的风俗习惯不同，因此三民主义是适应于南方的，北方应捧张作霖做皇帝，这岂不是很大的笑话吗？而且就事实来说，三民主义倒不及无政府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呢！

至于说舍近图远的话，你知道现在因为一般人都不懂无政府主义，怕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才远了一点；假若知道无政府主义好，就相信无政府主义，就宣传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很远的事！在满清的时候，保皇党的梁启超，不是也说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同盟会是舍近图远，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吗？然而到了辛亥满清一倒，他自己的论调也就变了。

有人说中国要成了富强的国家后我们才可以讲无政府主

义，这种人大概见了列强帝国主义者在中國历年来的暴行，受了很大的刺激，故有此种主张。自然中国富强了以后，一般资产阶级可以享一点福，资本家也不因内战而受损失，富人也不会被军阀敲榨，知识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会增高，留学生在外国可受优待，中国的资本家可占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得发大财，而平民呢？他们仍然苦于饥饿，疲于劳动，饿饭的仍然饿饭，作工的仍然作工，受苦的仍然受苦，做奴隶的仍然做奴隶。所谓国民革命只不过资产阶级革命罢了，可怜的平民，难道他们应该牺牲性命来替资产阶级谋幸福吗？难道他们还要永远做这二层奴隶么？看吧，欧美各国的平民何尝受着强国的福！他们的苦痛谁不知道！今天保不定明天的安全，自己拚命作工，到老便像狗一般的死去！可怜呵！中国的国民党员还拿这来骗中国的平民，还要他们牺牲性命求这样的幸福！

推翻国家是要在国家富强后才能推翻吗？那么女子放足也要等到把脚缠得极小，然后才能把它放开吗？外国人有时甚至没有中国人那样的自由，然而中国人却要拚命去入这种圈套咧！

就拿法国来说吧，那居留证把人民拘束得像笼中的鸟一样，一举一动政府无不知道。那野蛮的征兵制度更强迫人民去过非人的生活。甚至后来还定下法律，在战争的时候，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到战线上去防卫“祖国”。就是说要是法国政府和别国的政府闹了意见，法国的野心家要想满足他的权力欲，大资本家想把货物的市场扩大，那么全国的人都要去杀

人或被杀。为的什么？为的“祖国”！

中国的国民党员！你们的目的是这样，自己照照镜子，能不惊心动魄！

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极同情，但打倒之后要建设一个强固的政府，要把中国弄成富强的民主国家，这我却极端反对。

假若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为着人民的幸福的，那么我们便不应该拿三民主义做口号，我们便不应该重建政府！南京政府也好，汉口政府也好，都是一套鬼把戏！

我个人对于一般下级的国民党员是佩服的，我觉得他们的本心是好的，可惜走错了路！至于那些领袖们却有点骇人。好在先生说“我简直不敢恭维现在的国民党所谓领袖”。可见先生也和我们同意！而且先生更说“求一人如中山先生为我们信仰者，恐怕海底捞月还算易一点呵！”先生自己是国民党员，对于贵同志当然比我们局外人知道深些，先生既说国民党内无人，那么还有什么希望！难道中国的命运便随孙中山先生死去了吗？不！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先生，你若记得中国国内还有无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急待拯救的平民，那么请你抛开那无望的党！加入我们的队里来！我们是极其欢迎的。虽然现在我们无政府党在中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大的势力，那样多的党员，但我们这里而尽是一些诚心的人，我们的团体是自由的组织，没有野心的领袖，也没有盲从的人。只要真理不灭，这革命之少数未尝不可做出惊

天动地的事业来。希望先生勿自馁！不必坐等像孙中山那样的伟人出世！此复。并祝健康。

黑 浪 8月20日。

一封公开的信*

——给钟时同志

君毅的信

有一个问题，你也许早已想到：“中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了，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变节，都已冷淡了呢？”

最大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中国从前的无政府党，几乎全体是中产阶级出身，几乎都是青年学生、知识阶级。

二是他们在某一时期，都是热心太过，以为无政府革命立刻就会发生，他们几个人就可指挥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马上就可以完全实现。

这两个原因，是有密切关系的。现在不过为了说话便利计，暂时把它们分开。

无政府主义，当初本是从工人运动里发生出来的。在万国劳动会及犹拉同盟会，产生出近代无政府主义。当时参与运动的人，除了少数知识阶级如巴枯宁、克鲁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署名黑浪。

特金等以外，尽是劳动者。

到了后来，无政府主义渐渐发达，才有一些中产阶级、知识阶级里的人，爱好我们底伟大的自由思想，来加入运动。

他们虽然也给我们一时的宣传上的帮助，但是他们底缺点，很难完全消灭。

他们大都胆小怕事，善于谈论作文，但是在行动方面，不及劳动者那样不顾一切，勇往直前。他们里面有时也可以产生几个伟大的人物，但这完全是少数，而且不常见。

“革命”不过是那悠久的“进化”途中一个极小的历程，几乎看不出的一小段。一个人，甚至于一个党，在那无穷的宇宙里，又不过是些小得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分子。但是有些帝王、豪杰、野心家，以及“革命家”，他们底夸大狂，到了那样疯癫的地步，许多的无政府党，也不免受了他们的传染。

“如果我得了势，立刻可以使天下太平，万姓安宁。”无政府党换了几个字眼：“如果无政府成了功，那理想的、美善的、完全的人类社会立刻就会实现的。”

但我们应该问：“下次革命底发生、维持、成功，是否可以由无政府党包办？”换言之，“未来的革命，是否纯粹由无政府党一党来包办？”

在我个人，老实说，是不相信有这回事的。

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不像一间房子那样的简单，

拆了破旧的，马上可以另建新的，不要忘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已经有十六万万。

多少以前非常热心的同志，后来看见无政府革命，不是如此的容易，不是如此的简单，因而灰心，因而失望，因而冷淡，因而加入别党！

现社会令我们愤恨，令我们不平。

我们看不惯一个人拖着另外一个人，像一匹马似的，拼命奔跑；

看不惯一个年老的人，跪在路旁，向你耍个臭铜钱；

看不惯一个美丽的女子，在街上向你卖爱情；

贫苦、愚笨、贪鄙、奢侈、监狱、刑罚、军警、战争……无论到什么地方，随时可以看见种种不平的事，可恨的事。

我们于是希望一个社会，在里面任何人都用不着再去吃人，压制人，也不会再被人吃，再被人压制了！凡是人类可以避免的苦痛，完全消灭，大家同心协力，去谋大家底物质上、知识上、道德上、艺术上的幸福。

所以我们信仰无政府主义。

但是要到无政府主义之路，没有长时期的困苦艰辛的“预备工作”，无政府的社会是不会立刻实现的。

从前中国许多同志大都有一种通病：他们底“治人思想”从小养成，根深蒂固，便是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也还不能把种思想完全弃掉。

他们——我也许也患这毛病——一面“治人”思想没有去尽，一面“求速”念头实在太过，当然不免就去另找一条较容易，较短速的道路了。

怎样办呢？

希望劳动者里面，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渐渐多起来。他们里面，也渐渐产生些可以演说可以作文的人，以后遇见知识阶级、中产阶级里面的人，只让他们立在赞助的地位，如果敢来指挥，敢来命令，立刻驱逐出去。

“劳动者底解放，是劳动者自己底事。”

“只问耕耘，莫问收获。”

君毅 10月21日

致 钟 时

钟时同志：

君毅的信我读过了。因为《平等》的篇幅有限，我未得君毅的同意，便把他的原信缩短成现在的样子，但里面的语句仍旧没有十分改动过。

君毅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易于变节的原因，发现出两个来。虽然他信里的语句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他所说的两个原因，我却承认。

君毅在另一篇文里说：“黑浪说得好，离了劳动者就没有无政府主义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说过什么新鲜的话，我不过重述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从巴枯宁一直到高德曼）

许多年来所反覆不断说着的话罢了。但也很奇怪，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家和战士不断地重述着，然而无政府主义至今还是在被人误解。有些人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为某一阶级的，是为人类全体的，所以无产阶级不能专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的革命，应有各阶级来合作。我说这是在做梦。

俄国旅法无政府团的组织大纲上有一句很适当的话：“人类不是整个的了，人类已分成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实在主人和奴隶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在全人类中筑了一条大沟，是永远填不满的。只有在将来无政府的社会实现后，阶级的区别消灭后，人类才能成一个整体，那时才说得得到全人类的幸福。

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几个学者在研究室中空想的结果。它在民众中有深固的根底，它是无产阶级的欲求，又是时代的趋势。它是由生活的实际得来而又由生活的实际来证明。因此它不是浮泛的空想，而又不是适用于“生活情形完全相反的两个阶级”的万灵药。这并不是我的偏见，我们想一想看，世界上真有能把两个相反的东西连在一起的宝贝么？所以适用于两个相反阶级的，便是对于一阶级也不适用。狼是要吃羊的，要叫狼不吃羊，只有叫狼不要做狼。假若狼还是狼，羊还是羊，那么无论在什么好听的名词之下，它们还是不能生活在一处的。拿人类来说，主人阶级是狼，奴隶阶级是羊，主人阶级的正义人道，便是压制奴隶阶级，若叫主人阶级不压制奴隶阶级，这是做不到的事。所以若说将来有一天主人和奴隶联合起来实行无政府革命，谁也不会相信。

而且一个人要使他的思想脱出他的生活环境，这是很不

容易的事，在主人阶级（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他一定会以为现在的社会是安排得极好的，一切的制度都是能有利于人类的。他自己是现社会的骄子。他靠着一般工人的血汗享尽了现社会所能供给人类的幸福，在他自己是很满足的了。他维持社会，还恐怕力量不够，更哪里肯去推翻现社会呢？固然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是出身贵族的，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况且知道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生活的人，当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革命家，也是从实际生活的体验得来，并非读了一两本书受了感动就甘愿牺牲其地位而侪于平民之列的。

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只有劳动的人才能生存着，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么对于不劳动的资产阶级，无政府社会里就无他们容身的地位了。换言之，一个人要生存于无政府社会，必定要做一个劳动者。资产阶级不是劳动者，当然不能生存于无政府社会。那么无政府主义还能说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吗？离了劳动者还有无政府主义吗？

我们不要忘记许多以人道主义者自命的人，常常假借着人道的名义来维持着现社会。罗曼·罗兰便是一个。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罗曼·罗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反对一切的暴动，便是打倒极凶恶的暴政的暴动，他也反对，他的借口是“人道”。

自然假若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也可以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无权毁灭。但可惜我们不是基督徒。其实那些基督教徒也常常假借“人道”的名义，杀了许多革命家了。难道革命

家就甘愿在这“人道”的名义下被杀；无产阶级就甘愿在“人道”的名义下受压迫；现社会就该在“人道”的名义下维持下去么？自然我们最好是连一根头发也不伤害，连一滴血也不使流。我们情愿揩干人人的眼泪，不使任何人再去哭泣。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资产阶级不愿意这样，他们希望的只是不伤害资产阶级的一根头发，不流资产阶级的一滴血，不使资产阶级中有任何人哭泣。为了这个目的，虽使无产阶级流出无量的血液，受尽无穷的苦痛，他们也是愿意。

我在《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一文里曾说过：“对于那些失了抵抗力的工人必欲一齐杀尽，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下，工人只有往死的一条路上走了。”我觉得我的话并没有过分的地方。在无政府的社会中既然不能生存着不劳动的人，那么构成那社会的唯一分子便是工人。要是无政府主义也带上了人道主义的色彩，无政府的社会便永无实现之日，因为人道主义这个名词是资产阶级用来杀工人的最好的托辞，工人杀尽了，哪里还有无政府的社会呢？所以那些要把无政府主义染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色彩的人，简直是不懂无政府主义。

诚然克鲁泡特金在老年也常说他要写的《人生哲学》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是人的。这句话常被人误解。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反对我的意见，他说：“你所说的正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我要求的是人的正义。”我至今还觉得说这句话的人的可怜——人是什么？能吃饭睡觉、娶妻生子、杀人抢劫的两手动物便叫做人么？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连禽兽还不如，不知怎么

沾了他祖先的光，居然也披上了人皮，自己也以人自命了。对于这些东西，还有讲什么正义，什么人生哲学的可能么？野蛮人和下等动物的道德是：利于我者是善，利于人者是恶。“我偷邻人的妻子是善，人偷我的妻子便是恶”，这是俄国文学家高尔基描写野蛮人的道德观念时所用的话。近代的所谓“人”中，资产阶级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抱着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行动也能照着这样做去，所以为了保护他们一己利益的缘故，他们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残害他们的同类。最近烧死萨珂与凡宰特的事件便很可证明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要忘记当萨、凡的无辜已大白于世界时，那般资产阶级还坚持说他们是罪人。法国许多要求州长减刑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坚持说萨、凡是有罪的，不过因为他们已在死囚牢中过了六年的苦痛生活，为人道计，应该要求州长把他们的死刑减轻为无期徒刑！人道！人道！你难道竟能把两个无罪的人诬为谋杀犯，而要把他们判永远监禁么？）这可见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和野蛮人及下等动物的一样。“他们应该摒除在人类之外的。”只有不愿做资产阶级的奴隶的无产阶级才是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知道做人的道路，正向着做人的路上走罢了。克鲁泡特金所说的“人”便是指生在将来社会中的人，也就是指现在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无产阶级中已觉悟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不是只为无政府主义者写的，是为无产阶级写的，也就是为“人”写的。

从上面的话我们可明白，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从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靠不住的。自然我们不能

否认说由贵族出身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不是很好的无政府党，但我们要记着这只是很少的例外，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巴枯宁自己曾说过：“无论何人如生长、教育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苟真欲抛弃原有地位而为工人的友伴，则必须与原来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的习惯思想等完全脱离关系，并且还应该把它们当作仇敌，而与之宣战。”所以一个人虽出身资产阶级，只要他能脱离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关系，而跑到无产阶级的阵营来，则他已不能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了。反之若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的习惯、思想等，则他虽口口声声自称是无产阶级，也是靠不住的；至于出身无产阶级想去做资产阶级中的人，竟不惜卖掉他的阶级观念的那一类的“汉奸”（现在欧美的政界中这类的人倒也不少）也将要和资产阶级同归于尽。在未来社会中他们是不能存在的。

我并不愿挑拨阶级间的恶感，我也怕见人流血，但我不能说那快要来的事实。只要资产阶级没有真正的觉悟，只要他们还继续用武力来维持着这现社会，那么在最近的将来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一定不能免的，流血的惨剧也是免不掉的。而且我还要说那挑拨阶级的恶感的不是我们，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现在的情势谁都明白，谁都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战略只是防御的；总是资产阶级先挑战，无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才不得不过来反抗。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起见，无产阶级才不得不过来革命。所以我们可以预料现社会多维持一日，未来的阶级斗争便愈见厉害。资产阶级是在“自掘坟墓”的。

我自己也是出身资产阶级，就在现在也不能把资产阶级的习惯完全除掉。并不是我自己不愿，是习惯太深，一时很难铲除尽净，无意中常流露出来。我承认这是不对，但我现在总是在努力“改过”！我因为见到目前的危机，知道将来的事实，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化，才极力来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过是知道自己的罪恶，来努力改悔罢了；明白时代的趋势，顺着它而行动罢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资产阶级的批评是公允的。

以上的话不过证明君毅所研究出来的第一个原因是不错的。关于第二个原因，因这封信已写了六页，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下次再谈罢。

黑 浪 28 日。

法 律*

——“穷人的话”之二

—

提起法律两个字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并不是怕什么刑律第几章第几条；什么死刑，无期徒刑，几等有期徒刑。我也不怕有人拿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我怕的是那两个染满了无数冤鬼的血腥的字。难道你不看见这两个鲜血淋漓的字么？实在，这两个字已不知害死若干人了。

我不是一个法学家，我又不是一个学者，我不过是一个穷人。因此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法律的起原和功用，也不配写几本大书来解释它，赞美它。我在这里只说从我们一般穷人眼里所看出的法律是什么样子罢了。

说老实话，法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弄不清楚，我们穷人既没有时间和金钱进法政学校去学习法律，也没有程度去翻阅解释法律的厚书，那么我们只得自认是愚昧无知了。

我第一次知道法律的时候，就是我的父亲病在床上，睡了几天，我的母亲坐在床边哭着。我向他们讨食物吃，我的母亲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署名李冷。

对我摇着头，她说：“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说：“隔壁大饼店里正有许多新鲜的大饼，等我去拿几个来罢！”我的小心里充满了快乐，正预备跑出去，我的母亲连忙阻止着我：“儿呵！这是犯法的事，做不得的！”这时候我才知道法律这个魔王是不许拿新鲜的大饼给穷人吃，宁肯看他们饿死。

有一次我看见邻家的孩子满身绸缎，在挂着破衣的我面前夸耀，我回到家里问我母亲要新衣穿。她望着我哭。我说：“大街上的店里不是堆满了绫罗绸缎么？”母亲又说：“这是拿不得的，犯法的事呵！”我又知道法律是不许穷人有衣服穿的！

我看见邻家的孩子进学堂多么荣耀，我告诉母亲说，我明天也要进学校了。母亲说：“不缴学费的孩子是不许进学校的。”我知道法律又不许穷人的孩子读书了。

最后我的父亲死了。他是短命死的。他病了睡在床上不吃药，也不请医生看。我又问母亲这是什么缘故，她说：“请医生买药不付钱是犯法的事。”于是我知道法律是要穷人死的。

过后我又明白了许多犯法的事，我于是恍然大悟：所谓“法律”者，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吃人魔王，一切“不平之事”的主持者。人世间的一切罪恶都是法律造出来的！从此我便立誓要做法律的大仇敌！

二

我也听过有人说法律是如何好，如何不可废。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和资本家，便是“身居高位”的

官僚。他们的话也是不错的。法律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使他们有“家财万贯”，或是“身居高位”，于是大多数人便不得不到“贫无立锥之地”，“为奴为隶作人牛马”的地步了。

难道大多数的人都甘愿作牛马，做奴隶，饿死冻死么？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拥护这法律呢？

有人说法律是保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的。我们来看什么是现社会的秩序呢？

少数人压迫、掠夺、奴使多数人；少数人全不作工、终日游玩、穷奢极欲，多数人终日作工、颠沛流离、困顿而死。——这是现社会的秩序。

战祸连年，民不聊生，军阀暴虐，土匪横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与人战，国与国战，阶级与阶级战。——这是现社会的秩序。

妇女们卖身养活她的家庭，幼童被逼到工厂里作工，以致夭死；男子们工作过度，像狗一般地死在贫民窟里。——这便是现社会的秩序。

这样的秩序还值得保护么？

有些人开口是社会的安宁，闭口也是社会的安宁。他们说，若无法律则强盗杀人的事件无法制止，那么社会便不成其为社会了。然而我们先问一问为什么人要去杀人，要去做强盗？这是法律逼他去做的。因为法律保障富人来压迫穷人，法律不许穷人有饮食吃喝，不许穷人有衣服穿著。穷人中有一部分强悍的人，他们为饥寒所迫便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偷去盗，去抢去劫，有时甚至去杀人。他们明白这是做不得的，然

而却不能不做。做强盗有时或可不死，不做强盗却不免要饿死。存着这种心理，他们便甘愿去冒险了。杀人的原因甚多，（有因财，有因色，有因仇，有因酒……）但这都是由社会的不和谐所致；要是万人安乐的社会实现了，大家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谁还肯去杀人呢？至于强盗事件，因为那时万物为万人所有，大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谁还有去抢劫偷盗之必要呢？然而法律偏偏要维持现在这个不和谐的社会，拚命阻止万人安乐的社会的实现，拚命杀戮囚禁那般改造社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律便是强盗杀人的事的唯一制造者。

有人说法律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性命的。然而我们穷人没有财产，至于说到性命，法律说没有钱的人是不许穿衣吃饭、该冻死饿死的。可见法律倒是戕害穷人的性命的东西。

三

我们姑且昧了良心说法律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再看法律对于它所认为的“罪人”的处罚。第一，死刑：杀、刖、绞、钉十字架、枪毙、烧死、电椅等等；第二，徒刑：什么终身监禁，一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等等。死刑者，极野蛮极残酷的复仇举动也；监狱者，人间地狱之代名词也；法律之面子至少扫地尽矣。

而且监狱是罪犯的模范制造厂，监狱的生活非但不能使罪犯变好，反而使他们更加变坏。大多数人一旦入了监狱，一生便与监狱为缘，永远享不到人生幸福。（关于监狱，我以后在另一文里再来说。）

四

法律是少数人制定的(不管是国会也好,或……也好),司法的人是职业的,就是说这些人以定人死刑、判人徒刑、杀人刚人(说也奇怪,专门杀人的人倒不算犯罪)、监禁人们为职业的。他们这一般人有多厚的脸皮好意思来冒充为我们推举出来的代表?这是为着我们的利益么?不。立法的人都是富人,法官等也是富人,那么,无怪他们要保护富人了。于此可见,法律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我们不要它!

五

我还要来说,法律是一个欺骗的托辞,便是在法律的名义下,那般司法的法官还要枉法。有的法官受了诉讼人的贿,便故意开脱所谓“有罪的人”,冤害无罪的人。有的法官由于自己的偏见故入人罪,有的法官便连他们自己的法律也不顾了,全依着个人的意思去判定人罪。在中国在外国都是一样。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做律师,他办理的案件我都知道。有一次某一个人犯了八个死罪,他明明杀过人的,然而靠着我的亲戚的辩才,他居然得了无罪的判决。有一次,一件财产诉讼案件,这方面本来有正当理由的,但因对方向法官行贿便败诉了。

支加哥无政府党人案件(见本刊五、六期)正足以证明法官之受贿。萨珂与凡宰特事件更足以证明法官之枉法。谁都

知道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法庭方面仅有五个证人证明萨珂有罪，同时却有三十二个证人证明他是无罪的。凡宰特有三十一个证人证明他无罪，而法庭方面的证人仅有三个。而且法庭方面的证人自己的供词前后不符，有的是患歇斯特里的妇人，有的是娼妓，有的是小偷，有的是谎言者，然而法官便根据这几个人（不要忘记这几个人是被收买来作证人的）的话，判决了两个无罪的人的死刑。不管全世界成千成万人的反对，法律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把萨珂与凡宰特烧死了。萨珂与凡宰特事件不过是许多枉法杀人的事件中的一件而已。许多年来死在法律的名义下的冤鬼正不知有若干哩！于此可见，所谓是非曲直都是假话。法律者，一切罪恶之制造机器也。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答C. A. 同志的第一信

为无政府奋斗究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

——凡宰特

假若你怪我很久不曾答复你底来信，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的缘故，我底沈默证明出来我是要给我供献一个慎重的答复。而且我在这反动的时期，在这苦痛的生活中，怀着一个苦楚的心，抑下了奔腾的血潮，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所观察所思索得来的，并没有一点与我几年来所相信的主义冲突的地方。我不但不曾像那一般中途变节的人那样，发现了什么新的道路，违背了自己底真正信仰，而去做自己所反对的事，以求苟且生存于社会，反而我在这时代底前进中愈看出了我所认识的真理是不错的，我所走的道路是不错的。如果我能死一百次，又复活一百次，我仍要走现在所走的道路，我仍要做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既然又如此地将自己底思想和行为判断一番，评价一番，我明白我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黑浪。

不曾欺骗了我自己，我不曾卖掉过我底信仰，而且我还继续地生存于这浊流滔滔的社会中，并不曾玷污过我至爱的理想，那么我觉得我可以不带点愧色地立在你底面前，以同志般的真诚，兄弟般的友爱，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以我所确实感到而且想说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你这样地问了。在你底问话中我看出你近来的苦闷，你近来的消极，我知道你对于多年的苦斗已经厌倦了，对于正义胜利之信仰已开始怀疑了。你接着又问道：“这样的情形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终局呢？”亲爱的同志，相信我对于第一个问话，我底坚决的答复是：“照着我们底信仰所要我们怎样做的做去”；对于第二个呢，“这样的情形总有一天会终局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这一个疑问把我们引到一个人人生底大舞台前面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立在一个浊流滔滔的大海岸边了。我们还有什么路走呢？只有跳上舞台，跳入海里。然而我们在跳上、跳入之先，我们应该以透彻的头脑来把这舞台，这大海观察一下，然后才以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定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毅力投身于其中。在那里我们便可立得定脚跟，不会随世飘浮了。

我们现在且来把这舞台这大海——中国的社会——观察一番罢。不过在我们作这个观察之先，我要告诉你：几十年前在另一个国度里另一代青年怎样得到了这同样问题底解答的故事。这对于我们是一面明镜，我们要从这上面照出自己底面影来。

其实俄国民众主义底创始者巧尔里雪夫斯基在一八六三年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了。他在《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部小说内，所下的答案便是一代青年（旧虚无主义者）底理想之“三位一体”——（一）意志之自由；（二）有知识的女性同伴；（三）适合于主义之职业。这个理想竟渐次实现了。

我现在正以血和泪来写《俄国革命故事》，关于这个题目，我愿意从我所写的书底第七章《毕沙列夫与虚无主义》里引出下面的话：

……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虚无主义已大获全胜了。

“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旧虚无主义者至此已心满意足，不再前进了。巧氏底小说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客人，他来拜访他底先生。他以热烈的语调问那旧虚无主义者道：“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老主人底答复是：“我自己是幸福的了。”充满了热血的青年客人听了这样的答语不禁愤激起来了，又说出比刀剑还要锋利的話：“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要是你晓得你底乡土的同胞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你还能够是幸福的么？他们快要饿死了，政府夺去了他们所有的钱，强迫他们在街上去乞求一点面包皮。他们底苦痛诉之于人，人不顾；诉之于天，天也不闻。号寒没人给之以衣；啼饥无人给之以食。人生并非无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却不能不说是无情的了。也

许你不知道这个罢；不然你怎么能够享乐呢？怎么能够不去替他们做点事呢？你不是在数年前曾说过你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奋斗”么？

巴扎洛夫式的旧虚无主义者毕沙列夫等对于这个青年底质问是无法答复的，因此旧虚无主义便不得走上死亡之路了。而那个青年呢，他将抱着满腔悲愤而去了，从此他要用失望的语调来反复地自问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然而时节来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了。在这一个俄国青年面前现出了一幅图画：一个大的城市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而起了革命了。这个青年用了全副精神注视着法国赛纳河岸上正演着的惊天动地的活剧。他看见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听见在大路上被屠杀的妇人、小孩底沉痛的哭声。他们是为着什么而死的呢？为着什么而哭泣的呢？为的是工人底解放；为的是伟大的社会理想。

同时他又回过头来看俄国。好像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向他说：把你底眼光转到田塍上罢，你且看这一个人。这是一个农夫，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据说在俄国已再没有奴隶了。你再看清楚一点！这个自由的人并不是在劳动或播种。他在吞食土块。固然人把田地给了他了；但是他没有耕田的耒耜和锄锹，他也没有牛马，因此他无法使土地肥腴。他没有吃的东西，饿得急了，只得吞食土块！要是他在土里寻出了树根，他还要留下带回家去给那个在

破屋中等待着的妻子和小孩们。看着农民罢：他们底全生活充满了忧愁受苦和虐待。他们苦于饥饿，疲于劳动，永为特权阶级底奴隶，终日无休息，无慰安，无希望，无快乐地劳苦着；政府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知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夺他们，践踏他们，没有一个人援手救他们的。

热泪从这个青年底眼里流出来了，他底心苦痛着：“要是我真受着苦，要是我真在痛哭，这是由于那个苦痛着的俄罗斯老母亲的缘故，她眼看着她底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底枯瘦的怀中。俄罗斯呵，我在哀悼你！”：

然而徒然哀悼是无用的，于是这个青年便起来了，他现在得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他所下的答案是：“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不得不靠刀剑的力量。”他找到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到民间去”，他便向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农民怎样才能够想象他们自己，怎样才可以使他们得着幸福。为着这可怜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农民们，这青年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他底额上现出了红光，他底眼里喷出了烈焰。他于是在心里立下了严重的誓愿，愿牺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一切来解放那般匍匐于特权阶级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他知道那一类人曾流了生命之血来使得他——一个特权阶级的后代过着安乐的生活，能够安心读书增长知识。

于是这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掉那烧灼他底

身体的锦衣，弃却那梗塞他咽喉的美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足穿农民底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间去”的旅途。在那里他以一个贵族底后裔而加入农民底队伍，或入山间的僻地，或到田畔风暖之区，和农民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瞬间便把社会主义来宣传。只为了这个，这一类的青年就得了死刑与流放罪之判决。

“到民间去”的运动开始以后，又如何由宣传而进到恐怖主义，而进到皇帝之暗杀，而进到群众暴动，这其间的经过还需要一管调了血和泪的笔来写出的。一个十五岁的英国女孩说得好：“在这些男女底面前我们发觉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我在这里是不再叙述下去了。然而就从已叙述了的一段中，我们也可得到一个教训，一副兴奋剂了。

俄国青年所找到的答复也就是我们现代青年所应当找到的答复：“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为人民解放这一个伟大理想奋斗”，俄国青年在这一句话中找到了他们底生命工作，我们中国青年底生命工作也只能存在于这句话中。

现在鸡已三唱，天色已由深黑变为鱼肚色，快要变成白日的光明了。我见着光明征服黑暗的事实，我底心更是强健，我底信仰更是坚定！我相信终有一天光明要统治全世界！然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在第二封信里，我们再把注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战场的眼光移到现今的中国去罢！

一九二九年

无的放矢*

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致。对于主义，只是想想，只是谈谈而不能付诸行动，或者行动和思想、言论相反，决不能认为一主义者，明白地说，不能认为一纯粹的真实的主义者。把主义看做学术一样，加以精深的研究，即使对于主义的发展，很有帮助，也只能认为一个主义的研究者，而不能认为是一主义者。所谓主义者，是包含思想、言论、行动三者而言的。

吴稚晖、李石曾，以前对于无政府主义，曾经做过介绍的工作。中国首先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不能不推他们在巴黎刊行的《新世纪》（约在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所发表的文章。可是近几年来，他们是国民党党员；不仅是党员，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不仅是国民党党员，吴稚晖且做过南京政府政治部长；李石曾虽没有在南京政府中担任正式职务，然而他是时和政府中人发生关系，干直接关于政府的事。这是共见共闻的事实。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时候，据说有人请克鲁泡特金做教育总长，克氏说我宁愿做一个鞋匠。这才是真正的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春风。

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已经知道政府是万恶的，自己又跑进政府里面去，三尺童子，也会知道这是如何的矛盾的。世间哪有置身于政府政党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的思想、行动，都各有自由。吴、李一面虽为国民党尽力，一面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表同情于无政府主义者，这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是若说他们是一无政府主义者，是一纯粹的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但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决不认为对，就是只懂得无政府三字的人，也知其不可通。其实，在现在，如果和人谈论起无政府主义来，有不少的人都以为它的理想是很好，它是大家所喜欢的，可以说，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表同情于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少数。但是他们有的以为高远难行，有的以为非当务之急，于是在行动上都干别的事去，对于无政府主义，只是随便想想谈谈就是了。他们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敌人，但是也决不能就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

可是一些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人们，只以攻击吴、李为攻击无政府主义的不二法门。即使吴、李是纯粹的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真的有可以被攻击之处，被攻击的也只是他们二人，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无关，与无政府主义无关。何况他们明明是国民党党员，攻击他们者也明明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呢？这样的攻击真叫做无的放矢了。

无政府主义原理*

——为克鲁泡特金八年祭而作

无政府主义之出发点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否定国家，否定个人占据社会财富，否定一切的强权。还可以说把建立在不平等、不公道、压制及自利主义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整个地加以否定，把社会上所认为天经地义的旧宗教旧信条根本地加以否定，总之一切不合理的、旧的，已经属于进化的较低级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无政府主义即以这种否定开始而以种种的形式在历代的平民运动中表现出来。

而第一个使无政府主义成为完全的体系完成了无政府党的纲领的人乃是巴枯宁及其信从者。自然高德文、蒲鲁东已经具有了无政府的思想，蒲鲁东还是第一个公然高呼“财产是赃物”的人，然而事实上蒲鲁东的主张不免有点含糊，他的国民银行也和近代无政府主义差得远，所以他一生很难得人了解（见赫尔岑书），他的书也被人称为工人阶级的难懂的圣经（见波斯格的国际工人协会），著作虽多而翻译成外国文的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黑浪。

很少。在近代无政府主义战士中蒲鲁东是很少被人提及的了。真正值得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还是巴枯宁。

巴枯宁一派之能完成无政府主义体系者，在顺的方面是得着蒲鲁东的自由联合主义之鼓励，在逆的方面得着马克思的中央集权主义之刺戟。巴枯宁派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之初，主张还不十分显明，到了后来在第一个国际中强权与自由之两种倾向才逐渐显著，彼此对抗发展，遂形成了近世两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巴枯宁派退出第一国际后才正式成立无政府主义的团体。

无政府主义虽以单纯的否定为出发点，然而在斗争中是常常会走到积极的、肯定的一条路上去。在历代平民反抗强权的战斗中常常发生出自由社会之理想的萌芽来。而后来在像高德文、蒲鲁东以至于巴枯宁那样深刻的思想家，是绝对不能以单纯的否定为满足的，他们在否定之后便接着来阐明他们的肯定（即无强权的自由社会之概念，在这社会中各个人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是非常幸福）。

“不要国家”、“不要强权”，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个否定，然而在巴枯宁他们的口里说出来，却有了一个很深的肯定的意义。这句话同时是哲学的和实际的原理，其意义乃是指明现今社会生活全体（小自个人间的日常关系大至五大洲各种族的关系）能够而且应该依据无政府的几大原理而改造过。无政府主义的几大原理为何——一个人的充分的自由、集体间的自由协意以及成为社会习惯的体感相关而已。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大的哲学思想。它实在并不只是某种

行动的动机而已，它是一大哲学原理。它是由社会事实、人类历史以及古今来进步之真正原因三者之忠实的考察，而生出来的一个总合的见解。我们要接受这种概念，必须把我们在过去和现今对于社会现象的大大小的见解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见解那样一起改变过。

无政府主义是我们日常斗争的一大原理。而且因为它能够把民众的深切的要求和愿望，概括出来，表现出来，所以能够成为这斗争中的一大原理。这个原理虽屡经治人阶级和官僚学者的摧残，却永远保持其寿命，而且一天天地活动起来，促成社会的进步。

无政府主义表明一个理想，就是：全世界生物和人类都具有团结的感情，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使社会进步。这理想并不是新的，自有社会以来，它便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它永远在谋改善人们的互相关系，将来有一天它是会把种种使人们互相隔阂的障碍（如国家及阶级的界限）打破，而实现人类之大团结的。

最后我们还要承认无政府主义是根据最近的科学趋势要将物理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改造过，这种工作已有许多酷爱真理的学者做过了，虽然他们在实际运动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从实际一方面来说，今日之无政府主义所负的使命已较从前的大了许多，它如今不再是工人攻击厂主、百姓攻击官吏、部下攻击首领的一个单纯的斗争了。它虽然依旧把这一

切包括在内,但它的范围却扩大了许多。

无政府主义如今乃是两大原理(即自由之原理与强权之原理)的斗争,二十世纪正是这两大原理决死战斗的时代。在这场大战中一边竖着强权的大旗,立在这旗帜下面的人数是多极了,各党各派都有;一边竖着自由的大旗,团聚在这旗帜下的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人数虽少得多,然而却得民众的暗中帮助,因为民众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强权战斗。

历年来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独力拥护着自由之原理和民众之利益以与强权的党派战斗。所有强权的党徒总是迷信强权,以为非用强权不能使人们幸福。如果他们也高叫“反抗压迫”,则他们不是仅反对别人来压迫他们,便是主张改变压迫的形式,或减轻一点压迫的苦痛。如果他们反对绞刑架,则他们主张用电椅;如果他们反对用牛筋的皮鞭来打人,则他们主张用马尾的鞭子来打人。一旦他们得势,依旧杀人如麻,压迫如故。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懂得自由,才酷爱自由。强权的党派说:“没有工钱制度和饥饿,没有法官和警察,没有随便某种形式的刑罚,社会的组织是不成功的。”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却敢公然地说:“这东西决不是进化的要素,有了它们,‘自由’便逐渐消灭,社会内部便失其和谐,而社会的进化便停滞了。要谋社会之最大可能的进步与乎人类之最大可能的幸福,非废除上面的那些东西,而单依据自由之原理不为功。”

自强权的党派与自由的党派明显地对抗以来,强权的党

派便感到一大危机，它看见在它的面前有一个有力的原理，这原理如果有一天被民众完全了解，就会起大革命，强权的命运便难自保，因此它便不惜极力拖住一切旧的形式来防止自由，拿旧的成见来欺骗民众，以阻挠革命的势力。

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时期中所负的责任更大了。

第一他们应该把无政府主义的原理之哲学的一方面阐明出来，把它再应用到科学上去，由此便可使得思想界起一大改变：要它来纠正历史、社会经济、哲学等等之谬误，去掉学术上的、社会上的一切成见，把本世纪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化”。克鲁泡特金后半生的工作便是这个，而且已经有了功绩了。在科学上，无政府主义的大师所得的结论和多少爱真理的科学家的结论是极近似的，或者相同的。

第二个工作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同志在做，但离完成之期还早，这就是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之实际的部分来建设无强权社会，——即以自由之原理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工作只能靠着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之逐渐发展来完成的，现在应该我们来完成这种工作了。

克鲁泡特金说得好：“这种待完成的工作之伟大，对于那个觉得有战斗的人岂不是最好的鼓励吗？”

我们记着：“为无政府奋斗究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如果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凡宰特语）

附 录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

——覆六一同志的一封信

(上略)我不承认暗杀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不赞同你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有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的意思是“在宣传的时候往往被有特权者压迫或阻碍我们的进行，我们想完成我们的革命，非把有特权者杀掉不可”。但你要知道假若我们有力量足以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把特权者推翻，用不着暗杀了，若我们没有力量，则纵使杀了一二人，流血数步，事实上新压制者又将起来，而民众仍在下面受苦，我们的进行仍不会有好的现象。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被刺杀后，继之而起的亚历山大第三对于革命党的压迫更是猛烈。这便是个例子。并且当一个革命党，以党的全力注意到暗杀这方面，有时杀一个暴君或显宦，费了许多的精力，失败了许多次，然后才得成功。在这种时期中，因为周围形势的危急，这个党必定会把其他的事都荒废掉，而且无余力预备以后的事，纵使暗杀成功，革命党亦会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没有人再能注意到这暗杀后的计划了。亚历山大第二被刺后的俄国革命党人的行动正是如此，以致

新的专制者安然地起来继续与革命党开战。难道俄国革命党当时竟连这个也不明白么？事实上集权的暗杀只能有这样的结果。

你说：“社会革命不能即时实现，……他方面也由于有特权者把坏制度维持下去，来和他们革命者对敌。”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民众之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之不足，这使得现社会延长下去。有特权者的几个人算得什么一回事，一旦暴动一起，军队叛变，在民众的势力下，那时我们会知道有特权者是怎样的无力了，杀也可以，囚也可以，还用得着像从前那样牺牲多数人的生命和精力为孤注一掷之奋斗么？

若说宣传，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谷逊之刺杀美国大总统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之利益，反引起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柏克曼之刺杀福利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异常反对；拉瓦夏^①的举动，格拉佛极端攻击。我虽然很了解柏克曼等，但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举动于主义之宣传有多大好处。再说一句，就是暗杀是个人行动，其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无关。

许多时候以来，人们便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terrorist)当作同意义的名词，这种错误的认识对于主义的运动很有妨害。柏克曼自己曾经刺杀过资本家福利克，然而，

^① 拉瓦夏：法国无政府党，有炸弹大王之称。

他在从前致中国某同志的信上说：“欧洲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了。恐怖主义者在其他的各种政党里都有；这是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与乎社会的情形之结果，但与共和党、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无关的。”中国人之易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一方面固由于我们宣传之不得力，但一方面，这也是“地底下的”国家里应有的现象。秘密运动的团体，四围都有敌人，时时都在危险之中，这种变态的生活会使得这团体的分子趋向于恐怖主义。所以这恐怖主义者在“地底下的”俄国特别发达。现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也有不少自称恐怖主义者的。

恐怖主义是什么？这并不是很难解释的。照恐怖主义本身来说，这恐怖是指报复政府白色恐怖的赤色恐怖（革命党的恐怖，与现在所谓赤色恐怖不同）。那么，恐怖主义就是报复主义，亦即所谓“一命报一命”的主义是也。著名俄国虚无党人司特普尼克在刺杀了麦孙采夫将军后（一八七八）曾刊行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一命报一命》（A life for a life）。马沙里克说：“这题目就是恐怖主义者革命的伦理学说”。司特普尼克的意思，现在政府的军警如何厉害地用武力来压迫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们，并且杀害他们，那么对于那一群匪徒都有权利来以武力保护自己了。他这“一命报一命”的主张，即是有特权者杀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那杀人者杀掉；这全是防卫的报复的性质。一八八〇年民意社员加可屋斯基因暗杀运动被捕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曾宣言：“我们采用这手段（指恐怖主义）是为着保护我们团员的缘故，并非想以此实现我们

的目的。”一九〇二年巴尔马雪夫因暗杀内务大臣西皮雅金被处死刑。在受审时，他说他的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他宣言：“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一九〇六年，沙恭诺夫刺杀了蒲烈夫后，在监狱中写给他的父母的信说：“我杀了人，手上染满了血。然而这是由可怕的斗争与受苦所致，这是由于见着生活之可悲的实际情形所致。……”这便是恐怖主义的“一命报一命”学说的实行。阿尔金在《俄国革命之灵魂》里解说得很好：“他们是受着内心的驱使的。这样暗杀工作是由于道德情感的兴奋，使他们不忍见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为而不立刻起来报复。”在这里，没有义务的观念，理智没有活动的余地，感情完全占着上风，报复的行动都是如此的。再举事实来证明：麦孙采夫之被司特普尼克刺杀，是因为他劝“沙皇”对于“一九三人案件”施以加倍的刑罚。彼得堡警察总监因虐待犯人布哥路博夫，便被沙苏丽奇枪击。汤播弗省总督残害农民，即被玛利亚·司披多诺华刺杀。哈尔可夫总督克鲁巴金因同情狱吏虐待犯人，也被人暗杀。这样的事不少，现在也不能多举。这许多次的暗杀都含有报复和自卫的性质。这“报复”和“自卫”便是俄国恐怖主义的两要点。只要有政治的自由之国家内，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的实行便是不必需的了。所以一八八一年美国总统加非尔德被刺杀后，俄国民意社执行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宣言，攻击暗杀者，说“在人民能自由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见不仅造成法律，而且会使司法的人施诸实行时，在这样的国家内，政治的暗杀无异表示一种专制的趋势，这与我们要在俄国内所破

坏的专制正相同……”。

这可见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二而非一了。无政府主义者中也许有恐怖主义者，但这两种主义的本身没有多大的关联。有许多同志要用暗杀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或以为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只是暗杀，这在我看来是不合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对于无政府主义，对于民众并无好处。要实现无政府主义，除了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外，并无其他的路可走。

那样，我便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暗杀么？不，不然。就恐怖主义的本身来说，它也有它的价值，我不能否认。

恐怖主义的要点在“自卫”与“报复”。“自卫”是黜戒以后政府的行动；“报复”是报过去的仇。这在“地底下的”组织里是需要的，但在公开活动的公开组织，这便不必需了。所以被动的自卫的主义的复仇已不适用，在西欧国家内的暗杀事件，这恐怖主义的范围已扩大，而且不纯粹是被动的了。一九〇一年美国大总统麦坚尼被梭谷逊刺杀后，美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把一八四八年海岑写的一篇文章《以死报死》掲載出来。这“以死报死”使得司特普尼克“一命报一命”的学说更广大了一点。这意思是我把你杀了，我自己也把我的生命来报偿，即“我杀你，人杀我”，与“你杀人，我杀你”的“一命报一命”已不同了。这离开了“自卫”与“报复”，所以没有以前的那样简单；其实这也不是仅由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智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我们的毁誉都生不出效果的。因此对于那些鼓吹恐

的痛苦来报偿。所以阿尔志巴绥夫的《朝影》中的奈司拉莫夫就明白地说：“我爱那阳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那青春，以及一切自然母亲所给我们的和平与欢乐。我实在不愿意杀人。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究竟去杀人，去就死了，因为“我自己爱人生过烈，所以看不得别人来把它破坏”。同样，像《灰色马》中佛尼埃在死囚牢里所写的“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狱中记《死之忏悔》也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

古田是一个纯真多感的青年，他有那爱他的父亲，他有那爱他的妹妹，他有那爱他的朋友；他对于他们的爱情也是极其深刻；甚至于一只猫一只狗，他也时常想念。这真是一个无所不爱的人！对于他的父亲，七月二日（临刑前一百余日）的日记上他写着：“父亲的信来了。……文中有‘父和同胞会永远把你抱在胸中的’的话，我读的时候，不觉落泪了。”对于他的妹妹呢，七月二十日午后六点钟他在日记上写着：“妹妹们！睡了罢。”只这两段短短的话便是表示出他们的爱情，是血是泪，我真不忍重读了。对于他的朋友们呢，在他的许多好友中我只举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殉道的中滨铁来。中滨铁也因同样的事件在绞首台上牺牲了生命。古田先中滨铁六月死。中滨铁的弔古田的那首长诗在他的个人创作集《黑面包》上发表。我且举出很短的两段，便可表示出他们俩的友情。

我的眼中闪着灼灼的光辉，
我的心里却结了很厚的冰层；
露么，一滴都没有了。

同志哟！

在这心已干枯了的时候，
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京城之夜——三月，
从北面山袭来的，
烈风一般，严酷的余寒，
尚不能冻灭我们的强烈的火焰；
两人的握手啊，火似地在黑暗中烧燃。
噫，生离么？还是死别！

这友情不真是到了“你的‘是’便是我的‘是’，我的‘否’也就是你的‘否’。”（见中滨铁诗）的程度么？然而这一切——父亲的爱，妹妹的爱，朋友的爱，他都牺牲了。“为了真实的缘故只得不顾亲之泪与肉身之血，而做下去了。……父哟，请给有理解的爱与你的儿子！”这真是血泪中迸出来的呼声了。

他的最后是这样的：“他带着一只狗（名太郎）和一只猫（名“克鲁”，纪念克鲁泡特金的意思）的照片，以及他的妹妹寄他的一片枯叶上了绞首台。那狗、猫都是他生前所爱的。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绞首台上他仍怀着慈爱的心呢。”这样的死比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毒药，还要光荣得多。这才真正是为爱之故而死呢！

他的父亲说：“厚于人情连猫犬也爱纯美的心，这时如何了。”这应该去问现代社会，和同时代生存着的人们。极端的爱

而不得不用恐怖主义表现出来，自己无所不爱，而不得不抛弃所爱的一切，杀身成仁，来为将来的人，谋普遍的爱的生活。这种人固是有伟大人心之至人，而使得他去这样做的现社会却是应该如何诅咒的了。他的手枪他的炸弹不是钢铁和炸药，而是自己的血和泪以及无数平民的血和泪造成的。

同样，沙恭诺夫在一九〇六年给他的父母的信中便明白写出：“我做了世界上所有事件中的最可怕的一件了。我杀了两个人，把我的双手染满了腥血。然而这由于可怕的争斗与人民的受苦，这由于见着那可悲的生活实际，我才来拿起宝刀。然而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先下手的人。……请试试了解我并宽恕我罢。让人民批评我及我们的同志（那些被处死刑的以及现在活着的）像我的辩护士批评我一样。他说：‘这个人所掷的炸弹并不是装满了炸药的东西，而是满载着全体平民的眼泪和痛苦的炸弹。向他们的治人者掷炸弹，平民希望这至少可以消散他们胸中的可怕的梦魇’……”

这满载着眼泪和痛苦的炸弹谁能抵抗，谁又能说掷这炸弹的人是暴徒。这样的人，他自己甘愿受尽无穷的苦痛，牺牲他个人的幸福的生活，来为将来的人建立爱的世界，虽然他的炸弹未必就能有益于爱的世界的建立，然而这种崇高的人格，血和泪结晶的心情，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人间最优美的。这样的人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世间最优美的人，而他们竟不能把他们的精力应用在建设事业上，在青年时代（大都二十岁左右）便在断头台上送掉了性命。这种社会还不应该改造么？

这样，近代的恐怖主义已较从前的范围大了许多。除了

“自卫”与“报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破坏”。这“破坏”的出发点便是一个“爱”字，——爱而不能得适当表现的爱。因为不能为人们建设爱的世界，故只得来破坏这恨的世界的一丝一毫。这虽然范围较广大了，但仍是现社会中的种种罪恶造成的。这与无政府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这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则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与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我们鼓吹也好，反对也好，这毫不会有影响的。

我不反对恐怖主义，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但我却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下略)

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①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水星》第二卷第二期。发表时题为《信仰与活动——回忆录之一》。

① 一九二五年秦抱朴同志介绍我和高德曼通信，当时她在英国。

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南京接到。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 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①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

① 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

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

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姊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①命的传单。

① 这里的“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小小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句话就有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大约在刊物出到八九期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到刊物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一位编辑又来找我谈话。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他们邀请我参加刊物的工作，后来我就做了编辑。

《半月》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学生和军人发生了冲突。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我们先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到刻字铺去刻了一个长条的图章，用朱红印泥盖在那篇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这期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柜上，任人购买。读者们痛快地读完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激昂的辞句所感动。他们在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惊奇地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较大的字：“文本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去的，用在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就这么容易地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

但是《半月》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举行周年纪念庆祝会的时候，刊物就突然被禁了。查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就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倘使你公开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希尔席费尔特^①很有研究），就会骂你脑筋封建。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滸儿公”^②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也不曾引起任何的麻烦，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会写些带感情的话。我大胆地凭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篇文章在今天发表也会成为问题，可是在当时却平安地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

当时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辫子，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

① 马·希尔席费尔特（1868—1935），德国精神病学家。希特勒封闭了他创办的性科学学院，烧毁了全部的藏书和文件。

② “水滸儿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滸儿”和“滑头”同一意思。

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发表了两三篇这一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写的。这一来警察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找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这件事情，并且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交给他们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准备来跟我们讲条件。可惜我们这一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来不会拐弯，更不知道让步妥协。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跟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就下了查禁的命令。可是他们已经显得被动了。以后我们还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记载这件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的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沸腾起来。这位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业了，便因为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没有机会和他再见面。听说他在大革命中为革命事业奉献了生命。

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畅销的。每一期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大容易，所以每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为这刊物我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精神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经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崇拜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让我在

此地祝福他。

那时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人正要创办一种《警群》月刊，听说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参加他们的工作。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是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也不懂得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们却坚持登在创刊号上。他也就同意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居然也发表了意见。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跷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翻造房子，我为了方便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走了好几次，校长都没有说话，他却拦住我不让走。我望着他那张带黑色的瘦脸，不觉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

第一期《警群》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先生们反倒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暗地跑到警察厅去告发。警察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跟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刊物停了。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平民之声》。这次由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察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望着印机转动，注意地望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从印机上飞下来。我们兴奋得甚至忘了晚饭。

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好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

“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李老头看见我跨进门槛，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的手里。

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

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白：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宗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来了麻烦。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一九二一年”字样，他们却把“新世纪”当做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人看见。

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发卖。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的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察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第三期上有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从第四期起我们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完毕发回来以后才肯开印。刊物第四期上开始连载我的一篇题作《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的长文。这自然说不上研究，唯一的秘诀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发表到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印出来，但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剔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

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出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刊物上选了一篇《支加哥的殉道者》转载,这篇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很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这家印刷局的负责人比耗子还胆小,刊物付印时我们去迟了半天,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的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人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是后来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地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

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拚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 farce ① 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在报纸内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是并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了。我们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们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②

① farce(英文)，笑剧的意思。

② 这篇文章一九三五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写成，是故意写给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图书杂志审查会的老爷们看的。(一九五九年注)

我的幼年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坏了，这些时候都不曾修理过，雨水就沿着窗户从缝隙浸入屋里，又从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书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书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书、信和稿件全打湿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听见滴水的声音才慌忙地爬起来，扭燃电灯。啊，地板上积了那么一大滩水！我一个人吃力地把书桌移开，使它离窗台远一些。我又搬开了那些水湿的书籍，这时候我无意间发见了你的信。

你那整齐的字迹和信封上的香港邮票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张西式信笺。我才记起四个月以前我在怎样的心情下面收到你的来信。我那时没有写什么话，就把你的信放在书堆里，以后也就忘记了它。直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雨夜，你的信又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朋友，你想，这时候我还能够把它放在一边，自己安静地躺回到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吗？

“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打算留来坐 Bus 回鸭巴甸的。”

在你的信里我读到这样的话。它们在四个月以前曾经感动了我。就在我第二次读到它们，我还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过那些荒凉的墓场。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个同伴，因为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而且我也有过和这类似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我确实有的太多了。从你的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过去，你的话使我又落在一些回忆里面了。

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

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家把她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样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唤着“妈”这个亲爱的字。我的声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墙壁上母亲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

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时在狭小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黯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馁地死在街头。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张破席。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

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别人硬说他偷东西，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内。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期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和长辈的权威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这是陈独秀们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来。这天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发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我依旧到处去找寻方法来准备牺牲。我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一本《实在自由录》第一集，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然而行动呢？这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渴望也更加变得迫切了。

大概在两个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这是一个秘密团体的宣言。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做我的介绍人。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而且对我解说了许多事情。他们把我当做一个熟

识的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们绝对想不到别的许多事情。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高扬起来，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均社。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地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但这样的会议是不常举行的，一个月也不过召集两三次，会议之后是工作。我们先后办了几种刊物，印了几本小册子。我们抄写了许多地址，亲手把刊物或小册子一一地包卷起来，然后几个人捧着它们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印了一种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那一天天气很好，我挟了一大卷传单，在离我们公馆很远的一带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它们散发光了，又在街上闲步一回，知道自己没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到约定集合的地方去。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这一天我们就像在过节。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几条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到家里。晚上我悄悄地叫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浆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地读完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半月刊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人。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几条黑暗的街巷到“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愉快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带着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啊！

我就是这样地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那时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风，关注的窗门突然大开了。雨点跟着飘了进来。我面前的信笺上也溅了水。写好的信笺被风吹起，散落在四处。我不能够继续写下去了，虽然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你吐露。我想，我不久还有机会给你写信，叙述那些未说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话不能够帮助你更了解我。但是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信给我唤起了这许多可宝贵的回忆。那么就让这风把我的祝福带给你罢。现在我也该躺一会儿了。

1936年8月深夜

[注：目前中国出版的巴金文集，都被当局因不同时代政治气候，改来改去。这一篇表明巴金思想成长的重要文章，被剪掉他第一次写信的人生导师——陈独秀——的名字。而关于被他称为“精神母亲”的美国安那祺主义战士爱玛·高德曼的那一段描写，则被全部删掉。本文自《巴金代表作选》上海全球书店印行，民国29年4月再版。赵京，2009年11月4日]

我的几个先生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想你能够看见它们的。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创刊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语是很简短的，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当我知道你怀着何等急切的心情渴望着读我从前翻译的廖抗夫的剧本时，我的心更因惊喜和感动而微微战抖了，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話。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须得着生命的光。”那是基督的话，而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你读我的《家》读了一个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促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是的,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些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家》里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来的:“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我。……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爹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种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渐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跟过“赵大帅”打西藏，在那里吃过“蛮子”的肉。（《灭亡》里有一段关于吃人肉的叙述，就是他对我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因为吃粮被打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地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的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天像流星似的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

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现在不把她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他相信了安那其主义，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他很喜欢当时一个流行的标语：“人的道德为劳动与互助：惟劳动乃能生活；惟互助乃能进化。”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这是他受了师复的影响后发动的。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

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吧。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诉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1936年9月

[注：目前中国出版的巴金文集，都被当局因不同时代政治气候，改来改去。这一篇表明巴金思想成长的重要文章，被删去关于“廖抗夫”、“安那其主义”和中国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师复的名字。本文自《巴金代表作选》上海全球书店印行，民国29年4月再版。赵京，2009年11月4日]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①序

“有什么关于安那其主义的书记可以读的吗？”我从各方面得到这同样的问题。

去过伦敦大英博物院或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人当然会惊奇安那其主义文献之丰富。然而在我们中国却找不出二三十部可读的书来。而且严格地说，我们所希望的一部极其浅明而有系统解释安那其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书记，在中国简直是没有。

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运动的经验常常使我感觉得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乃是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之致命伤。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宣传虽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至今能够明确地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人，可说是很少很少，无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关于安那其主义的种种奇怪的误解。甚至有人在安那其主义的名义之下宣传反安那其的理论。

在这多年的痛苦经验之后，我曾几次抑下了奔腾的血潮，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来观察，来构思，来研究。其结果便有了写

^①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署蒂甘著。

一部正确地解释安那其主义的书之计划。我以为这是不可缓的工作，曾几次与高德曼通信讨论到这事。她告诉我柏克曼有一部这类的书正在著述中，希望我将来把它译出。我会见柏克曼的时候，他因为病的缘故，还不曾写完他的书。我自己的书也因为忙的缘故，只写了大纲，并未起稿。直到从欧洲回国后的今年才读到了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的ABC》一书。

诚然我说过安那其主义的文献极其丰富。可是其中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欧洲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前写的，所以近十几年来的经验并未曾被利用，这是可惜的事。我们知道这些经验是极其重要的，它使得安那其主义在战略与方法方面都必须有新的改变，新的修正。欧洲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掘了资产阶级的坟墓，揭穿了社会党的黑幕，促进了民众的觉悟，使他们更明白自己信赖自己组织之必要。俄国革命指示了社会革命之可能，而且靠工农阶级的自己努力，解决了许多革命的改造与防卫的问题；换言之，未能达到目的的俄国革命却替安那其主义解决了许多问题。

柏克曼的著作确实是把这些经验充分地利用了。而且他的书还有一种长处，就是浅明，诚如他自己寄我的信上所说：“这书的体裁是非常简明，非常通俗，对于那些完全不懂得社会问题的工人也很适宜。”

然而我并不曾翻译柏克曼的书，我却在写我自己的书。自然我的论据大部分是从他的书中抄袭来的（为了方便的缘故），但我却时常用我自己的言语，我的主张也不是和他的完全相同。在书的结构一方面，我虽然极力模仿他，但我也删了

几章又另加了几章。柏克曼的书大体是很好的，不过因为一则他的书是写给美国工人读的；二则在有些地方他也许是太 idealist^①了。而克鲁泡特金不是的。所以我只抄袭他的大部分论据，而不翻译他的书。自然没有他的书则我的书决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写成的。

我们安那其主义者没有教主，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信徒，因为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不过在大体上我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②这就是说我信奉克鲁泡特金所阐明出来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所以如果有人读了这书，觉得我的安那其主义是和大部分中国安那其主义书报所说不相同或者还相冲突的话，那么请他们原谅我，因为我只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

我现在并不是一个战士，所以这本书里面缺少煽动的情，只有理论的解释。我可以公平地说这不是一本宣传的书，这是一本解释的书，它的目的只是在用极其浅明易解的话语给人们说明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主义又不是什么。

① idealist(英文)：理想主义者。

② 自然，克鲁泡特金对于某一个特殊问题的意见，我有时也并不同意。

我们的宣言*（《平等》发刊词）

“平等，平等！”一个何等美妙的名词呵！你是几千年来平民的脑筋里唯一的理想，你是许多人渴慕仰望的福音，为了你，为了要求你的实现，我们无数的同胞已牺牲了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切了。美国的独立，法俄的革命，这几次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哪一次不是为的是你，血战场中河一般流着的腥血，山一般堆积的尸骨，断头台上，绞绳和利刀下殷殷的血斑，监狱内囚犯的眼泪以及陋巷茅屋中妇人小孩啼饥号寒的哭声，哪一样不是为了你。这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已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了！

然而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却是一个多末不平等的社会啊！一条大的沟把人类分成了两个大的阶级，掠夺者和被掠夺者，有产者和无产者。一些人个人每天的浪费足以养活一千多家的人还有余，另外一些人连每天必需的饮食也难得到。一方面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另一方面吃的残汤剩饭，穿的破衣烂鞋，住的茅屋陋巷。一方面穷奢极欲，一方面贫困惨苦。一方面许多的富人全不作工，毫无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平等》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产，只靠着他人的劳力而生活，他们享受各种娱乐，花费许多金钱，雇用许多仆人，占据许多房屋，垄断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的贫民去寻找工作却找不到，他们的家族受着饿，受着冻，受着极大的困苦。有工作的，每天挥着汗来养活家族，因为工作过度，饮食恶劣，到了三四十岁便死去了，留下他的妻子儿女受苦。这是何等的可怕呵！然而还不只此，一阶级的人握着另一阶级的人的生杀之权，可以任意的加以杀戮囚辱，而别一阶级只有匍匐去就死。

“饿死了，冻死了，平民什么权利都被剥尽了，到后来你们只有含泪吞声的哀悼你们自己的命运，然而那些靠着你们的恩惠而生活着的无耻的富人们却公然在举酒狂饮呢！”我们一读十八世纪末期流行于法国的这首歌曲，谁能不为他们流一掬眼泪呢？然而可痛的是，这正是为我们自己的写照！

翻开一部历史来看罢，那光荣灿烂的记载未尝不冠冕堂皇，然而字里行间，哪一处不是世代流离辛苦的平民的血迹。好血腥呀！难道我们竟不能闻着么？我们的祖先的血也已流够了，我们自己的血也已流够了，难道我们子孙的血还应该继续的流下去么？

我们一样的是血肉的身躯，一样的有天赋的智慧。我们辛辛苦苦地造成了现社会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还应该匍匐在一阶级的势力下面，沉沦在贫穷的苦海之中？

“平等！平等！”从这被苦痛贫穷悲惨等所包围着的穷人的世界中，洪亮的钟声响起来了。

我们不愿意再做被压迫的奴隶，我们不愿意再做那在命

运之神势力下过活的弱者。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权力。我们要来要求“平等”。这不平等的社会应该消灭，不平等的阶级应该铲除，人治人的机关，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我们的工具，政府法律军警等等应该打倒。

我们要求的是经济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人人都能享同样的幸福，尽同等之义务。没有主人，没有奴隶，没有政府，没有平民，没有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持着大旗向着这自由平等的社会猛进。我们的旗帜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它的方法便是“革命”。

有了“革命”，我们的“平等”才不是空想，有了“革命”，我们才能打碎奴隶的镣铐而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都是革命党。

白纸上印了黑字的这每月一张的小小刊物，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唯一武器，这不过是我们的呐喊，我们的旗帜，唤起我们同胞的一片钟声。在这里有我们主张的说明，在这里有我们运动的记载。有的是如火如荼的激烈风潮，有的是点点滴滴的血泪结晶。沉沦与黑暗世界中的未觉醒的同胞以及一切同情于我们的人请快来团结在平等的旗帜下罢！我们愿推起二十四生的大炮为你们的前驱！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序]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从日文和英文读到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欣喜若狂，这里还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无一例外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书；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多数来自网上。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著者、译者和我（编者加少数文章的作者），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B-英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目前收集到以下史料入文库：

A-1：《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2：《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A-3：《芝加哥的殉难者》，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4143-9

B-1：《政治正义论》，葛德文著，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C-1：《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赵京编辑ISBN: 978-0-557-19209-0

C-2：《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赵京著，ISBN: 978-0-557-01635-8

C-3：《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赵京著，ISBN: 978-0-557-03086-6

F-1：《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著，孙晔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J-1：《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巴金、赵京译著，ISBN: 978-0-557-23538-4

R-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R-2：《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R-3：《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R-4：《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R-5：《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R-6：《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R-7：《俄罗斯革命的先驱》，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2345-9

S-1：《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巴金、赵京译著，ISBN: 978-0-557-17055-5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Dr. Jing Zhao,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9年12月31日

定价Price: \$18.00

ISBN 978-0-557-19209-0



ID: 7896933
www.lulu.com

9 780557 192090